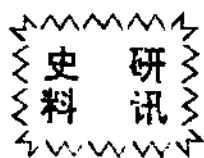


目 录

| | |
|--------------------------|-------------------|
| 勘建九龙炮台文牒选····· | 刘蜀永 整理 (1) |
| 醇亲王使德往来文电选····· | 丁 山 整理(32) |
| 至德金陵济南周氏家祠碑记····· | 郝庆元 整理(58) |
| 高阳土布档案选····· | 宋美云 整理(75) |
| 清国留学生招聘策····· | [日]矢野文雄著 云述译(95) |
| 梁启超致犬养毅手札····· | 陈占标 整理(100) |
| 井上雅二日记····· | 郑大华译 薛军力校(102) |
| 安徽讨袁檄文····· | 张炳湘 整理(133) |
| 孙中山佚文两则····· | 陈建明 整理(138) |
| 往事回忆····· | 叶恭绰(141) |
| 军阀与西方国家的军火贸易(1920——1928) | |
| ····· | [加]陈安东著 沈自敏译(177) |
| 英国对华政策····· | 张晓东 蔡洪波译(250) |
| 孔祥熙致唐绍仪密函····· | 学通译 沈自敏校(278) |



史料

研究

迫清帝退位通电列名者考·····张黎辉(280)

勘建九龙城炮台文牍选

刘蜀永 整理

编者按：本篇资料系自《勘建九龙城炮台全案文牍》中选出。

《文牍》原共有83件，删略其内容重复者，现刊出22件。全文复印件由香港大学霍启昌先生提供，并撰写前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蜀永标点整理。

说 明

本人致力于香港史研究多年，一直非常重视搜集中文文献中有关香港地区的史料，足迹曾遍及欧美日各主要藏书单位，但所获成绩仅是差强人意。偶尔从清代外交档案中发现几件此类文件即如获至宝。1983年本人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请回内地访问，到国内各大藏书单位调查了香港史资料收藏情况。在广东中山图书馆，承蒙各位负责同志热诚襄助，得能阅览《勘建九龙城炮台全案文牍》（以下简称《文牍》）。当本人知道这是一部有关九龙城历史的一批珍贵第一手史料时，喜悦的心情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

近时香港政府由于中国收回香港日渐迫近，开始着手处置九龙城寨内的僭建楼宇，九龙城寨再次成为香港报章报道的热门话题。鉴于时下出版的中文书刊，能够提供清代九龙城历史的资料极为有限，为了使国内同胞和本港居民能够清楚认识英人侵占前九龙城的实际情况，经《近代史资料》编辑部同意，请刘蜀永兄

对《文牍》进行标点整理后刊出，以飨读者。部分文件因内容重复或不甚重要，略而未刊。

《文牍》收录的这批文件的史料价值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它对研究香港地区本土历史和清代社会生活提供了难得的宝贵资料。二、它帮助我们了解，英国夺取香港岛以后，清朝政府对防御英人入侵采取过什么对策。它对研究当时的中英关系提供了其他档案并未收录过的重要史料。

九龙寨隶属新安县管辖，但距离县城甚远，《新安县志》有关当地地理环境和文物古迹的记载十分简略笼统。

兴建九龙寨城之前，两广总督曾派员前往当地作实地勘察。

《文牍》中收录的这方面资料，系专委勘察的记录，自然较县志记载准确详细得多。

《文牍》对九龙城兴建过程、所用费用、城寨地势、城墙及城内建筑物的方向、尺码、用料和炮位多少等，都有极详细的说明。对建城过程中因清拆民房、征用民田给予补偿的情况也有提及。这些不仅是研究香港地区本土历史的有用资料，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建筑工程和清代社会生活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鸦片战争爆发之初，钦差大臣林则徐曾奏请在九龙半岛的尖沙咀、官涌修筑了炮台两座，并购办大炮五十六门，派兵八百余名驻守在炮台附近山梁。这两座炮台是清政府为防御英人侵夺九龙半岛而建立的第一条防线。可惜琦善担任钦差大臣之后，在英人武力胁迫之下，竟答应从尖沙咀一带撤防。英军小股部队乘虚而入，毁掉林则徐所建两座炮台，因而引致其后要在九龙寨修筑寨城，重新建立另一条防线。清朝当局修筑九龙城的动机可从耆英的奏折中得知。他写道：“查九龙山地方，在急水门之外，与香港逼近，势居上游，香港偶有动静，九龙山声息相通。是以前经移驻大鹏营副将及九龙山巡检，借以侦察防维，颇为得力。第山势延袤，驻守员弁兵丁无险可据，且系赁住民居，并无衙署兵房

堪以栖止，现值停工，又未便请动公项。英夷虽入我范围，不致复生枝节，而夷情叵测，仍应加意防备。今于该处添建寨城，用石砌筑，环列炮台，多安炮位，内设衙署兵房，不惟屯兵操练足壮声威，而逼近夷巢，更可借资牵制，似于海防大有裨益。”^①遗憾的是，《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有关修建九龙城的史料仅此一件，以致以往香港史论著中，对建城情况无法作出详细和准确的描述。《文牍》的发现，使得我们能够弥补这一缺憾了。

清政府筹建九龙寨城竟然间接影响到整个广东防务的加强，则是我们意料不到的。而这鲜为人知的史实又是仅在《文牍》中得以看见，值得向读者作些介绍。

1841年1月英军攻陷大角、沙角炮台，2月攻陷虎门炮台，3月占领广州以南珠海等炮台，5月又占领城外所有炮台。经过英军多次入侵，广东一带海防已形同虚设。1841年7月，奕山将军上奏道：“逆夷退出外洋，缴还虎门各炮台。当即飞飭查勘，安兵驻守去后。兹据先后禀称：各炮台仅余基址，或被拆卸，或被轰碎，无可栖止。炮位大者无存，小者亦皆残毁，禀请勘估前来。奴才等查虎门内外各炮台，百余年来，扼要添设，未雨绸缪，工坚械备，一旦撤守，为逆夷铲平，去其所畏，遂致闯入内河，逼城分泊，拚死求和。尔时省垣可守者，仅一东炮台，其西炮台及海珠炮台，早皆为所击坏，今夷船退出，而诸隘为之一空，若急于修复，凡鸠工庀材，添铸炮位，非一二年不能一律完固。”^②稍后奕山又复禀告：“粤省自省河失防之后，器械船只皆为焚毁，所余水师巡船，仅可哨操，不能抵御。”^③

此后，清廷力图重整广东海防武备，但由于经费缺乏，未能认真办理。但想不到下令广东官绅捐输筹建九龙寨城的经费，所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十六，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010—3011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72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179页。

得成绩竟大大超出预想的数目。此段史实可从《文牍》收录的一篇奏章得知。1847年6月16日，耆英、徐广缙奏告：“至各官绅捐输经费，自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初一日起，至二十七年三月初十日止，共收洋银四十三万二千六百七十三两。又阳江镇，据阳江县知县朱庭桂率同绅士谭鸿义等，收捐洋银三万六千零二十两二，共实收洋银四十六万八千六百九十三两，均经先后解缴广州府库，除支給九龙工费外，尚存盈余银四十三万二千六百九十三两。”①

两广总督耆英即恳请朝廷批准，将盈余款项作为在虎门海口及省河一带筹建炮台、营造兵房、储备火药、修葺粤省城垣及增调弁兵驻守城垣各事宜之用。后经道光皇帝朱批御准，下旨内阁转令耆英从速按照原奏筹办一切，以便尽早强化广东的海防。

《文牍》对事情的经过和使用盈余款项的计划有详细的报告。《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十八中收有耆英“奏请于虎门并省城添兵”的奏折，但内容简略，且未提经费来源。相比之下，《文牍》所收有关文件的史料价值显而易见。

香港大学 霍启昌

一 恳请将委勘缘由行令有关官员稟

敬禀者：本月十五日接奉宪札，内开准署阳江镇沈文称，会同阳江县朱令，劝谕绅士谭鸿义等，捐资添建九龙炮台，并该处副将、巡检各衙门、兵房，业经汇缴经费银二万四千五百余两等由。飭委卑职驰赴九龙，逐一勘估，绘图造册，呈缴察核等因。奉此，遵查前项工程系现署阳江沈镇台劝捐呈报，内有衙署工程，从前委经署新宁县乔应庚勘估，原拟发帑兴修，现在一律捐办。所有原估式样及现造情形，均须悉心妥议，据实勘估。合无仰恳宪台咨会阳江镇，并札飭乔令会同勘报，一面将委勘缘由行

① 《耆英徐广缙奏请奖叙捐资官绅及酌提捐资盈余备支各项要工折》。

令该管地方官一体遵照，并请飭发全案卷宗，以备查考。是否有当，理合具禀大人察核。肃此，具禀。恭请福安，伏乞垂鉴。卑职谨禀。

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禀。

二 顾炳章、乔应庚复核勘估工程情形禀

委员广东试用通判顾炳章 谨禀 官保中堂大人 阁下敬禀者：道光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接奉宪札，飭委卑职等，随带委员丰顺县汤坑司巡检袁润业，前赴九龙地方，立将应建城寨炮台及原估复核，每处实需工料、银两若干，绘图造册，呈缴察核，毋稍浮冒饰延。又奉宪谕，前项工程基址，必须相度形势，悉心筹划，以期妥善等因。奉此，遵查新安县属九龙山地方，于道光二十三年奏明改调大鹏营副将一员，九龙司巡检一员驻扎，控制该处。原设九龙炮台一座，议应改修，并建文武衙署、兵房。先经奉委候补知府倪守及卑职应庚，先后分别勘估册报，尚未兴办。复经现署阳江镇沈镇督同阳江县朱令，劝谕绅庶报捐经费银二万数千两。缴经奉发广州府贮库各在案。兹奉前因，卑职等遵即前赴九龙山，会同地方文武各员查勘，得九龙山在新安县之东南，距城陆路一百里，水路一百八十里。山形如弓，湾长二十余里，南面临海与香港之红香炉山、群〔裙〕带路等处隔海对峙；北面依山傍田；东为鲤鱼门，直达大洋；西为尖沙嘴，内通虎门。该山居民聚处不一，多系耕种捕渔为业。惟中间附近白鹤山五里以内沿海一带，店铺民房数百余户。按志书内载，名曰九龙寨。现在副将、巡检皆驻扎其间。此九龙山地势情形也。复勘城基，非形势未协，即地盘低窪。惟白鹤山南麓下，离海边三里，一片官荒，地平土坚，风水亦利，既无坟田相碍，亦无潮水淹浸。就此建筑城寨，核与防海卫民题义相洽。当经勘丈明确，拟建石城一座，

北坐南向，圓围一百八十丈，高连垛墙一丈八尺，厚一丈四尺。城门、敌楼各四座，即以其方名。西门坐居兑方，建而不开，以利方向。一切工程做法考古阅今，参之城寨、炮台，并行不悖。城上敌台东、西、南三面配炮三十二位，北面依山，无庸备炮。城内开池，广深各一丈，另水井二口。通衢街道俱铺石板。正北建武帝庙一所，东北角建副将、巡检衙署各一所。西北角建演武亭、大校场、军装火药局并兵房十四间。东南、西南空地预备民居，毋致兵民互杂。城之前面，旧有九龙炮台一座，建自嘉庆十五年。其台原在佛堂门，因孤悬难守，移建于此。台周三十一丈，南面安炮八位，其余三面均系马墙。今拟将南面加高培厚，官厅、兵房一律修葺，添易三千斤炮二位，足为城寨犄角之势。至于城之东北角大竹园山，及西南角尖沙嘴两处，各设卡房烟墩，由九龙协拨兵驻守，声气联络，藉通策应。城之北即白鹤山，仅离城十余步，登山俯览全城，如在膝下。虽山背附近竹园村堪资援应，第高阜据险，究不可不妥为防范。今拟城北添筑腰墙一道，圈围山顶周一百七十丈，高八尺，厚三尺，酌开长形枪眼，旁设耳门，中建望楼，以杜抄袭，而期周密。至于^{九龙副将}_{九龙协镇}时赴香港巡查弹压，若坐三板脚艇，不足以壮观瞻，拟造大快船一只，长五丈二尺，宽一丈二尺，式样与省河沙尾艇大略相同。前项新建城寨、台汛、望楼、神庙、衙署、兵房、演武亭、军装火药局以及快船并改修炮台一切工程物料，确访时价，详细核明，共需工料价银二万六千七百两，先发九成成圆库平花银二万四千零三十两。所用丈尺系工部尺，委系实在，无稍浮冒。此勘估工程做法之情形也。除将未尽事宜及应行兴革各事另列清折附禀呈缴外，理合将勘估工程银数分别造具妥册，绘图贴说，据实具禀。是否有当，伏乞大人察核，并请另委大员复加勘估，委员督绅承办，实为公便。卑职应庚前估衙署工程做法丈尺，现经卑职炳章会同复勘，悉属妥协，合并声明，伏乞垂鉴。恭请福

安。除稟督抚宪暨覆所宪外。卑职^{运藩登粮泉}谨稟。

计稟缴确估工程银数简明总册一本，地理总图一纸，工程造作图一纸，另清折一扣。

红稟由：具稟奉委勘估九龙城寨、炮台、神庙、衙署、演武亭、兵房、药局、台汛、望楼、快船，另改修九龙炮台等项工程，履勘地势，确估银数，绘图造册，并将未尽事宜备具清折，候察核批示由。

一稟督抚宪^{运藩登粮泉}复所宪。

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二十五日稟。

（借用南海县印，借用广粮分府关防）

三 列折呈候察核未尽事宜稟

委员^{广东试用通判顾}谨将奉委勘估新安县属九龙城寨炮台案内，除具稟绘图造册申复外，尚有未尽事宜，理合逐款列折呈候宪核。

计开

一、城寨兴工，应请给示晓谕也。查九龙地方，铺民云集，渐成市镇。奉经奏明设官建署，并筑造城寨、炮台、巡船，实为捕盗卫民起见。此次兴办，大工、匠役人等五方杂处，该工匠与铺户居民必须和衷相处，各安本业。勘城基本属官荒，该地方人民毋得任意阻挠。其有干碍城基之平民房屋二十余间，兴工之时例应拆卸，听候印委各员勘验明确，酌给工价，另行移建，以示

体恤，而昭核实。至饭铺、歇店稽查宜周，毋得容留匪徒，以及开场聚赌。在工匠役、小工人等务遵条规，听候督工委员管束，不得酗酒打架，滋生事端。尤不得三五成群私往别处游荡。所买米粮食物，现钱交易，不准强賒勒买。各店铺亦不得高价居奇。该营县巡检之兵差、弓役人等，尤应守法奉公，实力巡缉。如果始终勤奋，工程完竣，准由该管各员择尤稟请上宪，分别超拔奖赏。倘敢阳奉阴违，需索扰累，以及土人、匠役不遵示禁，滋事误公，均应从严究办。

一、建筑城寨应拆民房请给予工价，作正开销，以示体恤也。查所勘九龙城寨东南、西南角一带，民房数十间，除圈入城内无相关碍不计外，内有逼碍城墙基址，必须拆卸之民房约十余间，又两屋相连拆此废彼应行全拆之民房六七间。前项房屋低下无楼，虽原建工本不多，而穷苦小民应宜优加体恤。请俟兴工时，由督工委员会同地方官勘估明确，实在应拆民房若干，每间应补给工本银若干，绘图造册，报候宪核。所给工本银两，准其入于工程项内，另款支销，毋庸地方官捐给，以示体恤。

一、匠役人夫责承匠头造册具结，呈由督工委员填给腰牌，以便稽查也。查此次工程应用匠役小工人数众多，诚恐良歹不一，应责成承办匠头妥为招雇。无论石匠、木匠、泥水匠、铁匠及小工人等，均以十名之中设立头人一名，分班别类，各有管查。仍将各项头人、工匠造具姓名、年籍清册，取具连环保结，呈请督工委员按名填给腰牌，以凭稽查管束。如有离工告退，即将腰牌缴销。倘滋事不法，偷盗逃匿，应将该班头人并原保匠头分别查究严办。

一、九龙山石准令匠头开采，工竣封禁，以昭慎重也。查本省历办炮台应用八寸方砧石，每丈报销工价银一两二钱至一两九钱不等。因时地估计办理，悉属实在。此次勘估八寸方砧石，每丈工价银七钱六分，按九成折实银六钱八分四厘。缘九龙出产石料

采运容易，是以工价便宜。应请行令地方文武会同督工委员给示晓谕，准令工匠专在于九龙寨附近开山取石，不得前往香港山场开采滋事。所有石匠仍归承办匠头造册管束，以专责成。工竣之日，即行封禁，由九龙协暨九龙司巡检就近稽查。

一、工程添改随时报勘，并予限期，以归核实而速藏事也。查此次勘估工程，业经造册分晰明白。第工程浩大，尚有零星工作，勘估未及周备，及兴工之后，别有应行添设移改并更易原估做法各事宜，应由督工委员随案报请勘办，仍将原估工程银数应除应抵，随案声明。至兴工之日应如何酌定，限期具报。工竣应请飭令督工委员核议禀复，俾得克期藏事，毋致旷日持久。

一、工程完竣，请予以保固年限，以重公事也。查例载城垣保固三十年，海塘保固三年，又本省历办炮台工程均保固十年。此次土民捐筑九龙城寨工程，做法实与炮台无甚区别，且建在海滨，又非内地城池可比。应请比照炮台成案，工竣之日起限，保固十年，以归画一。

一、在工委员酌定薪水等银，以资办公也。查本省历办军需善后工程，在事员弁均给薪水。此次建筑城寨、炮台，本属善后之事，而航海办公尤为劳苦之差，似宜酌定薪水，以示体恤。今拟督工委员一员，每月薪水银五十两；帮办委员一员，每月薪水银三十两；九龙协弹压地方，月给赏犒弁兵费用银二十两；九龙司巡检专司巡缉，月给缉捕费银一十五两；在工书写一名，每月工食银三两；就近拨派营兵、弓役共八名，每月每名口粮银一两，共银八两。以上每月薪水等银一百二十六两，酌定八个月为限，共计银一千零八两。至于兴工之后，委员往来船价，以及工次搭盖篷厂银两，应由督工委员据实开报，与薪水口粮一并入于工程项内，作正支销。

以上各条，卑职等体察情形，管见所及，是否有当，统候宪台察核施行。

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二十五日稟呈。

(借用南海县印，借用广粮分府关防)

四 复勘九龙寨山海形势古迹等稟

谨将复勘新安县属九龙寨地方山势方向，海面宽阔，附近山场古迹，查明原旧尖沙嘴炮台建废缘由、存炮数目，逐列折呈候宪核。

计开：

一、九龙寨山势坐北向南，其来龙自东北之虎头山，旋转至西北乾方九龙澳，折入坎宫，白鹤山为主山。该山南面临海，东南直对鲤鱼门水口，归于巽位，山水气脉均佳。今城寨建于白鹤山南麓下，城门方向以坐山坎卦为主。北门宜开于坎宫伏位壬方，主兴旺。南门开于离宫丙方，为延年门，主益寿。东门开于巽宫巽方，为生气门，主荣昌。西门开于乾宫乾方，主高爵厚禄。按山形局，拟开四门，均属大吉。惟前面离方水大，宜于鹤山上添建镇海楼一座，供奉北帝神像，另于高坡处所，酌安炮位，以镇风水，更为周密。

一、城内水池开于东南角，生气巽方，与副将衙署对照，主大吉。

一、九龙城寨南门，城脚量至九龙旧炮台处，计长一百二十丈；由炮台量至海边三十余丈。统计南门至海边一百五十余丈。

一、九龙城寨海边与香港之红香炉山隔海相对，离海面宽一千余丈，约有五六里。九龙寨城东南首，即鲤鱼门海口，宽约四百余丈。九龙城寨西首尖沙嘴与香港之群[裙]带路隔海斜对，海面宽约五百余丈。其九龙城自西边尖沙嘴至东边鲤鱼门，山径旋环共约二十余里。

一、白鹤山在九龙城寨西北。志书内载，上有游仙岩，岩下三小石，形如品字。上盛一巨石高约六七丈，广约三丈余，壁立

难升。石北刻游仙岩三字，第年远，字稍模糊。昔尝有白鹤一双棲止石上，故名。

一、鲤鱼门在九龙城寨之东南，相离海面约五六里。

一、佛堂门在鲤鱼门之东南，相离鲤鱼门约十里，志书内载，佛堂门又曰铁砧门，旁有巨石长二丈余，形如铁砧。潮汐急湍，巨浪滔天，风不顺，商船不敢行。其北曰北佛堂，其南曰南佛堂。两边皆有天后古庙，北庙创于宋咸淳二年，庙之右曰碇岗湾，古有税关，今废，基址犹存。至南佛堂之山，乃孤岛也。康熙年间设炮台一座，以御海氛。嘉庆庚午，知县李维榆详请移建此台于九龙寨海旁，即现在修建九龙之旧炮台也。查该炮台方围三十一丈，南面临海，配炮八位，东边开门，内有官厅、兵房共十间。

一、虎头山在九龙城寨之东北，离城寨四五里。志书内载，虎头山怪石嵯峨，险峻难行，然实当冲要道。乾隆壬子年，土人捐金，两边砌石，较前稍为平坦。查该山附近大竹园村，此次所建卡房、堆台，即在虎头山腰处所。

一、官富山在九龙城寨之西北，离城寨五六里。志书内载，官富山下为官富寨，县治东南八十里。原设官富司巡检，因衙宇久坏，莅任者多就居民舍。康熙十年，巡检蒋振元捐俸买置离县城三十里之赤尾村民地，建造衙署，仍以官富司名。今奉改设九龙司，所有赤尾村衙署仍存其旧。

一、官富山，志书内载官富驻蹕。宋景炎中，帝舟幸于此，即其地，营宫殿。今土人将其址改建北帝庙。其官富司衙署基，今名衙前村。查该处村民不过二十余户，地盘不甚广阔。

一、宋王台在官富山之东，九龙城寨之西南角，离城寨一二里。志书内载，山顶有盘石，方平数丈，宋帝昀驻蹕于此。台侧巨石有宋王台三字。

一、前稟估册所称垛墙，即城上之垣也。查《太平御览》内

载，城上垣谓之睥睨，言于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陴，助城之高也。亦曰女墙。所谓堞，即女墙也。

一、前禀估册筑城前后砌石，中用泥土。今阅《圣武记》，书内云：凡砖石之城，中用沙土，炮不能透，大炮遇沙即止等语。今拟照办，中用沙土。

一、尖沙嘴在九龙城寨之西南，离城寨约陆路十里，水路十余里。该尖沙嘴地方于道光二十年三月建造炮台二座，一名惩膺，一名临冲，共配铁炮五十六位，分派大鵬左右两营防守。嗣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奉文，以该二炮台不足御侮，飭将原配炮位、药弹运赴新安县城防堵。其二处炮台旋经坍塌拆毁。今查原运赴新安县城炮位，自七百斤至五千斤，止共五十六位。除经水师提标中、右两营拨配贞吉第十、二十三号战船大小炮位四十位外，尚存新安县城五千斤炮一位、四千斤炮一位、三千斤炮四位、二千五百斤炮六位、二千斤炮二位、七百斤炮二位，以上存炮十六位，将来堪以运赴九龙城寨配用。再，查所存新安县城炮十六位，内七百斤铁炮二位。据水师提标左营游击陈魁伦移称，该七百斤炮二位已经拨运师船，行至海康县属洋面，遭风失水，通报有案，并以声明。

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委员顾谨呈。

（借用广粮分府关防）

五 造具膛样并开列简明清折呈核禀

谨将奉委勘估九龙寨城、庙宇、衙署，除另造工程做法估册禀缴外，理合造具膛样，开列简明清折，一并呈候宪核。

计开

一、九龙寨山势座北向南，其来龙自东北之虎头山，旋转至西北乾方九龙澳，折入坎宫，白鹤山为主山。南面临海，东南直对鲤鱼门水口，归于巽位，山水气脉均佳。今城寨建于白鹤山南

麓下，城门方向以坐山坎卦为主。北门宜开于坎宫伏位壬方，主兴旺；南门开于离宫丙方，为延年门，主益寿；东门开于巽宫巽方，为生气门，主荣昌；西门开于乾方，主高爵厚禄。按山形局拟开四门，均属大吉。

一、原估寨城周围一百八十丈，内东西南三面高一丈三尺，厚一丈四尺。另外垛墙高五尺，厚二尺，连城墙共高一丈八尺。其北面城墙不配炮位，城墙厚六尺余，与东西南三面城墙同。

一、原估城墙外面用八寸砧石三层，内面用八寸方砧石二层，中心用黄泥并沙筑成，垛墙全用八寸方砧石砌。

一、原估后山腰墙一道，圈围山顶。其围墙长一百七十丈，高八尺，厚三尺，均用大块石筑砌，酌开长形枪眼。每个高一尺六寸，阔宽七寸。

一、乔令初估副将及巡检各衙署，每所头门、仪门、大堂、二堂共四进并无三堂。今另加添三堂一进，所有工料仍照初估，银数并不加增。

一、遵查三、四、五千斤铁炮炮身长不过五、六、七尺。今城上敌台厚一丈四尺，除安炮外，尚有余地六七尺，足敷施转。理合督明。

一、新建寨城一座，后山腰墙一道，武帝庙一所，衙署二所，演武亭一所，兵房十四间。另外新建虎头山等处卡房、墩台二所，修建旧九龙炮台一座。统共工料银二万六千三百五十。九成折实库平花银二万三千七百余两。另有篷厂及往来船价并委员薪水，均不在此数。理合督明。（以上系用手折进呈）

遵查原估九龙城周围长一百八十丈（原估长一百三十五丈）。内东西南三面城墙高一丈三尺，厚一丈四尺，另外垛墙高五尺，厚二尺，连城墙共高一丈八尺，均用石砌。理合督明。

遵查原估北面城墙不配炮位，墙厚七尺余，与东西南三面同。理合督明。

遵查原估后山腰墙周围长一百七十丈，高八尺，厚三尺，酌开长形枪眼，每个高一尺六寸，阔七寸，均用石砌。理合督明。

遵查三、四、五千斤铁炮炮身长不过五、六、七尺。今城上敌台厚一丈四尺，除安炮外，尚有余地六七尺，足敷施转。理合督明。

遵查城内餘地直深四十余丈，横阔五十余丈。所建副将衙署，深不过十余丈，前面多有空地。理合签明。（以上五款系用红签贴牆样）

附近南面并东南角建成南面城，长六十九丈，厚一丈四寸，高一丈五尺四寸（照原估加高二尺四寸）。另垛墙高五尺，厚二尺二寸（照原估加厚四寸）。

东西南三面，上城面厚一丈四尺，下墙脚厚一丈六尺。东面、西面城共长六十六丈，高一丈三尺，厚一丈四尺。另垛墙高五尺，厚二尺二寸（照原估厚四寸）。

北城长六十四丈（照原估加十九丈），高一丈三尺，厚七寸（下厚八尺，照原估下加宽一尺）。另垛墙高五尺，厚二尺二寸（照原估加厚四寸）。

统共城台百九十九丈（照原估加十九丈）。城内横量七十丈零七尺，直量三十五丈二尺。

道光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呈。

六 九龙炮台及其配台情形稟

谨将大鹏协左营九龙炮台建造年月日，高宽长尺及配台弁兵炮位数目开列呈电。

计开

九龙炮台一座。查该炮台系嘉庆十六年建造，周围城墙共长三十一丈，城墙高一丈一尺。垛子四十二个，每个高三尺。前面城墙马道宽一丈三尺五寸左右，后城墙马道宽五尺。内营房一十

间，樵楼一间，派防千总一员，配合兵丁四十二名。另协防外委带兵二十名，分驻九龙海口汛。

配合炮位内，二千斤生铁炮三位，一千五百斤生铁炮一位，一千二百斤生铁炮一位，一千斤生铁炮一位，七百斤生铁炮一位，三百斤生铁炮一位。

七 请饬发第一批工程经费禀

委员^{试用通判顾}_{署新宁县事候补知县}谨禀大人阁下敬禀者：案奉宪札，飭委卑职等督办九龙寨城、衙署、兵房工程，遵照批详条款章程，随时查照办理，一面先赴广州府库，请领取存捐项购料兴工等因。查此项工程禀准十月初七日兴工，卑职等于初三日带同各匠由省起程赴工办事，业将兴工日期并请颁发钐记各缘由禀报在案。兹奉前因，理合缴具印领一纸。禀请宪台迅飭广州府，拨发原收九龙捐项第一批成元库平经费花银四千两，以便购料兴工。除将请领经费数目呈报广州府备查外，理合禀候大人察核施行。再所领工程经费，按批请领，每批缴具骑缝领结，一样两纸，注明印领、堂领字样。内将印领一纸报缴登复所，其堂领一纸，呈交广州府，以备查考，而昭慎重。合并声明。肃此，具禀。恭请福安，伏乞垂鉴。卑职 谨禀。

一禀登复所。

计禀缴请发第一批工程经费花银四千两印领一纸。

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初二日禀。

（借用广粮分府印）

八 兴工祭土神祝文

维道光二十六年岁次丙午十月初七己未日，督办九龙城工

委员^{署广东新宁县知县}_{广东试用通判}乔应庚^{判顾炳章}_{袁润业}谨以鬯柔毛、庶馐、香帛之仪，敢昭

告于本境山川土神前而颂曰：山川毓秀，土地效灵。选择斯境，建立寨城，涓吉兴造，浩大工程。惟祈默佑，不日告成。官民集庆，庶物咸兴。虔告。尚飨。

九 拆卸民房补偿银两晓谕

督办九龙城工委员候补粮捕分府顾为晓谕事：照得九龙地方建造城池，凡有阻碍城基之房屋，例应迅速拆卸。当经会同地方官勘丈妥办，应拆梁兴德等平民房屋十六间，取结在案。查例载，拆卸民房，每间给银二两八钱至五两不等，是应遵照办理。惟念该民人梁兴德等均属贫穷，今酌量从宽，每间旧屋给银五两，每间新屋给银七两五钱，统计银二百五十九两一钱七分，照依后开条款数目，按户即日给发，定限一个月內拆卸净尽，拆落料物着原业户一并领回，听其择地建造。其租屋居住之人，迅速交清租价，另行搬迁。至砍伐树木、菜果及搬屋费用，例不给价。今本分府格外捐资赏银一百七十两，分别等次开列于后。此项加赏银两准于十一月十六日照数给领，用示体恤。各宜遵照。特谕。

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十二日示。

十 改变栅门管理办法晓谕

督办九龙城工委员候补粮捕分府顾为晓谕飭遵事：照得九龙直街原有栅门三道，向归各店铺轮流管理，所办极属妥当。惟现在兴办工程，官兵昼夜往来巡缉，各栅门启闭无常。若仍令铺户关锁，未免过于辛劳。今本分府传集谦益等店，谕令专雇栅夫三名，每月每户给工食银一两。自十一月十四日起，至明年三月十四日止，共计工食银一十二两，另加赏栅夫棉衣杂用共银二两，另又新造左右横街栅门二道，约计工料银十两。统计前项银二十四两，由本分府如数兑给，即日发交谦益店领收，俾得酌量妥

办，诚于公事地方咸有裨益。至于新建九龙寨城，原为防海卫民起见，城内地基本属官荒，各店铺乡民如有情愿迁进城内居住者，任从择地建屋，以顺舆情。倘有土棍把持拦阻，立即指名稟控，以凭会同地方官严拘究办。特谕。

右谕通知。

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谕。

十一 奖赏九龙寨附近团练晓谕

督办九龙城工委员^{候补县正堂}_{候补粮捕分府}^乔_{即补县左堂}^顾为奖赏事：现准九龙分司许报称，九龙寨附近各乡团练，择于本月十七日齐集校场，请往阅看等由。准此，当经亲临会阅查看，得该处乡民素著良善，守法奉公。现在农忙事毕，团练乡勇，供〔？〕匪保良，深堪嘉尚。且所阅各壮勇，队伍齐整，技勇成熟，尤为尽善尽美。自应量予奖励，以勉勤劳。为此赏给铜钱六千文，着各团长祇领分派，聊

本县
以尽本分府之微意耳。特谕。

本分县

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示。

十二 九龙街道建筑围墙木栅晓谕

督办九龙城工委员候补粮捕分府顾为晓谕事：照得九龙街尾左右铺户中隔荒地一幅，并无关栏。今在该处建筑碎石围墙一道，宽八丈，高九尺，厚一尺二寸；另于海边街口添做木栅一道。不但地方周密，而且风水更佳。前项应用银两悉由本分府给发。飭令本处匠役陈亚长办理。该处铺户人等，务宜同心照料，以成善举。特谕。

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示。

十三 沥园村港口情形禀

敬禀者：十六日申刻接奉钧谕，飭查沥园港口一节。遵查虎头山后沥园村港口系属内河，径通大鹏营，并非外洋海口。缘九龙协所辖左营兵马钱粮驻扎大鹏，是以拟拨巡船，以资应援。现已将原图添贴浮签，以便考查。至奏案图说，准于十九日恭绘齐备呈缴。肃此，禀复。敬请福安。恭缴宪谕，伏乞垂鉴。卑职谨禀。

计禀缴原图二纸，一夹单禀抚宪。

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禀。

十四 九龙城工拆房补价等四款实报禀

委员^{广东试用通判顾}等^{广东候补知县乔}谨禀^大堂^{保中}人^堂下敬禀者：案奏宪札，飭委卑职等督同汤坑司巡检袁润业督办九龙城工，遵照批详条款章程，随时查照办理。并奉发条款章程一纸，内开建筑城工之应拆民房，俟兴工时估给工价。在工委薪薪水及兵差口粮，酌定八个月为限。又往来船价及篷厂工料据实开报。以上四款用过经费银两，作正支销各等因。奉此，伏查拆卸民房一款，原勘应拆二十余间，内有业主自建自居，亦有转赁别姓开店贸易。安土移建，事不容易，必须体察情形，分别给价妥办，并予以搬运之费。其有砍伐果木，踩踏瓜菜，亦应给赏资本，务使有盈无绌，以仰副宪台轸念民艰至意。当经勘文明确，拆去梁兴德等民房二十一户，计大小平房二十六间。砍伐荔枝树木二十八株，踩踏花生瓜菜地亩四十井，买断陈贤泰、陈杨祐税地四亩五分，另建造街坊石围墙三幅，栅门四道，补建警目院一所，圈出石井一口。以上统共用银八百一十四两。至薪水、口粮一款，初议督办委员一员，月给薪水银五十两；帮办委员一员，银三十两；九龙协银二十两；

九龙巡检银十五两；在工书写一名，口粮银三两，兵丁四名、小差四名，每月每名银一两。以上额定每月薪水口粮银一百二十六两。嗣奉委督办委员二员，照初议添增一员，每月应增薪水银五十两，并以所派兵丁四名不敷差遣，续禀奉提宪酌半支，给每名银五钱。另添雇棚夫、更夫共三名，每名工食银二两。工次油烛纸张杂用，每月银一十两以上。原续薪水口粮杂用，每月银二百零二两，遵照八个月为限，共银一千六百一十六两。另兴工祭土及工竣酬神牲礼分胙，并庙宇开光延僧建醮，酌赏团练乡勇，捐建民间义学，共银三百两，应入于薪水项内支销。统共薪水等银一千九百一十六两。又篷厂一款，查此次工程搭盖篷厂甚巨。内除石匠等一千七百名所盖篷厂，已言明由各匠自行经理不计外，其委员监工厂及兵差住宿并堆贮物料各厂屋，另置器具床板等项，统共用银七百二十两。又船价一款，查由省往九龙经过零丁洋，必须雇用沙尾艇，每天船价银四五两不等。此次工程各委员及官亲、家人往来络绎。若遇爱〔爰〕解经费，则又须移会营员，添派师船，每次赏钱四十千或三十千不等。统计自上年五月查勘至本年五月工竣为止，需用船价、赏犒等银六百六十两。以上四款共计实用银四千一百一十两。实用实销，无稍浮冒。至所请幕友、官亲襄理公事，一切修脯已由卑职等将所领薪水项内自行支送。惟原置器具、床板各物，既经开销正项，拟将各物移交九龙协及巡检衙门公用。为数无多，请免估变。除俟工竣，将买断陈贤泰等山地四亩五分递年应完粮税银六分有零，粮米不及一升，另行禀请，飭县注册豁免粮税外，理合禀候宪台察核。肃此，具禀。恭请福安。伏乞垂鉴。除禀督宪暨登复所外。卑职等谨禀。

红禀由：禀报九龙城工用过拆造民房补给工价并薪水、口粮、篷厂、船价等四款银数据实报销由。

督宪登复所。

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十三日稟。

(用九龙城工铃记)

十五 九龙寨城添筑工程续估银数等稟

委员^{广东试用通判顾}_{广东候补知县乔}谨稟宫保中堂大人阁下敬稟者：案奉宪札，飭委卑职等督同汤坑司巡检袁润业督办九龙城工，遵照批详条款随时查照办理等因。奉此，卑职等遵即前往九龙，会同该地方文武官员，镇静妥办，并将兴工日期及派卑职应庚专管银两各缘由通稟在案。伏查此项工程，原议在九龙建造石城一座，周围一百八十丈，高连垛墙一丈八尺，内东、西、南三面城墙厚一丈四尺，北面城墙厚七尺。后山建粗石围墙一道，长一百七十丈，高八尺，厚三尺。武帝庙一所，副将、巡检衙署各一所，演武亭一所，军装局一间，火药局一间，兵房十四间，城楼四座，堆房六间，水池一口，水井二口，虎头坳、九龙坳等处汛房、烟墩二所。另拆修原旧九龙炮台一座。原估工料银二万六千三百五十两。嗣于兴工之后，因南面地势低窪，商同将南城加高二尺四寸。又因药局、演武亭等皆建在城之东北，地基不甚宽裕，而城外居民多欲迁入城内居住者，故将北城添筑长一十九丈，统计周围一百九十九丈。至原估东、西、南三面城墙厚均一丈四尺，北城厚七尺，城面城脚均系一律。今将东、西、南三面城脚各加厚二尺，北城脚加厚一尺，上侧下宽，以固基址。又将周围马道旁边及内外墙脚，均加筑灰沙城心，添用横马石条。至于神庙、衙署，原估砖墙因恐日久浮松，现将墙脚改用石砌。此外，如城内之开平地基，城外之挖砌壕沟，东门之添筑照墙，炮台之加用桩木。九龙仔坳该土民以地势扼要，稟求添筑三合土围墙三十八

丈。以上所添各项工程，皆系因地制宜，必不可少。将来有料可查，有工可验，不能稍涉虚浮。当复逐一确估，需添工料银五千五百四十两。前复原续工程共估工料银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两，本无虚糜。但卑职等既奉专司其事，固不敢尅扣见长，而于购料支银时，有可量为减省者，亦不得不从樽节办理。现在通盘核算，约可节省银三千两。除俟工竣另行造册具报外，理合禀候 宪台 察核。至前项樽节银两，仍请于工竣时将一半转给新安县发商生息，以备岁修之需，一半作为犒赏。实为恩便。肃此，具禀。恭请福安，伏乞垂鉴。除禀督抚 宪暨登复所外，卑职谨禀。

红禀由：具禀九龙寨城添筑工程续估银数，及请将樽节之项仍行给回犒赏，并发商生息以备岁修由。

一禀督抚 宪登复所宪。

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十三日禀。

十六 释报销部费一事呈文

遵查九龙寨城各项工料，原估银二万六千三百五十两，续估添工银五千五百四十两，二共银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两。现计折实用过银二万八千八百九十两，尚余节省银三千两，已有卑职等禀请将一千五百两，转给新安县发商生息，以备岁修之用。其余一千五百两，拟交沈守留为报销部费，因部费二字未便形诸禀内，故改为犒赏名目用。特陈明，伏乞原鉴。

一清折呈督抚 宪登复所。

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十三日 试用通判顾 谨呈。
候补知县乔

十七 九龙城寨各工一律完竣禀

委员广东试用通判顾 谨禀 官保中堂人 阁下敬禀者：案奉 宪札，飭委

卑职等督同汤坑司巡检袁润业督办九龙城寨、炮台、神庙、衙署、兵房、药局等工程，遵照批详条款章程，随时查办，一俟工竣，稟请委验等因。奉此，卑职等遵即前赴工次，督令承办之六品军功刘金堂、周昭汉等认真建造，业将兴工日期，并原估、续添各项工程做法，确估银数，先后稟报在案。伏查此项工程于上年十月初七日兴工，兹于本年四月十八日一律完竣。卑职等详加查验，所有原估、续添各工程，委系工坚料实，造作如式。用过工料银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两，另又用过拆造民房补给屋价、搭盖篷厂、薪水、口粮等银四千一百一十两。统共报销银三万六千两。实用实销，并无浮冒。除飭该承办刘金堂等另造妥册，呈由卑职等申缴登复所核办外，合将工竣缘由，取具承办，保固甘结。卑职等加具联衔钤结，一并稟缴宪台察核，俯赐委员验收，实为公便。肃此，具稟。恭请福安。伏乞垂鉴。除稟督抚宪暨登复所外。卑职谨稟。

计稟缴承办士民保固甘结一纸，督办委员保固钤结一纸。

红稟由：稟报九龙城寨各工一律完竣，缴具各结，并请委员验收由。

一稟督抚宪登复所宪。

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稟。

十八 顾炳章等九龙寨城工程保固钤结

督办委员^{候补通判顾炳章}今于与结事：依奉结得士民刘金堂、周昭汉等承办九龙城寨、炮台、神庙、衙署、兵房、药局各项工程，于上年十月初七日兴工，兹于本年四月十八日一律完竣。委系工坚料实，造作如式，用过原续工料银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两；另又用过拆造民房补给屋价及运脚、船价、搭盖篷厂、薪水、口粮等银四千一百一十两。统共报销三万六千两。据承办刘金堂、周昭

汉等出具保固十年甘结一案。此工程委系工坚料实，并无浮冒，堪以保固十年。倘有限内倒塌，卑职等照例赔修，中间不扶合加具钤结是实。

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结。

十九 施工占用民地请豁免粮税稟

委员^{试用通判顾}_{候补知县乔}等谨稟大人阁下敬稟者：案奉宪札内开，现奉巡抚部院徐批，据卑职等稟报，九龙城工一律完竣一案，奉批据稟已悉，仰登复所转饬知照，仍将用过陈泰贤等山地应豁税粮，飭县查明详豁等因，转行到职。奉此，仰见大人慎重公事，体恤下民之至意。卑职等曷胜钦佩。伏查建筑九龙城基均系官地，惟西门一处用过民人陈泰贤等山地四亩五分，当经督同九龙司许巡检吊契勘文明确。缘陈泰贤、陈景一、陈杨祐等弟兄三人，籍隶新安县九龙衙前村，于道光十四年冬，开契贾陈观英、陈朝田等祖遗土名九龙洞下则民米税四亩，又土名九龙寨西社下则荒地税五亩五分，共计九亩五分，原价银一十四两，逐年共应完税银一钱六分四厘，米四升四合，系一契买受。兹因九龙寨西社地方建筑城基，用过陈泰贤等荒地税四亩五分，照时值给过价银三两。所有税粮应请注销。其余剩九龙西社下则荒地税一亩，并九龙洞下则民米税四亩，共计五亩，仍归原业户陈泰贤等照常管理，输纳粮税。缘奉前因，合将原勘查验缘由，绘图註说，照抄契纸，呈候察核。卑职等更有请者，此次建筑九龙城寨原为防海卫民而设。该城外铺户居民情愿迁入城内居住者，自应任其择地盖屋。该地方文武各官尤当加意抚循，并飭兵差人等不得藉端需索。如有土匪豪右抑勒阻难，立即严拿解究。仰恳大人俯赐，一并出示晓谕，给发九龙司贴板，在于四门张挂，俾士民周知，共相勉励，实为德便。肃此，具稟。恭请福安。伏乞垂鉴。卑职等谨稟。

计稟缴勘图一纸，并附抄原契。

红禀由：禀缴原勘陈泰贤山地图契，请行县豁除粮税并请出示晓谕由。

一禀登复所。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禀。

二十 赔修九龙工程完竣禀

委员署广东广州佛山同知候补通判顾谨禀大人阁下敬禀者：道光二十八年九月间，准署理九龙协李参将、署理九龙协镇府李函开，以是年八、九两月飓风大作，各衙署、兵房、望楼、鼓楼多被吹刮倒坏，其城脚灰缝及马道灰沙间有损裂等因。遵即前往勘明属实，鸠工购料，妥为修复。择于十月初六日兴工，兹于本年正月二十五日一律完竣。当准李署协、署协镇府李知照前来，卑职复往查验，委系如式修复坚固，并无草率朦捏。伏查九龙城寨衙署，奉经卑职与乔令监工倡建，此项被风刮坏，系在保固限内，例应赔修，以重公事。所有用过修复工料银五百八十六两，除寄存广州府外办岁修银五百两领回支用，尚不敷银八十六两。业经卑职与乔令分赔完讫，不敢请领公项，并请免予造册。合将赔修工竣缘由禀报大人察核。再，九龙工程原案禀明节省银三千两，奉经提存府库，以备发商生息岁修之用。现在此案业奉报销，合无仰恳宪恩俯赐飭将前项节省未领银三千两，发交新安县，分给当商永远输息，所收息银递年由县解营，作为岁修备用。如遇限内城墙倒塌，仍责成卑职等赔修，断不敢藉有此款稍存推诿，合并陈明。肃此，具禀。恭请福安。伏乞垂鉴。除禀督宪暨登复所外。卑职谨禀。

红禀由：具禀赔修九龙工程完竣，请将原案节省未领银三千两发县交商输息，以备岁修由。

一禀督宪登复所。

道光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禀。

二十一 耆英徐广缙奏请奖叙捐资官绅及酌提捐资盈余备支各项要工折

(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初四日)

臣耆、臣徐跪奏，为捐建九龙城寨、炮台等项工程一律完竣，并官绅捐输经费，先经遵旨停工，现查明捐资官绅，请给奖叙恭折具奉仰祈圣鉴事：窃照九龙山地名，应行改建城寨，设立炮台、衙署、营房，先经前抚臣黄会同臣耆奏明，由粤省官绅捐建，并请照历次捐修炮台、战船成案，给予奖叙。道光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奉到上谕：“耆等奏官绅捐建城寨各工一折，广东九龙山地居扼要，亟应改建石城，设立炮台、衙署、营房以资守卫。现据该省官绅陆续捐资，经该督等派员督同估计修筑，着照所议办理。统俟工竣验收，再行奏请奖叙。此项工程免其造册报销。钦此。”钦遵，转行遵照，随飭委员勘估兴办，并将勘办情形及地方形势、工程做法，绘具图说，续行具奏。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初五日奉到上谕：“此项工程现在核计捐数，已属有赢无绌。其官绅捐输，着即停止，仍俟工竣后，核明本案工程尚有盈余银若干两，再行奏明，拨归该省藩库，以备要需。钦此。”当即行知，于本年三月初十日停止捐输。查此项工程，先经委员核实勘估，共需工料银三万六千两，即责成该绅等自行建筑，仍委员会同监修。据报于上年十月兴工，本年四月工竣。复经委员验明，建造如式，工料坚固，委无浮冒偷减情弊，出具验收切结，并取其监修委员该绅等保固各结备案。至各官绅捐输经费，自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初一日起，至二十七年三月初十日止，共收洋银四十三万二千六百七十三两。又阳江镇，据阳江县知县朱庭桂率同绅士谭鸿义等，收捐洋银三万六千零二十两。二共实收洋银四十六万八千六百九十三两，均经先后解缴广州府库。除支給九龙工费外，尚存盈余银四十三万二千六百九十三两。当即钦遵

谕旨，解归藩库，除拟将盈余项下酌提银二十万两，备支目前应修要工，及未雨绸缪事宜之用外，兹据司道督同委员查明捐资官绅衔名、银数，按照例案逐一核明，悉属相符，列册详请具奏奖励前来。臣等复加查核，均无冒滥，合将捐资各官绅衔名、银数照缮清单，恭呈御览。仰恳皇上逾格恩施，准查照例案给予奖叙，以示鼓励。至此项城寨工程，事属创建。该监修委员候补通判顾炳章、候补知县乔应庚等实心经理，工料既属坚固，又能力加撙节。访诸水师提臣赖恩爵，亦称工坚料实，经理得宜。查尚有应建琴沙炮台、虎门同知衙署、省垣内外城工，以及添调防兵兵房、修葺加工火药局等项要工，均责成该委员等一手办理。统俟各工告竣，果能始终勤奋，再由臣等据实保奏，合并陈明。除飭将各官绅年貌、籍贯、履历造册送部外，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再，粤省官绅捐输九龙城寨、炮台等项经费，现在截数共收洋银四十六万八千六百九十三两。除支九龙工费银三万六千两，尚盈余银四十三万二千六百九十三两。臣等与司道公同筹计，尚有应办要工，如肇庆府高要县属之琴沙地方，当东西两江之冲，南控高明、鹤山河面，北扼北江及通三水县，西南江口为肇庆府属紧要门户。现留弁兵驻扎巡缉，系搭盖篷寮居住，实非经久之计。应于此处建造炮台一座，添派弁兵防御。又新设虎门屯防同知，应建衙署。经前抚臣黄题准由粤省筹捐办理，无须动项开销。应即于此次捐输项内拨用。惟该同知驻扎之虎门广济，相距武营较远，必须派拨弁兵防卫，添建兵卡、汛房。又东莞县属缺口司巡检衙署，原在虎门广济墟，嗣应风雨坍塌，未经建复。现将该巡检旧署基址改建同知衙署，其缺口司巡检衙署，拟即移建在太平镇口地方，使彼此声势联络，于地方更有裨益。又，省垣内外城工，间有损坏，亟须修葺，以资保障。至督标兵丁，现在驻省仅止四百名，应再添六百名，以壮声势，亦须建造兵房，俾

供棲止。又，粵省額操火药寬為儲備，其火药局另須妥為修葺，慮〔以〕免漏濕之虞。以上各工已委員分投勘估，擬即于此項捐輸盈餘銀四十三萬兩內，酌提銀二十萬兩以為各項要工之需。此外恐尚有未盡事宜，容臣等體察情形，隨時奏明辦理。如工用復有盈餘，即與現存捐輸盈餘之二十三萬兩一併封貯本省藩庫，以備要需。

再，此次捐輸，議令收繳洋銀，系為便于本省行用。今工費之外，計有盈餘，若傾鎔紋銀，折耗較多，應請歸入海關尾銀，另款存貯，以備要需，合併陳明。所有酌提捐輸盈餘銀兩備支各項工需緣由，臣等謹合詞附片具奏。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二十二 各部奉旨依議耆英所奏各事宜折

為遵旨速議具奏事：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內閣抄出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宗室耆等奏籌辦炮台，添撥兵丁，建造兵房，儲備火药及修葺城垣調兵駐省各事宜一折。奉朱批：“該部速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臣等查該督原奏內稱：“省河虎門炮台，旧章向未畫一，或輪流防守，或臨時添調，倘遇有事，難期得力。現復體察情形，酌定實在額數，常川駐守，以專責成。查省河一帶水陸炮台共二十二座，除永康一台逼枕省垣，旧設弁兵足敷防守，无庸另議外，其南安、西固、東定、保厘、鳳凰岡、大黃滘、南石頭、沙腰、東壩、仑頭、東安、東固、東靖、中流砥柱等十四台系屬最要，配炮三百七十一位，每炮應配兵三名，共一千一百一十三名。海珠、永靖、耆定、拱極、保【極】、永靖、西炮台等七台，系屬次要，共配炮一百三十二位，每炮應配兵二名，共兵二百六十四名。又每台酌派司理軍火兵二名，共應配兵一千四百一十九名。除原配兵八百九十一名，應添配兵五百二十八名。在于該管之抚標、廣協、順德協及提標中后二營均勻派撥。虎門海口炮台

共一十四座，内威远、靖远、镇远、水军寮、沙角、上横档、下横档等七台系属最要，原配炮共四百七十六位，内除上下横档相对处所，共炮三十位，形势逼近，难以互行施放，无庸配兵外，实共配炮四百四十六位，每炮应配兵三名，共一千三百三十八名。蛇头湾、竹洲、九宰、南巩固、北巩固、大角、大虎等七台系属次要，原配炮一百五十位，内除大虎、蛇头湾有炮八位，相度形势，施放不能得力，无庸配兵外，实共配炮一百四十二位，每炮应配兵二名，共二百八十四名。又每台酌派司理军火兵二名，共应配兵一千六百五十名。除原配兵一千二百五十二名，应添配兵三百九十八名。查有第六号贞吉战船原配兵六十名，于道光二十六年二月届应小修。又第九号贞吉战船原配兵三十五名，第八号贞吉战船原配兵五十名。该二船俱于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届应小修。又第二号、第四号贞吉战船，各配兵八十名。该二船俱于本年十二月届应小修。以上五船共兵三百五十五名，应俟次第撤回归伍。今拟就便配拨炮台，以海口防守之兵仍归海口防守之用，其余不敷兵丁，由提标中右二营均匀派拨。其有碍施放之炮，虽不必配兵，应仍留台备用，毋庸裁撤”等语。应如所奏办理。

“至省河各台兵房尚敷棲止，虎门最要各台，除沙角一台毋庸添建兵房外，其余威远等六台，应添建兵房二十八间、军装局二间、火药局二间，另拆造原建兵房一十八间。又上下横档孤峙海面，并无陆路可通，应添造三板船三只，以便兵丁汲水买米之用”等语。应如督所奏，准其添建，合共估计工料等项银五千一百八十两，应在九龙炮台捐款盈余项下支销。“又兵丁常川在台驻守，额给粮饷不敷食用。查虎门各台兵丁，道光二十五年议定每年六、七、八、九四个月，每兵每月增给银四钱，为数无多，既未能周年支外，而省河各台又未一律增给，未免两岐。今拟省河虎门各台，每兵每月一律增给银五钱，共兵三千六十九名，每月应需银一千五百三十四两五钱，每年应需银一万八千四百十四

两，遇闰加增。查有防夷水操经费生息项下，每年可得息银五千五百两。排练经费生息项下，每年可得息银三千五百两。南韶惠潮两道公捐犒赏项下，每年银一千两。又水师各营应行找回承修战船二成工料项下，共存银三万八千八百七十六两零。业经议定免其请领，捐备充公。现拟发商一分生息，每年可得息银三千八百八十余两。连虎门各台兵丁每年应支增给四个月口粮项下，共银二千两。统计共得银一万五千八百八十余两，尚不敷银约二千五百余两。即在现届小修贞吉战船五号之裁撤兵丁停支口粮银内，酌拨给领，尚属有盈无绌”等语。

户部查前项三板船三只，既据兵部准其制造，应需工料银两，应准其在于九龙炮台捐款盈余项下动支造报。至省河虎门各台共兵三千六十九名，每兵每月一律增给银五钱，每年应需银一万八千四百十四两，遇闰加增，应准其在于防夷水操经费等款内动支，其不敷银两，即在届修贞吉战船、裁撤兵丁停支口粮银内酌拨。至虎门各台兵丁，每年应支增给四个月口粮银两，现已改归本案一律支销。其屯租项下，每年开支银二千两，即拨入本案新收项下列造，仍于屯租案内分晰造报，并将各款逐年收支数目，按年题报核销。

工部查前项各工，应令两广总督转饬作速照例造具册结，题报核办。至应添造三板船三只，估需工料银两，亦应令该督编列字号，造具成规细册，送部具题核办。

该督又称：“各台需用火药亟应宽为储备，除每月操演应用火药照常支领外，拟制造加工火药五万斤，分贮各台，以备缓急。”亦应如该督所奏，【准】其照数添制。查加工火药每百斤需工料银九两二钱，计五万斤需银四千六百两，亦于九龙炮台捐款盈余项下支销。工部查制造前项加工火药数目，亦应令该督转饬造具工料银两细数清册，照例题报核办。其应需银两，户部亦应准其在于九龙炮台捐款盈余项下动支造报。

又称：“省河各炮台，向系抚标、广协等营分管；虎门各炮台向系提标中右二营分管。惟各该营员均有巡缉差操之责，势难常川驻守。若责令兼顾，仍恐有名无实。拟于各营参、游、都、守中，择其结实可靠者，省河各台派委四员，虎门各台派委二员，常川经理，以一年为期。如果勤慎得力，严密操防，著有实效，即于期满时核明，请给议叙。倘有始终奋勉，堪资倚赖之员，留防至二年者，给予升衔。至三年者，以应升之缺升用。该管期内，如有失事，与该本管营员一律参处；倘不能得力，随时撤退更换，以昭激劝而杜推诿”等语。应如该督所奏办理。所有派委各员，应酌给薪水，以资操防。拟每员每月给予银三十两，在米耗盈余项下支給。户部亦应如所奏办理，仍于递年米耗盈余案内，分晰报部查核。

又称：“各台每月操演大炮，即照现行章程，派委文职大员，会同监视演放。粤省垣年久失修，虽经地方官随时粘补，未能悉臻巩固。兹拟择要兴修，核实估计。并城上兵房、炮棚等项，共需工料银一万二千两。又城内火药局二处，亦应及时修造，估需银五百八十两，均在于九龙炮台捐款盈余项下支销。”工部查前项各工，应令两广总督转飭作速照例造具册结，题报核办。其应需工料银两，户部亦应准其在于九龙炮台捐款盈余项下动支造报。

又称：“粤省内外两城地址宽阔，五方杂处，阡陌比，宵小易于托迹，必须按段分派兵丁弹压。除旗营防兵另有差使及抚标、广协额兵仅敷应用外，其督标六营共额兵四千四百五十余名，向调在省驻防仅四百名，管带官四员，其余均驻肇庆，一时调集不及，兵力实形单薄。兹拟于肇庆各营添调千总、把总六员，带兵六百名来省常川驻扎，一年更换。计督标连前驻省兵四百名，共成一千名”。亦应准其照数拨驻。至添调千总、把总六员，来省常川驻扎，亦应如该督所奏，准其添调，在省常川驻

扎，仍俟一年更换时，专咨报备案。“除额支粮饷外，仍参酌旧制重定章程，每弁每月给口粮银二两，每兵每月给口粮银一两，以资餬口，即在米耗盈余项下，按月支給。应需兵房，在于督标衙署新旧箭道并军装局等处隙地建盖”等语，亦应如该督所奏，准其建盖。估计料银六千八百七十两，亦于九龙炮台捐款盈余项下支销。工部查前项各工，应令两广总督转飭作速照例造具册结，题报核办。户部查该督所奏，每弁每月给口粮银二两，每兵每月给口粮银一两，在于米耗盈余项下，按月支給之处，亦应如该督等所奏办理，仍于递年米耗盈余项下，分晰报部查核。其应建兵房，估需工料银两，亦应准其在于九龙炮台捐款盈余项下动支造报。至所拨兵丁，有由修葺贞吉战船内派拨者，俟工竣应行配载时，再由各营酌量派拨。以上各炮台兵丁经此次移驻之后，仍请旨飭下该督，责成该管将备协力严防，务使兵归实用，饷不虚糜，以仰副我皇上廑念海疆有备无患至意。所有臣等会同速议缘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训示遵行。再，此摺系兵部主稿，合并声明。为此谨奏请旨。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初六日具奏。

本日奉旨：“依议。钦此。”

醇亲王使德往来文电选

丁 山 整理

编者按：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醇亲王载沣出使德国，为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一事向德皇道歉。此事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中颇为引人注目。有关此行情况，特别是有关礼仪之争和载沣径直回国原因，当时中外报刊多所讹传。今选刊有关使德往来文电，或有助于澄清一些史实。可与本刊总73号《醇亲王使德日记》参照阅读。原件藏首都博物馆。

1. 军机处致奕劻、李鸿章电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四日

前据来电，谢德专使意在派醇亲王前往，究是何意。上意，醇亲王年岁尚轻，交涉事宜向未阅历，如果定议令往，必须得力之员赞助一切。张翼明练熟悉，若派充参赞，可期胜任。特电闻，希酌复。禄、韶、霖^①。元。宣转。

2. 全权大臣致行在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五日辰

火急。西安行在军机处：宙。元电悉。先是德使派参赞来询，专使赴德，拟派何人。答以未定。伊询醇亲王何如？答，尚谨慎，何不往来晤谈。醇遂与穆使^②、瓦帅^③相见。该使电知国

① 荣禄、王文韶、鹿传霖。

② 穆默，德国驻华公使（1901—1906）。

③ 瓦德西，八国联军统帅。

王，均以为然。旋又照称：本国皇帝提明，候中国照各国公索各款，全行照允，方愿接待专使等语。查醇亲王年岁虽轻，志趣尚好。上年拳匪内讧，莫赞一词，尚守家教。惟交涉向未阅历，伊已约定张翼偕往赞助。记名副都统荫昌，前驻德年久，熟悉情形，拟请该员等并充参赞，庶无陨越。第惩办祸首虽定，该使等多方磨难，续议各款，屡催不就，看来一时断难合拍。此事应俟公约画押时，再行降旨。请先代奏。奕劻、李鸿章。咸。

3. 刘坤一转吕海寰^①电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四日

西安。行在军机处、鄂督张制台、上海盛大臣：吕使勘电：昨德相毕鲁在议院明言曰：“和议最要者两端：一、启畔首祸，前言概治以死，今稍从宽，不论官之大小，以罢为断。醇王来德一节，我皇甚喜，然须和局定后方可接待。二、赔款，除军费外，商教亦须索偿。惟款须有著，而仍不伤中国财力。已与诸华情者相商，均谓不宜干预华内政，亦不宜稽查一切财项，以海关作抵为最妥，银价已落，华已吃亏，稍加关税亦属所宜。至盐厘等应否加增，须详察再定。或谓应废厘金者，是干华内政，我政府不甚谓然。倘中国办法未能尽如各国意，则各国应仅筹理财善策。德兵何时可撤，以华人办事迟速为断，赔款有著，兵即可回。去年德英条约：一、保中国土地；二、保英、德在华商务，与满洲事无涉。德在满无多商务，存亡无干。然德不愿中国国产任意弃置，国债甚巨，各债主亦不愿其浪掷，如有专约牵涉中国财力，我国断不能坐视。幸各国立论，均谓在华不求专利，有则公之。唯公司数家乘机索利，若不严阻，恐华财将尽，我无所取。华使来商满洲事，答以归驻京使公商为妥。有谓俄、德相持不下者，此说无稽。计于俄专注北省，与德无涉。德廷办事，大意在保全

^① 时任清驻德国公使。

太平，勿损己利益。各国或有争端，德必守局外例，我行我法，不争他人指使。我德总以速结华事为宜，遇事公平劝商。如各存意见，亦必竭力排解。”谨照转。坤。寅。

4. 盛宣怀转吕海寰电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五日

行在军机处、总署：吕使覃电。顷晤外部，据称：偿款并息已奉旨认付，全权请早撤兵。兹奉德君特谕撤帅，并将德兵调回，仅留四分之一，如和约及早全行议妥亦撤，倘别生枝节，撤兵恐须另议。至专使来德道歉，现可举行，届时当以优礼接待。柏林驻使赴宫礼节及往来电报，一律照旧，嗣后可友睦如初云。转枢译，请代奏。海寰叩云。除转庆、李、刘、张外。宣转。咸。

5. 全权大臣致行在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六日

西安。行在军机处：宙。醇亲王赴德一事，正月咸电已详陈。昨穆使因赔款息银议定，欲催早去。顷接吕使覃电，德君以专使现可举行，届时当优礼接待。应请降旨，特派醇亲王为头等出使大臣，并令前阁读学张翼、副都统荫昌随往赞助一切。臣等犹虑该员等情形未熟，与瓦帅商酌，添派德员随行。德君性急，醇去恐难迟缓，可否令其不必远赴行在请训，致需时日。国书、礼物即代预备。瓦来辞行，定明早起程，先赴日本。其兵队约两礼拜后可陆续撤回。并附闻。请代奏。奕、李。谏。

6. 盛宣怀转军机处致全权大臣等电旨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

全权大臣：奉旨：醇亲王载沣，著授为头等专使大臣，前赴大德国，敬谨将命。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副都统荫昌，均著随

同前往，参赞一切。钦此。巧。宣转。一三二。①

7. 盛宣怀转军机处致全权大臣等电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

全权大臣：醇亲王出使德国，已奉旨特派矣。至谕旨内“将命”下，应否用“道歉”二字，请尊处斟酌。并醇亲王免来请训，国书、礼物由京备办，均各奉旨允准。枢。嘯。宣转。一三一。

8. 全权大臣致行在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

火急。西安军机处：嘯电悉。“道歉”二字，似不必用，转落小样。巧电旨到，遵拟国书一通，请代呈御览酌定，候复即缮。庆。李。效。

恭拟国书全文如下：大清国大皇帝敬致书于大德国大皇帝陛下：朕维中国与贵国订约以来，信使往还，辑睦无间。前岁贵国亲王来京，朕叠次接见，情谊尤为款洽。乃上年五月，义和拳匪阑入京师，兵民交讐，贵国使臣克林德竟至被殒戕命。该使臣衔命来华，办理交涉事件，悉臻妥协，朕甚嘉许，不意变生仓卒，遽尔捐躯。朕自维薄德，未能先事预防，保护多疏，疚心曷极。已于该使臣死事地方，敕建铭志之坊，用以旌善瘅恶，昭示后来。兹派醇亲王载沣为钦差头等专使大臣，亲赍国书前往贵国呈递。该亲王分属近支，谊同休戚，特令竭诚将命，以表朕惭悔之意。又，此次贵国劳师远涉，戡匪安民。和议早成，生灵无恙，尤征大皇帝顾全大局，并令该亲王代朕道达谢忱。惟望大皇帝尽弃前嫌，益敦夙好，从此我两国共享生平之福，永联玉帛之欢，惟大皇帝鉴察焉。

① 疑为盛宣怀发电编号。下同。

9. 全权大臣致行在军机处电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初二日巳刻

西安。行在军机处：昨据德穆使照称：奉本国电谕，德皇拟乘本年华历七月二十日大阅驻扎德国京师御林军之便，堪以接待醇亲王。并谕达知，妥为预备，国书、礼物均赶办。穆使面称：六月初五有德公司船自沪开行，可搭坐。约五月廿六、七由京起程。请代奏。奕、李、冬。

10. 奕劻致吕海寰电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初二日

吕大臣鉴，大德国李希德尔此次带兵来华，今将撤队回国，醇亲王因其在华有年，精通华语，人品声名久著中外，意欲借重长才，赞襄一切。望转恳大德国政府照准，并速电驻华钦差穆默，转飭李希德尔随同醇邸前往，是所切盼。再，醇邸抵柏林时，所有寓所及一切事宜，妥为预备。庆。

11. 军机处致全权大臣江电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初五日

全权大臣：奉旨：奕劻等电悉。醇亲王载沣初次出洋，一切言动，诸宜谨慎，饮食起居，随时调护。并著张翼等悉心照料，妥慎赞襄。礼毕即行回国，仍将外洋风土人情，随地留心体察，而资阅历。钦此。江。宣转。一四二。

12. 醇亲王致驻华各国公使馆函(定期往拜)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初八日

径启者：本爵奉命出使德国，启程在即，深愿畅叙，以慰夙怀。兹定于本月 日 点(半)钟，前往贵馆拜晤。即希贵大臣

届时稍候，并望见复为荷。专此。顺颂 日祉。钦差头等专使大臣、醇亲王载沣。

13. 醇 亲 王 载 沣 折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七日（到）

奴才载沣跪奏，为酌调随使人员，并加派参议一员以资器使而符向章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出使向章，均准奏调随员。此次奴才衔命使德，事务尤纷繁要，业经钦奉谕旨：“特派张翼、荫昌随同前往，参赞一切。钦此。”此外尚须酌调数员，以收指臂之助。兹查有候补道梁诚、候补道刘祖桂、候补道麦信坚、候补知府王瑾、户部员外郎象贤、刑部员外郎曾广镛、候补知县尚希曾。以上七员于交涉事务颇知讲求，堪以派充随员。又，分省补用知府治格通晓德文，候选直隶州知府吴仲贤、候补知县严璩、候选知县杨书雯通晓英文，分省补用知县唐家桢通晓口文，堪以派充翻译官。又，太医院八品吏目王应瑞颇明医理，堪以派充医官。即由奴才分别咨调，飭令随同出洋。又查，前次大学士李鸿章出使俄国，派有参议一员，以崇体制。奴才此次使德，与李鸿章之充俄国顾问专使事复相同，拟即派张翼为参议官，以壮观瞻，而符前制。谨附陈明。所有酌调随使人员并加派参议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再，奴才出使德国，奉命之后，接准全权大臣知照。美国使臣来信邀往该国一行，以示和好之意，彼国虽无应递国书等事，而际兹时势，未便辞却，致拂其情。奴才起程后，倘他国亦欲仿行，彼时重洋远隔，不及请旨遵行，奴才只得随时电闻，就便前

往。是否之处，伏候圣裁。谨奏。

14. 盛宣怀转行在军机处致全权大臣电旨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七日(到)

全权大臣：本日，醇亲王具奏酌调随员并加派参议一折，奉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另片奏，就便前往美国等语。奉朱批：“著照所请。钦此。”希即知照醇亲王钦遵。枢。咸。宣转。谕。一五一。

15. 总理衙门致醇亲王咨文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二日

钦命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和硕庆王为咨行事：本年五月初二日，由本署致出使德国吕大臣电云：大德国总兵李希德尔，此次带兵来华，今将撤队回国。醇邸因其在华有年，精通华语，人品声名久著中外，意欲藉重长才，赞襄一切。望转恳大德国政府照准，并速电驻华钦差穆默，转飭李希德尔，随同醇邸前往等因。兹于初十日，接准吕大臣复电云：李希德尔事，德廷已照准等语。相应咨行贵亲王，查照办理可也。须至咨者。右咨，钦差头等专使大臣和硕醇亲王。

16. 全权大臣致行在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九日

西安。行在军机处：据日本小村使函称：外务电开，醇亲王使德，回路经美暨日本，政府因望旌节抵日，迎驾入京，藉伸同洲和好之谊，请奏明为要等语。该使所称，具见和好邦交之意，自应照准，藉伸联络。祈代奏，请旨遵行。又，闻英、比亦有此意，可否候函到，即行知准醇亲王援照办理。奕、李、效。

17. 盛宣怀转军机处寄全权大臣电旨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到)

全权大臣：奉旨：“奕劻、李鸿章效电悉。日使函称，醇亲王使德，回路经美暨日本，政府望旌节抵日，藉伸同洲和好之谊等语。著照所请，以重邦交。英、比如有此意函请，亦可准行。即由该王大臣随时知照办理，仍一面电闻。钦此。” 旨。宣转。

·五四·

18. 张翼致盛宣怀电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盛京函鉴：来电禀明。庆、醇两邸谕，醇邸到沪，毋庸预备仪仗。其裯褥、铺垫，均照寻常，不拘何色，万勿华丽铺张是为至要。但轮船到埠，请代备绿呢四人轿一乘、红伞一柄。除轿辮、肩扛须用杏黄布色裹，其余均照寻常。再备连鞍马八匹，以备护卫骑坐。参随等十余人，代雇马车十二辆，小工数十名矣。翼。径。

19. 总理衙门致醇亲王咨文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钦命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和硕庆亲王，钦差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商务大臣、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部堂、一等肃毅伯李，为咨行事。

兹据比姚使照称：贵亲王于德国差竣后，或能前赴本国会晤，等语。前经电奏，奉旨准行，即由该王大臣随时知照办理，仍一面电闻。钦此。已于本月二十三日恭录谕旨，咨送贵亲王在案。今该使照请前来，除由本衙门电奏行在，并照复比姚使外，

相应抄录原照，咨行贵亲王查照可也。须至咨者（附抄件）。右咨钦差专使大臣和硕醇亲王。

附：

照录比国姚使照会

为照会事：照得前于本月十六日，本大臣与贵亲王晤谈，言及本国愿请醇亲王于公务事毕，前赴本国一游。本大臣嗣即电知本国政府。顷接电复，内开：本国国家欣悉醇亲王于德国差竣后，或能前赴本国会晤，定当按照品级，派人相迎，并以优礼相待，必要隆礼，拱候贵临等语。本大臣接据之余，立即备文照会贵亲王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

醇亲王使德各员銜名单

专使大德国头等钦差大臣醇亲王载沣。

参议、侍郎衔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头等参赞、侍郎衔正白旗汉军副都统荫昌。头等参赞、记名直隶候补道梁诚。二等参赞、候补道麦信坚。三等参赞、浙江候补道刘祖桂。三等参赞、道员用直隶候补知府王瑾。二等翻译官、分省补用知府治格。二等翻译官、候选知县杨书雯。三等翻译官、知府用候选直隶州知州吴仲贤。三等翻译官、江苏补用知县严璩。三等翻译官、候选知县唐家桢。随员、户部员外郎象贤。随员、刑部员外郎曾广镕。随员、候选知县尚希曾。随员、候选县丞缪钦臣。学生、候选州同李树藩。学生、五品顶戴李士鉴。医官、太医院八品吏目王应瑞。供事姜沛霖。头等护卫三员。二等护卫二员。三等护卫三员。骁骑校一员。八品首领太监一名。太监一名。八品銜亲军一名。八品匠长一名。请发一名。成衣一名。苏拉一名。马夫一名。武弁一名。跟役一名。另随使洋员三名：参赞、大德国总兵官李希德尔。随员、大德国驻华武官劳诃。随员、北洋水师总管轮巴士。

20. 载沣致全权大臣电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二日

北京。全权大臣鉴：密。东电谨悉。本爵奉命先至德国，礼毕尚须至英、比，赴美至早在西十月矣，计已过避暑之期。望据复柔公使，倘届时仍有不能接洽之处，即当遵电办理。冬。

21. 奕劻致载沣电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二日

醇亲王鉴：宙密。义使谆请台端到罗马一行。敝处已允转电，候德事毕前往。除电奏外，祈查照。庆亲王。冬。

22. 载沣致奕劻电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二日

北京。庆亲王鉴：宙密。冬电谨悉。德礼毕后，遵赴罗马。祈电复义使。沣。冬。

23. 军机处转醇亲王电旨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二日

醇亲王：奉旨：命侍郎衔正白旗汉军副都统荫昌，充出使德国大臣。钦此。

24. 张翼致李提摩太函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二日

敬复者：接读来函，敬悉种切。阁下提倡学教，嘉惠中邦，苦口深心，素夥钦佩。兹承厚意，驾欲贵临，即希明日十点钟前来，王爷定当拱候台端。畅聆清诲也。肅此，敬复。顺颂时祺。张翼。

25. 袁树勋解奉出使经费银致醇亲王呈文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二日(到)

二品顶戴、监督江南海关分巡苏松太道为呈解事：窃奉王爷传谕，此次出使德国，约需经费银十五万两。除已由京收到银四万两外，除银十一万两即速等解等因。奉此，职道伏查：前项经费，先于四月二十三日，奉全权大臣庆、李电，拨库银二万两；五月十四日，续奉飭拨库平银一万两，照数动支，先后送交汇丰银行汇京上兑。旋于五月二十七日又奉总理衙门电谕，以王爷濒行，又需经费银一万两，已由本署垫付，速电汇归款等因在案。兹奉前因，遵再动支库平银拾壹万两，备批呈解。仰祈王爷俯赐察收，印制批回备案，实为公便。为此备由呈乞，照验旋行。须至呈者。计呈解出使德国经费库平银拾壹万两正。右呈钦差出使德国大臣醇亲王。管关巡道 袁树勋。

26. 载沣致奕劻电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五日

庆亲王钧鉴：辰刻乘海关巡船赴吴淞，裴副总税司随送，现已登拜安轮，即展轮。沣。歌。午。

27. 载沣致奕劻电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十日

北京。庆亲王：初十日早七点钟，沣安到香港。港督派中军带小火轮来候，沣随于十一点钟乘轮往拜港督伯来克。该督五点钟至拜安船回拜，甚相偃洽。于六点钟起碇赴新嘉坡。祈转电奏。阳电于本日十二点钟接到，已敬悉矣。沣。蒸。

28. 载沣致奕劻电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六日

庆亲王鉴：密。沣于十五日未刻抵新加坡。代理坡督来见，随即答拜。十六日辰刻开往槟榔屿。敬祈代奏。沣。咸。

29. 载沣致奕劻电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北京。庆亲王鉴：密。本日未刻安抵槟榔屿，坡督接待甚优。申刻开船，往库伦泊。祈代奏。沣。洽。

30. 载沣致吕海寰电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宙密。尊电悉。台从到义港口亲接照料，感甚。此〔比〕来风浪大作，船行稍迟，计十一日方到折奴阿。望即电请义外部，谕该埠医官，拜安船随到随查，俾即乘车往德，庶免迟误。期迫，颂辞请尊处代拟，先交外部，以便答词。国书俟到义面交。参赞五，中西随员、翻译二十一，护卫十二，武弁、跟役十五。醇亲王。

31. 军机处致张翼电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此次拳匪肇乱，实由教士平日袒纵教民，欺压良民，积忿莫申，遂轻信拳匪，激成大变。必须与各国议明，以后民教交涉章程，订立专约，方能民教相安，永弭后患。中外各官条奏，皆以此为要务。而全权不能与各国妥议，因思执事曾有遣使诣教皇商订教案章程之议，今值义国请醇亲王亲临罗马之便，机不可失，即希台端于随同到罗马时，亲见教皇，实告以天主教主教、司铎

等，在华滥收匪人入教，纵容教民，遇事欺凌平民，酿激拳匪之祸，大失传教劝善之意。向其婉切商定，请其严戒主教等恪守教规，不准滥收匪类入教；凡民教词讼，悉由地方官持平秉公办理，教士等不准干预包庇讹索；教堂偶因滋事被毁，务须公平议价赔偿，不得藉词动辄要索巨款，以期日久相安、永敦睦谊。中国传教，以天主教为最横行无理，皆罗马教皇所辖。此外，各国之耶稣教亦各有教会，亦望于所至各国，查询各大教会，一律向其妥商民教交涉条约，免再激生事变，不惟中国受害，即各国商务亦不能不因之伤损，且败传教之声名也。特为电达。应如何妥筹商办之处，仍须先行电知为盼。枢。沁。

32. 载沣致奕劻电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二日

北京。庆亲王鉴：十七日未刻由檳榔屿开船，二十一晚到克伦泊。次早起旋，二十九晚安抵亚丁，计行印度洋十二昼夜。初一早驶入红海。祈代奏。沣。艳。

33. 吕海寰致载沣电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六日

王爷钧鉴：递书礼节，屡询无确耗，正在起身往接，于礼官处得悉，廿七，德皇在白厅坐见；王爷行三鞠躬礼；递书；致颂。其参赞随同人见者，均照中国臣下觐君礼叩首。据云，此次系赔礼，非寻常聘使可比。不知可与穆使商及否。惟大局攸关，时甚迫促，海现力争，能否挽回，未敢预必。乞王爷并燕谋、午楼诸兄，速筹良策训示为盼。海寰叩。鱼。

34. 吕海寰致载沣电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九日

王爷钧鉴：海顷到折奴阿迎驾，突然中暑，触动旧症，眩晕

异常，不能起立。此处天气太热，拟即赴瑞士调理，叩乞王爷恕罪。现留翻译李德顺在此伺候，面禀一切。由义赴德交界专车已订定，栈房亦看妥。海寰叩。佳。

35. 载沣致全权大臣电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一日

北京。庆亲王、李中堂鉴：宙密。沣于十一日抵折奴^①，正在筹议会李希德向外部设法挽商。适接电，意相符合，倘难挽回，自当遵电办理。如何，俟到德边界巴在尔奉告。应否电奏，斟酌。沣。真。

36. 盛宣怀转使德参赞庚音泰致行在军机处等电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二日

行在军机处、总署：卦电转醇邸、吕宪。顷晤外部，知穆电已呈宰相。据称：此次中国遣亲王等，系为赔礼而来，即应照中国礼赔罪。告以庆王、李、刘，均不为然，恳其设法相助，免行此礼。答以德皇以戕使为欺慢德国太甚，恐难挽回。午楼能否免礼，仍尚未定。除速电醇邸、吕宪外，请转庆、李、刘、张并枢、译。庚音泰等谨禀。真。宣。文。

37. 载沣致使德参赞庚音泰电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二日

坐船月余，辛苦万状。昨勉强就道，益觉疲倦，暂住巴在尔。已请提督李上德前往德京，将本爵情形面达外部。现未能按德皇定期到柏林，甚歉。请婉告外部。醇亲王。侵。

① 前译作“折努阿”，后又有译作“折奴爱”。

38. 廣音泰致載沅等电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十三日

王爺鈞安：跪叩一節，屢與外部爭辯，迄無更改。據稱：中國與德國系平行，所以見德皇亦須行華禮。蔭昌仍以參贊看待，如免蔭昌，置張翼于何地云。廣音泰稟。文。請轉慶、李、劉、張并樞、譯。宣轉。元。

39. 載沅致全權大臣電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十三日（辰刻發）

北京。慶親王、李中堂鑒：頃接廣音泰侵子電。晤正外部云，十四接見，不能更改。礼节或改請安，尚未知宰相能否照准，明晨听信云云。沅當已復電，改為請安，與向例仍屬不符，本爵不能擅專，仍須請旨遵行。恐誤接見之期，事出兩難，本爵只得力疾前來，以表我國家至誠修好之意。務祈婉商外部，格外見原，以顧兩國交誼。沅為保全大局起見，未敢過於拘泥。今擬五點力疾即赴德，候信辦理。即祈代奏請旨。沅。覃辰。

40. 載沅致全權大臣電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十三日（亥刻發）

北京。慶親王、李中堂鑒：本擬力疾赴德，以全大局，適接廣音泰電稱，德皇已諭，停止十四礼节。請安能否更改，尚未得宰相回音，恐亦難辦。并稱，暫宜緩赴德京，李希德爾已詳達外部，并蒙德皇在行宮召見。現候其電復情形，再定行止，乞代奏，并示遵行。沅。覃亥。

41. 全權大臣致行在軍機處電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十四日

急。西安。軍機處：頃接醇邸自瑞士折奴洼發來真電：沅于十

一日抵折奴洼，正在筹议令李希德向外部设法挽商，适接卦电，意相符合，倘难挽回，自当遵电，办理如何，俟到德边界巴在尔奉告。应否电奏祈酌。又接醇邸自瑞、德交界巴在尔文电：十二未刻到巴在尔，接赓参赞来电云，跪叩一节，迄无更改，荫昌仍以参赞看待，亦不能免。顷德皇遣内务府来，并交所定礼节单图：十四午刻在柏林宫内接见，坐受专使三鞠躬礼，参随三跪礼，并跪听宣读颂词。此为西国向无之礼，大体攸关，万难迁就。泮因一路轮船颠簸，火车暑热，眩晕异常，饮食少进，刻下只得在巴在尔暂为养息。此地系瑞、德交界，离柏林尚有十六点钟之路，十四接见，已来不及。当命李希德先到德京，代达外部，并设法力为转圜。倘能有济，自当赶速前进。若竟无可挽回，泮碍难专主。务祈代奏，候旨遵行云。查李希德系巴帅前带来兵官，曾充北洋学堂教司，经派随醇邸回德，虽令代达转圜，未必有济。吕、赓力争于前，臣等又派徐寿朋、联芳嘱穆使转致，未允更改。德主已送交所定礼节单图，使气恃强，恐难解免。原约第一款代表国家惭悔之意，自与亨利前来华觐见无事不同，但屈辱过甚，令人难堪。现计十四接见之期已过，可否令醇邸俟李希德回报时，如德廷肯改期，仍须前谒，以完约款而昭大信。事毕促令回华，不必再往各国，庶免訾笑。请示遵行，乞代奏。奕劻、李鸿章。寒。

42. 全权大臣转载泮电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四日

西安。军机处：顷接醇邸自巴在尔覃、亥电：正拟力疾赴德，以全大局。适接赓参赞电称，德皇已谕停止十四礼节。请安能否更改，尚未得宰相回音，恐亦难办。并称，暂宜缓赴德京。李希德已详达外部，并蒙德皇在行宫召见，现候其电复情形，再定进止。乞代奏，并示遵行云。奕劻、李鸿章。寒。

43. 载沣等致全权大臣电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四日

北京。庆亲王、李中堂鉴：覃两电计览。坐受国书，参赞跪拜礼节，屡经海寰磋磨，万无更改。即通融诸安之说，亦作罢论。昨晚李希德由柏林回，据云，仅见内、外部诸大臣，将中国亲王为难情形业经详达，并恳代为转圜。坚执前说，丝毫不能移易，此为中外向无之礼，一经应允，将来何以为继。沣万分焦灼，曷敢擅便。但大局攸关，且值时势多艰之际，尤为事处万难。祈据情代奏。恳请朝廷，妥筹良策，谨候电示遵行。沣、海。咸辰。

44. 军机处致全权大臣电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七日

寒三电所转醇王电均已进呈。醇王此行虽为谢过，与亨利前来华觐见无事时固稍有间，然德皇所定礼节，屈辱中国过甚。坐受国书，尤属轻侮，于两国修好之意实未允协。现既令李希德等向外部设法挽回，想能转圜。仰祈转复醇王，相机因应，期于顾全大局，仍于国体无伤。事毕后，是否再往他国，亦即酌定，请旨办理。枢。篠。

45. 军机处致出使英国大臣罗丰祿等电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七日

奉旨：“德主接见醇亲王礼节，拟坐受三鞠躬，参赞以下皆跪叩，倨傲过甚。各国向无此礼，殊非敦睦之道。前岁德亨利王觐见，曾经出位延接，并于纳陛上赐坐，极为优礼。今醇亲王虽因道歉前往，亦不应屈辱中国至此。著该大臣切託外部电达德外部，婉切商改，务期循通礼而修旧好。想英、美、日本笃念邦交，必能代为转圜也。钦此。”希即钦遵办理。枢。篠。

46. 盛宣怀转吕海寰致军机处等电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七日

火急。行在军机处、总署：礼节事已成骑虎，愈辩愈坚。刻下外部不容再商，若徒恃在德争论，恐致决裂，日后即难再往。焦愤万分。可否交各国原议公约使臣，将受书礼节，另行持平订定，以昭公论之处。愚见仰祈钧裁。事关大局，迫切之至。海。陳。祈转庆、李、枢、译。自瑞士发。宣转。霰。

47. 军机处致全权大臣电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

陳电所转醇王、吕使咸电已进呈。吕使另电，拟交各国原议公约使臣，将受书礼节，持平订定，以昭公论等语。此事关系至要。现在正联邦交，各国皆重情谊，望即坚託各公使出为调停，并与穆使婉切商议，托其转圜。一面电知吕使与德外部再行磋商，总以磨得一分是一分。如实在不能挽回，应与照会议明，此次专使原为道歉，姑为通融酌允，以后仍按照各国通行之礼，不得援此次为例。尊处託各公使调停，应否将此意告知，祈裁酌。樞。嘯。

48. 全权大臣致行在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

西安。军机处：顷奉篠电，令转复醇王，相机因应，期于顾全大局，是否照约觐见，代表惭悔之意，至仍与国体无伤。尊处注重坐受国书，盖其傲慢性生，不足计较。嗣后欢宴、阅兵，均无失礼。此次为谢过而来，实非享利往日可比。尊处所辩者，坐受，醇意所怪者，参赞跪拜，似应酌中定论。如德肯改期，醇王进见，可酌带金楷理、廣音泰等参赞。张翼、荫昌等仍照前电，

或托疾，或暂避他处，以免拜跪受辱。醇王年幼寡识，已电达酌办。吕使拟交各使持平订定礼节，各使多助德抑华，断乎无益。请先代奏。奕劻、李鸿章。嘯。

49. 吕海寰致载沣电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日

效、皓电敬悉。顷知德皇六号出巡，日内尚可接见。现与外部大司员克博梅再三切商，据称，王爷来必定接见。惟免去下跪一节，可请王爷照致废音泰德文信办法，照会外部，转恳德皇邀免。如德皇不允，即可照全权嘯电办法，携金楷理、废音泰递国书。德皇允否，亦须请示。至王爷照会，外部是否用电，抑须王爷来德备文面交外部之处，俟请示外部大臣定夺，再给回信云。此事稍有转机，除俟得外部确信再行电禀外，时促，祈先预备行装，以免届时担〔耽〕延。海昨晚亥刻到署。海寰叩。号。

50. 载沣致吕海寰电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日

号电悉，知事已有转机。顷据艾领事面称，现接外部来电，问王爷能否起身，以速为宜。并称，德皇允其接见，递书只带午楼一人，余均别殿伺候。现拟今晚十一点钟搭车前来，明申可到。余容面谈。醇亲王。号。

51. 吕海寰致载沣电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日

顷晤外部司员克勒梅，据云，奉德皇谕，格外加恩，免去跪拜礼，惟递国书时，只能带荫昌一人，藉作翻译。其余参随等亦可同来，均住坡坎他姆皇宫。时促，务于今晚约十一钟成行，明午两点抵柏林，稍憩，往晤外部面商一切。并云，如逾西历本月

四、五两号，则不接见矣云云。照会外部之文，时迫，亦可暂缓。除电两全权外，启节乞先示。海。号酉。

52. 盛宣怀转吕海寰致全权大臣电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全权大臣：吕使简电：醇邸今日申刻安抵德国波次他姆住宫。明午递书。容再电请。转庆、李、刘、张并枢、译云。宣转。马。

53. 吕海寰致军机处等电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行在军机处、南京、武昌督署：今日十二点半，醇亲王带荫昌作翻译。呈递国书，致颂词，德皇坐受。其余参赞等六人在旁殿伺候，礼毕，随醇王同出。德皇当即回拜。明早见德后后出宫。乞转庆、李、刘、张并枢、译。海寰。养。宣转。

54. 载沣致全权大臣电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北京。全权大臣鉴：宙。前接嘯枢电，相机因应，并示折中，仰见周密，欣有遵依。自十四日德皇停止礼节后，遣来朝车、提督、礼官均未撤回。察其动静。似有挽回之机。因与翼、昌、诚、李希德尔等再四筹维，命昌用德文信致赓音泰，婉商外部，以跪礼我国万难应允。于德既无所取，更与两国体面尤有相关，作为出自沣意，恳请德皇宽免。一面又与驻巴在尔艾领事面商，或将此意由沣备函经达外部，托其先为代通消息。复于十八日晚，面命吕使赶即回至德京，设法接办。十九早，吕使去后，接到嘯电，亦即转电吕使，命其照示再与外部切商，旋于廿申。据艾领事来称，顷得外部官电，命询王爷何时起身，以速为宜，我皇必

定接见，跪礼已免，递国书只带荫昌一人，余在别殿伺候等语。当晚，复接吕使回电云：德皇六号出巡，现据外部大司员云，王爷日内前来，德皇必定接见，事有转机云云。据以上各情，事已挽回，但为时甚迫，沅未敢稍涉拘泥，即于十一钟令该国来接各官备车前往。廿一【日】三点半钟到坡思坦们，德皇又遣朝车并头等官提督接沅等均至旧皇宫居住，供应优渥。随商订次日进见，并送故德后花圈礼节。廿二巳刻，亲至故德后墓如礼。十二钟复遣朝车、提督，迎至新行宫，沅随带荫昌进见，内殿送递国书、宣读颂词。张翼以下六人在外殿侍立。礼成，德皇遣马队送归旧行宫。两点钟，德皇亲来答拜，意极殷勤，坐谈良久，并命备舟车游览哈芬湖孔雀岛等处。又约廿三早看操。午后仍至新行宫进见德后，并留多在柏林居住，阅看各厂院。又面嘱前赴丹西会晤亨利亲王。看其水师各事。沅未便拂却。现拟见德后后，即赴柏林另住客寓。所有一切，均赖国家鸿福，俱臻妥协，堪慰宸念。谨祈代奏。马电已收。沅。漾。

55. 载沅致北京醇王府函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子载沅跪请额娘、姨前金安。敬禀者：子在瑞士巴在尔具禀，计已到府矣。具禀后，十九、二十日同张翼、荫昌、李希德尔再四商酌，只得请吕使回德，并将荫昌致赓音泰洋文信函送交外部磋磨，作为沅请德皇免参随跪礼。不意，彼自有转机，竟自允许免跪，诚为我朝廷洪福，大局保全，国体无伤。沅极忧闷之心，为之爽适，乃于二十日夜子初，乘坐火车开行。廿一日申刻抵德行宫波斯达穆^①，住橘宫。廿二日早，至德前皇坟墓供花圈。午刻，见德皇于蛤蚧厅，只带荫昌，同行三鞠躬礼，沅读颂词，荫昌翻德语毕，沅递国书，德皇坐受并答颂词，德礼官翻汉

^① 前电作，“坡思坦们”。

语毕，遂退。彼派兵队送回。是日未刻，德皇答拜，至泮所住橘宫，让泮对坐，略谈寒温而别，接待尚优，并数日后请泮阅大操。廿三日午时见德后，亦荫昌随，行鞠躬礼，问答数语而退。申刻，泮坐火车至柏林京都，觅客店住宿。因德皇欲远行演操，不便久住彼之宫院也。宫中甚静，并无闲散人出入。泮奉我国诏命专使导邦，因参随跪礼，几乎有衅，幸而事有转机，竟成此典，幸甚。泮眷恋慈躬，心不遑安，因思前之礼节小变，我慈萱必见忧于怀。今既礼毕，回路游历各国，路程渐近我国，可慰慈怀，子载泮跪求安意，切恳之至。泮身体甚好，饮食起居照常，敬以告闻，并俟于七月二十六日，拟向上行礼，谨预禀陈，伏乞垂鉴。子载泮谨禀。

再：此事既已完成，各府宅有问情形者，请呼泮名请安，并代泮达意，乞均放心为祷。因时日甚促迫无暇，即十叔父处均未寄禀，更乞呼名请安，请恕未能具禀。兼以告慰。附此禀以闻。子载泮附禀。七月二十三日自柏林发。

敬问六、七弟、三妹近日均好。兄载泮手泐。七月廿三日自柏林发。

56. 张翼等致全权大臣电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口日

北京。庆亲王、李中堂鉴：德皇不愿醇邸游历英、义、比国，其意甚坚。惟罢游必须出自中国之意，勿露因德阻止。望以醇邸现因微病，兼有冬月归候回銮，请旨完姻，迟恐误期为说，婉解在京公使为祷。候示遵行。翼、昌、诚叩禀。

57. 载泮致全权大臣电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三日

北京。全权大臣鉴：泮奉命本为德国专使，自递书后，虽德皇

款接优渥，但因前节，未免犹有芥怀。屡晤外部，据称，除美、日与彼无涉，若往欧洲英、意、比，有违专诚之旨，该皇深不谓然。收礼至今尚在游移未定。泮今日前往丹溪阅看大操，五日可回柏林，仍须看视各厂院，约计八月二十日在德即可竣事，而意皇来信，西十月十五日后，方能接待。又接驻英罗使函称，英外部澜候云，曾接驻京公使来电，虽有敦请往游之意，至今尚未奉有英廷敬迓之谕等语。泮此番远涉风涛，到德复历观各厂，精神劳顿，饮食减少，兼有水土不服之症，务恳与驻京英、意、比公使设法托辞婉商，万勿宣示该外部阻行之意。现拟德事毕后即行前赴美、日，顺途回国。以上各节均已函达罗使矣。伏祈代奏，请旨遵行。泮。江。

58. 全权大臣致载泮电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七日

顷奉枢转鱼电旨：支电所转醇王电已代进呈。奉旨：“朕钦奉懿旨，载泮江电览悉。此行本为德国专使，该亲王现有水土不服之症，饮食减少，闻之深为廑念。在德使事既毕，著即起程回华，以慰远系。美、日、意、比各国使事暂从缓议，此时均无庸前往。钦此。”庆、李。阳。

59. 载泮致全权大臣电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十日

北京。全权大臣鉴：阳电谨悉。泮于初三随带张、荫赴丹溪次，与德皇、亨利亲王晤面，礼接甚优，颇为笃念邦交。阅操三日，并邀泮同翼、昌在兵船与宴，赠泮红鹰宝星。宴毕辞行，于初八日回柏林。礼物已收。接读懿旨，告之该外部，极为钦悦。现往克虏伯各厂看视制造毕，遵即于本月十九日仍由折奴爱乘轮回华，九月内抵沪。并祈代奏。泮。蒸。

60. 载沣致全权大臣电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

北京。全权大臣鉴：沣赖两宫威福，德事妥竣。今以德皇派车送至边界，仍由折奴爱搭拜安轮船，十九日开行，原路回华。余俟到沪再行电达。谨祈代奏。沣。洽。

61. 张翼、梁诚致上海道袁树勋电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九日

上海道袁观察鉴：邸节于十九日抵港，晚十一钟开行。若无风浪，约二十二日午刻抵吴淞。并希转达诸公暨招商局裴税务司备船，邸节仍驻洋务局。此请，勋安。翼、诚。皓。

62. 庆宽致外务部衙门禀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敬禀者：适由上海来电，王爷二十三日到上海，乘安平轮船至天津回京，再赴行在迎銮。谨此禀闻。章京庆宽谨禀。

63. 载沣致行在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三日

行在枢垣鉴：沣于初二日到大沽口，阻风，初六日早登岸，午刻到京，当经电奏。兹将一切公事安置粗悉，拟于十七早，酌带参议张翼，参赞梁诚、王瑾，随员尚希曾，供事尚毓谦由京乘卢保火车起行，恭迎圣驾。谨祈代奏。沣。元。

64. 照译德提督李希德来函备述

醇王此次出洋情形缮具清折，呈请钧鉴：

王爷此次出洋，沿途平安。

邸节及洵、涛公爷在大沽口验看各工程及船坞等处，德国官员接见极为尊敬。

德璀琳由津送至大沽口，甚属殷勤。船经上海、福州、香港、新加坡至槟榔屿等处，所有中国绅商皆备公饌，齐出恭迎。所经各埠，中外人等，均瞻仰王爷端正风裁〔采〕，增光壇坫，以尊国体而重邦交，俱各钦佩不置。

王爷将离上海之时，驻沪德国总领事请饌，并约各国领事作陪。欧洲人藉此接见，极为赞善。但外国口约或具帖请饌，王爷尽行辞之，此举足证王爷深明大体，令人敬服。各国人稟安稟见，王爷均一一答拜。

本朝王爷出洋，乃系首次，所以华人留居香港、新加坡及槟榔屿者，均争先恐后恭迎邸驾。

自槟榔屿至哥林埔稍有风浪，惟王爷尚觉平安。同船有诸多德国官员，均极为爱敬王爷，并备盛膳优礼款待。当时所谈之语，并非谀词，实系德国官员真诚之意。又蒙王爷答赠以物，各人更感王爷之德。

船抵意大利时，该国因王爷乘座此船，相待格外优厚。

邸节到巴些儿车站时，闻柏林如何预备接见，惟为时太急，一切俱在巴些儿地方筹酌定夺。查甫经薨逝之德国皇太后，王爷为制花圈二枚，亲安陵寝上，以昭诚意，德皇与其百姓均深感之。德皇祖父母之陵寝，王爷亦亲安花圈于其上，至前在北京焚死之某提督坟墓，王爷亦安以花圈。于是，举国人民更为感佩不已。前驻北京德钦差之墓，王爷亦赠花圈，派希德前往安放。

王爷赠德亲王亨利之礼物，即上海所制之德兵船石碣模样，德亲王十分感激，并领王爷挚爱之心。

此次王爷所得红鹰宝星，皆由王爷性情纯厚，各人均乐其受之。德国国家本不欲赠送宝星，惟德国皇帝一见王爷，极为爱敬，遂以是赠之，并非以其专使办理国家事务之故。王爷慎重外

交，不辱君命，谅必具奏上闻。

此次大操并各制造厂，王爷均已阅看。虽是匆匆一瞥，总可知其大概。

王爷所带各随员，与德人会晤办事者，即张翼、荫昌、梁诚、麦信坚、吴仲贤及巴斯等。希德据外部大司员说及，去年变乱之际，所办各事，实非轻易。吕钦差办理有方，可令人钦佩，可谓出使中不可多得之员。张翼所有一切应对，似已游历外国者。一日，李树芬问之：此次王爷及各参随所见，以何为最？答云：德国皇帝不论何时幸临何处，帝与民相亲爱如此。此答语甚属可嘉。李君再问：除此尚有可取否？又答云：民乐且丰，可知国政之井井有条。又云：所有看各厂局所时候太短，未能细观。各人虽极赞美，但只可尽行于外国，而不能骤行于中国。必须随时考究，深知其故，然后方可一一施行。以上各语，俱梁诚以文词翻译，德员亦极敬服。张君随侍王爷既形谨慎，会晤德国官员应对有方，实为大员中所不可多见者。德国报章所载，荫昌于德文极有学向，德人不但嘉其文词，而且羨其熟悉德国性情并武备事宜。荫君一举一动亦属文雅，德皇见之，想必乐与周旋。遇有交涉事件，自然易于办理也。梁诚英文甚精，于办理交涉事宜亦极见长，识见亦甚精卓。麦信坚曾于随王爷阅看各局厂时，亦曾翻译问答。惟麦君性情好静，语不轻发，堪称稳重。随使各员，各司其事，甚属妥善。

以后出洋，似可不必携带多人，仆役人等亦可无庸多带，以免阻碍试证。以所经各处情形，当可熟知其故也。

此次出洋，天气平和，各人均呼为王爷天气云。

吴仲贤 谨译呈

至德金陵济南周氏家祠碑记

郝庆元 整理

编者按：本资料选录《至德金陵济南周氏家祠碑记》中《周氏先贤家祠记》等七篇碑记，主要反映了近代著名洋务派官僚周馥一生中的重要活动和政绩，对于全面了解和认识周馥及洋务派有一定参考价值。同时，对于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家族祠堂、周氏家族亦颇有意义。今刊出，供学者参考。

原文系碑记拓影，原碑今已难寻。

周氏先贤家祠记

天下文庙之有乡贤祠，旧矣。吾邑自唐设治至清末千余年中，入祀乡贤者仅十一人，良以乡里见闻真切，其德隆望重，深服人心为最难。乃十一人中，吾六世祖暨先考居其三，是吾族光荣，尤为难得。盖唐析贵池鄱阳地为至德，境属边鄙，久为政教所不及，其始民情朴陋。迨吾族中丞公、处士公^①并起，能文章，敦孝友，蔚然开一时风化，故志称本邑文教自二周先生启之，其诗文为全唐集所著录，宜乎乡人之景仰，永不能忘。至清季咸丰、同治间，遭洪、杨之厄，城破十余次，蹂躏十数年，野无居人，文物荡然。先考^②尚书公热心毅力，修黉宫，立书院，一切培植桑梓，事事不遗余力，至老不衰。故其歿也，乡人奔走

① 周繇（841—912），字宪，唐咸通十三年（872年）壬辰科进士，官至县令，御史、中丞，御选全唐诗有一集，全唐文有赋一篇；其弟周繁（845—907）亦以文行著时。

② 周馥（1837—1921）。

呼吁，请建专祠，并祀乡贤，此其事实昭昭，在人耳目，不能湮没者也。近顷政府通令取消文庙祀典，乡贤祠随之中辍，而民间家祠在所不禁，于是族中父老集群从子弟，谋所以崇先德而矜后嗣，金以为宜于宗祠之外别立三公祠堂。吾族村居依东郭，城内旧有空基，为尚书公所手置，因就地建正寝三楹，供奉三公神主，厅事门闾各如式，旁附宿舍，畀族人司香火。经始于癸酉仲春，至秋落成。颜曰：周氏先贤家祠。寝中悬崇德堂额，以别于宗祠。学熙既筹建筑费，并捐田产，订祭扫会规约，岁时祀事及贍恤诸端，各有章则，且以考察之责，属诸天津孝友堂支祠，用示维系而垂久远。噫！吾邑界连赣边，数年来频惊风鹤，今幸成此举，先人灵爽实式凭之。尝考古者周礼之制，政教始乎乡里，其法自比闾族党，以达于州乡郡，遂相为联属，故民得相安而亲睦。今崇德堂之祀，吾族固得遂瞻依，而吾邑千余年之文教，亦得由此动人爱慕。庶几乡党、贤哲群相敦勛，思有以振德之。则兹祠也，岂止一家之益已哉。是为记。

癸酉^①仲秋，三十九世孙学熙、学渊、学辉谨撰。

祭扫会规约附后。

至德纸坑山周氏先贤祭扫会规约：

本会系由天津周孝友堂支祠发起，为纪念本族先贤唐中丞繇公、唐处士繁公、清尚书恂慎公而设，指拨田产，定期祭扫，并就余款分别成数，提充奖励学生及津贴孤贫之用，以崇先德而敦族谊，特订规约，俾资共守。

一、现由天津周孝友堂支祠将学熙所捐至德东门坂田伍拾伍亩捌分玖厘，地肆亩叁分陆厘，又高湖坂田捌拾叁亩玖分六厘，又花桥地式拾肆亩，庄房拾式间，又坦亭地陆拾伍亩伍分玖厘，庄房肆间，以上七项，拨充本会经费。所有拨出田产，并即改立崇德堂户名管业，藉垂久远，嗣后无论何人，永远不准典卖。

^① 1933年。

二、本会应设置值年二人，经管收租完粮及一切会务，每年由族中预选数人，开列名单，寄由天津支祠审查，指定正副值年各一人，次年以副作正，再选一副。以后年年如此递换，每年正月交接，各清界限。但津祠视有特别情形，亦得令其连任，或未满年而更换之。

凡族人中，有嗜好吸红丸者，好赌者，不务正业者，皆不得充值年。倘充后犯此，应即撤换。

三、每年祭期定为春分、秋分二日。届期，值年应就族中公推八人，邀同族长率领致祭。备办祭仪，以拾元为度。祭毕饮胙，即以供菜作为与祭之人公宴。

四、每年立冬后，由津祠指派本族四人，赴唐山寺、云雾坑、桃源扫墓，顺路过戴家垆、檀家坂、陈子墩、马鞍岭、打鼓坦等处，每人发给路费叁元、香纸费捌元，共支式拾元为度。津祠亦得由津派人回至德祭扫，其往返川资由津支，不在此例。

五、每年收付租稻款项，应由值年于每年终结帐，公布宗祠。经族长核明无误后，再寄天津支祠审查。如有亏短侵蚀，族众及津祠均得指实公议处治，责令赔缴，并永远不准再充值年。

津祠认为必要时，得派人监督收付租稻款项事宜。

六、每年所收租稻存入仓房，除冬初扫墓式拾元，春秋两祭式拾元及完粮等事，准售稻应用，此外不准变价。所有余稻作拾贰成计，叁成留备下年荒歉之添补，如连年丰收，即于次年出果，将款另存，以备收买邻田。届时再由津祠公议决定之；式成为族长及值年酬劳按拾式成分派，族长式分，正值年陆分，副值年肆分，柒成为本族学生奖励及孤贫津贴。其分派法如下：

（一）本族学生程度，以能作文二三百字以上，品行端正为及格，每年终由值年考其全年功课成绩（其考绩方法另订之），取分数优者，定为甲、乙、丙三等。凡甲等得奖三分，乙等得奖二分，丙等得奖一分。程度不合者不奖，成绩不列等者不奖，品行

不端者不奖。

(一) 本族孤老赤贫无依者(其标准另订之), 每年终, 由值年造册, 寄天津支祠评议, 分别极贫、次贫。按丁口计, 其极贫者得津贴二分, 次贫者得津贴一分, 十二岁以下减半。

以上两项统计若干分, 即在每年余稻额定七成内核计分数, 平均摊派。年有丰歉, 租有多寡, 各听天命。

凡已领孤贫月折者, 此项津贴应核计其全年已得之数, 抵除之不足者, 补给尾数; 有余者, 不再给。但依本条规定, 孤贫之学生仍得照领奖金。

七、本会例行事件, 应由值年照章执行, 遇有特别事件, 均须商得天津支祠同意后行。倘因事故, 本会目的有不能继续维持之虞, 或有危及捐助财产之情形时, 天津支祠并得立时收回祭产, 停办本会事务。

八、本会规约如有未尽事宜, 天津支祠得随时增订及修正之。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一月, 学熙又捐国币叁千元生息, 专备歉年田租不足之补助。只准用利, 不准动本, 有余仍存备添置他产。特此附记。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癸酉九月北平市文楷斋刻石

金陵常府街至德乡贤周公故宅建作家祠记

前清同治初年, 先公佐李文忠戎幕, 平定东南, 由沪而苏而宁, 继以官留省, 迎养先祖母叶太夫人, 购常府街屋为久居计。熙生才三岁, 今犹记当年竹马嬉戏于吾母左右, 门庭光景历历在目。迨八岁, 始随侍北迁。光绪戊寅^①, 先公丁祖妣忧, 家贫, 不得已售出, 营丧葬。后数年, 仍赎回, 盖以先人旧居不忍舍去也。嗣先公见熙稍能自立, 乃以是宅给令世守。然宦游北方数十

^① 1878年。

年，迄无一日得归，惟于庚寅、辛卯^①间，扩置东偏基地，增筑十数楹，出赁以助岁修费。乃宣统末至今，兵燹十数次，犹幸敝庐无恙，或亦先人灵爽所式凭欤。辛酉^②，先公薨后，苏省士绅追思遗爱，具词政府，请在金陵建专祠。已奉中央议准，未及鳩工，适国府更章，一切祀典废止，事遂寝。然先公开府两江，政迹赫赫，深入人心，固不系乎祠宇之有无。今春，熙因事过宁，垂白父老犹殷殷称颂不衰，熙于是就故居立为家祠，供奉先公暨先妣吴太夫人神主，岁时祭祀属之。天津孝友堂支祠派人经管，用维久远，既慰一方爱戴之忱，且遂百世不迁之义，而熙所奉世守之命，亦得以毋违。呜呼！兹宅先公得之于大乱削平之初，今复入祀于沧桑几易之后，其中若有数存焉，抑亦先公生平厚德所积，故能迓天庥而永享馨香，非偶然也。爰纪颠末，并录清史本传及苏省士绅请祠原呈，刻石壁间，俾后之览者知所兴感，加以爱护，是则熙所兢兢祷祝者矣。是为记。癸酉仲冬至德周学熙谨撰。

武进徐宗浩敬书

江苏省长郑谦请在江苏建立专祠呈

呈为前故总督功德在民，奉准建立专祠，拟即在省城集资建置，以隆报飨而顺輿情事。窃据江苏绅士魏家骅、仇继恒、邓邦述、吴家修、孙起泰、顾锡书呈称：窃前两江总督周馥功在国家，泽及后世，前由公府侍从武官长荫昌等，请于南北洋地方建立专祠，经内务部核议，请准其集资自行建置，于民国十一年三月八日呈奉前大总统令准在案。其北洋地方专祠，由北方士民在天津捐建，经直隶士绅李士铎等呈准亦在案。窃维绩著旂常，易

① 1890年、1891年。

② 1921年。

代建表忠之观，泽流寰宇，殊方瞻粹德之碑。周故督昔从合肥李文忠公，创立淮军，荡平南服，历监司而荐膺疆寄，由山左而移督江南。值邦家多难之秋，纾文武兼优之略，鞠躬尽瘁，任巨肩艰，总制三吴，凡经两载，综其政绩，倭指难陈。谨举其犖犖大者：南洋防务，夙号恬嬉，濒海军资，尤伤窳败，巡防营之兵心久涣，亟宜舍旧而谋新，东西洋之战略方新，不憚周咨而博采。周故督于是裁湘军，练新军，以重国防，南服军容兹其基础。诘奸禁暴，职有专司，飭纪陈纲，法求大备。借资欧美，较保甲为尤精；练兵江淮，与京津而媲美。周故督于是练巡警以保治安，南中警政，斯实权舆，说礼敦诗，用备干城之选，明刑弼教，先储牧令之才；朴槿作人，则师资是赖；家庭施化，则妇德宜先。周故督于是设武备、法政、男女师范各学堂，南方教育由是萌芽。而其尤关安危大计者，莫如裁江淮巡抚、查办会审公堂两事。先是朝旨割江北淮扬、徐海地置巡抚，苏绅哗然。周故督甫莅任廉其弊，奏寝之，只裁淮扬总兵，设江北提督，大江南北赖以相安。及上海会审公堂事起，华洋交哄，几酿兵端，廷旨命周故督往勘，安良戢暴，全埠贴然。天下事绸缪于未雨，则不见其功，补救于已然，则受祸已烈，之二者使非周故督老成持重，消弭无形，则江淮有累卵之危，沪淞有燎原之势。纠纷未已，溃决堪虞，是周故督之政绩孔昭，勋劳卓著，初不仅治军一事也。征舆论于石头城下，至今犹系人思，溯遗勋于扬子江头，不愧古之遗爱。万户之讴思未已，实匪今而斯今，百年之裡祀常新，冀福我而寿我。遐溯政声于三省，宜隆庙貌于千秋。伏查周故督在南洋建立专祠，早经奉准有案，拟即由家骅等在江苏省会、江宁县地方集资，择地自行建置，以符原案，理合呈请钧鉴，俯予转呈执政备案。并令飭地方官与前清名臣各专祠一体保护，以重祀典而顺輿情，不胜屏营待命之至等情。据此。查前两江总督周馥，功在国家，泽及后世，前经呈请于南北洋地方建立专祠，经内务

部核准有案。此次该绅等，请于江苏省会地方集资择地自行建置，自系为藉隆报飨起见，事属可行，理合据情呈请钧鉴，俯赐飭部立案，实为公便。谨呈临时执政。

中华民国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至德周公山东祠堂记

当前清光绪末造，疆场多故，民生凋敝。先公抚鲁二载，教养诸政，百废俱兴。其最棘手者莫如治河，从百孔千疮之后，为一劳永逸之计，心力交瘁，卒能挽障横流，使数十年来无大溃决，地方至今隐受其惠。故公薨后，遗爱甚深。邦人士吁请中央准建专祠，春秋致祭，正拟集资兴筑，适国民政府通令取消一切祠祀，事遂寝。今岁癸酉^①，距先公见背十有三年矣，学熙等在济南商埠置基，自建家祠，附设寓所，畀子孙之寄居兹土者世守之。其常年经费诸事，则属于天津周孝友堂支祠，用维久远。谨叙其颠末，并录士绅原呈暨所撰碑文，勒石壁间，俾后世瞻依有託，常同粉社之馨香。而先公灵爽所凭，永作棠阴之纪念。呜呼！河山无恙，俎豆常新，百世下其亦有揽斯文而兴感者乎？是为记。

癸酉孟冬至德周学熙、学渊、学辉谨撰。

昆陵徐宗浩敬书

山东祠堂碑 襄平赵尔巽

江、淮、河、济，古称四渎。而惟河最难治，自大禹导河积石与导江、淮，导沅、济东入于海，于是四渎安澜中国者，垂三千余年。洎元季，河南徙，合淮入海，苏皖二省受其灾。清咸丰初，河北徙，合大清河入海，而东省遂逢其害矣。大清河者，古济水也。河由淮而济久淤阨，下游壅塞，水高出民屋上，横决无

^① 1933年。

时，故民罢于救水。然至今而民皆得安居者，惟建德周公之功也。公初官直隶，辄以治河著崇迹，及来抚斯邦也，勘惠民、刘旺庄、利津、冯家庄诸漫口，复驰上游履曹濮，于济宁、兖州、东平、运河、小清河诸形势，尤能殚思竭瘁，用澹厥患。值河决利津、薄庄，适当河冲，其势又曲，将横溢不可制。即治堤而费且万万，不若不塞，俾河流直泻抵海便，乃令徙所居民当水冲者，决口放河流自刷尾闾入海。又用抛石护堤法，石不足，则砖代之，费省而工坚，由是东省数十年无水患。论者谓公抚东二载，兴学校、课农桑、创设教养工艺诸局，开官报以达民情；起中西医院，以疗民疾，皆因时制宜，而其有关大计者，尤在交涉一事。德人踞胶州，意欲囊括全省，公外与德吏相亲，内则守约款不逾尺寸，首奏开济南、周村两商埠，复筹官款，维峰矿以敌之，德人遂寝之范围。凡此皆由河功告成次第设施，民歌咏焉。昔者虞廷制治，由于水土既平，经训流传，卓为典要，后世治河诸书无虑十百，然皆劳费无已，终莫裨于民生也。创一法而天下利赖之，与夫拘一法而天下愁痛者，其得失相较为何如？然则国家之理乱，世运之隆污，推其所自，岂不系乎在上者主持调剂于其间哉。公讳馥，字玉山，用军功起家，历任津海关道，四川、直隶布政使，至两广总督，所在多善政；而山东民尤深受赐。故于公之歿，念公德惠弗能忘，爰请建祠省会，春秋飨祭。而属尔巽举公治绩之大者，为文镌石，以示方来，且系以诗曰：

泰岱神皋，泱泱齐鲁，行则肩摩，动则汗雨。河济再迁，时乃怀襄，千里一曲，怒涛弥猖。公谓河伯，汝胡为灾，从汝所之，而毋厉阶。昏垫既乂，咸熙庶政，靖内柔外，张弛惟命。蔼蔼芳轨，允绍仁圣，松桷旅楹，有蕉有酒。以妥公灵，式临左右，惟公惠我，匪惟我私，千秋万祀，来考此诗。

山东祠堂碑 胶西柯劭忞

山东濒海，湾岛错连，扼北洋渤海形势，通商而还，海人麇至，山东遂为所覬觐。光绪二十三年，德乘我敝，踞胶州，设官驻兵，视若属县，筑铁路达省会，因蚕食沿路矿山，势张甚。巡抚周公慤焉忧之，奏开商埠济南、周村相箝制。德人沮蹙，自撤胶济路兵，还五矿，民乃安堵。其后二十有六年，胶州终复还我有。而公于是年八十有五，卒于天津寓庐，山东之民感念勋德，为建祠济南，春秋飨祭礼也。公讳馥，字玉山，安徽建德人，今县名易至德。初赞李文忠公戎幕，已而治河，数有功绩，至永定河道。历任津海关道、天津道、按察使、长芦盐运使、四川布政使，调直隶，擢山东巡抚，两江总督；转闽浙，移督两广，所至以廉勤自厉，多惠政。当抚是邦也，值河决利津、薄庄，公辄导河直泻，抵海不塞，而徙居民避之，沿河更设电局，备险工，迄十数岁，河不为患。盖公治河逾三十年，其规划闳远皆类此。当文忠督畿辅，创立海军，设机器局，辟天津商埠，建陆军、水师学堂，举凡新政，公莫不与厥事，而尤留意交涉和民教。朝鲜初议商约，公草创首书，朝鲜为中国属邦，枢庭刊其语。公慨曰：分义弗著，招外心矣。后果有中东之事起，公总营务前敌，极陈战守之宜，驱驰安东、辽阳、摩天岭间数百里地，寝馈冰雪，不一言瘁苦。及莅川，而义和拳乱畿辅，诏各行省练义民。公曰：彼乱民者可召乎！白总督阁朝旨不下，川以无事。八国既联军内犯，两宫西狩，文忠授议和大臣，欲得公自佐，调直隶布政使。公至数月，事稍平，而法兵仍踞保定，闻公来辄郊迎入署，乃缮城郭，抚流亡，民大悦，法兵徐引去。而联军壁天津，治津榆路如故，公复趣说诸使臣，诚以相孚，卒完疆索，时嘉叹焉。盖自国威隳败，外患日亟，而迂儒曲士，又复鄙夷新政厥为夷务。公独挺然自任，外亲宾礼，内严款约，付应剖析，机括悉

中。而山东之事，系邦国安危尤重，不出尊俎之间，折冲衽席之上，斯其智略之大，体国之忠，宜民之思，公深而不敢忘也。专祠因世变未及办，公之子学熙等乃营家祠，以癸酉年十月落成，前后之屋各五楹，旁屋各三楹，俾子孙世居守焉。余谓公旧治兹土，神其妥字，宜乎垂馨千祀而不朽，而后之士来拜祠下者，恍亦知所感慕而自奋也欤！

山东督军田中玉请在济南建立专祠呈

呈为故抚遗爱在民，据情转恳建立专祠，恭呈仰祈钧鉴事。据地方士绅吕海寰、张英麟、赵尔巽、何宗莲、孟继笙、毛承霖、丁麟年、刘恩驻、于宗潼等函称：查已故前山东巡抚周玉山制军馥，行藏勋业，海内所钦，历任封圻，俱有名绩，而前在东抚任内，惠爱尤深。今者岁厄龙蛇，神骑箕尾，抚时感事，弥思保障之勤，崇德报功，欲永馨香之荐。谨陈其拳拳大者：

一曰兴办学堂。东省风气开通较晚，故抚莅任，首重教育，中小学校推广日多，蚕桑、农林渐次设立，所建省城高等学舍规模尤壮，程课尤详，延聘通人、教习多士，务在变学究为通方，化迂腐为实用。迄今海岱之间，英彦辈出，讲求政法艺能，日新月异，实由故抚早立之基致臻斯盛，其培养人才也如此。

一曰劝募路股。胶澳既开，门庭洞启，汽车内骛，势尤駸駸。故抚周历海疆，怒焉如擣，乃于东隅既失之日，为桑榆收效之谋。与彼国合订章程，力劝华人附股，阳敦睦谊，藉以阴挽主权。方是时也，众情疑阻，咸谓随人作计，无补丝毫。迨夫接收议起，争辩纷纭，仗义执言，惟此是赖，始知老成谋国别有深衷，譬犹良医察脉，善奕观棋，方其未形，群相哗笑，及观厥效，乃共憬然，其深识事机也如此。

一曰创设商埠。我国商埠之设，大抵由于各国之要求，故恒听命于人，为所牵制，从未有中国自倡之而使人听命于我者，有

之自山东始。盖铁路所到之处，即商务所萃之处，亦是形胜必争之处。故抚有鉴于此，先发制人，特于济南、周村两地自辟商场，列隧置市，所以杜彼窥伺，使之就我范围。其后济南一埠异常发达，货贿流通，公私充衍，冠带衣履，杂遝鳞萃，富商大贾故以并趋争先，稗贩、佣赁、迁徙之徒，衣食于兹者，尤不可胜计。昔陶侃在武昌立夷市于郡东，大收其利，兹之经划将毋与同，其建威消萌，为地方兴大利如此。

一曰修治河工。东省大吏多以河防著称，然往往沾习旧章，昧于通变。若乃深察形便不主故常，古法今制互相为用，则以故抚为最，故其功亦较前人为多。利津、薄庄之决水，适由古徙骇河入海，奏明不事堵塞，以畅尾闾，是为因形便，迁其土著，载之高地，辍公家堤防之费，为灾民庐舍之资，汉明之诏，贾让之策，前史所陈无以过此，是为用古法；碎石坦坡，抛砖成坝，两师其意，随宜而施，先事预防，不惜劳费，沿岸设电，速于置邮，一有险工，闻信立至，是为用古法而不废今制，即以今制济古法之穷，遂使千里之内蠲堧宜耕，十年以来鲸波息警，其御灾捍患，为闾阎谋久安又如此。

至若察吏安良，整军经武，绥和民教，保持矿产，旌节所临，百废俱举，第其功伐，堪与丁文诚、张勤果相伯仲，机神干略，殆又过之。文诚、勤果皆有祠宇崇奉济上，故抚歿于易代之后，而民功曰庸，讴思未已。褒忠劝善，有国宜先，准之前典，事同一例。伏望体察群情，主持公道，呈明大总统，准在山东省城建立专祠，春秋致祭，永媲樵梁之祀，式昭阮略之勋，感荷鸿施，实无纪极等语。据此，查该故前抚经制东邦，勋绩昭著，群情爱戴，历久如新。既据绅民吁请，在山东地方建立专祠，以资崇报。合无仰恳恩施，俯予照准，以顺輿情。除咨内务部外，所有请为故抚周馥建立专祠缘由，理合恭呈，仰恳大总统鉴核训示施行。谨呈。

中华民国十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附录一：

天津祠堂碑 天津徐世昌

光绪二十六年，乱民肇衅，八国联军内犯，两宫西幸，廷旨趣大学士、两广总督李文忠公入都媾和，于是文忠奏四川布政使周公北上襄事。越年，文忠薨，海宇震撼。内而抚戢凋残，外而抗御强敌，凡文忠未及为、与为之而未尽者，举属之于公，张弛缓急，悉协其宜。呜乎，伟矣！

公讳馥，字玉山，安徽建德县人。咸丰初，从文忠戡定江苏，历功保道员，留直隶。尝署永定河道、天津兵备道、长芦盐运使、除津海关道，历七年，升授直隶按察使，历八年，尝一摄布政使。中东役起，特任前敌营务处，我师不利，文忠薨去位，公亦告归。其后，文忠出治黄河，强起相佐，条论河政，机要甚悉，以费绌不果行。文忠密疏荐其才，诏授四川布政使，调直隶，大乱敕平，晋兵部尚书衔，巡抚山东，调署两江总督，移闽浙，未莅任，改授两广总督，逾年致仕归。公晚膺疆寄，兴学练兵，以实心行新政，东南资为保障。

先是，公在直隶沉滞监司垂三十年，平狱讼，飭吏治，创路矿、邮电，储武备、译材，厘订通商事宜，声施粲然；而其功德在民，尤以河工为最钜，迭治天津入海金钟河、北运筐儿港减河及通州白河。庚寅^①督办永定河北汛大工，创北岸巨石堤，卫京师。癸巳^②督办卢沟桥。减水石坝，工益钜。后抚山东，河决利津、薄庄，建议迁民居，使河流自刷尾闾入海；又创抛石护堤，石不给则制砖以代，以故京畿及东省数十年无水患。联军既陷京师，公自四川调直隶布政使。外兵横境上，戮前布政使廷雍，踞

① 1890年。

② 1893年。

司署，及闻公至，法兵列队逆诸郊，而自让司署，然犹踞省城未退也。后见公所施設悉当，乃徐引退。两宫闻轸状，始拜巡抚衔之命。方议回銮，而元臣遽殂，公护直督兼北洋大臣，从容镇慑，举国贴然。项城表公任直督，公还布政使任，奉迎两宫返京师。大局始定，将赴山东，袁公奏言：老成重望，列使所敬信，撤兵钜任，微公莫属。公乃激以至诚，立谈之间，津榆俱复，海内闻之，靡不额手称庆。惟公受知文忠，相与为终始。文忠歿，而国势益衰，公继其后，所处盖益难矣。其事动关天下安危，非吾直隶所得私，而直隶受赐独厚，宜吾民至今不能忘也。

公学宗程朱，兼通经术词章，著《周易汇参》、《玉山诗文集》，而以《治水述要》为生平精诣之书，后有尽心水利者，举而措之，诚万世益也。民国十年辛酉九月，薨于天津旅邸，年八十有五。事闻，清室哀悼，予谥愍慎。直隶、山东及江南皖省士绅，均牖公事迹，请建专祠。世昌前在大总统任，知公最深，辄报可。兹当津祠落成，爰举公大有造于吾直者，镌诸石以诏后世，系以诗曰：

皇天不仁，遽衍遽乱，八国兴师，京畿糜烂。皤皤二老，联翩北上，谤议潜消，父母斯仰。指挥谈笑，歆歆风雷，九宇倾覆，一朝莫之。亦有河伯，毋逆厥性，禹甸芒芒，罔不効命。滔滔淮济，濯濯江浦，勋业相望，敢告终古。

附录二：

天津祠堂碑 天津严 修

有清逊国之十年辛酉，故两广总督周愍慎公薨于天津。于时，畿辅荐绅之士，咸相顾而叹曰：公鸿功骏烈，炳耀铿锵，与世无极，今公虽歿，而道化行于国中，风声振于徼外，其颂懿美、称神明，巷祭而野祝者，环津上皆是也。崇祀先哲，国有彝典。矧贤者宦履肇始之地，与夫生平流寓之乡，而庙不创立，于

典奚称焉？乃共上其议于直隶省长，请为公立庙天津。书上省长，为达诸部，辄报可。越二年，始鸠工。度材于津上之挂甲寺，为制后殿、旁庑、重门、夹室，总二十四楹，中以祀公，都墙之外，石坊、照壁各一，廡库、庖湑各得其所，庭圯端洁，街道直修，阑楯翼遮，城平密巩。旁设寝庙，祀公正配吴夫人及公支下之在北者。祠之东北隅别筑荐福庵，祀西方诸佛，招僧主之，以奉公祠事。其西为馆舍值事者之所居。北为藏书楼，公之手泽书籍及遗墨、碑版，悉保存于是。西南隅则周氏之广慈善堂附焉。祠地凡三十亩有奇，祠外隙地建市廛，收其馥值，以为修葺之资。祠经始于癸亥^①之春，落成于甲子^②之夏。其年四月，将有事于公庙，罇俎维旅，法齐苾芬，而丽牲之石未有文者，众以属修。修维公当咸同间，从李文忠公肇建淮军，遂夷粤平捻。逮文忠移督直隶，引公自辅，公兴文教，修武备，酺河引渠，通商惠工。津上百族错居，中外民大和会，公怀柔绥抚，疆场因以无事。迄光绪庚子之难，畿甸沦铺，公相文忠回七八国方张之师，捍亿万兆生灵之患。文忠薨后，公卒力返津榆侵地，其有德于津人者尤甚渥。士民怀思追慕，薪公庙食于吾土，以永永无敎，斯诚其宜也。修自少师事公，比岁公就养津上，修适里居，执业请益，靡浹旬间隔者。今庙貌岿然，此虽疏逖之士瞻礼祠宇者，犹以兴无穷之思，而况生平昕夕严事其人者乎！昔鲁有閼宫，而蜀相诸葛忠武立庙沔上，至今咸歌詠不足，使人想见盛德之美。修虽不敏，敢缘古义，再拜而系以迎送神之诗，诗曰：

公昔仗策兮北游，志康斯民兮功济九州；藏衣冠兮旧邱，魂气则无所不之兮，嬉吾邑兮盍少休？驾凤鸾兮骖云虬，公入新庙犹兮夷毋，罇有醴兮俎有馐。式燕享兮春与秋。神霁霭兮来至，风冷冷兮堂户，声赫赫兮鼙鼓，肃肃两旗兮上下，龙在天兮鸿在

① 1923年。

② 1924年。

渚，迺祐神人兮锡纯嘏，奠河海兮永终古。

附录三：

安庆祠堂碑 桐城马其昶

辛酉^①冬，建德周愨慎公之丧归自天津，将还葬于其邑。舟过安庆，乡人士迎奠，谋所以祀公者。金曰：咸同间，东南倣扰，幸能芟夷大难而底定之，翳惟曾文正公收其成，李文忠公善其后。文正所为未竟者，非文忠莫属；而文忠所为未竟者，非公莫属。公之功在天下，与文忠相终始，然初受文忠之知遇，固于安庆发其轂也。乡邦父老思中兴之伟业，念公始事之勤劬，报殮之典乌可以阙。爰牒上公状，请于省会建专祠。报曰：可。越两载而祠成，以此见公之德泽涵濡于乡者，时愈久而愈不能忘也。天运循环，剥复相倚，当祸变方殷之时，其迁流诚不知所终极。粤匪披猖，自武昌以达金陵，都会所趋，声势蔓延数千里。其树本坚兵利卒，顽夺郛郭，以据要害，荼毒之惨视輓近为尤烈。长江上下，贼踪弥满，纵横四出而莫可如何。安庆当上下游之冲，郡城旋得而旋失，凶焰方张，如火燎原，不可响迓。迨安庆围解，江浙又失利。文正自祁门移节兹土，筹战守策应之计，倚文忠如左右手，幕客皆一时贤俊，人才辈出。公于是慨念时艰，建策自奋，文忠见而异之，遂留幕府论兵事，敝精疲神，磨以岁月致之，盖甚难也。踞安庆一危城，控制江淮，阻遏贼锋，扼其吭而夺之气，卒能落其牙距，凿其巢窟，手夷大难，公之赞画为多。嗟乎！古今非常之局，必得非常之人以任之，寇乱方炽，不患无已乱之日，而患无御乱之才。文忠承文正之后，能建不世之勋，故乱未久而即定，然则国家治乱盛衰之故，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其后，文忠督直数十年，经营百端，多设施而未【及】收效，乃竟一再蹶，赍志以歿，凡所为吏治、河防、军政、外

① 1921年。

交、路矿、邮电，与夫绥辑民教、通商约章、议和条款诸大计，胥赖公区处条理，终其事以告厥成功。宜乎文忠当日身膺艰钜，四顾心伤，谓并世舍公无与共功名者也。宇内兵争日出而未有已，倖得如公与文忠艰难揶拄转危为安者，以匡时而应变，治平岂终无望已乎！近岁国家多故，吾皖郡城数惊，犹未若往时寇乱之甚，而居民弗宁，恒惴惴朝不谋夕，若有风雨飘摇之叹，其故何哉？旧泽湮而民生蹙也。此邦人士慨然念戒惧之无已时，思复覩中兴之盛事，抗怀公初受知文忠之日，假手奏功安庆，其嚆矢也。赞画基于一乡，而利赖遂磅礴乎天下。记曰：有功德于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公之捍患御灾其功德溉民者，在吾皖为尤挚，故于其祠之成也，述往事以诏来者，因勒石而系以诗曰：

屹屹皖城，大江东注。在昔浸氛，屡为贼据。节帅投袂，牙纛前驱。忧国瘁矣，我民其痛。顾瞻江淮，实生两杰。公佐合肥，左提右挈。上书当路，草檄能飞。出死入生，喷薄重围。以戢大乱，以鬯皇威。甲子一周，河山顿异。遗耆云亡，天胡此醉。澎湃江涛，伏莽在野。后顾茫茫，谁继公者！庭庑式廓，模范馨香。更千万祀，来视公堂。

附录四：

安庆祠堂碑 合肥龚心湛

前清咸丰初年，李文忠公创立淮军，东征粤寇，西平捻匪，功与湘军相比并。其后，文忠以大学士督直隶兼北洋大臣，创办通商事宜，凡所设施，胥关天下安危，而每遭疑忌，不安其位者屡矣。迨庚子乱世肇衅，八国联军犯京师，两宫西幸，天下阽危，卒赖文忠缔约媾和，转危为安。自后国是大定，天下遂无有訾议之者，而与文忠终始其事，惟建德周愨慎公一人而已。公初从文忠，以军功起家，历任直隶监司，授四川布政使，复特调直

隶。文忠薨，尝护总督兼北洋大臣，数转至两广总督。是时，清廷方厉行新政，公一以实心将之，其布政直隶也。所为尤关天下之重。盖中国自海禁大开，列强挟其坚船利械，纷至沓来，若风雨之不可抗御。曾文正公督直时，实始讲求洋务为富强之本，李文忠继任，益经营三十余年，多格于朝议，未尽发展。而一挫于甲午日本之役，再挫于庚子联军之役，两公所搏揖缔造者，至是渐焉殆尽。暨和约甫成，文忠遽逝，举迎銮、撤外兵、绥辑民教诸大计，胥公藏其事。议者咸以继文正而有文忠，继文忠而有公，诚所谓社稷臣者。嗟乎！古今未有之奇局，非非常之人不能任之。胡文忠公尝谓：自南宋以来，士大夫讳言和议，至今已七百余年，而李文忠始发其覆，宜其身膺艱钜，踌躇四顾，遽焉自伤，以为生平所与共功名者，舍公而外，固不可以旦暮遇之也。先是，公任直隶监司最久，举吏治、民生、路矿、邮电、军政、外交诸务，皆为文忠所倚任，而其前后治河之功尤最钜，以故津畿及东省数十年无水患。公自两广告归，逾数年国变，益覃思典籍，从事著述以寄意。民国十年辛酉（1921年）九月，薨于天津旅邸，年八十有五。丧归，皖中人士谋所以祀公，以为当日无文忠，几无今日之天下，无公，亦无以赞成文忠之所为，盖公与文忠所为，为天下所利赖，实为吾皖所託庇，而崇德报功之典乌可缺如。乃群状公事迹，请于省会建专祠，以资报飨。奉前大总统令，报可。越二年，祠成，乡之人以心湛知公深，属为丽牲之文，以诏后世，爰述其荦荦大者，镌诸石，且系以诗曰：

大造蕃衍，波诡云蒸，世方晦冥，畴见明星。汤汤江淮，实生两杰，王事驰驱，左提右挈。嗟我相国，负天下谤，尽瘁于国，谤亦何妨。维公崛起，垂老相依，出死入生，气薄风雷。精诚所达，足动鬼神，矧彼异族，而亦人焉。仗义执言，乾坤旋转，至今国存，变犹不变。吾皖报德，怆怀遗老，先正云亡，前轨谁绍。万古陵谷，式临此祠，后有作者，盍视铭诗。

高阳土布档案选

宋美云 整理

编者按：河北省高阳县的土布业，十九世纪末、本世纪初期，在我国北方各省曾名噪一时。它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从家庭自给或仅供当地之需而远销外地，占领市场。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帝国主义无暇深入对华经济侵略而得到发展，战后，又受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之打击而渐趋衰落，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过程中，在手工业方面，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代表性。这里发表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一批档案资料，是从天津档案馆所藏天津商会的大量档案中精选出来的。可供研究高阳土布业，特别是它最初发生发展情况者参考。

1. 农工商部致天津总商会

农工商部为札飭事：

接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一日奉上谕：“近年来纱布进口日益增多，实为漏卮之第一大宗。民间纺织渐至失业，固由工作之未精！尤因种植之不善，利源外溢，何所底止。查美洲等处棉花种类精良，茎叶高大，花实肥硕。所出之绒，细韧而长，织成之布，滑泽柔软，胜于内地所产数倍。皆由外国农业家于辨别种类，审度土性燥湿，考验精详，故能地产日精，商利日厚。中国棉花质性较逊于外国，种植又不讲求，南北各省洵有数处，所产较胜，而培植仍多卤莽，是必须博求外国嘉种，采取培养良法，料美工精，自能广行各省，保全利权。著农工商部详细考查各国棉花种类、种植成法，分别采择，编集图说。并优定奖励种植章程，颁行各省，由各督抚等督率，认真提倡，设法

改良。其果能改良之棉花纱布，经过各关卡应如何优加体恤，并著税务处妥筹办理，以资畅销。该部未经颁章以前，著各省督抚先行体察该省情形，劝谕商民实力筹办，或选择官地试种，或集股设立公司，多方鼓舞。所属地方官及绅商，如有切实创办早著成效，应令将所产棉花送部查验，准其奏请优奖。此乃兴利急务，勿得视为具文，致负朝廷振兴农务，惠利民生之至意。钦此。”遵旨寄信前来。查纱布为民生服用所必需，各国制造日精，其输入我国者，岁以亿万计。此次特奉谕旨，亟应详细调查，藉资考镜，除由本部咨行各出使大臣，迅飭商务随员将该国棉花种植及织造纱布悉心考查，绘图贴说，详细报部。所有该国棉花籽种，一并选择采购，寄部试验，再行订定奖励种植章程。并咨各督抚飭属详查见复，暨将遵旨先行劝办情形，随时报部备案外，该省各属地方，现在种植棉花以何处为最多，以何地为最良，所织纱布行销何处，能否仿照洋布，与洋纱比较优劣若何，以及有无设立此项公司，或已设公司几处，自应先行调查，以资比较，而便考校。合行札飭。札到，该总理等即便遵照，并转知该省各商务分会，一体详切查明，迅复本部，毋稍延缓。切切。特札。

右札 天津商务总会，准此。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

2. 高阳商会复天津总商会

高阳商务分会为申复事：

（上略）伏查高阳物产棉花为大宗，民间织纺为生计。然棉花之生质，实因土性之肥晓，亦由籽种之优劣。高阳所出之花，绒短而色白，织纺不及外洋之精工，线绒不及外洋之柔滑者，诚不能精其底蕴，亦不能不仿照改良以期进步。自去年组织商会，开办以来，研究物产，体察商情。六月间曾在天津各工厂调查织纺工艺，至弹花、轧花、织布各机器，均可仿照推行，当

即购买人力木轮织布机器。若照设公司，用款甚巨，未能设立。因选本地良工巧匠，仿照样式作成，按照用法劝导乡民织纺改良。现在高阳左近村庄，织布均仿作此等木轮机器，约计千余架，均织宽面洋布，较前所织之布工精数倍，销售日见起色。惟纺纱机器因本地花绒短促，实难仿办。此高阳织纺之大概情形也。俟后应如何筹办之处，购办棉花种类之法，可否飭下通省农业学堂暨农务各会，通行合办，实出自上裁。所有织纺情形并棉花种类，理合备文具复，伏乞照验施行。须至申者。

右申 天津商务总会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到

3. 磁州彭城镇商会复天津总商会

磁州彭城镇商务分会总理府经历銜王鸿宾为申复事：

前奉贵总会照会转奉农工商部札，接准军机大臣字寄，以奉上谕云云。札飭到会。奉此。窃查磁境地面，石厚土薄，种棉之地仅居十分之二，所产之棉并不敷外客购买，故民间于纱布一项，鲜有织造。考其种类，皆购自永年县、赵州等处。所出之棉，绒短而粗，织成之布，疏阔不精。固由工业未良，实由种植不善。若以之比较外洋，相逊甚远，然嗣后得有外国嘉种，用意培养，当必有效。至公司一项，去年十月拟集款创立，后以款项无着，未成中止。即遍查磁境各村，目下亦无设立之处。此磁州棉花种植之大概情形也。现既调查明确，理合备文具复，伏祈贵总会宪台大人查照施行。须至申者。

右申 天津商务总会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到

4. 秦皇岛商会复天津商会

秦皇岛商务分会总理县丞銜孙璋为牒复事：

(上略)查秦皇岛附临榆县属境，地处海滨，土多斥卤，不宜种棉。县之西北，土脉稍和，虽有种棉之区，而历年所产亦属无多。自棉纱充斥，愈形销减，故近年所出棉花，不敷本处絮衣之需。无论其不能考较设立公司，既乡间之机杼遂亦因之渐辍。惟本县谭令提倡官商集股于县城创设实习工厂一区，购用木轮铁轮等机器共十五架，由天津及本处购买双兰鱼洋线及合股白洋线，织宽面布疋。每工日织布四十尺上下，面宽二尺四五六寸不等。每疋长一百零八尺，其布华润可观，较洋布无少差别，均在本处销售，亦甚畅旺。此临榆县种植木棉及机织之大概情形也。

又，查抚宁县环山一带种植较多，农人播种皆谓最宜砂土松浮之地。其种类之嘉者，籽小色黝，微白者次之。立夏前布种，初伏搯蔓。其秧喜干短枝繁，叶肥硕，则结桃亦密。所出之绒，柔长细润。丰年每亩捡籽棉百觔左右，每籽棉一觔出净棉四两。考籽之微白色，近有采购美国者，较中国白籽种类良胜。初种则茎叶高大，出棉固多，而绒稍促短。种植一二年，茎叶遽变，依然矮小。揆其性质，未必概因土地之肥饶，气候之寒燠也。总之，泥于守旧，弗善改良。若将种植培养之方，博究底蕴，可期愈臻精美。况乡间种植既不得法，弹轧统用笨器，织纺均系妇女，机杼已不合用，而经纬犹更失匀。织成布疋，体质粗重，布面间有跳线结瘻之疵，较洋布之滑泽差逊，用以制衣，其坚固耐久则过之。而该县并无公司之设，向有商贩购运关东者，近亦鲜少。现今乡间有购洋棉纱，用笨机织成布疋，虽然莹洁华润，而性质脆弱，不能经久。以此考较优劣，而该处所产之棉未尝逊于洋棉。此抚宁县种植木棉及乡间织纺之大概情形也。俟后应如何提倡筹办之处，出自上裁。所有遵查木棉种类及种植织纺各缘由，理合具文牒复，为此牒请总会宪查核汇报施行。须至牒者。

右牒 天津商务总会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八日

5. 顺德商会复天津总商会

顺德商务分会为牒复事：

（上略）伏查顺德府属织布之处多，产棉之处少，如内邱、钜鹿、唐山、任县、南和、平乡等县，向以织布为生计，而惟平、广、钜三县产棉仅堪自用。其余各县用棉皆购自邻境，絨短葩瘦，不见精良。各县纺织向系女工手制，所纺之纱，粗细不匀，织成之布，自难精密，视洋布之滑泽柔软相逊远甚。各县所织布疋，向销山陕一带，皆由西客行贩，每年总计约有二百万疋之谱，以彼不产棉布故也。并无设有公司。自二十八年春，职因故到津，瞥见美商胜家公司手摇缝机，日商田村洋行轧棉、弹棉、纺纱、织布等机，甚为捷便，遂定购三十余架，包送到顺，并传授用法；又于郡市择地摆列，布告织纺村民来郡参观，并授以用机各法，以期改良进步，仿效推行。继而任县、钜鹿以及邻封各属，仿造者有之，贩卖者有之，藉兹风气渐开。即如钜鹿、任县、平乡，现在各设实业工厂，仿造木轮机器百余架，均织宽面洋布。惟纺纱机劣，不适于用，仍须购买洋纱，不免利权外溢之虞。此职会调查之实在情形也。俟后花种应如何采择，织纺应如何精进，非各属农商各会成立，认真研究，提倡有人，不足以增进智识而挽颓风也。仅将棉种、织纺、销售大略，理合备文具复总会宪查核，伏乞照验施行。须至牒者。

右牒 天津总商会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6. 高阳商会呈天津总商会

高阳商务分会总理韩为牒呈织纺土布，疏通销路，恳请详咨布货出口经过各关卡给与凭照，以资保护而重商务事：

窃高阳棉花为大宗，织纺为生计。曩昔织纺高阳粗布，出售

不利，日见消疏，渐至失业。商等自去年组立商会以来，提倡织纺改良，购办人力木轮机器，均改织宽面洋布，推广实行，前已将大概情形详复在案。蒙登商报，以昭众览，足见总会宪提倡鼓舞之至意。现在织纺得利，日见起色，高阳合属改织宽面洋布，统计日出数百疋，月计万余疋，若不设法疏通销路，一若积聚，大有关碍。商民远近招徕，贩客接踵而至，发往布货以至古北口、张家口、津省、京通。诚恐经过地方各关卡厘税刁难，有碍销路。查农工商部札行通飭：凡提倡内地改良之棉花纱布，经过各关卡，应如何优加体恤，并着税务处妥筹办理，以资畅销等因。奉此。鄙会有保商振商之责，不得不仰体宪意，维持商务。为此牒呈，恳请总会宪据情转详，并咨行税务处，应如何酌定厘税给予凭照，畅疏销路而保商民。是否有当，理合牒呈，伏乞核夺，照详施行。须至牒呈者。

右牒呈 天津商务总会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廿七日到

7. 高阳商会呈天津总商会

高阳商务分会总理韩为牒呈提倡改织宽面洋布，恳请移送品评会酌加品评，以资激励事：

窃查京津筹立各会，维新商政，工业为重。伏想品评会设立以来，原为内地出产，激励改良，不论巨细精粗，凡内地所产之物呈送品评会，以经品评，显陈优劣，随即改良，以资鼓舞，而昭激励。鄙会自劝导商民织纺改良，渐有成效，所织之宽面洋布，虽则推广实行，而优劣究属不分，难资激励。兹有商会议员杨木森将现织之宽面洋布样式呈请品评前来。为此，牒呈总会宪核准移送品评会，以加品题，具有成见，随即改良，而期进步。理合备牒呈送，伏乞照验转移施行。须至牒呈者。

附呈宽面洋布四半疋

右牒呈 天津商务总会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到

8. 天津劝工陈列所致天津总商会

敬复者：

顷接手书，以高阳县商务分会提倡改织宽面洋布四半疋，送交敝所，嘱为考验，并嘱敝所择订日期，以便转致该总理等到所研究等因。准此。查敝所招考工业简章，凡外州县制品送所考验者，自三月起，以五个月为限。本埠制品送所考验者，以四个月为限。如有独出心裁，创造新法新式，或能抵制洋货，行销外国者，一经敝所取录，应即分别给予金银奖牌。现尚未届考期，所有此项宽面洋布，自应归作投考一类，以便届时汇考。将来有何评语，敝所当必另行函复可也。除将宽面洋布四半疋留所汇考外，相应检同招考工业简章一份并收据一纸，一并呈请察阅转交。将来考毕时，如该分会索取此项布疋时，即以此收条为证，肃复。顺颂均祺。

名正肃

天津劝工陈列所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到

附一：

工艺总局第四次奖评语：

组织既密，价格亦廉。且查原料均系中国土产，用塞漏卮，此为正品。

三十四年十月

附二：

劝业道孙评语：

该县织业发达，甲于畿疆，该分会呈品尤复细密平匀，颇堪适用，宜其行销远近，遍受欢迎，合亟褒扬，以昭激励。

南洋商会赏给奖金执照

此高阳商务分会送来该县土布土产所得奖评等语，应归档。以此事由该会拟请复土布税则，不日即来公文矣。

夏时五月十五日记

9. 高阳商会呈天津总商会

高阳商务分会总理韩为提倡土布，广开销路，遵批划一纳税不至重征，再请咨询关道宪通飭税务各局征税划一，以免轇轳而恤商民事；

窃高阳土布实行改良，民间之生计日兴，而外溢之利权可挽。前据众商据陈：高阳职商许鹿鸣贩运土布，经过张家口一带，因土布征税无定，在通桥税务处稟请轻减，蒙税务处批开：

“该商贩运爱国图土布稟请减税，系为恤商起见，应从宽减免，以顺商情。嗣后凡遇贩运此等布疋查验，每疋九丈，按五分完纳正税；每疋五丈，按二分五厘完纳正税，以昭公允。此批。”据情牒请总会宪详请农工商部咨行税务处通飭各关卡，一律纳税，不至重征关税，商民两有裨益。已蒙总会宪稟详农工商部，当经咨税务大臣酌核办理，蒙批开：前据该商会稟：以高阳县许鹿鸣贩运土布，仍请优恤减税等情。当经咨行税务处核复去后。兹准复称：该商所运土布，既在通桥税务处稟准，每疋九丈按五分纳税，每疋五丈按二分五厘纳税，是该处收税业经宽减。至所请照所批之数再加优恤一节，应候本处核定改良棉花纱布优加体恤统一办法，通行各省，该商自能一体均沾。现应仍照向章办理，以免纷歧等因。合行批示，仰转飭遵照，此批等因。遵此。仰见总会宪提倡织纺改良之至意，广开销路，保全商务之深心。理应静候部章，无庸烦渎。然天津为直省之口岸，商家交通之总汇，高阳土

布振兴，非由天津畅行销路广开，不足以敌外货而挽利权。各商号贩运高阳土布，牌号不一，惟恐外客希图渔利，夹带影射，漏迹偷漏。又恐实系高阳土布，经过各税分局强征勒索，故为刁难，有碍商情。可否遵照税务大臣批复，土布纳税仍照许鹿鸣在张家口通桥税务处禀准，每疋九丈按五分纳税，每疋五丈按二分五厘纳税，咨请关道宪通飭天津一带税务分卡，照通桥批准之数纳税，以期划一。再请札飭敝会，如有运贩土布，不论何等牌号，有敝会凭照，即按土布完纳正税，以免冒滥。敝会为公起见，为此具牒呈请，转咨关道宪，分行札飭，以期税务划一，而恤商民。是否有当，伏乞鉴核批示，祇遵照详施行。须至牒呈者。

右牒 呈天津商务总会

宣统元年二月初七日到

津海关道蔡批：据禀已悉。查此项改良土布，既经税务大臣核准，每疋九丈按五分纳税，每疋五丈按二分五厘纳税，核与本关则例所差无多，应准照通桥章程办理，以恤商艰。仰候函致钞关遵照。缴。

天津商务总会

宣统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到

10. 津海关道钞关复函

敬复者：

接准来函内开：土布由高阳运津销售，该分会发给凭照到津，查明实系高阳土布，查销凭照，以通行裁尺量明，丈数相符，按新章纳税，发给收税单。如再转运出境，另由原商赴关报明，请发子口单。前叙沿途概不重征一语，专指天津分卡而言。至通桥原系崇文门税局分卡，运津土布，向不经过。希查照办理等因。准此。查高阳土布入境时，即照新章征税，存堂发给税单，俟运出境，再行报关，发给免重税执照。此执照只能行于直隶境内津

海关道所辖之各关卡，他处不能通行，亦不能给子口单，相应函复。即希贵总会查照是荷。此颂升祺。

管理钞关曼德敬启

宣统元年又二月二十五日到

11. 高阳商会呈天津商务总会

高阳商务分会总理韩伟卿为牒呈新出色土布、斜纹土布运售各处请定厘税，以资提倡而振商业，恳祈转详立案事：

窃高阳自扩充织纺，提倡实业，改良土布，广开销路，稟请划一纳税，蒙准高阳土布均照新章，每匹五丈按二分五纳税，前蒙批行各在案。

高阳土布销路日畅，织纺开通，实业渐兴。职等悉心筹划，劝立工业，极行推广，期求进步。伏想外洋布色品类居多，自当设法抵制，高阳织纺初行，提倡尽用木轮机，仅出白批土布一种，工业难期发大〔达〕。现在劝行铁轮机器，能巧织新样布品者，仿行推广。高阳出有色土布、斜纹土布，运销各处，以便试行。惟斜纹土布较白批土布经纬稍异，而布质系属一律，其尺寸系改良铁轮连机，十丈一匹。而色土布用本地线批织成，面宽二尺二寸，长六丈一匹，与本地染坊研究染料〔料〕，染成色土布，以便推行。此等布货初创行销，必须运售各处，方能畅行。凡经过各关卡应行照章纳税，以重国课。然初行提倡，尤当优加体恤，以资鼓舞。色土布、斜纹土布可否援照白批土布定案，每匹五丈按二分五纳税，此两种土布一十丈一匹，一六丈一匹，理合照数核算完纳，抑是另有定章，请定厘税通飭示遵。又有劝织各样土棉手巾，每捆十条，约计价本银三钱上下，应如何纳税之处，呈请上裁批飭准行。仍由分会给发凭照，著明土棉手巾数目，以凭关卡验查纳税，以免影射而昭慎重。分会劝设铁轮劝业工厂，业已稟部在案。嗣后出有别种布货，再行呈报。

所有色土布、斜纹土布以及土棉手巾请定厘税各缘由，为此具牒呈请总会宪转详农工商部，核咨批行立案，俾得划一纳税，商民戴德靡及矣。是否有当，理合备牒呈请鉴核，伏乞照详批示，祇遵施行，实为公便。须至牒呈者。

右牒呈 天津商务总会

宣统元年八月初七日

12. 高阳商会呈天津总商会

高阳商务分会总理韩伟卿为高阳土布运售东省经过天津，已在钞关纳税，而新关应如何体恤放行，恳祈转详立案，以资保护而免重征事：

窃高阳自提倡织纺改良土布，推广实行，销路日畅。土布运售天津，前蒙海关道宪优加保护，通飭关卡，高阳土布每匹五丈按二分五完税，并准分会发给凭照，验行有所稽考，通行在案。而关卡商民遵行恪守，土布来津运行无滞难之处，商民亦无偷漏影射之弊，殊觉甚便。然高阳土布极行推广，日增月益，远近招徕，广开销路，方能扩充实业。现在高阳土布运售奉省之营口、吉林之滨江，经过天津，在钞关纳税即过新关，均属津关厘卡。土布本系内地提倡织纺，扩充销路，抵制外货，税不重征，格外优恤，如出口之土布已在钞关纳税，而新关应如何优恤放行之处，通行立案。俾得关卡有划一之证，商民庶免重税之弊，关税商民两有裨益。

职分会为提倡工艺振兴商业起见，为此具牒，恳祈总会宪转详海关道宪，核定立案，通飭新关税司、分卡一体遵行，理合备牒呈请鉴核，伏乞照详批示，祇遵施行，实为公便。须至牒呈者。

右牒呈 天津商务总会

宣统元年八月初八日

13. 津海关道致天津总商会

道蔡为札飭事：

案查前据该商会禀：高阳土布在钞关完税，运售奉省，经过新关，应如何优恤放行，请示遵等情。当经函致新关税司核复去后。兹准复称：“查中国正值振兴实业之际，所有出口土货，应完税银，未便此轻彼重，自应照纳。俟运往他口，再行征收，复进口半税，以符向章。至营口、滨江均系通商口岸，亦应一律办理，而免两歧。相应函复，查照飭遵。”等因。函复前来，合行札飭，札到，该商会即便查照飭遵。此札。

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到

14. 高阳商会致天津总商会

敬复者：

前蒙惠函并商会同人表录，仰见联合盛意，广开商界之深心，拜领之下，益增向慕。承询敝处商务实业及地产输出、外货输进各情形，惟高阳地脉硗薄，产物甚稀，蕞尔一邑，又非商埠，输出寥落。地产惟棉花为大宗，民间以织纺为生计。往昔尽织狭面粗布，名曰高阳细，出售不利，渐至失业。敝会成立以来，提倡织纺，研究改良宽面土布，试用轮机，劝立工厂，扩充实业。近今白批土布每月出计数万匹。又纺织斜纹布、条布、色标布、土棉手巾各种，由敝会报部呈验，扩充销路，此地产输出之情形也。外货输进者，上海线批为大宗，皮货由古北口、辛集运来；杂货、油粮均次之。商务均以布行为正业，贩运土布出售京津为大宗，东出吉林之滨江、奉省之营口，西出张家口一带；又销售山东、河南、山西各省，此商务实业之情形也。所有填注上海同人表录，遵奉垂询各节，附函聊陈大概，望希鉴查是荷。肃复，恭请钧安。

高阳商务分会韩伟卿

宣统元年十一月初三日到

15. 饶阳县商会呈天津总商会

饶阳县商务分会总理韩树勋为呈请转详立案事：

窃维保守利权，必以振兴实业为要，而振兴实业尤以改良工艺为先。

饶邑自宣统元年六月间设立商务分会，以地面实业窳败，极力提倡，嗣有饶城东北大尹村天祥益钱铺执事王万峰，自去岁八月间，创立益记铁轮机织布工厂一所，招工徒五十人，聘高明工师四人，又派管理齐玉琢往天津各工厂学习参观，购买北洋铁工厂铁轮机四十架，较从前木机不但灵活，而且所制之布，精致缜密，试办数月，销路日见畅达，外货日形困滞，且于地方贫民生计，大有裨益。似此办法逐渐推广，利权庶不致外溢，实业亦由此振兴。

谨缮具办法章程，呈请总会宪大人转详农工商部立案，实为公便。须至牒者。

附呈办法章程 一扣

右牒 天津商务总会

宣统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到

附一：

计开：

益记工厂办法简章十五条如左：

第一章 名称：益记工厂

第二章 宗旨：以提倡工艺，改良织纺，抵制洋货，补塞漏卮为宗旨。

第三章 地址：工厂设在饶阳县城东北十八里大尹村。

第四章 厂舍：暂租民房四十八间。

第五章 款项：开办资本五千元，系天祥益钱铺独资成立，并无官款，俟有成效，再为扩充。

第六章 员数：总经理一人，管理一人，稽查一人，监工一人，总收支一人，副收支一人。治线所监工一人，治线所收发二人，织科工师二人，染科工师二人。

第七章 资格：工徒以十六岁至二十五岁，体壮性纯，粗知书算者为合格。

第八章 课程：每月每机织花布者，以一百三十丈为及程，织合服袍料者，以五十四丈为及程。

第九章 学科：机织科、轮线科、染科。

第十章 额数：现招织科工徒五十名，俟办有成效，再为扩充添招。

第十一章 学期：无论织科、染科，均以三年为期满。

第十二章 假期：一、年假，腊月二十二日放假，正月十八日开工。一、特别假期，婚丧给假五日，至亲疾病给假三日，己身患病者不在此例。

第十三章 禁止：

一、工徒入厂，不准携违禁器具，如有银钱要件，逐时报明，交帐房代存。

一、工徒无故不准擅出大门，如有事外出，必须报明帐房，限时回厂。

一、工徒亲友来厂，须由帐房引至接晤室相见，以二刻为度，不得擅入宿舍。作工时，不准闲谈嬉谑，任意唾溺，抛置器具。

一、无论何时，不准歌唱、赌博、饮酒、吸烟。

第十四章 规则：

一、各工徒须取具亲族或铺户保结。

一、各工徒如有不遵本厂条规或任情懒惰，实不堪造就者，当随时革退。

一、各工徒未经期满，而私往它处工作，或故意犯规被革者，均须追缴饭资。以上【工】之日起，按日计算，每日京钱一百五十文，如本人不能缴，应向原保人追赔。

第十五章 奖励：每月考查一次。

及程者，奖京钱二百文。

织花布，每过程十丈，加奖京钱二百文，寸〔过〕程五十丈，加奖京钱一吊五百文。

织合服袍料，每过程一丈四尺，加奖京钱一百文，过程七丈者，加奖京钱一吊文。

每届年终，大考一次，按一年合计，每日织布若干尺，过程者，酌量格外加奖。

以上各条，倘有不妥，逐时酌量变通，以期渐臻完善。

附二：

益记工厂总理及工师清单

总理：监生王万峰，年四十三岁，献县人。

管理：从九品齐玉琢，年四十二岁，肃宁人。

稽查：从九品马松嶽，年三十七岁，武强人。

监工：索良栋，年三十五岁，饶阳县人。

总收支：王庆长，年二十五岁，献县人。

副收支：李瑞兴，年二十三岁，肃宁县人。

治线所监工：魏继增，年三十六岁，蠡县人。

治线所收发：王鸿宾，年二十三岁，献县人。

高丙戌，年十八岁，饶阳县人。

织科工师：王瑞林，年二十五岁，肃宁县人。

何生祥，年二十六岁，饶阳县人。

染科工师：王宴清，年三十岁，肃宁县人。

苑 倭，年十八岁，饶阳县人。

16. 饶阳县商会致天津总商会 附简章及农工商部批

饶阳县商务分会总理韩树昀为牒请转详注册事。

窃工艺为商业之本，商业为富国之源。忆自海禁大开，各国通商，迨至今日，洋货日多，中货日滞，漏卮日巨，国脉日衰。揆厥由来，只以中国工艺不兴，抵制无方，以致莫大利源，任人侵夺。即如布匹一项，诚为销路最大之货，中国产棉地广，织户本多，无如拘守旧法，不思改良，所织之布，与外货相形见绌，几至无人过问，遂使民间织户，失业渐多，日就饥寒，将难挽救。时势至此，若不设法改良，远则无以挽外溢之利源，近则无以保贫民之生路，是则非多设工厂不可，非改良织布不可。

兹有敝会钱行行董李梦祥，系饶阳县城东北大尹镇协成元钱铺执事，以资本三万元创立织布劝业工厂，购有铁轮织机六十张，木轮织机五百四十张。其办法并无多修厂舍之费，较多修厂舍者，其收效更速。以创办伊始，倘大兴土木，耗财过巨，致人生畏缩，而风气暗受影响。且厂舍之多寡有限，即容人之多寡有限，即织布之多寡亦有限。踌躇再四，不若暂租民房，将机厂分立四乡，聘工师教授，陆续招徒，则织机可随势加增，分厂可逐渐推广。就本地情形而论，扩充工艺，未有如此办法之善者。且此厂专购中国所纺之线，织宽面土布、斜文褙褙两种，在张家口、热河、京津各地，均设有发售处，惟张家口销路最畅。自去年正月开办，查年终共出宽面土布六万匹，褙褙二千余匹，均各销尽。似此办法，再继之以扩充，不独开民生路，保我利权，并可以抵制外货。惟是开办之始，恐市侩奸商，垂涎垄断，牙纪书吏，节外生枝，于工艺前途，大有防[妨]害。

惟此恳请转详农工商部立案，并飭县保护，优免税用，则销路益畅，于无形中，风气大开，工艺振兴，更为今之所求不得也。

敝会为扩充实业，谋挽利权起见，所有为协成元工厂请转详

立案，飭县保护各缘由，理合具文牒呈总会宪大人鉴察施行，实为公便。须至牒者。

附呈简章一扣

右牒 天津商务总会

宣统二年二月初十日

附件：

饶阳县协成元织布工厂简章十二条

第一条 名称：本厂定名为饶阳县协成元织布劝业工厂。

第二条 宗旨：以开通风气，振兴实业，添民生路，挽回利权为宗旨。

第三条 地址：本厂设在饶阳县城东北十八里大尹镇，另有分收发处，设在蠡县东南三十里刘家佐村。

第四条 厂舍：本厂以开办之始，倘多修厂舍，不但需款甚巨，且更以房舍之多寡，容人反形限制，除有办公帐房及存线室、存布室、办事人员斋舍外，机厂分设四乡，暂租民房。该分厂管理稽查，俱有常员，较在一处多修厂舍，不但节费，更觉活便，易于扩充。

第五条 规则：共织机六百张，工徒六百人。拟定织土布一匹，发给工徒钱一千二百文。织褙裤一匹，发给钱二千文。如有格外优劣之处，当即随时奖罚，以资劝惩。

第六条 办法：本厂专为挽回利权起见，所用条线，专购中国纺纱各厂所出之线，外国洋线概不购用。

第七条 本厂开办资本：银洋三万元，商人李梦洋自行筹措，不用官款，不招股份，独资成立，所有资本金三万元，由商务分会查悉属实。

第八条 职务：总理一人，综理全厂一切事宜。监理二人，监察全厂一切，照料收发布线存货销货等事。稽查二人，稽查总

厂及分厂一切事，并考察工徒勤惰。收支二人，掌理出入款项，核算簿记等事。庶务五人，承办全厂杂务，兼有采办运货之责。

第九条 防弊：本厂分厂既多，工徒亦夥，必须拟〔以〕斥〔斤〕发线，按线收布，不准使水调浆，以期久远实在。并将所织之布，按上中下三等分印将号，不使丝毫冒滥。

第十条 销路：除本地销售外，北京、天津、北口、热河、张家口俱有发售处。以张家口销货最多，以多输入俄境故也。

第十一条 牌号：宽面土布，标印中华富贵牌号。斜纹裕褙，标印独占鳌头牌号。

第十二条 附则：本厂所拟章程，因试办之初，殊多简略，所有应行改良之处，容俟随时更生，以期达于完善。

分厂坐落机数，照录如下：

曲阎村分厂，机四十张。寺冈村分厂，机三十张。献邑路贾庄分厂，机十张。临河村分厂，机三十张。石家疃村分厂，机二十张。肃邑寺上村分厂，机十张。西南庄村分厂，机三十张。博野县东阳村分厂，机六十张。蠡县仇村分厂，机三十张。七器村分厂，机百张。洪善保村分厂，机三十张。符家左村分厂，机七十张。刘家佐村分厂，机四十张。

员司姓名籍贯，照录如下：

总理 李梦祥 蠡吾县人。监理 赵薄源 饶阳县人。王继和 肃宁县人。稽查 王箴甫 饶阳县人，王化轩 蠡吾县人。收支 张汉章 献县人，赵应樵 献县人。庶务 许鉴鳞 饶阳县人，陈熙和 饶阳县人，袁瑞林 安平县人，尹凤华 饶阳县人，苗松延 肃宁县人。

农工商部批：

据转禀饶阳商会牒称：商人李梦祥出资本金三万元，开设协成元织布劝业工厂，缮具简章十二条，禀请查核立案等情。

查该商人独资开设织布劝业工厂，系为振兴实业起见，所呈

简章十二条，大致均尚妥协，准予立案。一俟办有成效，遵章到部注册，一体保护可也。此批。

右批 天津总商会。准此。

宣统二年三月十三日

17. 直隶总督致天津总商会

直隶总督部堂陈为札飭事：

二月十七日准农工商部咨开：本部奏定公司注册章程内载：凡商人经营贸易，无论何项公司，一经注册，即可享一体保护之利益等语。兹查有蚨丰织纺工厂遵章到部，呈请注册，业经本部核准注册给照在案。相应开列名号，咨行飭属妥为保护可也。等因。到本大臣，准此。除分行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商会即便查照保护。此札。

计抄单

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到

计开

直隶蚨丰织纺工厂

总厂设立南边吴村，分号设立高阳县城内。

宣统元年九月初十日注册 资本洋银一万元

总经理人 李铭勋 住安州

18. 张国珍稟天津总商会文

请 议 书

请议人 姓名：张国珍 籍贯：天津

住所：东门外 年龄

职业：九诚铜铁铺

为自制织布铁轮机，恳恩照会高阳分会维持代销事：

窃商号开设东门外历有年所，亦在商会范围之内。考查部章，

凡属兴商保商，无不逐渐维持。现商号制成织布铁轮机，极其灵便，拟赴高阳售卖，然无提倡者，终恐善器韬晦，以致商业不能发达。查高阳辖境，织布工厂迭兴，此项机器颇称利用。与其购置异国机器，不如购买本国铁轮机，则利权不能旁落，庶可商业共相发生。况商号素称殷实，交易一切委实可靠，倘此项轮机试用利便，至于各项机器，商号均可承造。所有自制织布铁轮机，恳请转行代销缘由，理合稟请总会宪大人恩准照会高阳商务分会维持代销，以便发达中国商业前途，实为公便。上禀。

宣统二年七月廿五日到

19. 天津总商会致高阳商会

敬启者：

现有九诚铜铁厂张国珍自制织布铁轮机，灵便利用，直与外洋无异，亟宜互相维持，以资提倡。查尊处织布工厂林立，均以铁轮机织布，与其购置外洋利权外溢，何若购置华制，共维实业。且此外所需各项机器，张国珍亦能承造。兹本商趋谒贵会，敬祈接洽，仍希格外维持代销，俾中国实业发达，皆贵分会之力也。专此奉布，敬请升安。仍希惠复不既。

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总理 王竹林
天津商务总会
协理 宁世福

清国留学生招聘策

〔日〕矢野文雄 著 云述 译

编者按：矢野文雄（龙溪）是日本政论家、小说家，1897年至1898年任日本驻华公使，任内积极筹划招收我国留学生之事，企图借此使日本之势力“悄然駸駸于东亚大陆”。现将其与日本外务大臣间往来公文移译于下，或于研究近代中国学生留日风潮不无裨益。原文刊于日本《政治经济史学》第167号。

一、矢野文雄呈西德二郎

机密第四十一号信

如本日呈送之机密第四十号信中关于福建省内铁路事项中所陈，设若向彼提出要求，为表示超于口头友谊之实际友谊，提出我接受留学生教育之要求，据观察所得，势必为清政府所欢迎。此举不仅有助于此次要求之成功，而受我感化之人才播布于其古老帝国之中，实为将来在东亚大陆树立我之势力之良策。兹将其缘由详陈如下。如斯，则彼之从于武事者，不仅限于模仿日本之兵制，军用器械等亦必仰给于我；聘用军官等人员也将求于日本。毋庸置疑，清军事之大部行将日本化。理科学生亦必求其器械、工人等于日本。清之商工业自身，则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而为我商工业向清扩展打开门路。另，法律、文学等科学生，为谋清之进展，必将遵袭日本之制度。若能至此，我势力将及于大陆，正未可量也。斯时清之官民对我信赖之情，亦必胜于今日十倍。由于此辈学生与日本之关系，将来清政府必陆续不断自派学生来我国，如是则我国之势将悄然駸駸于东亚大陆。故而无论从何方

考虑，望我政府适应时机，接受清之留学生。同时思及此事可有助于促成铁路事件之要求，故前件第四十号信所附抄本，业已电报分别请训在案。如该信中所陈，本月至总理衙门，于商妥福建铁路事件协议之后，向总理衙门诸大臣陈述如下意见：

“日清两国间，值此赔款终于清偿，威海卫占领撤离之际，邦交可望日益辑睦之时，日本政府愿向清政府表示诚挚之友情。今闻清政府开设文武专科，变通武备，因之亟须拔擢人才。盖造就人才在于教育学生，清政府若有派遣学生去日本之意，日本政府愿接受多数之学生，为之提供费用，施以教育。希请亮察诚意，惠予答复”。

因需事先提出学生数额，故先此之电禀中乃提出要求接受多数之学生，夫以清朝之土地广袤，五十或百人之数，不足以使彼感恩怀德。复从为培植我国将来之势力而言，亦属多多益善。然鉴于对方一时难以派出多数学生而希逐步派遣之情状，故本公使口头提出接受二百名之数。另关于费用一事，希我政府同意供给前述二百名之费用。若以每一名一年不超过三百元（指日元，下同——译者）左右计，则二百名一年间终不超过六万元上下之数。以此微少之费用得为前陈大业之一部分，其得失甚为明显，毋庸赘言。另，应对方之请，于次日（8日）送致本公使所述要旨之咨文（见另纸乾号抄件）。其后于昨日（13日）得清政府之答复（见坤号文），感谢我政府之友好情谊，然以方在设立日本语学校之际，当熟虑更加切实之方法，再行提出留学生之事云云。盖以清政府中，有欢迎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之开明派，亦有不欢迎之守旧派。因而属于前者之大臣中，如李鸿章当然欢迎此举；二三守旧派之意向究至如何，现当难以推测察知。本公使当逐步说服彼等，期能逐渐派遣多数之留学生来我国。当续与彼等会商，议及细节。专此禀陈如上。谨呈

外务大臣 男爵 西 德二郎阁下

特命全权公使矢野文雄(印)

明治三十一年(1898)五月十四日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

二、西德二郎致矢野文雄

明治三十一年(1898)六月三日拟稿 六日发送

五月十四日机密第四十号件中，及同日第四十一号件关于清之留学生事，业已阅悉。根据上件，阁下曾以书面向清政府提出我帝国接受多数清之留学生事，且支办有关之一切经费。并在会见清政府官员时，口头提出接受二百名留学生等由。此事颇出本大臣意料，盖我帝国政府为清政府留学生支出六万元之巨款，首先不仅无支付此款之来源，且其事本身即应熟虑。阁下关于此事之意见，大体似为得当，但实际得益，即是否能达所期目的，则甚难逆料。诚然，由清之富豪缙绅子弟中选拔其受有家庭教育者，我帝国施以专门教育，或可有益。但一般而言，若贫家子弟当其选，既缺乏报効之志，且费用亦不能自筹，设若不断东来，由我帝国政府资助彼等学习，是否能取得良好结果，殊属怀疑之事。不仅如此，察近来清国顾及自身利害，各地频有自行向我帝国派遣留学生之举，如浙江巡抚要求派遣来日研究陆军兵学留学生四名，文学研究留学生四名；复有湖广总督提出在近期派出多数留学生之打算。因而由我帝国承担直至支办经费之留学生教育，是否有此必要，当属疑问之事。然鉴于贵公使已以书面向清政府提出此事，现即得难取消。如清政府进一步响应，要求派遣留学生时，可复以设法安置极少数之人。在对方回复阁下照会时，乞注意对其请求勿表示过分热烈，使此事系不出于我之鼓动，任其自然成行为好。 此复。

(日本外务省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

三、矢野文雄呈青木周藏

机密第一百三十六号信

日前经与本公使馆之青木陆军少校会商，自一出入军机处清人之手，获得一部分清政府机密文书，但其为秘密文书目录之第二号，至关重要之第一号目录则未能取得，甚感遗憾。乃复对上述之清人悬以重赏，试囑取来第一号秘密文书目录，日前得以辗转入手。此一文件系由相当清政府内阁之军机处所编纂。就其目录，如能索得我所需之必要文书，则可确实得知清政府之真实活动，对我帝国将来有重大利益。更令上述之清人携其知友二、三人协同进行此事，所得之款亦经彼手在其间分配。上述费用所需如下：

- | | | |
|-------|------|------------------------------------|
| 一、银 洋 | 一百元 | 每月固定报酬。 |
| 一、银 洋 | 十 元 | 取得每月目录一册之报酬。 |
| 一、银 洋 | 四十五元 | 取得选自目录中所需文书原文一件，酬一元五角，每月平均三十件，如上数。 |

合计银洋一百五十五元整。

年来可望入手上述之类机密文书。现终于得此眼线，于工作实属方便。故恳请核准上述金额之专项支出。不胜翘盼之至。谨呈

外务大臣子爵 青木周藏阁下

特命全权公使矢野文雄(印)

明治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有系获取清国政府秘密文书事之驻清公使禀帖一件)

附：

矢野文雄所获得之派遣留学生奏摺

议派出洋留学生事

谨奏为议派出洋学生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钦奉上谕：“据御史荣寿奏，请添派出洋学生，以资阅历，而得实才等语一摺。着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议奏。钦此。”等因。臣等查原奏内称，现在交涉日繁，必有深明于彼中情势【者】，方可不致扞格。且人才以亲践为实学，而尤以阅历为真効。今所派出洋学生不多，其中或有鲁钝者，则所得实属不多。拟奏明酌请添派出洋学生三、四十名，庶人才既可多，而收效亦广等语。臣等查该御史所奏，自是为广兴人才起见，应请于下届出洋时，奏明酌量添派，以广人才。所有臣等遵议添派出洋学生缘由，谨合词恭摺复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奉硃批：“依议。钦此。”

梁启超致犬养毅手札

陈占标 整理

说明：此件未见诸文献史籍，是1899年夏间梁启超逃亡日本期间，为争取与孙中山先生合作而写给日本立宪国民党领袖犬养毅的。

梁启超在上述致犬养毅的信中，至少能说明如下几点问题：第一，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康有为先后逃至日本，孙中山曾争取与康梁合作，受到康有为的拒绝，出现了革命派与维新派之间一些龃龉。梁启超信中所说，与他无关；第二，梁启超是主动争取与孙中山商谈合作的，康有为是在1899年3月22日被迫离开日本去加拿大的。在这之后的22天，梁启超便致函犬养毅斡旋与孙中山会晤，就是最好的明证；第三，信中也反映当时的日本政党对中国革命派、维新派的关系。

原函现在日本冈山县立博物馆收藏，由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文学博士坂出祥伸先生复印，寄赠给新会县梁启超研究室参考使用。

西欧之人常谓敝邦人无爱国之性质，^①斯言仆几无以辩之也。然仆敢谓敝邦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因未与他人相遇，故不自知其为国也。然则观之于海外之人，则可以验其有爱国性与否矣。今内地督抚无可望，民间受压制，不敢小行其志，欲其扶危局难矣。故今日惟求之于海外，庶几有望也。

孙逸仙近曾见先生乎？仆等之于孙，踪迹欲稍疏耳，非有他也。而横滨之人，或有与孙不睦者，其相轧之事，不知如何，而极非仆等之意矣。孙或因滨人之有违言，而疑出于仆等，尤非仆所望矣。敝邦有志之人既苦希〔稀〕，何可更如此相仇！仆欲一见

^① 梁启超致犬养毅函，开端缺受信人称呼，疑该页非为信之首页。

孙、陈^①而面解之，先生有暇日，约会见于此间可乎？至仆等与彼踪迹不得不疏之故，仆见彼当面解之也。

本堂先生^②有道数日不侍几杖，方思走诣，顷见柏原君始^③知贵体清恙稍剧，想念之至。伏乞为大局自保重，善自调摄，不胜企祝。仆顷为康先生译人来滨，须往彼一会晤，两日内归京，更当走谒问讯一切。敬请 兴居。梁启超再拜。四月十四日^④

① 孙陈系指孙中山、陈少白。

② “犬养毅，字木堂。

③ 柏原君，即柏原文太郎。日本千叶县人，号东亩。东亚同文会干事，协助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活动。

④ 原函缺载年份，坂出祥伸先生来信说：“那封信，他（指梁启超）甚么时候写的，我不清楚。”考诸信中内容及当时康、梁、孙、陈四人在日本活动的史实，应为1899年。

井上雅二日记

——唐才常自立军起义

郑大华 译 薛军力 校

说明：井上雅二（1877—1947），日本兵库县人，1900年前后任日本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干事。在此期间，他与很多日本人一起参与了唐才常组织的中国国会和自立军起义活动。在这份日记中对此事有较为详细的叙述，皆为作者亲见亲闻。有些内容可补中文资料之不足，对于研究自立军事件颇有参考价值。《井上雅二日记》藏于日本东京大学法学系近代日本法政史料中心，由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整理，载于日本《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第1、2号。

明治三十一年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初，作为东亚会的干事去中国游历。首先乘船到上海，然后去苏州、杭州游览。从那儿与甲斐宽中先生一起溯江至汉口、武昌、南京等地。八月末又返回上海。与清人毕永年先生一起自上海乘船北上。在芝罘（今烟台）^①与平山周先生相伴抵达天津。偶遇游历中国的伊藤博文先生，与他相继到了北京。在北京住在浅川海军大佐的公馆里。

与康有为等相往来。

此间，与小越平陆先生到万里长城、西山、明陵等处游玩，共用十日。

九月二十四日 一到北京，（戊戌）政变发生。王照逃入我

^① 文中（ ）号内文字为编者所加。下同。

们的住宅。乃由山田良政先生连夜送他去天津。

二十六日 在大沽口停泊的大岛舰上见到梁启超。

二十七日 与大冈育造先生同乘“玄海丸”号踏上归国之途。在仁川上岸，游览京城（即汉城）。两日后，乘该船直接从仁川出发。朝鲜人安炯寿也在船中。十月初，回到东京（此次旅行游记以“大陆啸傲录”为题发表在当时的《读卖新闻》上）。

十一月，东亚同文会成立，任干事。与中国人的交往逐渐增多。

明治三十二年

明治三十二年七月，在东京专门学校毕业。

同年九月，赴中国。任上海同文会支部委员。

同年十二月，完成与汪甘卿主持的《字林沪报》的谈判，决定以三千元价格买下该报。

从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一月四日起，《字林沪报》改名为《同文沪报》发行。井手三郎先生主持，我任编辑。

三月初，与安村喜当、曾根原千代等几位到浙江省游历，途经杭州、绍兴、宁波、舟山群岛、普陀山等地。费时约二十余日。此次纪行以“越中记游”为题刊在日本报纸上。遗憾的是中途停止刊载。

男儿三十未平国，
后世谁称大丈夫。

明治三十三年

五月二十八日 义和团事始起。

六月八日 此次事件对东亚时局关系颇大。将此缘由向东亚同文会报告，提醒会员注意。

同时，向陆实、池边吉太郎等报纸主笔推荐了有关对此时局

重大不可忽视的评论。

六月十七日 大沽炮台为（八国）联军所占。关照宗方^①第二天从大沽口返上海。盖因时局急剧变化，已经没有实施原先所订策略的余地了。

六月二十三日 联军进入天津。

六月二十五日 二十五、六日前后起，端王几乎独掌大权。两宫陷于空有其位的状态。

让唐才常一派的人探询南京刘（坤一）的意图。汪康年与张之洞商谈，无结果而归。

七月二、三日之交，会见陶森甲。知道陶让白岩承办军火，由我寻找具体办法。我想可与李寿亭等商量。

七月五、六日 田锅安之助、佐佐友房等来沪。故大体得知本部及政府的意图。

准备设立通信机关。约定和汪、唐、文等会谈的日期。

七月十五日 和井手、宗方、田锅等商量，确定今后应执行的方针。如前所示。

七月二十日 井手、宫坂匆匆回国。

井手与根津、小山及近卫公等商议，想尽力使参谋本部及海军省联络一气。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宫坂和森就^②○○○○进行协商。

七月二十一日 九十二度。唐才常一派有在长江流域举事的朕兆。狄平已约定一周内溯江赴汉口，准备与哥老会磋商。

李鸿章抵沪。外国人评论不佳。计划让汪康年了解李鸿章的意图。

自称皇帝密使的志钧抵沪。

七月二十二日 九十三度。白岩、牧来谈。

^① 宗方小太郎，日本在华间谍。

^② 此处日文原注：原文如此。

白岩昨日收到陶森甲发来的电报，问五万磅无烟火药的价钱。由姚文藻处得知此事。

和末永节商谈，议妥了与广东同伙沟通的办法。双方的计划现在不能明说。

福本日南发来急电，叫来山田良政就此商量。决定在山田兄南行期间，让那里的几位了解中部的情况。

佐佐友房致电伊藤博文，请求将他介绍给李鸿章。决定佐佐据此去见李，说服李赞成我们的计划。

七月二十一^①日 姚文藻、志钧兄弟对我们的计划皆表示赞成。当夜李经芳、杨某、志钧等八九人聚会。

经芳说：“我有我的想法，老爷子有老爷子的打算。有关国家前途的大事不用和他商量。”断然要避免与其父商量。保守秘密固非常重要，难道对李鸿章就没游说的办法吗？

刘坤一仅保全自己的辖区，而且还有御职还乡的打算。是自立还是北上，没有表示。对西太后仍是拥护的。

张之洞大概也一样。他声称只有列强准备瓜分时，将坚决抵抗。

李鸿章和太后关系紧密，不可能分道扬镳。

七月二十三日 叶翰有信。就王照的事来商议。遂答应与领事交涉。

《国闻报》主笔方成，六月二十日逃出天津重围，与其妻空手来到上海。商议了对他们的保护问题。

夜访小田切领事，就王照一事和保护方成一事进行磋商。

田锅、山田、中村等赴南京。

根据领事会议决定，购买武器须经其所属领事同意。规定得愈加严格。

王修植昨天归定海。陈锦涛今日到。

^① 此处日文原注“原文如此”。

七月二十四日 晨访佐佐友房，约定一起拜访李鸿章的事。

去张元济家访王照，因他外出未遇。与稻村大佐会见。唐才常等派往北京的赵从善十九日返沪，来访。

七月二十五日，酷热，室内九十五度。上午，方城来访，谈北方的事。欲一同拜访陈锦涛，因王照来而止。

王照决定在四五日内赴汉口，先与黄忠浩（二千湖南兵的统领，现在汉口）和郑孝胥商议，并探听张之洞的打算后再作决定。他陈述了这样的想法：“不敌视外国人的人，都应该用。策动兵变以成壮举。”好像打算与哥老会的人士联系。与宗方交谈而别。

汪康年来说：“李鸿章对我们通过郑观应提出的条件与形势对策尚未予答复。同时叱责郑观应不该说出那样的话。

“看来李鸿章几乎没有打算，实际上似要按照西太后的回电才能作出决定。”

汪本人似也缺乏坚定的信心。

夜，访唐才常。

唐与长江一带的哥老会特别是湖南人有联系。已让狄平在沿江的镇江、南京等地活动。他自己打算十日以内赴汉口。

唐称，如果周汉及孔宪教称奉诏率其五千团练攻打洋人的话，他将加以制止。

有人说，张之洞如果今后十天之后不离开汉口，保护外国人这一点难以保证。证实这种说法的根据就是目前黄忠浩的兵也在汉口，护字营及凯字营里哥老会匪帮等还不断地增强力量。

狄平准备三、四日内返沪。

从康有为那里得知宫崎、清藤等在新加坡被捕的消息。^①当时，我让中国人打电报了解。得到了回音。康有为详细地讲述了这件事，并予以辩解，且对此深表遗憾。

^① 宫崎、清藤二人在新加坡被捕事，详见《近代史资料》总66号，内田良平《中国革命》一文。时康有为流亡在新加坡。

福本日南本日给末永来电，说：“去福本处等待。”

宫崎、内田等从新加坡到香港，立刻返回福冈。

孙文的追随者尤明在上海也缺乏力量。

志钧兄弟昨日赴南京。

本部来信，要求注意上海报纸上刊载的痛斥国策的文章。

王照又说：“袁世凯眼下陷于孤立。山东任城以北已成义和团天下，任何人只要携带一件洋货即遭痛打，甚至被杀掉。袁抄剿义和团引起民心不服，而且他统领的新建陆军也不是很心服的。山东布政使张人骏是团党。由于其父与西太后之父相友善，^① 恃此常常妨碍袁。

王今日致书众议院议长片岗健吉：“日本应先出兵进京拥戴光绪帝。否则，若让俄国人先下手，民众将遭屠戮，两宫将为其控制。结果将是大难临头。”决定将此内容通知政府。这也有一定的道理。

稻村说：“陈泽霖、张春发所部兵已进入北京。二人晋见二宫。目前李秉衡率亲兵抵济南境。”吴淞口附近有一艘大舰，常期停泊，一旦有事，四十分钟之内占据吴淞炮台。在香港有三千英兵，一道电令，五十小时内可赶到天津，保护租界。

方城说：“天津附近尚在的新党人都到了上海。以中国兴盛转机难望，目前不动声色，暂迁居上海，以观望时机。”从天津逃来上海的新党人有：

王修植，浙江人。京师大学堂总办。有名望。

严复，福建人。水师学堂总办。道台。

伍光建，福建人。水师学堂教习。生长于美国。

陈锦涛，广东人。京师大学堂教习。康有为门人，秀才。善算数。

温钦夫，海关道译员。

^① 此处日文原注：原文如此。

赵仲宣，京官，江西人。

方成，浙江人。《国闻报》主笔。

陶模在京城，魏光燾代理，^①也没有镇压管辖区内的力量。贵州巡抚邓华熙近日也逃离京师来沪。

七月二十六日 下午六时，和佐佐一行、小田切领事一起赴刘学询别邸拜会李鸿章。佐佐用二小时阐述时局问题。总的感觉是李似对时局变化心中无数，既使他奉太后命北上，也不过是出自君臣之义。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反对李，这归结于他和俄国有关系。

在坐的有刘学询及杨崇伊。有人说杨不属端王一派，这还有疑问。

夜，与佐佐一行同赴愚园，参加汪康年的宴会。十二时返回寓所。

在沪诸人士组织的中国国会

汪康年、唐才常等从一个月前就主张成立的所谓国会，终于本日在愚园召开。到会者五十二人，皆为民间人士。前美国公使容闳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定于二十九日再次集会，尔后散会。尚未制订章程。

七月二十七日 温钦夫、陈锦涛二人来访。他们理应出席昨日的国会。

桑田、福冈等自福州来沪。微恙，终日卧床。

收到佐佐木两封信，得知刘坤一对我出兵抱有疑问。

寄往本部中西等诸位先生私信，述及时局。将给干事的两封信寄出。寄给田锅一封私信。

七月二十八日 佐佐友房列^②、林民雄、太田原、成田等回国。

① 时陶模任陕甘总督，奉召晋京，魏光燾以陕抚署总督。

② 此处日文原注：原文如此。

七月二十九日 上午九时，收到佐佐木君信。认为有必要给总部发电报。电文如下：

“刘坤一怀疑我国大量出兵并在天津进行军事活动的理由、目的，认为我国与各国同样采取瓜分中国的态度。望采取措施迅速解除他的疑虑，在上海报纸上大事进行宣传。”

四川来电说：“决定由井户川辰三任参谋，让提督丁鸿臣率兵北上勤王。”但不了解其详情，暂记下等待复报。近一周内英国的举动十分奇怪。似有完全放弃北方，专事中原的打算。

七月三十日 与牧访问赤诚舰长上伟。

对英司令西摩尔中将的行动有两种看法：

第一，他的南下是根据他本国政府要求，实施分割南方的计划吗？（是否在英国存在英俄协议的事。）

第二，只是消极的保护长江一带吗？

大乱的时机是否存在，取决于西摩尔今后如何行动。假如有一个士兵上岸，张（刘也是）要采取对抗的态度。要注意今后一周左右的局势。

唐才常又准备四、五日内动身。和我有所商量。

暴动最近要在安庆发起（和唐等一致）。

唐表示，若张采取排外的态度，将与黄等一举夺取武昌。

哥老会成分复杂，不乏明达之士，必定不打洋人。哥老会和义和团不同。

中国国会不断发展清军将领入会。

与刘和张的联系是难以解决的。

中国国会昨日召开第二次会议。到会者六十余人。其宗旨为：

一、保全中国疆土与一切自主之权。

二、力图更新日进文明。

三、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

四、入会者专以联邦交、靖匪乱为责任，不承认现在通匪诸

矫传之伪命。

而其中大多数人抱有以下三点宗旨，且不排除。一、尊光绪帝。二、不承认端王、刚毅等。三、力讲明新政法而谋实施之。

而会中的极少数人，如章炳麟主张：不许满人入会；救出光绪帝为平民。这种主张与其他人不同，却与孙文接近。

这个组织重要的成员有：容闳、严复、汪康年，参与中国议会核心密勿的有张元济、沈士孙、赵仲宣等。他们和汪的意见一致。唐才常、主事丁惠康、主事吴葆初、主事孙宝瑄等。宋伯鲁、张元济、王照等未加入。郑观应等没有影响。陈三立大概近期内加入。

唐才常和广东南关游勇的大头目陈翼亨联系。

吴之愷是哥老会成员。

唐又打算成立中国自立会。

夜，送宗方、中路、石田等游长江。拜会宋永。

福本日南来，预定八月三日乘和泉丸号来沪，可能过去的计划稍有变更。

王照今夜应去汉口。

孙文欲起事的计划，已为广东巡抚探知，加强了防御措施，他们起兵更加困难。

深夜，汪康年来。他说：“西摩尔中将致信李鸿章：若一周内得不到公使的确切消息，将占领吴淞炮台。”并说这个消息是井上听唐才常说出的。我回答说不知道此事，他大为惊讶而归。

七月三十一日 唐才常未如约而来。

与汪康年交谈。

中国国会的真正宗旨是极为秘密的，会员很多人不知道。对外的简明章程如前所述。秘密宗旨由十二条组成，主要是“废除旧政府建立新政府，保全中外利益，使人民进化”等。

一两日内，要将此宗旨通报日美英三国。若通报，此事必为

西方报纸刊载，那就会为清朝官员所知。于是，这些维新党人在上海，对此并不感到放心，必须另外选择一个安全的地点。收哥老会的力量为其所用，立即夺取长江战略要地，这是他们的计划。哥老会中有许多明白人，必然不厌恶外国人。

“张之洞有排斥外国人的意图。不了解刘坤一是否主战”。这是汪康年说的。

下午七时，将中国国会二三日之内通电日英美三国之事电告本部。电文如下：

“前驻美公使容闳、严复、唐才常等六十余人创立的中国国会，以建立新政府、保全支那国土、弭平团匪、排斥端郡王为目的。二三日之内将电告日英美三国，以争取得到对他们的承认。李鸿章对此内心赞同。上海的外国人不反对，张之洞、刘坤一可能反对。西摩尔中将行动值得注意。无论何国调兵进入长江，刘将不依赖日本的援助而与之对抗。张不可能脱离北京政府。当前仍要与刘、张、李三位联系。”

唐才常一派的计划：

将中国自立会的成员发动起来，严明法令，规定：泄露军机者杀，奸淫者杀等。如哥老会一样用暗号联络。其宗旨当然是谋求中国的自主独立、不允许杀害外国人、与外国人亲睦等。

照唐才常所说，长江一带的大部分兵营已听命于他，并得到哥老会的数万人的支持。

张通典之兄庆云在湖南，领二千五百兵，是总兵。黄忠浩也一样。

汪和唐在心里有隔阂。唐认为汪不可靠，汪认为唐是个有野心的人。汪不知道自立会的事。容闳似乎知道此事。

中国自立会和中国国会不用说是一致的，已经刻了会印，列名参加的有数万人。

唐待一个朋友来后即赴汉口。

陶森甲昨日起准备在沪停留一周。他与白岩关系密切。

按照陶的说法，无论那个国家的军队进入长江，刘都准备将其击退。

关于日本出兵的原因，刘由于小田切、佐佐木的辩解，已经清楚了；然若真有事件发生，他不会依靠日本，他会即刻在江阴水面布设水雷。决心似相当坚定。

张与政府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他对自己管辖地区已无能为力，更不用说有打洋人的气概。

白岩忠告陶，若本日拜会李中堂，应与其商议这样一事：“列国若悍然进兵长江，刘、张将拼死拒之，因此要特别注意。应将此电告列国。”陶表示同意后去了。

总之，原仰仗三总督维持秩序稳定一事，由于英国的行动，几乎归于不可能。

本日，在上海的领事、舰长就防御计划进行了会商。

宫本来电，说武器的事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行。实在令人灰心丧气。这不得不速求财源。

八月一日，佐佐木、四方志昨日抵沪。今晨来访，确切得知刘的决心。

田锅来一信。

清历六月二十六日上谕。

此上谕系发给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王之春、刘树堂、奎俊等，意为保护洋人，谋求和平，是以上诸抚和朝廷的共同意见。各国公使，除德国公使外，皆安全无恙。目前已经送去蔬果食物，并命令布告保护其管区内外人。但是，如果各国恃其兵力侵犯封疆，应断然击退，只是不要衅由我启。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我认为，对于这个上谕，张、刘不用说是拥护的。在两宫存亡的关头，他们决不会在南方搞联邦。他们注重忠厚，不可能对

北京朝廷发难。

湘军大将李占椿当然与刘采取同样的态度。如果他们和刘同命运，刘不动，他们也不会动摇。

田锅说：“攘夷的思想在南方影响一般。区分满汉在今日已经过时了。满清政府似乎是要凭此举来赢得普通民众的心。这是官员们的一般看法。”这值得考虑。

收到小田切万寿之助的来信，即照约赴会。我对他说：“近来有张、刘等要取缔报纸的传闻，人们对此议论纷纷。今日召开的领事会议若就此事进行磋商，请将结果通知我。”

午后，和唐才常一起访问容闳。他虽已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但身体健康，精力充沛。

容与汪不融洽。容认为汪自私。唐和汪也不十分相投。汪的朋友中决心献身的志士很少。这很使人慨叹。容在美国人、英国人中知己很多，但上海的外国人、上层人物对他似乎不太感兴趣。大概是各国领事仅注意维持秩序的缘故。小田切对中国国会冷眼相待。

八月二日 给本部近卫公发出第二号秘密报告。收到田锅一封来信，信中说：

“在南京有刘光才、杨金龙二位湘军统领，名望甚高。因二人听命于刘，所以刘不动，他们就会按兵不动。前几天从各地赶来的革命党首领，想与湘军联系，但那里的军官拒绝会面。

“招降徐老虎乃权宜之计。举事的准备已经妥当。这是徐一个姓熊部下说的。

“听说哥老会在南京的首领，由辜仁杰带头离开了当地。”

陶森甲来沪，可能是受张之洞之命。昨天他拜会了李中堂。

夜，参加赤城舰长在徐家花园举办的告别宴会。初次见到蔡钧及美国海军大尉摩耶舰长等。

八月三日晨，福本日南自香港来沪，立即会面。福本想搞

农民起义，这不是针对日本只是作为东洋正义者，想以革命方式推翻旧帝国。不用说他没有什​​么深谋远虑。我谈了自己的看法，相约今后互相帮助，然后分手。

与唐才常会晤。

游历长江，还要待数日之后。

姚文藻来，他反对中国国会。知道志钧目前在芜湖。

八月四日 陶森甲加入中国国会。他称奉张之洞之命要会见福岛安正。

李鸿章对中国国会印象不错。刘坤一看来也不打算妨害它。

唐才常说：“北京不是已失守了吗？刘、张就会丧失权力。我们只有准备干。”

自立会会员目前有十余万人。

汪康年说：“面对当前形势，中国国会的办法有二：第一，众人议定政令、法令，一旦大变之后，即推戴一名人为总统。第二，各省按地区自行处理。

“要乘今日民心纷扰之时，派人去各省联络土匪，以造成势力。各地民间均有秘密团体，派别不同，组织严密松散也有所不同。有的聚集一处，有的分散各地。这些人颇有力量。若能联合驾驭他们，那是很有用的。第一个办法似易却难，第二个办法似难却易。”

今日谣传，张、刘、李及盛宣怀在上海被拿办。想系因为他们不执行打洋人的命令。

陈宝箴自旧历六月二十五日病倒，于翌日死去。陈三立归国。

可以说失去一个极有力的支持。

八月五日 晨，拜会前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其所讲与汪、唐等相同。袁、许二位大臣被杀，王文韶革职，是事实。

夜，访谷、龙，欲谈关于石川舜台事，因不在而归。

给田锅寄第六号信。

八月六日 晨，访容闳、唐才常、狄平。午后，与高雄舰长及摩耶舰长交谈。与汪康年、沈少纬兄弟交谈。

决定电文先发给英、美二国，日本则用邮件寄去。英文由容闳起草，汉文由严复起草。电报费太贵，日本路途近，所以用邮件。

索尔兹伯里关于中国事务的章程六条，足以了解英国政府的意图（本月三日下午院通过）：

“第一，英国政府表示，与各国一道紧急援助北京各国公使。凡公使出任都奉有国君之命，若公使受辱，则无异于侮辱其国君。

第二，沿长江各省如有骚乱，英国出兵帮助各省督抚绥靖地方，以保全大局。此事已和各省督抚议定，所以我国政府在事前应做好准备，以应付事变发生。

第三，英国政府坚决反对他国瓜分中国，各国必定也与我国持同一态度。

第四，中国政府不管如何变更，都应以中国官员为主。不能设想由欧洲各国共同代执中国政权。

第五，中国将来若要练兵，如需聘用外国教官，各国应利益均沾，不得一国独占。

第六，目前已代中国征剿匪党，事定之后，英国必定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军费。”

李秉衡入京以来，许多大员被弹劾。

有人说，刺客向袁世凯行刺。同时，前山东巡抚张曜的先锋官孙军门亦被刺。

唯董福祥的势力兴盛。

荣禄本主张剿匪，但自旧历五月二十四日董军同英提督西摩尔军交战回京后，顿改前言，竟与董军一起攻打英国公使馆（据旧历六月十四日离京目击此事的德国使馆某人说）。

七日 与严复、汪康年、方城、姚文藻等相见。

小越平陆自香港来，谈了南方、平山、福本等的计划，颇为机密。

主持山西福公司的刘铁云来。初次见面。他家在隔壁，家财丰厚。今年初因创办矿务获罪，旧历五月三日官府曾派人捉拿，他恰在上海，幸免于难。刘说：“太后本意不重义和团，因久为刚毅挟制才致于此。去年程文炳面见太后，认为要解除危局只有先与英日美联盟拒俄才可，太后命其将意见上陈。当时我为程起草奏折。太后阅后大喜，立刻命荣禄和程商办。次日，因刚毅大怒罢议。这是去年十一月的事，程因此请假回籍。”

中国国会昨日给英美二国打了电报。给日本的是派人送去，还是邮去，眼下尚在商议中。

○福本、平山、孙文等的计划

打算与康有为联系但未成。宫崎等在新加坡得到二万元的兵饷。

平山、福本有各种的计划。开始，打算在广东省城举兵，因看到防备严密没有成功的把握，就准备从惠州方面举兵。

孙 陆丰
海丰 土匪约二千人，以此为主力。
惠州

邓荫南 在省城附近。福字军哨官。另外在河南缉捕机构中有同志，大约九十人。

林信贤
吴苏如 皆在省城。

另有叫摩尔高伦的英国人，隶属孙文。前述三人等，本由原口闻一介绍给平山等，据称和官兵有联系，实际不确。

朱通孺 据称与省城附近的有志之士及军官有联系。属广西一派，与康党接近。

以下与原口有关系的是：

王庆延 在郁林、浔州、平乐有基础。
唐景崧 王颖祁
王第

等。他们拥戴唐景崧办团练，运进武器准备起义。

原口认为平山等首先在惠州起义不行，加以反对。广西一带已有些根基，目前他自己打算将其巩固。现在平山和原口之间不和。加上平山一伙的原（叫做近藤）、野田、尾崎、伊东等人，然相互间不甚融洽。

对比之下，官军的防备如下：（略）

力量对比这样悬殊，资金却又不过四、五万。有离心倾向。并且三千件武器还未运到，恐怕连运进的把握也没有。

然而，因李北上以后，那一带民心稍有摇动，彼等难以成事。当地的土匪叛乱，不仅不能利用它，而且英国不希望动乱，极力要维持安定。英国反对动乱是确实的。

八日 容闳、狄平来，未遇。

中岛裁之从四川来，井户川等也要离去。丁大概不北上。访唐才常、白岩、容闳、汪康年等。

约定明天上午十时与唐才常拜访容闳并进行磋商。准备明天与唐才常一起溯江而上，请甲斐靖同行，了解他的想法。待明日商量细节。

小山田从汉口带来宗方的信。宗方认为唐才常一派不可能举事。

○张之洞

已经电奏订立东南互保条约不是他的本意。其真实本意是准备让一北方人将他的想法带给端、刚诸人，此事可能是真的。

杭州领事等在拱宸桥畔返回。不通事理，轻率之极。

一个叫井上藤三郎的人带来了内田甲的信。他是专科学校的学生。答应他暂时留下。

九日 先后访唐才常、汪康年、容闳等。

唐才常因为忙，让张通典和我同去访问容闳。我决定十天内返回上海。大约一周之后打电报。

从汪康年处得到去汉口、南京的介绍信。中岛裁之十分赞成我们的计划。宫坂九郎给白岩送去一件○○^①的奔走始末记。

参谋本部似有这样的意图：预计日俄一定开战，将首先解决朝鲜问题。

和甲斐靖商定，与唐才常一起先去汉口视察。

夜，专科学校校友会在六三亭召开。与会者有牧 中路、桑田、领事馆某书记生和我共五人。小山田、坂上都没有来。十一时，搭乘“大井川丸”，入上等仓。同行者有七人：甲斐靖、唐才常、○○、○○、○○^②到汉口，我和小越往南京。三井的藤原也同船。

长江视察日记

十日 晴。十时半，过仪征县。午后三时，左岸山势渐渐迫近，至河宽不过一哩处，这是江阴。山上山腰都是炮台，兵营很多。

岸边停泊着海琛、海天等兵舰十一艘、水雷舰三艘，蒸汽汽艇一艘。

下午九时，到达镇江。

十一日 阴。五时到达南京。与甲斐靖、唐才常道别，立即上岸。乘车到鼓楼妙相庵的同文书院，时间已过六时。田锅、中村及留学生共有十人。中午气温在华氏一百度以上，比上海热得多。

妙相庵环境很好，院内有树，还有水池环绕。

上午，知府王毓平及保甲总局总办候补道张锡寿二人来。

午后有雷雨。

将唐才常的介绍信送给辜人杰。他好象改名为万年。回信说，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缺。

准备明晨七时来访，一起去拜访杨军门。终日闭门不出，变得悠闲起来。

十二日 早晨辜人杰来。因为太忙立刻就走了。辜现在作为杨金龙的副将，统领五百多人。约定十六日上午再会面。

统领杨金龙有病。副将赵云龙出城捉拿土匪，不知归期。据说除此三人之外，南京没有好军人。

○大通的骚乱

县水师营的兵勇因被革职纠合土匪进行骚扰。不清楚是否与唐才常所说的铜陵、南陵地方的土匪有联系。前天夜里衡字营的王世雄率三营士兵正从水路进行讨伐。

听说大通督销委员、候补道叫钱寿甫字松年的，正在捉拿土匪，待官兵一到，就回南京去。同在一处的一名募友被杀，军官余某也死了。不知结果如何。

○徐老虎

前天来南京谒见刘坤一，昨天返回镇江。托洋务局的叶某，安排了对徐的访问。

○康有为

昨天严令禁止“富有”钱票流通，并捉拿康党。听说是由康党伪造的，以“富有”为店号。风传长江一带康党有一万余人，康的名望决没有低落。

夜，访问了汪康年介绍的杨文会，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笔谈多时。杨在英国工作数年，现隐居在市里讲佛学，是个比较开明的人。

夜，与中村、大森登上鼓楼赏月。

十三日 早晨，前道台俞明震及其弟明颐来。是个有品格的人，但不是主动的人。约定一两日内与几名绅士会面。田锅为劝说驻沪的留学生而返回上海。小越也来了。

我写信给辜人杰，想寻找了解大通地方情况的途径。辜忙得

一点时间也没有，所以未能回信。准备还在南京停留数日。终日足不出户，读书度日。

十四日 上午，与松岛、大森、内藤三人骑驴马到玄武湖游玩，莲花满湖中。

中午，俞明震为促成二十二日游玩秦淮河之事而来。

杨文会之子杨自超来访。

据说大通的众贼已被官兵击退，逃到青阳县一带。

十五日 洋务局叶某来，说：“大通闹事的原因是督销盐局的二十名缉捕被强制解雇，为生计所迫，煽动不法之徒聚众而起。没有别的意图。”

督办钱松年的父亲是兵部尚书钱应涛，已南下至扬州，听到这个警报，将一万二千两银贿赂土匪以赎钱的命。

据说徐老虎的部下抱怨徐独自拜见招抚官，而对他们没有恩惠，有些骚乱的朕兆。

十六日 广东人林颂三来，是个比较明白的男子。

夜，辜人杰约定来访，等待他有一日千秋之感，他却因事务繁忙，竟没能来。

由于杨金龙患病卧床，赵云龙公事繁忙，不能相见，遗憾至极。然而接到辜人杰明日中午来访的通知。

十七日 辜人杰因总督紧急召见，不能来。遗憾。

清晨，山田兄弟、曾根原、大原、神津五人归沪。

下午三时，应俞明震及当地绅士之邀，乘画舫游秦淮河。美人随侍，弦歌满船，也是旅途中一乐事。夜八时半，辞别，骑马返寓所，途中访辜人杰，亦不遇。九点回到书院。

参加聚会的有：刘世珩字聚卿，候补道，现办商务局。傅春官字茗生。秦际唐，濮文暹，前河南南阳府知府（二人未来）。易顺鼎，江防营务处。

薛培萃字次申，顾云石，五十多岁老人，壮实男子。俞明

震。

另外有一人忘记姓名。酒席间谈及中国国会之事，诸人都赞成。

十八日 和留学生们一起捕捉池中的鲤鱼，得二尺长鲤鱼数尾，烹之，以下老酒，亦是一风流事。

晚上，辜人杰来，就与杨金龙、赵云龙等就“自立”事进行相商。

而后，俞明震又来，商量了一系列联络事情。

在金陵的任务大体完成

一、民间绅士、官员方面让俞明震等进行说服，约定为中国国会一致努力。

二、武将方面，约定通过辜人杰与杨金龙、赵云龙等联合一起，致力于自立会的工作。

三、我回上海立刻与陶森甲或张通典二人商议，联合南京文武官员中有志之士的事，完全有成功的希望。

四、若时局稍有进展，应使徐老虎和我们一致。虽然文官、绅士中缺乏大胆的豪杰，但他们赞成我们的事业是必然的。

五、长江一带的哥老会遍布各地，令人遗憾的是缺少统帅。我确信让他们施行“不打洋人”的方针并不难。

六、刘坤一认为两宫的西奔将招致清朝的灭亡，欲极力与李鸿章等劝阻。若在京大臣多无见识，遂可能促成西奔。若两宫此时西奔，刘坤一能采取什么对策呢？仅只太后、端王西奔使刘等不承认太后或许能够做到。若两宫共同西奔，刘等与各国意见冲突，局面将难以收拾。若至此地步，我等帮助中国国会在南方组织新政府，并应尽力使各国商量善后之策。

七、我权衡了事情的轻重，尚未设想在与容闳商谈后是否立即回日本与权威人士相商。

总而言之，在金陵八天间，我的任务大概可望取得好的成果。

回到上海后唯有尽力发挥我的才能。小田切万寿之助^①的意见以前和我稍有不同。他因不了解内部情况而出现谬误，现在逐渐明白过来，考虑应该把认识的距离缩小。

凉爽，正午也不过华氏九十六七度。秋高马肥之际，跃跃欲试，一展鸿图。

本部国友重章来了两封信，投送给在汉口的甲斐靖，嘱托迅速了解武汉及湖南的情况。

十九日 在金陵的公务大体办完，有必要速归上海。与留学生神津、谷原、御园等三人踏上归沪旅途。上午九时半，辞别同文书院。下午一时，在下关搭上太古洋行的鄱阳号船舱。来送行的有山田兄弟、曾根原、大森、大原、松岛等六人。

下关有英舰哈西恩号。五时，抵达镇江。这里有清舰二艘、英舰一艘。在船中，见到了北京同文馆的某中国人。他说：“昨天有电报说联军在旧历二十一日进入北京，端王、刚毅等反抗，两宫都还在城中。”这种传闻真伪不得而知。夜里辗转反侧，颇有感慨。

二十日 上午十时半到上海。

一回寓馆，宗方在。听说平山周在沪，立即去拜访他。他说本日乘日本丸回国，预定三周后再至香港准备起义。和牧一起拜访从重庆新来的堺与三吉，转道拜访了篠崎、容闳、狄平、西村天因、白岩，晚上才回家，桑田、中路在。

中国国会容闳等这十天中没有新的情况。今天经英国领事向英国政府发电报。待其回电，打算向美、日也公布。即有回电后，我了解了中国国会的前途如何后与其告别。

自立会的活动无何变化。

宗方说，汉口还是老样子，成不了什么事。

据说陶森甲昨天去苏州，明天返上海。

^① 时任日本驻上海领事。

北京在十五日被攻破，据说李秉衡等死于守城，端王、刚毅拥两宫逃向山西五台山；庆王、荣禄在北京。

据说上海有一千英兵登陆，法兵二百名登陆。我国丰桥舰也载陆战队六百人，远藤少将改乘八重山号作为旗舰。

二十一日 夜，降雨。近来凉风习习，早晚颇感凉爽。

张通典来，转达辜人杰的口信。

向近卫公发出第五号秘密报告。

午后，访问桑田，转至摩耶舰，拜访牧原雄吉及舰长佐佐木，闲谈至傍晚。与牧原上岸一起去拜访桑田，桑田不在，小田桐在。三人在旭馆小酌。归途中拜访了牧、堀二人。十时半回到寓馆。

昨天，遇到王照，四五日内要去北京。桑田返回福州。

文廷式今日从湖南回来，似一事无成。腐儒终究无用。

十六日本部来电，称：“昨天召开临时大会，议决以下宣言：保全中国为本会所一贯倡导。兹鉴于时局，更加坚信此宗旨的正确，期望保证贯彻执行之。”在此宣言外包含怎样的手段方法尚还不知。

井手三郎十一日来信说，报纸扩版的问题十分困难。我的欧洲之行还未商量。应等一两天内中根津一赴京。据说同文书院方面要先安排好。

王照、白岩来。

二十二日 唐才常等三十人被逮捕，计划大受挫折。

午后二时从汉口来电说：“昨天夜里唐才常及其一派以及甲斐靖也同时被捕。”恰巧陈锦涛来，让将此事告诉狄平等。我自己立刻与狄平、张通典、李学孝等会面，约定让他们立即打电报向汉口报馆寻问逮捕唐等的理由及后来情况。接着拜访容闳，与之磋商。过白岩处回家。马上向汉报馆发电：“我们要知道情况。”听说三井洋行接到电报上说被捕的是康有为一派三十人，大部分曾在东京待过。陈锦涛已来，带五十元钱想通过我打电报。

我答应了，再次发电报：“我们急于想知道唐才常等被捕的理由及其以后的情况。电报费以后送去。”给《日本新闻》也发了电报。

傍晚，唐才常的弟弟来，为去东和洋行的事请我帮助。我们一起来到东和，一进楼上的一间屋子，岂料梁启超与另外一人在这里。长期在美国游学的××和××^①，两人都剪去辫子着洋装。我们谈着分别后的情况，梁启超突然请求我发电报给近卫公，尽力营救唐才常等。但是，我和宗方大致商量后认为，这不会有什么效果。我们决定给与伊藤关系密切的佐佐友房、片冈谦吉二人打电报，请伊藤给张之洞打电报。我们的电文如下：“维新党人唐才常及二十九人，以乱党嫌疑昨夜在汉口被捕。若他们被杀，长江一带动乱将不可避免。望立即与伊藤侯相商，给张之洞发电报救出他们。”同时，我们也以陶森甲为张之洞所信任，劝说陶也进行营救。我们请陶与小田切万寿之助会而，并请小田切打电报营救唐等。小田切表示同意，还让人通知我向他详细讲述原委。因此，晚上十时，我拜访了小田切并谈了此事。恰巧宗方也与陶在某处会合，带着同样的打算来会见小田切。小田切先寻问了唐等被捕的原因然后说，发电报应讲营救的办法，若唐才常等只因是康有为一派而被捕，或许侥幸能救出。如果唐等新的计划为张之洞所注意，结果就很难说了。因为张一直嫉视唐等，而且握有遇事临机正法之权。估计对甲斐靖不会有多少危险，大概二三日内会被释放。

十时半，辞别小田切再到东和见梁启超，告诉他小田切答应的结果。但他们似乎知道不会有作用。

照梁所说，哥老会、三合会与康有为一派的联系似已建立，而且大通的事也与他们有关系。大通失败后六百多人被杀，陈宝箴的死也带来不小的挫折，汉口现在又发生了这样的事。唐才常

^① 原文此处缺。

在联系控制哥老会上有极重要的作用，若他一死，没有人能够立刻代替他在长江一带所起的作用。

梁启超由横滨乘法国邮船今天中午到达上海。他来上海的事不能和任何人说起。

梁启超和孙中山不久前似在东京会见。以梁启超、孙中山的才能，没有成为同志，实在可惜。

梁本打算在长江一带活动，一到上海，突然接到这样的消息，所以今夜速派秦鼎彝去汉口，探明真实情况。待有电报后，考虑离开上海去某地方。或也许是赴两广，似和两广的唐景崧等联系已很密切。在两广起义，眼下尚未和孙文派联合，将来一定要联合，这话梁说得很明白。

康有为现在暂时处于不能有所活动的地步。梁启超也没有通知我方政府就来了。事实上美国、英国不愿梁等进行活动。

中国国会前日已向英国政府发出密电。

晚十时收到南京来电，说：“形势恶化。后天离开此地，请马上安排房子。”即南京同文书院终于到了撤离的地步。

今天从小田切处听到担任博物馆派遣员的安村喜当，前天安全抵沪。他从四川由陆路向北京，途经长安，在陕西巡抚端方的保护下避过灾难，平安回到上海。我曾有机会与他在江浙游历，对他的消息非常关心，现在得到此事，大为放心。

不久前日本人协会送给的西公使及山口师团长的慰问信如下：

天津领事馆

由日本邮局转交大沽口岸

请转达对西公使^①和其他人员的问候。我们获悉北京解围，向西公使和其他被救人员表示祝贺，并感谢参加保卫公使馆的全体勇士以及由于采取了有效行动使北京得以解围的山口隆一和他的

^① 时日本驻华公使西德二郎。

部下。

上海日本人协会

二十三日 晨，赵仲宜来，商量为营救唐等给在东京的钱洵打电报的事。这也是一个办法。即向钱洵发电报：“唐才常及留日学生三十余人，在汉口被捕。望公顾大局、保志士，速电张帅，并在日本托当权者想办法。沈翔云代表”。

下午一时，访问在常盤的安村喜当，听他说起四川、陕西的见闻。他说四川有赞许我国人的风气，进入陕西则全然一变，似乎害怕与我们接触。

安村由成都出广元，从那里到长安。因时局急变，由潼关南下，经襄阳于三日前回到上海。安村由宜昌溯江入蜀历四个月，今能生还，实在是幸事。

访梁启超，丁惠康、贺某等在。片刻即归，赵仲宜又来，说，本日英领事署接到电报，称昨日被捕的党人中已有二人被杀，其姓名不知道。

陕西一带的谣言实在令人吃惊。

方城、沈小伟、文实甫、白岩、小林、坂上等诸人来，西村天囚、唐才常的弟弟亦来。

夜十时，由汉报馆接到来电，说：“甲斐靖被释，今夜登上大井川丸，其他人被处决。”即张之洞将唐等立刻处置了。其中几个人被害还不知道。若三十人全部被杀，那张之洞也是一个很果断的人。此堪称大狱。我和唐才常关系非浅，这次我也曾让他多加注意。现在竟得此消息，悲哀难忍。愿唐才常的同志不能让他白白死去，若能成其志，也可聊以慰亡灵。此大狱果然象井伊直弼杀害讨幕志士一样。对于此，容闳等态度及外国人的感想如何，明天要探听。

得知这个坏消息，立刻访梁启超，狄平在座。皆长叹，不发一语。我昨天以来的苦心俱成泡影，现在对他们更是感到悲伤。

临别写“经历一难又有一难”一语示梁，梁为之颌首。

拜访白岩、西村、牧。十一时半返回住宅。

二十四日 来访者为狄平、西村、中村、曾根原、山田。

早晨，寻访狄平，转而访容闳，谈了唐才常等事后返回。容以此事与己无关而无所谓，实乃中国人的本性。

狄平来，想由王照给伊藤、青木打电报，营救唐等。我说明这样无益，并且不合适而让他回去。

中村等从南京来，准备筹借房子。陶森甲昨夜去南京。

据小田切领事观察，陶森甲是为刺探中国国会的内部情报而入会的间谍。

唐才常与徐老虎通信的事，在汉口、大通等事中，似全有奸细向张之洞、刘坤一等告密。

甲斐靖给我的信确有被拆开的痕迹，在中国没有秘密，没法子。

二十五日 向近卫公发出第六号秘密报告。上午，先后访安村、小田切。西村、中村、管、文廷式、小越等来。

传说皇帝在日本军中，大概不是事实。

篠崎升之助由东京昨天来沪。八重山舰三名士官来。

篠崎转达了安永东之助的意思，说：“○○^①已由我方运来。刘坤一、张之洞是否需要，请答复。”

二十六日 早晨，与白岩相商，知陶森甲那里很需要。总之，知道安永进行顺利后事可着手进行。随即发电：“有定货。东西如果准备好，马上送来，乘明日便船来。”

若根据和安永会谈的情况看，此事不会徒劳无功。

十一时，大井川丸由汉口到沪。甲斐靖被打伤尚未痊愈，还在汉口领事馆治疗，未能回上海。三井的藤原返沪，据他所说，唐才常等起事经过如下：

① 原文如此。

唐等七月在英租界以一百五十两银子租了一个大房子作为据点，与同志一起进行枪支、弹药等一系列起义的准备。预定二十二日首先举兵袭击机械局，然后乘势攻打护军营的主力，夺取武昌。但前一天有人告密。张之洞于是照会英领事，派兵百人包围了房子，一齐射击。房子里的人有的逃亡，有的抵抗。遂捕获十六人，又连夜搜查逮捕了十多人。唐才常、林述唐、向联升三人当即被杀。其他人被押到武昌，已有十多人被杀。

甲斐靖也同时被捕，经我濠川领事严正提出引渡，于第二天二十二日释放。因遭殴打，至今犹在治疗中。估计张之洞的意思是虽是日本人也该杀，杀了后就说不知道是日本人，也能搪塞。真是无法无天。

唐才常等的自立会檄文外国人评价不错。只是英文With arms if necessary（如果必要就应拿起武器）等话，说得稍欠妥当。并且以我领事的严正说明，外国人也深表同情。

张之洞当然将他们看作土匪，并已犯制造“富有”票的罪。目前虽然维新党偃旗息鼓，但哥老会有些不安定的兆头。不是有在新堤暴动、并派兵讨伐的报道吗？

唐等失败的真正原因

哥老会若没有督抚那样大的兵权就不能驾驭。为什么？因为哥老会党人本来就是散兵游勇，而且是些不知道作一个国民道理的人。

此次唐的失败有两个主要之点：一是对哥老会的人只用符合自己意图的，因此造成其他会众离心。二是所找的人不是会党中的俊杰，而仅是一些闻命就乱动的人。原本约定大通和武汉同日起事。但大通先盲动起事，而武汉却未应。及至唐君到汉口催促，其中间离开的人也不是没有。如林述唐等权力重而威望轻，不能调度其部下。因此，先是泄露机密，以导致败露。

还有，唐才常的活动确有贻人口实的地方。其失策在于模仿

会匪故伎，发行“富有”票，并在大通抢劫银庄、当铺。募集军费这也许是必要的，后则不免为人讥议。

是否有人继之而起

叶瀚等打算待汪康年明日归沪后，收集唐的残部并利用这些人。现在他们中有人去招集败众，以待他日之用。听说他是哥老会党中极有实力的人物。他已去汉口。哥老会到处都有，也许出现点什么动荡。

官兵难指挥

长江一带的官兵多和哥老会相通，若不是统帅不能调度，他们功名已成。如果与其没有很大的利益，他们必不肯服从我们。

对中国国会此事的感想及它的影响后继乏人的原因

会长容闳实际不知道唐等人干的事，完全是康有为一手导演的。因此挽回败局是不可能的。容与康的关系原来很好，故汪康年一派已嫌其偏袒唐等，这就有了唐的事。及事件发生，人心骚动，待询问时，会长称不知其事，众人又将此事置于一边，因此，此次唐失败能继其志殊难。虽然如此，对众人说来，若将来时局急变，此事再兴，唐的苦心或可得以报偿。

○叶瀚听到大通事败后，急忙让狄平向在新加坡的康有为发电，要求寄重金助军饷，让唐才常发兵西上保卫皇帝。已于二十日发电报，第二天就收到唐失败的消息。

○李鸿章、刘坤一也由唐才常之事对中国国会有些怀疑，以至要限制它。张之洞甚恶康有为，似以杀唐等出气。

○经由英国领事之手发密电是事实。而容闳等寄重于外交，准备在他们答复后再全面布署、举办团练。利用民间乡勇可以认为是明暗二法，明则以北上西指为名，暗则是举办团练可以保护长江一带。

○中国国会与张、刘很难两立，若不破除东南互保，难于发动国民的大运动，同时不能与各国共同协商。两宫已离开北京，

北京之事是不是由联军派官代为管理?那样东南保护条约也无用。各国若均以武力行事,张、刘会一起失败,对民众有利。

上海各报的看法

如《新闻报》将唐等看成是土匪,看成是聚群行劫的。《中外日报》甚至没有评论,仅登载一句话。象《字林西报》认为他们是自称维新党,实际是哥老会,很不同情。汉口的外国人即不然。这大概是与张之洞有互保条约,不能太公然庇护维新党吧!应为唐才常他们惋惜。

靠田锅来营救唐才常,事已经迟了。我想这事也许波及南京,发电报请求探查:“唐才常等被杀、甲斐靖获释。湖北有哥老会动乱的朕兆。南京情况如何?请探查。”

决定今天以后登在华英日记中。

○唐才常事件之后维新党的势力完全垮掉,不能再起。其理由写在同文会报告(明治三十三年十月发行)上。

卷末有关记述自立军的纲领和檄文(略)

中国自立会的布署

哥老会成员很多

湖南长沙杨鸿钧、罗桂堂、张灿等

| | | |
|----------|----------|--------|
| 岳州 新堤 | 谭凤池等 | 部下约一万人 |
| 汉口 | 唐才常负责 | 五六千人 |
| 麻城 | 陈说等 | 十余万人 |
| 安徽安庆 | 唐凤翔、肖波等 | 四五千 |
| 镇江 | 张金山、徐长山等 | 七八千人 |
| 九江 | 谭荣 | 二三千人 |
| 扬州 | 宋刚涛等 | 二三千人 |

从昨天在安庆已开始起义,秦力山(鼎彝)为军师。准备夺取南陵、铜陵、宁国等地。

黄忠浩、杨金龙、辜人杰、熊希龄、唐景崧、陈翼亨、康有为、梁启超等一直在联系、磋商。

康吾友 参将，曾在台湾任游击，唐景崧的部下。

李花亭

哥老会长江一带各地都有，若让其头目联合一起，有武器，筹饷也有办法，率领他们足以定天下。吴元愷尚未使用。李寿廷、黄少春毕竟不足以谋大事。但是很多兵士为哥老会成员，故大可依恃。

武人利用文人从事外交，文人用武人干军事。若自立会与中国国会相互支援，预计必可成功。

最初筹划时不让康有为参与，只让他为此负责筹饷。

自天津来上海避难的志士

严复（前水师学堂总办。现住上海新马路昌寿里。年龄四十余。很有影响的人。被选为中国国会副会长。）

王修植、伍光廷、陈锦涛、温钦夫、赵仲宣、蒋新皆、方诚、四川周善培（二十五岁）。

康有为的门生

陈千秋、曹泰二人有出蓝之誉，都死去。梁启超、徐勤、赵兰生、麦孟华都嫡传弟子。

南京文武绅士

杨文会 高士 曾在英国做事。

□俞明震 前道台 南京马营

赵云龙 副将

○杨金龙 总兵

□辜人杰 副将 游府西街星沙辜公馆交 辜大人 外略

徐宝山 投降刘坤一的枭匪的头目。

蒯宝山 候补道 格致书院总办。

○卞彬 武解元，是侍卫。部下有二三千，是有志之士。
但近来有些迷信拳匪，真可惜。

龙璋 上元县知县。

○朱起琇 兵部郎中 财产有二百万元。

钱德培 前陆师学堂总办。现在江西，是督销盐局长。

□陶森甲

大部分志士对康有为的感想

朴实而有主见的绅士认为康有为性太急、无恒心，了解变法的好处却不知中国的情况。戊戌政变以来，北京政府更加顽固，这不能不是康、梁的过失。太后从前也不完全是这样顽固。康有为的急于变法，将满朝的大员弄成今天这种情况。这与事实接近。

江 阴

黄金满 现指挥江阴炮台。比徐老虎官小。十年前是有名的宁波盗魁。

安徽讨袁檄文

张炳湘 整理

编者按：本篇收录安徽“二次革命”时期讨袁檄文2件。辑自安徽《均报》以及《民立报》等。

一 讨袁世凯檄

的 恒

民贼袁世凯者，性实残酷，质本官僚。昔充合肥僚属，会以蚤缘入阁。戊戌变政，紊乱朝纲，阴恃西后之私，致令载湉见闭。在朝善嫉，奸猾不肯让人，昏夜进谗，谰词偏能惑主。窜康梁于海外，陷六友^①于极刑。尔乃虺蜴为心，豺狼成性，窃共和名，行专制实，杀张屠方，^②刺宋贼徐^③。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民之代表，威之以兵力（捕参议员谢持），匪之党魁，委之以顾问（戈克安、王和顺）。呜呼！华盛顿之不作，马忍尼之已亡。违法借款，知汉族之将尽，秘密割地，痛五色之旗裂。

的恒中华国民，黄帝血胤，继宗祖之遗业，荷民国之厚恩。王铁珊之调和，良有以也，岑西林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五衷，志巩共和。因天下之郁懣，顺宇内之舆情，爰举义笔，以

① 指戊戌政变中被杀害的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

② 张指张振武，方指方维，1912年被袁世凯杀害。

③ 宋指宋教仁，1913年3月被袁派人杀害。徐指徐绍桢，亦曾被刺受伤。

诛妖孽。南至东粤，北迄蒙藏，志士成群，毛椎相接。累累黑珠，讨贼之料靡穷；灿灿黄绢，扑袁之声何远。檄文动而义军起，民气冲而妖气平。暗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贼，何贼不灭；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公等或居边境，或处重镇，或膺重寄为都督，或绾兵符为将军，兵柄在握，忠岂忘心，武汉之血未干，万姓之命谁託！倘能转祸为福，歼彼凶残，共立保国之勋，以固共和之命，凡诸酬尝，固民所念。若其眷恋爵禄，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貽史笔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必无一姓之天下。

1913年7月8日《均报》

二 淮军檄文^①

盖闻忠信者，国家之根本；廉耻者，国家之纲维；贤良者，国家之命脉；法律者，国家之经纬；文明者，国家之源泉。自古治国者，未有不秉忠信、重廉耻、任贤良、遵法律、浚文明，而可以措国家长治久安者也。中华民国第二期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诈伪相尚，残忍成性，卑污自侍，暴弃自甘。民党仁慈，不足以格其非心；世界文明，不足以化作戾气。方之桀纣，桀纣无其暴；方之莽卓，莽卓无其凶；方之僇汜，僇汜无其恶；方之杞桧，杞桧无其奸；方之张宪〔献〕忠、李自成，张、李无其残酷。至于此极，是诚殄绝忠信，斫丧廉耻，锄害贤良，蹂躏法律，仇视文明，天下国家，世道人心所不能容之元恶大憝者也。

甲午以前，中日之好甚笃，世凯欲利用国家之便，以遂其一人之私，于是有甲午之役，丧师辱国，削地失藩。庚子之祸，伏根于此。戊戌之际，清政不纲，谭嗣同、康有为诸志士说清帝以

① 1913年7月，安徽讨袁军兴，淮上各军将领，齐聚正阳，部署讨袁，研究作战方略。以张汇滔为首，集淮上军警师讨袁。此檄文即为张汇滔与各军将领共同发出。

变法，并组织新学会。世凯亦隶党籍，既而告密于荣禄，于是盟友之头颅，化作袁家之官爵，世道陵夷，谁料及者。六君子被戮，维新机会顿挫，十年爱国之志士，悲之至今。世凯旋以沾友之绩，擢督北洋，递入军机，浚脂削膏，进赂权贵，年纳庆王者百万。其家奴段芝贵袭其故智，贡黄金献美人于载振，于是贿赂之风，朝野以溥。廉耻荡然，谁尸其咎？然犹得曰：“胜朝之轶事，与民国无涉，旧染污俗，咸与维新。”武昌起义，天下风从，是非顺逆，自在人心。世凯竟密派爪牙，傅佐良、周符麟刺革命伟人吴禄贞于帐下，且南犯汉口焚其市，全国精神化为焦土，残酷万倍白起，浩劫敝蕞昆阳。文明战争仅见有此。然犹得曰：“世凯故国人臣，忠于其主，原心略迹，不事诛求。”阳夏既陷，和议方兴，世凯揣知民军仁爱，不忍久事干戈，我可以要总统之位置，彼可达共和之目的。相约停战，既复虑土地过蹙，难据要求之地位，遂当停战期内，乘民军之不备，诡曰剿匪，北袭我娘子，西略我潼关，南取我亳颍，公法之所不许，匹夫之所羞为者，世凯竟为之矣。

和议告成，总统定举世凯，首都定在南京，载在条约。世凯以南京不便于己也，除命赵秉钧、曹錕下京、津、保三镇兵变之命，以为要求改都北京之口实。君子可欺以其方，南京政府虽恶其反覆，又以迫于求治之心，不事峻拒，且希望世凯终有效力民国之心。迨统一政府成立，进绝贤材，仇视端士，家丁门吏，贩夫屠竖，悉纳之于机关，以便操纵。于是中华民国之政治遂为袁姓家奴政治矣。参议院违其用人之意，彼即犯天下之不韪，军警出而干涉。国家初立，财政困难，裁兵之议，兴于志士。革命军人爱国家，信公理，谈权利，相率归田。世凯旧部，不但不令裁汰，且复招募，增益拱卫，各军又复倍其原数。各省军饷，数月不一发，北洋各师月一发而且加额焉。司马之用心果何在耶！革命军队裁矣，世凯去之犹恐不尽，复定大计，运动各军哗变。

得收渔人之利，遂与褚其祥十五万元往烟台，徐鹤松十万元往南昌，黄桢祥二万元赴武昌，予范姓三十万元赴苏，组织九龙会，以图藉口兴兵南下。身居总统之位，居然草寇行为，诛之固可胜诛哉！爱国之士犹不肯遽尔弃绝，引领北望曰：世凯之所欲者正式总统耳，倘民党硕彦表示意见，不争总统，庶几改过自新乎。于是孙、黄毅然有北上之举。世凯恶犹不悛，阳与孙、黄周旋，阴肆鬼域伎俩，旋以黄兴为川粤汉铁路督办，计在杀黎以罪黄，复灭黄以报黎。幸黄得其诈而去职，神奸巨慝，骇人听闻。

命令以代法律，即在君主立宪国家，且为叛逆。世凯以命令施行官制；法律无民政长，世凯竟置民政长；法律无护军使，世凯竟置护军使；法律无观察使，世凯竟置观察使。诸如此类，不可殫述。自我【为】之，自我行之，共和国家之总统顾如是乎？

鸦片之禁，民国所严。河北彰德府属遍罍粟，问谁所植，为世凯家人。人方禁之以除害，彼则因之以网利，奸商恶贾之行，经总统乃优为之。‘官有铁路，国家之财产也，交通银行，官有铁路之金融机关也。世凯据为己有，以之豢养盗贼，以之供给暗杀及侦探，以之收买议员及报馆，以之招纳罪人，如王和颀、黄土龙、张鸣岐、李準之徒，皆入幕府。迹复益肆猖獗，叠次蹂躏报馆，捕拿参议员谢持，以其枉杀张振武者，毒杀林述庆，以其暗杀罗明典、吴定安者，锄杀宋教仁。二千五百万磅丧权辱国之大借款，不告国人云。二十二行省之质问，视而不见；四万万人之呼吁，听而不闻。又复派内务次长言敦源运动上海流氓，抢掠租界，以重民党之罪。幸临时变易，转强(?)制造局。是可为也？孰不可为也？

迹其行事，莫非殄绝忠信，欺(?)丧廉耻，锄害忠良，蹂躏法律，仇视文明。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任其率兽而食人，不加诛戮，人道沦亡，国于何有？汇滔誓师淮上，前驱讨贼，不敢告劳。愿我同胞，同心协力。谨告天

下，咸使闻知。此檄。

张汇滔、龚振〔镇〕鹏、岳相如，毕靖波、范光启、田桐、郑芳荪、凌毅、凌昭、杨冠英、陈华亭、孙传轩、管应启、张汉、黄杰、顾汉、葛昆山、吴树滋、方楚翘、马仁生。

1913年7月20日（民立报）

总第75号要目预告

- 太平洋会议日记(上卷).....李景钤
 书诗志恨六十首.....方 芬
 光绪二十六年份山西教案识略.....田俊生 安世英 徐斌整理
 吴棠年谱.....陈庆二
 赣案密电簿.....申 江
 曾纪泽未刊书牍.....拓 芹
 袁氏家塾训言.....田俊山 安世英整理
 记女伶金月梅母女事.....斗山山人
 吴江报刊纪略.....解根生 辑
 中国的形势及秘密结社.....山口升著 赵金钰译 刘淙校
 《近代史资料》总第65—74号目录索引.....本刊编辑部

孙中山佚文两则

陈建明 整理

编者按：本篇收录孙中山佚文两篇，系录自1918年5月广州《真光》杂志，为目前出版的《孙中山全集》所未收。

致美总领事函^①

驻广州美总领事韩慈敏君大鉴：

径启者：溯自战事发生以来，各地受灾者亟待拯救。乃贵国红十字会实行其消弭痛苦之设施，热心宏愿，实获我心。所拟创设美国红十字会华人协会之举，鄙人尤极端赞成。似此共策进行，深信中美两国固有之睦谊，从兹日益增进也。耑泐。顺颂公安。

孙文谨启。

民国七年五月二日

书于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府

中国人应协助美国红十字会之理由

自有历史以来，世界之变迁未有若今时之甚者。所谓变迁，非指形势上之变迁，乃指人类之思想及其关系。回溯上古，浑噩荒凉，及乎地球之热度上升，然后水陆以分，遂成人类之世界。迨经几许变迁，以至今日。盖历时愈久，进化愈增。故逆料生于将来时代，人类之道德愈进，关系愈切，相得愈深，则对于公益之趋向愈勇，其将成为一完全之新世界，不问可知。由斯而谈，

^① 原编者注明该函由英文翻译。

为吾族催促进化，作无限之功德者，其为红十字会乎！红十字会者，无自私自利，而牺牲己身之事业，以实行施济者也。以事实为重，言论次之，然有时言论亦可产生事实，对于会务，未始无裨。举凡世界上之热心慈爱者，固咸以红十字会之名深存脑海。世人作书，对于红十字会济饥、治病、疗伤种种事举之纪载，已觉连篇累牍，至继后而作者，尚不知凡几。此次欧洲发生空前之战争，其需红十字会之急，较诸曩昔，尤为重要。美国红十字会早知应肩要重之担负，毅力进行，首集捐款一百兆元，以应战期救济之需，于此人类永不遗忘之时代，建立光荣事业。美国加入战争而后，责任弥增，美国红十字会当事人等，预料更须多筹一百兆元，藉资接济，爰向中国求将伯之助。所当注意者，以一共和最早向称富足之国，现为筹款济世，求助于一地大物博新创共和之友邦。想一览下开情形，中国人士当必乐为赞成者也。

（一）其总因则需款孔亟也，不拘其何处而来，得一元即收一元之功效。凡应为之事，则当为也，不遗余力，不弃小财，务使得达完满之目的为止。中国人士〔士〕岂有不各尽其能力，以应此世界之呼吁乎？

（二）回忆中国水灾饥馑之秋，彼时灾黎遍野，美国红十字会尝由函电汇款数十万元，分发灾区，实行拯救。如在两广，美国红十字会捐款、济饥、治病、疗伤，多不胜数。诿意天道循环，灾区易地，待赈孔殷。今日中国人士若能乐于输将，倘他时反有所求，美国人士自可触引此次之援手，亦必踊跃资助也。

（三）美国红十字会计有会员三千余万，阅历之深广，组织之雄伟，为世界红十字会之冠。其救济灾黎，以最直接及最廉俭之方法施行。中国人士素存当仁不让之心，然凡欲行善，谁不愿捐资于一最善办理及最堪信重之人，使灾黎得沾实惠者乎？

（四）以两广之地大人稠，设立协会，何难一举而得十万会员。尤望指日可将此项消息电达远洋，藉从事实上增进两大民主

国之友谊，其功效尤胜于外交家提倡联络中美谈判经年也。合友邦之力，以倡善举，而救难民，乐何如之。圣训有言：施于人者，得福尤多于受施于人。前者美国之效力于中国者，不胜枚举。今愿中国广施于其友邦之美国，更愿中国立应所求，动其广施之美德，使历史上之两国交情日益笃厚也。

抑所望者，吾侪可以高声疾呼曰：美国红十字会广州协会已得华人会员十万矣！会内第二期战务慈善款已就地筹得五十万元矣！此固事属易举。诚以两广殷富之人，为数以兆计，以十万会员均计，每捐五元便可筹集所求之款。以人数而计，捐款者每三百人不过一人，况其中能力有可捐至千元及千元以上者乎。今美国已宣战矣！美人之热血横流于欧洲大陆矣！其为法国效力与为中国无以异也。中国人之血，幸未尝见于法土，然岂忍见其友邦流血而坐视不救乎？吾侪深信，若此呼吁之声一闻于中国，则中国人士无不竭诚援助也。请人人以此事转知其亲友，使各均尽力协助红十字会，以至吾侪能书成功二字为止。

发起赞成人

| | | | | | | |
|-----|-----|-----|-----|-----|-----|-----|
| 孙中山 | 伍藉磐 | 吕渭英 | 周亮臣 | 黄宪昭 | 罗 诚 | 钱树芬 |
| 潘元耀 | 陈辑甫 | 姚轮三 | 徐绍桢 | 李锦纶 | 黄璧如 | 李之腴 |
| 潘棣甫 | 伍廷芳 | 刘英杰 | 林福成 | 徐乐亭 | 朱惠章 | 陈廉伯 |
| 陈楚珩 | 胡颂棠 | 梁恪宸 | 陈勉畲 | 伍朝枢 | 郭仙舟 | 何夔石 |
| 潘锡藩 | 陆卓卿 | 林子峰 | 刘若操 | 陈益南 | 邝余初 | 陈俊民 |
| 萧 宽 | 郑 豪 | 卫祝龄 | 陈廉仲 | 姚观顺 | | |

往事回忆

叶恭绰

编者按：叶恭绰（1886—1968）字誉虎，广东番禺人。民国初年历任北京政府交通部路政司司长、交通次长、总长等职，为当时交通系重要人物；1923年又出任广东孙中山大元帅府财政部长，熟悉民国初年南北政坛政治内幕。现刊之七篇回忆录，为其本人生前所撰写，弥为珍贵。叶子冈先生拟收入“叶恭绰传记”一书，承蒙慨诺，先于本刊转载，以飨读者。

本文总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国邮政收回前之回忆及其各种措施

中国邮政自帝国主义手中已收回多年，尤其在解放以后，我国的邮政事业更有蓬勃的发展，回思昔日之与帝国主义在邮政上之种种斗争，犹有馀愤。今适有霍锡祥同志写《中华邮政二十年》一文，承其来询当年之经过情形，除为霍同志提供一些意见外，将余所回忆各节另撰此文，以备读者参考。因年老记忆力欠佳，又以事隔多年，文献难征，容或有疏误之处，尚希知者补正。

吾国自前清光绪甲午以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各国纷攫吾国权益，法国要求中国邮政由法人代办。其时邮政归海关兼管，总理衙门（即后来外交部）当局畏惧外国势力，一切不敢抗争，仅求敷衍，允以俟邮政独设机关时，乃行考虑，邮传部初固未知之也。嗣光绪宣统间，收回权利热潮逐渐发生，邮政亦在筹议之列。事渐成熟，法人遂提前议，当局大窘，迭经磋议，乃定为中

国自行聘用法籍人管理邮政。时盛宣怀为邮传部尚书，李经芳为左侍郎。李号通英文，实任此项交涉，因用向在海关专司邮务之法籍人帛黎续司其事，称为邮政总办。一切对内对外权责，皆帛黎负之，几如总税务司之隶度支部，仅名义上为主管衙门，而实权尽操之于帛黎之手。余久知其弊，思所以矫正之。民国三年（1914）余以交通部次长兼领邮政总局局长，适总办帛黎以年老将退休。余查知邮政中资格相当之法籍邮员（当时例以资劳相当之邮务长递升总办）凡有数人，其中有铁士兰者，人颇干练，在外籍人员中性较和平，而资格不居首列。余乃遣人示意，谓邮政中不少应改革之事，如能彼此协力令邮政改进，愿服从中国政府指挥，当向政府推荐。铁士兰表示极愿服从从事改革，余乃招与面谈。凡邮政应行改革诸大端，如用人、培才、正名等等，他均同意，余乃用交通部令派其试署总办。当年在海关兼管之邮务改归邮传部辖时，李经芳未加研究，总办之英文名称听帛黎定为“Postmaster General”，各国于是只知帛黎为中国邮政首长。缘欧美各国暨印度之邮政部首长皆用此英文名也。余因告铁士兰此名称之不当，须重改订。研究再三，英文名规定邮政总局局长为“Director General of Posts”，邮政总办为“Co-director General of Posts”，并另添置邮政会办一人，以中国人充之，英文名为“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posts”，即以此通告万国邮会。并规定行文时某类公文应用局长之名，某类应由总办副署，某类应由总办单衔。凡此种种，皆由我国自主施行，固不必得法国之同意，更不须任何国过问也。

同时，余以我国每一省皆有一邮务长，司该全省之邮务，向来皆外籍人任之。余与铁士兰曰，中国邮政开办数十年，何以邮务长无一中国人，铁无以对。余因查职名录中，中国人任副邮务长者却有五、六人，余谓何妨于其中择尤升邮务长。铁曰恐其能力尚逊。余曰此皆有资劳之人，为何不加培养。如永无升进，令

渠等何从历练，倘虑其能力差些，尽可试以小省分。究竟此五人中，以何人为较优？你可举出。铁士兰举出二人。余因定以陈茂涛任陕西全省邮务长，刘书蕃任贵州全省邮务长，并令二人来京，面加奖励，并授以交通部委任状，二人之欣跃自不待言。以我国有邮政以来，首次中国人任邮务长，全国邮员无不振奋。同时，余规定邮务员工为五等，即邮务官、邮务员、邮务佐、邮务生、邮务差等，再分别等级，各按资劳升进。以前凡考进之华员，升至一级邮务员为止，不能再进。余询何故，铁曰，应考之人学历太低。余曰，招考时为何不将学历提高，今毕业大学生不知凡几，嗣后应将投考资格提高，而以后职位升进亦不应有限制。又原来低级华员有每年经考试而升进之例，但考不及格，以后即不能再应考。余曰何必如此限制，尽可多次应考，其不及格者自然无法应选。于是，从前所沿袭海关旧例，对华员升进多方阻限之恶习悉为扫除，此对中国人拔才选能，广开途径矣。相反的旧日洋员应选毫无限制，余因定为洋员应考亦须规定条例，不能由各地任意选录。且统计全国所用洋员数目，定为准减不准增，如此则可逐步将邮政收回国人之手。

嗣又举办全国邮政储金，业务大为发达，历年利润存额将达一千万元。余思此数若一宣布，则中央、地方、财政、军政各机关必思掠取，因商拟用之于建设。观当时各地邮务皆缺适当的办公处所及交通工具，于是先于京、津、沪、汉、粤五处兴建邮务局，又购备轮船、汽车，以期邮政业务之扩展。甫经大体粗备，而余去职矣。至今五处之宏大邮局房屋，即其时所造也。

其后铁士兰寝为法国一部分人所不满，谓其对中国太让步，未达到把持中国邮政之目的。驻华法公使玛德尤忌之，至逼其辞职。时余适再长交通，仍召铁士兰，劝其勿萌辞意。后玛德竟荐一曾任某处领事之法人于我外交部，外交部不敢拒，而又无计可施，当局亦感为难，劝余迁就。余曰，数十年前清廷所许与

法方者，亦只协定聘用法国人为止，并无由法政府或公使推荐邮政总办之协定，今若开此例，是弊甚于前清，余实不能负此责任。如诸公不便坚拒，则一切推归于我，由余折冲可也。余因使人告玛德曰，邮政总办之用法籍人固有成案，但从无由法政府推荐之规定，君之所知也。此次举荐某法人为邮政总办，不知是巴黎政府之意否？玛不能答。余知其内怯，乃曰，不知君之此举为邮政乎，抑为君之挚友谋一职业乎？如为邮政，则君所荐者从未办过邮政，今忽破坏邮政之良好习惯，用一异途为首领，恐彼此名誉均有大损，且亦非法国政府助我国发展邮政之初意。邮政中各国人均有，即法籍人亦有应升此缺者，铁士兰又并无过失，今若此将致内外哗然，余之不允亦为君计也。如欲为挚友谋一职业，可包在我身上，但不必定要此职。玛曰，并无为人择事之意，事竟中止，人皆诧焉。

邮政储金事业日形发展，逮南京政府时，遂视为财源之一，别立专局与邮政分开，成为银行之一大别动队，亦为各派系之目的物，不复顾及储金之本旨，竟成一盘烂帐矣。当年邮政总办沿海关旧例，月支薪水、公费、房屋、车马至四、五千元。余以邮政总局局长，体制应在其上，故一切待遇规定甚丰，但余兼任局长时并不实支，仅月支公费六百元。后任之局长刘符诚以专任为词，首请照支全数，月至五、六千元，后任交通总长竟予批准。刘符诚任职四、五年，了无建白，但积资极丰，当总办铁士兰谒总长时，竟为总办任通译，余闻之喟然而已。闻铁士兰在部司纵容之下，日形骄肆，大权在握，亦非余任局长时之奉命维谨矣。

又邮旗、邮票之划一及员工服式之规定等等，皆余所办，沿用多年，但知之者甚稀。溯自1896年3月20日，至1921年3月20日为我国开办邮政二十五年之期，余意我国应对世界有所表示，以引起国内外之注意，因议发行一种纪念邮票。乃先期由邮务司及邮政总局会商讨论，结果用大总统及国务总理、交通总长三人相

片为图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雕刻。两个半月始成，乃定以是年三月十一日为邮政开办二十五周年之期，发行纪念邮票，于是年十月十日正式发售，总共发出四百五十万枚。此不但为吾国创办邮政之史征，亦余与邮政关系之一种纪念也。周梅泉为吾国集邮专家，于晚年编订专集时，谆嘱余为之序，盖亦为此。

我是怎样向俄国收管东清铁路的

1920年10月2日，我在交通部总长任内时与华俄道胜银行续订合同，藉此接管东清铁路满洲里至长春一线，而由我国依原合同派一督办（自许景澄被西太后所杀后，我国并督办而不敢派。）主持全路，以替代了盘踞该路三十余年兼为白俄远东临时政府最高领袖的俄人霍尔瓦特，并使之离开哈尔滨而入北京。此事在当时颇震动世界听闻，而且对于俄国十月革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就此而解散了白俄远东政府，同时扼止了日本南满铁路的向北伸延的侵略计划。迄今事经三十余年，其中机宜措置及若干曲折，似乎记载很少，因此默思深忆，就所能回想到者成此一篇追忆录，非属自诩，惟期记实，以供历史家的取材，如有疏舛，文责自负，更望对此有研究的读者，指疵补正为幸。

回溯自前清甲午中日之战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示恩于我国，因而要求报酬。俄首先通过西太后订立密约，其中有准俄建造中东铁路一款。俄于大连、旅顺取得不冻港，因而引起德、法、英等国各种要求，继而导致日俄战争、英日联盟，美国亦乘机插手，我国内政外交则不断发生事件。该路由满洲里起入我国境，经哈尔滨、长春以迄大连、旅顺，其性质乃由俄自造，与内地借款兴筑者迥不相同。沿线有驻兵、设警及开矿、采木种种特权，乃至设立法院，而一切权利以沿线左右两旁各三十俄里为限。其大站如哈尔滨、旅顺、大连，用地至整个商埠，形同租界，正如一把长剑插入东三省心脏。日俄战后，俄割长春以南的

铁路让与日本，日本一沿帝俄之经营而更加深入，终至酿成“九·一八”，以迄中日事变及满洲国事变。在此数十年间，东清、南满铁路始终是帝国主义的一项重要侵略工具，其作用绝非仅仅为交通经济也。东清铁路在日俄战后分而为二，长春以南俄国割与日本，而长春以北仍属俄有，一切权利如故。我国当时政府似乎置之度外，于是引起南满铁路经营北满的野心，欲由当时北韩以通北满，有经营二线两港之说。时美帝国主义早有由勘察加注意东部西伯利亚之趋向，且有继承东清北段之意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即通航尼哥拉斯港（即庙埠），及经营萨哈连^①岛，我国未尝不知之，但力所不及，听之而已。既而，各国知帝俄势力渐弱，政变迭起，于是霍尔瓦特运动各国联合组织东部西伯利亚铁路共管委员会，并邀我国参加。我国不知是阴谋诡计，贸然应允，诂一议及管辖权限时，即声明包括乌苏里及东清铁路在内。该委员会以美国司蒂文森氏为主任，我国则以詹天佑为代表，其实一切仍由俄人主持，委员会仅能监理而已。但经此一来，等于各国已有监理东清铁路之责，益启美国插入东清铁路之野心，而霍尔瓦特挟此会以自重，益形骄恣，进而为政治上阴谋，遂产生远东政府等等事实，其时我国政府为英美等国所挟持，且任听霍尔瓦特等胡乱非为，致每年我国应付俄国的赔洋款本息等，仍照常支付，与战前一样。此时北洋政府忙于内战，又怯于办外交交涉。我当时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虽已结束，各国无力东顾，而俄国形势极复杂，如不于此时有所举措，待事定则难于变易。于是派人密侦，知东清沿线已伏乱萌，而我国中央及地方皆无所计划，仍在机陞因应之中，且趋势皆在于保存霍尔瓦特一面，措置极不妥当，如任用何丰林、张宗昌等带兵助霍尔瓦特及镇压工党等等。因思我方究应取何态度，大有研究，否则我国他日无论何方胜利，皆与我不利。且乌苏里与东清系属两路，乌苏里全线皆

① 或译萨哈林岛（库页岛）。

在俄境，东清全线皆在我境。其在俄境者我固亦可参预，在我境者则本来另有中俄互订合同，我有特别之权责，必须认清题目，方有文章可做。其时俄已等于无政府状态，我国应与何方交涉？无可认为对象者。继思及道胜银行本为订立合同之一方，尚可认为对手，不论当时内幕是何把戏，而该银行要为订约之一方，盖无疑义，如抓住该行最为得当。于是首先调查该行究竟是何国籍，及有无可以负责之人。旋知该行以沪行为中心，且主要人员多在上海。于是进行联络，微示拟修改合同之意，该行在沪各个均在风声鹤唳中，闻我国认其为对手，颇为踊跃。我遂请其举出可负责者叶节斯基来京，与之洽商一切，嘱其设法证明道胜银行确为俄籍，可以代表俄方，并须由法国政府正式证明（见附一）。其时该行亦正徬徨无措，得我国承认，不啻对俄法间关系有所保障，亦复欣然承诺。于是磋商一切，拟订合同草案，极为顺利。我亦只期先接管该路，一切条件无大苛求，其关键问题包括在该合同总纲内（见附二），并撤去其军权、警权、司法权。大体确定后，我遂赴奉天（沈阳）向张作霖详细解说，并指出要点：第一系全线均归我护路军保护，第二系全线客货均收中国货币。张闻之跃起曰，“真有这事吗？”我示以合同及附件全文，并曰，“待提出阁议，即全局俱定，请你好好选择护路军长官（后他派黑龙江督军鲍贵卿为护路总司令，事权统一），至于该路业务行政，千头万绪，我当妥为进行，望地方官有协助而无干预。”张拍胸曰：“那一定照你意思办，你要何人做督办？”我提出拟用王景春，因为其入办事结实，张亦同意。我回京后即提出阁议，并于合同签字，便完成了接管东清铁路文字上手续了。但霍尔瓦特并非一个庸儒的人，如何令其离开该路，颇是一个困难问题。霍尔瓦特建立远东政府自为首领，且与谢米诺夫等合作，搞种种政治活动，为当时全路工党所反对。我侦知其事，即利用此点，劝其离职入京，可以另予保护。他初不肯，继而工党势大，霍尔瓦特无兵无将，陷

于孤立，其所用汽车，一旦不知去向，他感觉危险，意渐动摇。我告诉他，如果来京，可保证身体及家属的安全，他乃允诺。我派人一路护送，招待甚优。到京后，我询其愿往何处？他云愿往使馆界，我亦听之。旋组织一个中东铁路研究会，请其担任会长，月送三千元，实则名誉职，藉此羁縻而已。未几霍尔瓦特病死，会亦取消。

对于路务之安排，我先已作好准备：(1)、督办就职第一事，即会同护路军长官命令全路员工，现收归中国自管时代，以保护路产为要，不能听员工有妨碍何项业务和损害路产的举动。(2)、全路客货均改收中国货币（所谓中国货币即是中交两行钞票，时未贬值）。(3)、薪工均照定期发给，不准拖欠。(4)、全路收入均存入中国的银行，非监察局局长（俄本设有监察局，我以留学俄国之工程司陈瀚任之。）核准不能开支分文。(5)、全路糜费太巨，由督办另立预算，非预算所规定者，不准开支分文。于是全路员工及当地工商业者，均大欣慰。盖曩时全路事务均用俄文俄语，各级职员因缘为奸。有请求的事至三、五年均办不到者，现一两星期即可解决，又不分道里道外，一律平等相待，空气为之一新。故第一年铁路收入及余利，即几加倍。案原合同之订立，规定八十年后中国即可赎回，而俄方有意永久占据，故尽量虚糜，令我国永远无法收赎，一切开支均以庞大为目的，虽缘中饱，亦政策也。斯时最困难者，为当日通俄国语文者太少，而向来内部日行公事均用俄文，致运输几乎停滞，幸早有准备，又对各中下级员工不分畛域，一律各仍其旧，故业务反形顺手，此亦运用得宜之一。

接管时各方顾虑纷纷，议论庞杂，国际上尤其幸灾乐祸，而木已成舟，无从破坏，数年之后形势益好。北满向来币制纷歧错杂，奉票以外尚有诸种公私乱发之纸币，币值低贬，已达极点，反而以俄国卢布票为正币，由铁路操纵，汇兑不通，人民困苦已

极。自铁路收归国管后，一律须用国币，不得用卢布票，如血脉壅滞之人，忽然大血管畅通，不但百货得以流通，并奉票亦提高行市，杂币均行摈斥，与津沪汇兑亦如泉流地上，循环周转，公私利便，不可胜言。因此引起军阀张作霖的震惊，而东三省民众亦皆认为奇迹，尤其是南满铁路和美国大为惊讶，遂蓄意制造对抗计划与行动。南满铁路总裁松冈洋右马上来北京找我，一面祝贺我的成功，同时表示南满铁路也可以由中国派一督办，而且说尤其欢迎我做。我答云：“不要说笑话，派督办不过是一个节日，要紧是许多大纲，我们慢慢商量吧，将来也许我会做南满铁路的督办，但是个人的事，不是彼此要商量的事。安奉支线等，不是中俄原合同所有的，将来应如何处置？还有中国对南满铁路入股的问题。”他说：“南满本来欢迎中国人股的，不过事实上无人入股。”我说：“照目前情况，自然中国人不愿入股。”他笑而不答，又说，中国政府如愿入股是很欢迎的。我也笑而不答。因为我认为时机和环境都还不到时候，而且那时的内阁总理是靳云鹏，绝不会主张与日本有何要求，无法可以进行。果然为时未几，我就去职了。

同时我很注意戊通轮船公司的事，因为中俄已往的老条约，曾有黑龙江上下游中俄两国均可行船的规定。俄国在松花江有不少轮船，而俄国境内中国却无一艘，因此我很想打开这一条航线。不料费了许多事，依然成空，这是一桩遗憾，不然水陆联络，到也大有可为。

当时西伯利亚北部，有一海港名尼哥拉士港，为黑龙江出海之尾闾，我国人名之曰“庙街”。因为那里早有华侨，并建一关帝庙，故有此名。美国有定期航船，吐纳量不小，而我国上下均不注意（虽然有不少华侨），这是和萨哈连岛互为呼应的。明朝在那里曾设卫所驻兵，清朝却无人过问，就无怪咸丰八年把河东六十四屯的地一概划与俄国了。我提出此点，正说明美国很久时候早

已注意东部西伯利亚，迥非一朝一夕的事，近些年来在太平洋和日本的许多问题，不过是更明显的暴露吧。

我国收管东清铁路，本系利用那个时机，变更许多成案，为得步进步计，故条文中处处留出地步。果不期然，大战一停，列国（尤其美国）便出了不少花样，借俄国国基未大定之时，便在东部西伯利亚出了事故。其时英、美、法、比、意各国，藉口于俄国内乱及维持国际交通，于1919年1月由日本与美国订一协定，并约中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加入，各派军队驻在东部伯利，称为协约国铁路委员会。并根据俄政府之请求（系指帝俄政府），辅助西伯利亚全线及东清铁路之运输，实际乃系各国欲乘机插手于东部西伯利亚，其时我国政府囫圇许可，且以加入为幸，而未察及东清铁路是何性质。直至民国十年（1921年）9月12日，美国公使以试拟“太平洋会议议事日程”交我国，其中戊项，为各铁路之发展，连同有关中东铁路之各计划在內云云，是竟欲旧事重提，欲将东清铁路浑包在內，而加以处理。幸当时已在我国接管之后，经我国代表顾维钧多方抗议，开会时各国并力诋缔续合同之不当，及我国接管后种种措置之不宜等等。惟我方态度鲜明，当开大小各种会议多次，时即知道英美日意之所在，已觉来意非善，故早有所准备。其继因我代表严鹤龄未被驳倒，遂又转主设一代表分会，以许士为中心。许士者曾任国务卿，前总统威尔逊之智囊也。意欲推翻1920年的续订合同，而以原合同及1919年之日美协定为根据。各国委员环攻猛击，我顾代表坚拒不让。其时中国代表另一提案，英代表健特士及美代表罗脱仍力加争议。其继日本代表埴原、法代表楷美娄云，本分会并无决定何合同有效之权，遂指定顾维钧与楷美娄会拟一提案。两人又屡经讨论，变为顾维钧，楷美娄、埴原三人，又经迭次修改，经过无数争执，顾氏遂另提一项声明。其后主席以各国所拟案（多系附和美方的）付表决，除我国外，一致通过。顾维钧之

声明，亦付表决，亦一致通过。其后双方提案或声明，亦经大会通过，等于无结果之结果，勉告结束。其实一场争议，并未解决任何问题，不过各说各话而已，事实仍系事实。迨苏联统一，其铁路监管会亦自然取消，足征各帝国主义存心插手西伯利亚东部和东清铁路之念始终未忘。或者可说至今仍然存在，实系值得注意的。

观于以上情形，足证如非我国于1920年乘机接管该路，造成既成事实，则所发生变化实不可知。且其实我国政策，仍在偏向英、美方面，朝野间欲倚美为长城者居大多数，故不敢与苏联交涉，以撻英、美之怒。幸签订此续合同，把路权抓回手上，并与赤塔的远东共和国的临时政府协定通车，继而有奉俄协定，中俄协定，始将各国共管东清铁路的计划打破。观于彼时我国政府当初之极力帮助霍尔瓦特镇压苏联工党活动等事，几乎全听美、日指使，其不至引狼入室，酿成共管东清铁路之局者几希！而在那个时期，能从容布置，脱离各方的罗网，保全我国权利，亦不能不说当事者之有微劳足录也。嗣收管不久，政局迭变，督办易人，余亦去职矣。

附一

道胜银行呈交通总长函

敬启者：前因会议东省铁路，关于贵总长所要求之事，业经电达敝总行。对于东省铁路公司全部股分属于俄亚银行之所有权，必须觅一证据，以为证明。此项复电及函件，业于九月二十四日由驻华法国使馆交到敝行，兹将钞件转送贵部。此项证据系由法国外务部经手寄来，确能证明东省铁路全部股分之所有权属于俄亚银行。此致 交通总长叶。俄亚银行（即道胜银行）兰德启1920年10月6日自北京发）。

驻华法国公使馆致俄亚银行函

径启者：前准贵行声称，关于答复北京交通部所要求之正式文件，为证明俄亚银行有东省铁路股分全部之所有权事。兹将法国外务部对于本公使所陈请，业已给予一切便利，使银行交付此项证据，得有驻伦敦之俄国财政部委员沙孟君签字情形，奉达台端。此项正式文件，业由巴黎俄亚银行董事会保险寄交贵行，兹附九月十八日法国外务总长兼国务总理寄发本公使电报一件，送请察阅。此项电报足以证实确系正式证据，贵行可向中国政府证明一切也。此致 驻华俄亚银行总理史纪爱斯基君。卜柏启1921年9月24日自北京发。

法国外务总长兼国务总理米勒霍致 驻华法国公使卜柏电

祈告史记爱司基君，所请求之证据现已照发，并祈将下列电文转交史记爱司基君为祷（阁下可于下次邮船收到俄国财政部委员沙孟君寄发保险信函之正式证据）。所叙原文如下：俄国财政部委员，即驻伦敦之俄国公使随员沙孟君，于此次寄发之信函，证明东省铁路公司全部股分属于俄亚银行所有。1920年9月16日自巴黎发。沙孟押、俄亚银行董事会押、米勒霍押。驻华法国公使照钞。

道胜银行呈交通总长函

总长钧鉴：敝人证明俄亚银行是股分公司，并是俄国国民事业，曾在俄京注册，特此声明。专此敬候日祉。北京俄亚银行（即道胜银行）兰德启。1920年10月6日。

附二

管理东省铁路续订合同（民国九年十月二日）

绪 言

中国政府

一、中国以库平银五百万两入股，曾经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与俄籍华俄道胜银行（即现今俄亚银行）合伙开设生意，订定建造经理东省铁路合同。

二、因东省铁路公司所欠中国政府五百万两之本利，加以中国政府接济该路款项之种种债权关系。

三、因俄国政治紊乱之故，致失其管理该路及维持秩序之能力。

四、因中国政府以领土主权之关系，对于管理路界以内地方之治安，维持世界公共之交通，实行保护该路之财产，暨整顿一切秩序，均有应负之责。

综上述之理由及责任，中国政府特于九年十月二日，正式通知该银行，声明中国政府决定暂时代替俄国政府，执行该路合同及现行章程之所有各项职权，并执行光绪二十二年所订合办东省铁路合同及公司原有现行章程所予之特权。此项代执行俄政府职权之期限，以中国政府正式承认俄国政府并彼此商定该路办法后为止，特续订本合同以资遵守。

兹于民国九年十月二日，中国政府特派交通部代表中国政府，与驻北京道胜银行（即现在俄亚银行及以后改组之银行）代表暂驻巴黎之道胜总银行，彼此同意订立以下条款，为1896年之东省铁路续订合同。

第一条：东省铁路公司（以下称公司）一俟本合同签字之后，务即立将应缴中国政府各款同价之铁路债券交与中国政府，此项债券性质，另函声明，其款详列于后。

(甲) 按照原合同第十二条, 该公司于路成开车之日, 应缴中国政府库平银五百万两。

(乙) 前项五百万两历年应缴之利息, 应自开车之日起算, 按公司章程第十六款, 每年照六厘计息, 并按息上加息计算, 至1920年为止。

由1921年起, 所有前项债款, 应照上文(甲)——(乙)两项之总数, 每年给息五厘, 每年支付一次, 此项铁路债券, 至中国赎路之时清还, 或由赎路款内扣还亦可。因上项欠款而发行铁路债券, 应以该路之动产及不动产作为担保。

第二条: 董事会董事九人之内, 除督办在外, 中国政府得派华籍董事四人, 不以有无股分为限。至于俄籍董事, 由俄人自由选举, 如遇中俄之数平均时, 督办除固有议决权外, 有加一取决之权。

第三条: 董事会法定人数, 以七人为至少之数, 所有一切取决, 亦必须得七人全体同意, 方可有执行之效力。

第四条: 中国政府得于稽察局之五员内, 派华籍稽察员二人, 其总稽察即由此五人中选举, 但以华籍为限。

第五条: 为该路管理便利起见, 所有华俄人员均应秉公支配, 受同等之待遇。

第六条: 公司以后所有之权利及所有之职务, 无论何款均应严行限制于商业范围之内, 所有一切政治事项均应禁止, 中国政府并得随时严重取缔之。

第七条: 凡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即西历1896年9月2日所订之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 及公司合同原有章程, 与本合同不相抵触者, 均为有效。

本合同共缮华法文各二份, 但以法文为主。

中华民国九年十月二日即西历1920年10月2日订于北京
代表俄国道胜银行(即现在俄亚银行及将来改组之银行)

驻上海道胜银行行长 叶节司基
驻北京道胜银行行长 兰 德
代表中国政府交通部

道胜银行呈交通部函

径启者：今日决议东省合同一事，曾经彼此同意，应声明东省铁路公司欠付中国政府之款，应用算式如下：（甲）按照原合同第十二款，该公司于路成开车之日，应缴中国政府库平银五百万两。（乙）前项五百万两历年应缴之利息，应自开车之日起算，按公司章程第十六款，每年照六厘起息，并应按息上加息计算，至1920年为止。兹因前项开车日期双方尚有争执，在敝行认为1907年，贵部认为1903年起算，是以欠缴之总数未能解决，现将此问题候双方查明证据解决后，再用专函证明欠缴总数，即本利两项之数。此致 交通部。

交通部致道胜银行函

径启者：按贵行函称，今日决议东省铁路续订合同一事，曾经彼此同意，应声明之款如下：一、董事会会办仍以俄人充之。此外并添帮会办二人，华俄各一人，仍由董事中选充之。惟俄籍会办离职时，当由俄籍帮会办代理之。一、管理东省铁路俄籍局长外，另设华籍副局长一人。一、所有工务、机务、车务、会计四处俄籍处长处，各另设华籍副处长一人，以资相助。此外如董事会认他处应添设副处长时，以华人充之。以上各条，本总长均表同意，特此函复。顺颂 日祉。

交通部致道胜银行函

径启者：接贵行函称，今日决议东省铁路续订合同一事，曾

经彼此同意，应请钧部通知东省铁路督办于十月内召集该路股东大会，以便另行正式组织新董事会，并纯以商务性质另行整理路事，此后股东大会按照公司章程每年举行一次等因，本总长均表同意，特此函复。顺颂 日祉。

交通部致道胜银行函

径启者：来函声明，今日决议东省铁路合同事，曾经彼此同意，应声明之款如下：一、临时添设之坐办决计取消。二、所有临时添设之各缺，凡不在公司章程内所有者，一律取消。以上两节均悉，并特复函声明，本总长同意。此致 道胜银行。

交通部致道胜银行函

查光绪二十二年，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第一款内载，所有股票只准华俄商民购买等语，是华人有购买该路股票之权与俄人相等。又该路章程第十款内载，公司股票本金之总额定为五百万卢布，共分一千股，每股五千卢布等语。为此根据上项两款，中政府要求道胜银行将该路股票让与华人一半，即二百五十万卢布。磋商多日，双方争持无决。中政府特声明，对于1920年10月2号所订合同虽许签订之权，而于要求购买股票一层，仍得有续议之权。相应函达，即请查照，并希见复为荷。此致 道胜银行。

道胜银行复交通部函

总长钧鉴：奉到今日来函，声明中政府对于1920年10月2日所订之合同，虽许签订之权，而于要求购买东省铁路股票一层，仍有继续提议之权，敬悉，并以备案。谨复，敬请钧安。此致 交通部。

道胜银行呈交通部函

总长钧鉴：遵奉钧意，敝行应用本函声明者，俄亚道胜银行（即前华俄道胜银行），系股分有限公司，纯系商办性质，对于俄国各政党并无牵连之关系。尤特声明者，东省路事，除华俄两国外，并无第三国之关系，特此声明。敬请钧安。

交通部致道胜银行函

径启者：中国政府（一）因以库平银五百万两入股，曾经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与俄籍华俄道胜银行（即现今俄亚银行）合伙开设生意，订定建造经理东省铁路合同。（二）因东省铁路公司所欠中国政府五百万两之本利，加以中国政府接济该路款项之种种债权关系。（三）因俄国政治紊乱之故，致失其管理该路及维持秩序之能力。（四）因中国政府以领土主权之关系，对于管理路界以内地方之治安，维持世界公共之交通，实行保护该铁路之财政，暨整顿一切秩序，均有应负之责。缘上述之理由及责任，本部特代表中国政府正式通知贵行，声明中国政府决定暂时代替俄国政府执行该路合同及现行章程之所有各项职权，并执行光绪二十二年所订合同及公司原有现行章程所予之特权。此项代执行俄政府职权之期限，以中国政府正式承认俄国政府并彼此商定该路办法后为止。即希查照见复为荷。此致 道胜银行。中华民国十九年十月二日。

附三

顾维钧之声明

（见交通史路政编第六册3942至3944页）

中国代表团以为中东铁路问题与各国发生关系始自1919年协约国所订之协定，经中国暨参与本委员会五国加入在内。

中国代表团于讨论此事有数项要旨，应请注意。其一、监督西伯利亚全线之经营，连同中东路在内，既规定于协约国订立之协定，今若对于中东路另定特别办法，使中国不免发生疑虑。其二、中东路之重要关键，在连接欧洲与太平洋之交通，故无论何种协定，如不将接连欧洲之西伯利亚铁路及能达海口之乌苏里铁路包括在内，则其价值亦自有限。其三、该路之线全在中国领土之内，中国主权应予保障。

中东路之由来与其性质，暨该路与中政府之关系，本席不欲赘述，因此各节，业已载入中俄数种协定及中国与保有该路全部资本之道胜银行所订合同内。

依此三项要旨，（即按照1919年协定，对于中东路不能另定特别办法，暨关于中东路任何协定，如不施行于能达海口之乌苏里铁路，则无甚价值，并无论何种办法，如与有利害关系之中国之领土主权有所抵触，不应成立。）先经中国代表团之代表，在专门分股委员会，复经本席亲在全权代表分股委员会与各国代表协商可以实行之办法。有一时间，主席指派预备讨论，根据之楷美楼君与本席共同拟成一草案。当时本席以为此事，可以意见一致，旋经提出分股委员会，乃其他代表意谓必须加以删改，而此删改之处均与本席所述要旨互相抵触，分股经此种困难与复杂情形得一结束，各项由罗脱君向委员会所报告者。

又第二案内载，中国以外各国保留权利，要求中国能否履行义务担负责任云云。此自属各国权利以内之事，非本席所得加以评论。本席惟愿将中国意见，关于中国与该公司之关系略述数语。该路法律上地位，已明白规定于中俄各协定及中国与该路暨道胜银行所订合同，此后复与该公司订立合同之内所有该路内部改组事宜，均照一定手续，且时常查照1920年10月2日中政府与道胜银行新订合同办理。

本席固知本委员会不愿讨论此合同之事。本席亦不愿讨论及

此，而所以追述及此者，不过作为一种报告，并表明中国政府，先经调查明白，确知道胜银行可以代表该路一切股东及所有股份。且法国政府亦曾为之证明，是以与订新合同。

至中国所负代管责任之范围，自以从前俄政府按照中俄协定行使之职务，与中国现因俄国目前尚无正式承认之政府，暂代行使之职务为度。故于此范围以内，亦可谓中国担负俄国政府与该路公司关系上原有之责任也。

按之目前实在情形，该路固有改良之余地，犹之世界各铁路无不有应改良之处也。惟中国政府所遇之困难极大，因俄国政变与其内乱，致在该路区域内发生意外问题，俄国工人屡次罢工，红白两党互争，该路所有种种详情，毋庸赘述。谅本委员会各代表犹能忆及，1920年该路总办霍尔瓦特将军取非常办法自任为该路区域内之最高总司令，行使政府取权之事。

自始迄今，每遇一次事变，中国官吏必竭尽心力以应付此艰危时局，使该路区域内各界人民至今得以安居乐业，外国报纸如何确信，不难复按。中国政府按照与俄政府原订合同条款，已尽力保护该路与该路服务人员。倘如此保护犹有数国以为尚未十分完善，则其咎实由于俄国政治纷扰，较之由于中国方面有何不能毅力完全履行其义务所致之为多。其实当西伯利亚各路腐败情形达于极点之时，而中东铁路有此保护，当能照常通车。故本席敢望委员会于考量此第二案时，将本席所说明者一加注意。

洪宪帝制前政事堂的产生 及其有关各人的活动

袁世凯为了洪宪称帝一幕，其计划是有其步骤的，第一是做种种准备，先为此铺平道路。乃于民国三年（1914年）五月一日，在解散国会之后，公布修订的《约法》。六月一日，即宣布废止国

务院官制，于总统府下设立政事堂，任徐世昌为国务卿，杨士琦为左丞，钱能训为右丞。钱能训固为徐任东三省总督时之参赞，而杨士琦在政事堂之权力实在钱上，而且颇能左右徐氏。按国务卿系仿照美国制，而美国之称谓实为总统的秘书长，日本译为国务卿。袁氏用其制而变其称谓，一若特别隆重徐世昌者，令人称为相国，其中亦暗示帝制之规模，不同民主。经此改组后，进步党的熊希龄及掌财权的梁士诒，遂一打两脱矣。农商部总长张謇，财政部总长梁启超皆先期去职，可谓见机而作。熊希龄、梁士诒二人，则陷于被动，亦由于地位所处不同。传闻在解散国会之前，袁氏曾以查办热河行宫盗宝一案的文书故意放在桌上，而召熊希龄入府，使得见案由，而不知内蕴，意在恐吓逼迫，然后出解散国会的命令示之，熊只得以国务总理资格副署。对梁士诒则以五路参案明白威胁，使其不敢不赞成，故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注有要头抑或要脸的比喻，人皆认为贴切。闻颁布政事堂命令之前一日，梁士诒奉袁命将此事告知熊希龄，熊犹狙于外间传说，以为必梁任国务卿，因问国务卿为何人？梁答以徐东海（世昌）熊始愕然，继而恍然。外间皆谓熊之粗疏，而不知梁之粗疏亦不逊于熊也。1915年9月6日，袁氏特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代表，在代行立法院发表对于变更国体之宣言。此为袁正式宣布施行帝制之第一篇文章，为极重要的文献，于此亦具见杨士琦地位之重也。旋于同月十九日，由沈云沛发起全国请愿联合会，推沈为会长，那彦图、张镇芳为副会长。沈云沛为江苏海州人，在前清时以翰林院庶常忽任农工商部左参议。民国时，袁氏强令交通部派沈为浦信铁路督办，与杨士琦之弟士驄为儿女亲家，与张謇有江北二霸之称。余为铁路总局局长，循梁的办法所执行者，为借款各已成铁路之督办，凡建造中的铁路，向不过问。故津浦、陇海、浦信、川粤汉等铁路，皆另有督办，一切事皆与铁路总局划分，几为老例。

袁世凯与杨士琦之关系有悠久的历史，今略为追述之，以见其渊源有自。袁在北洋初期，对外则恃赵秉钧、唐绍仪等，军事则恃刘永庆、王英楷等，财政则恃陆嘉穀、周学熙等，此乃人所共知者。与其有极密切关系而参与帷幄运筹者，尚有杨士骧、杨士琦兄弟。杨氏安徽泗州人，向走淮系李鸿章、李瀚章兄弟之门。袁虽豫人，亦属淮军系统，为李鸿章所赏识。杨士骧字莲甫，以翰林居李鸿章幕府，助订辛丑和约，极得其力，经李鸿章密保，故不数年官至山东巡抚。及李死袁继，二人更密切结合，迨袁入军机，即以莲甫继北洋大臣之任。杨士琦字杏城，行五，人皆称为杨五，以举人出身，多计谋、善策划。袁任北洋大臣时，欲练兵办新政，苦经费不足，杨五乃献策，尽收盛宣怀所办事业，以给用度，遂以候补道而升为候补四品京堂，督理招商局电政大臣，更任商部左丞，洊升侍郎，为庆王奕劻及袁世凯所极倚重。时庆、袁最大政敌为岑春煊及瞿鸿禨，此二人颇得西太后那拉氏之信任。袁于引进徐世昌与二人相抗之前，亟欲拉杨士琦入军机，而那拉氏意不甚属。杨是时竭力奔走庆、袁及李莲英间，专为沟通联合，以图推倒岑、瞿。世传伪造康有为与岑春煊合拍照相及找恽某上折参瞿鸿禨之事，皆杨五所为。其他阴谋诡计尚多，此不过举其显著者耳。当时京师文人中颇流行诗钟之戏，有人以奇态二字作嵌字诗钟云：“弟兄岑氏奇皆好，姊妹杨家态最浓”，皆用杜甫诗意，上联指春煊、春冀，下联指士骧、士琦，一时传诵。及那拉氏死，袁世凯被逐回籍，命下之日，袁坐三等火车潜踪赴津，意欲与北洋大臣杨士骧密商善后，而士骧恐受牵连拒不见面。袁颇怏怏，狼狈而回，自此对杨氏兄弟怀恨而疏远之。逮辛亥年袁世凯重组内阁，杨五虽得为邮传部大臣，而袁氏对之宠信大减矣。辛亥革命起，南北议和，北方以唐绍仪为代表，杨士琦副之，二人同到武汉。其时英国怀对俄夙怨，欲藉革命火焰以倒清拥袁，唐先有所知，因此不主张在汉会议，要求

迁沪，以便造成推倒清室建立共和之局，而杨士琦颇不以为然，（张国淦论此事曾云，唐主张共和，而杨主君宪，故致水火，并注明杨所主张君宪，非欲扶清之谓云云。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洪宪纪闻）其意殆欲当时便拥袁世凯称帝立宪，以示忠诚而弥前憾，谚语所谓打铁须趁热也。然唐绍仪是极力主张共和国体者，与孙中山、伍廷芳均契合，又有国际上支援。杨非其敌，故愤而辞职，不再参与新局，因而隐居者年余。共和成立，由于汪精卫等的串合，劝孙中山辞职让袁，（此有很大内幕，当别作记载）袁亦姑从之，实非本意也。一部分北洋军人主袁直接搞帝制，不必再作迂回，以唐绍仪在北洋时，向来看不起一班护兵马弁官僚，尤藐视段芝贵等，皆含怨恨，终日在袁侧媒孽唐，谓其偏帮同乡，有意自己活动，心不可测。故袁氏上台后便心怀疑阻，遇事与唐齟齬。唐不知就里，以为袁氏出任总统，中国确有希望，欲举责任内阁之实一抒其抱负，而不知袁之内心别有打算，故遇王芝祥一触即发，与唐数十年交谊和成绩一笔抹煞。至此时唐感觉有危险，遂拂袖离京，从此结束了袁唐的关系，实皆有人从中播弄也。袁氏的表弟张镇芳字馨庵，于五路参案时曾将袁世凯与杨士琦关系与我详言过，谓“老头子（指袁氏）对杨五并不器重，不必怕他”。因为当时外间皆传说梁士诒与杨士琦为劲敌，馨庵故有此语。馨庵是时欲组织盐业银行，原拟议为官商合办者，因与交通银行不甚融洽，欲挽我从中调解，故倾诚相告，殊不知我向无预闻交通银行的人事，并不能有任何力量也。

梁士诒与袁之关系，系由唐绍仪推荐。辛亥南北议和之际，袁氏正倚重绍仪，同时亦遂重用士诒，且当时北洋旧人多星散，故得任府秘书长。及唐下台，形势已变，而梁未能憬悟，又自命有一套理财手腕，以为在袁氏手下可以发抒，至少在理财上可有成绩，不知袁氏视之仅为一个可以筹款的人，且因唐之关系，诸不放心，实际在形势一变后即已不安于位矣。袁氏之尽收盛宣怀

所办各事业，实杨士琦所献计，前已言及，继改官制设立邮传部，统辖路、电、邮、航，而以唐绍仪任侍郎。且其时船、电等多已归隶农商部，因邮传部之设，遂移归邮传部，而杨士琦是在农商部，因此引为大憾。唐知其故，恒周旋之，并以女妻杨子，结为亲戚，但无济于事，终至仳离。又值南北议和，意极相左，遂成水火。迨辛亥革命后袁氏当选总统，唐绍仪任内阁总理，而杨温温无所试，嫉妬更深，故唐之下台，杨实与有力焉。唐绍仪既倒，怨毒遂移集梁上谳，又值北洋旧僚蜂拥而至，皆有所欲，袁皆推之于梁，梁成为众矢之的，势所必然。有一次（记不清年月），袁忽欲命杨士琦长交通部，其后不果，杨疑为梁所阻（其实无此事），恨之刺骨。嗣窥知袁克定内幕，乃通过徐世昌与克定款洽，两人一拍即合，遂演成改设政事堂一幕，事前梁固一无所知也。一说，政事堂之组织皆徐世昌主张，杨士琦、钱能训皆徐所援引，亦有可能。徐为东三省总督时，坚欲以杨士驄（士琦之弟）为京奉铁路局长，其原任局长为天津人于煖年，并无过失，梁欲维持之而徐不可，致梁极其为难。政事堂一幕揭开后，梁乃被一闷雷，又不敢辞税务督办之职，貌为恭谨，嗣以袁命迁居府内，又不敢不从。闻其家人言，最困难者为每日伙食，须辗转托人购办。时余以五路参案故，半载不与梁见面，且不通邮电。他处记载，有谓梁虽无秘书长名义而办府事如故，实无此理。袁虽做事横霸，但日行之事各有专司，梁虽居公府，实同监视，非袁特派，岂能丝毫过问，至仍称为秘书长，乃当时官场习惯而已。至内史一职为总统的私人秘书，阮忠枢之为内史监，仅司奔走撰拟，与政事堂固毫无关系也。杨既为左丞，众皆谥为左相，杨亦泰然居之，据唐在礼对人言，袁支付特别费与杨，为所有人之冠，动辄数十万元，其权势实与赵秉钧等，又兼为大典筹备处长（世传朱启钤者误）。

杨士琦未入政事堂之前，恒居上海，暗中指挥操纵一切，杨

善德、郑汝成等等即其所引。居恒表面上与诸文人往来，实则均有作用，赵凤昌、王存善、蔡乃煌皆其著者。蔡乃煌前之伪造岑、康照片，后之收买印土，计划皆经杨手。至于沈小宜之勾结报馆，（袁月送八万元）亦与杨脉络贯通，故尔时东南文坛趋之若鹜，且博好士之名焉。其后张一麟为政事堂机要局长，以北洋幕府老资格不大买杨的帐，遂出为教育部总长，实亦杨之把戏也。至于五路参案，亦徐世昌、杨士琦等所构成，则更不待论，容当另文记之。洪宪事败后，杨乃从容出都，若无关系者，论者不能不服其立身之巧，藏身之固焉。杨居沪不久，得病去世。

我参加孙中山先生大本营之回忆

1923年孙中山先生任大元帅，开府广州。余以避直系曹、吴凶焰，方居于神户（我本不欲出国居日，以其实曹、吴方受美帝国主义操纵，欲以武力统一南北，故暂居神户，以读书著述为务，交通救国论即成于此时）。一日，有友人来访，致中山先生之命，欲我回粤参加革命大业。谓曰：“余知叶君非常人，虽不争权位，然爱国必有同心，预料今后全国将益糜烂，两广尤在水火中，旅日岂为长计。”我味其言良信，且既备尝与一般官僚军阀委曲周旋的滋味，何必恋此泥坑，遂决计经香港入广州谒孙。到广州之日为五月十七日。是晨适沈鸿英奉曹锟、吴佩孚之令，攻广州市，已进至郊外白云山，炮声震地，火光照耀省河。时交通未断，秩序尚好。大元帅府在河南，余入见，中山先生时方指挥调度，汗流满面。曰：“君来甚好，但省城现势危急，君非战斗员，如怕，或先回港亦好。”余曰：“如怕即不来矣。”中山先生笑曰：“有是夫。”下午各军并力，已击退沈鸿英军，余再往见。中山先生延入密室，屏左右言曰：“余请君来，非为一地一时关系，不料省城情况忽紧，不得不先其所急，但大计不定，枝节何裨。君知我约

君回国之大意乎？曹、吴之指使各方攻我，其背后尚有主之者，而我内部干部，派别分歧，政策之执行，固不能贯彻。即行政事务，亦互相牵掣，各为其私，其何以济？君既意志坚决，我想将一切政务事务，交君主持，我专务其大者远者何如？”余闻之出于意外，惶恐无地。稍息，余心神略定，乃对曰：“余以一党外之人，未尝追随先生从事革命，（时对中山皆称先生）且军务尤非所习，怎能当此大任，且先生何为而出此言？目下军队虽然庞杂，财政更形枯竭，党内诸先进或不尽互相融洽，然对党纲政策及先生命令，当不致违背。且精卫、汉民随先生有年，即有不合，亦不致有大出入。”言至此，中山先生欲言又止，旋曰：“今且姑谈应急之策，今孤守广州，财源将竭，君意计将安出？”余曰：“余去国经年。离乡廿载，情形极为隔膜，容细思奉答。”旋晤廖仲恺、徐固卿及汪精卫等，始知一切梗概。即夜赴香港晤商诸友，始明国内外资本家心理及市场气氛，皆对革命事业不利。余意对财政只能以散兵作战，姑且从吸收游资及外援入手。所谓外者，乃党外、省外或国外之外。但远水难救近火，将若之何？正踌躇间，廖仲恺再三劝余不宜推托，遂定只任大本营财政部长，较为凌空。而粤省财政厅，则以邹鲁任之（后闻粤省一切财政及官营事业多由胡清瑞（汉民之兄）一派入包办，此辈操纵官商之间，已成积习，闻余至将群起抵制，用邹所以缓冲，以邹较与彼等通气，且邹已定以胡为财所顾问，几代邹执行职务也）。余意欲缓和一般人对革命事业不利之心理，必须先减少人民各种痛苦入手。时徐固卿绍楨为内政部长，乃与之联名宴请省城各界，征求意见及请求协助，结果反应不大，然对革命意义，经此解说，却渐有认识。余于是赴港及派人与津沪各银行界、工商界及各华侨所在地联络，然反应亦不大，后不得已介何东与汇丰港行（港为其总行）面谈种种，亦无良果。始余觉资本主义确有其有形无形之壁垒，而国内外资本家之另相结合，亦有其心然之趋势。且资

本家亦必各有其政治上的方向与后援，而与狐谋皮之终归无用。当时，又为欧美帝国主义在我国利用曹、吴的积极时代，其不肯帮助中山，固为必然之势。左思右想，姑且从反对曹、吴的一方面作些打算。因此想到段祺瑞、张作霖虽同是北洋一系，但和曹、吴是不两立的。此外则是徐世昌、冯玉祥，但对曹、吴不一定是对立，于是赞同中山暂同段、张两方面联络，以反对曹、吴为共同目标。因此从中奔走的人不少（自然我也是其中一个），但结果段、张两方面的反应却各有不同。段虽表面上作政治上的周旋，而军事上却并不放松。张则曾对经济上作多次的帮忙，而其他却别有打算。犹忆一九二三年，中山曾命我与段、张有所接洽（那时曹、吴尚未失败，且日谋进攻西南革命地区），交与我一个建国纲领方案（大约系李协和起草，而中山自行定案者，其中分建国军与建国政府两大部分。其原件存在我的沪寓，因抗战时淞沪沦陷，我即日单身出走，不能携带，遂与其他文件数箱，一同被毁），大致系军事上合力消灭曹、吴，政治上孙、段商定分工，后因段一方面内部文武已极分歧，拟先与张作霖、卢永祥商有轮廓，再行向段提出，于是先往杭州晤卢，征其意见（时齐卢之战尚未发生）。大约汪精卫、许汝为因有所闻，要求同往，余不能拒，遂同见卢。卢因人众，未置可否。隔旬日余再往杭晤卢，卢主先解决对曹、吴军事。继往奉晤张作霖，张亦谓应从三方面合力讨曹、吴入手，否则政治亦属空谈。于是三方军事合作，逐渐形成。其时助曹、吴之帝国主义者，为之恐惧，加紧从事破坏，遂有上海齐卢之战、广州商团之变，然三方合作之局迄未动摇。冯玉祥回师北京，曹、吴遂彻底失败矣。第冯玉祥虽然拥段，然却别揭国民军之旗帜，且颇得人望。冯又请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北上，沿途有三次电报与余，余皆未得见。又段派许世英任招待中山先生，而未及余，殆均有电也。中山先生到津时，地方招待情形，极为疏慢。民众及工人、学生均不能接近。到行馆少

息，中山先生即往拜张作霖。时在坐者张作霖与张学良、吴光新、杨宇霆、叶恭绰五人。中山先生对张表示谢其历年相助。张当场表示：“我是一个捧人的，可以捧他人，就可以捧你老。但我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我不辞流血”云云。孙先生归行馆，幸几旧病复发。其后入京，与段迄未晤面，此中关键，有无国际背景，很难决断，亦说不到政治合作矣。不久中山先生病歿北京，我与孙先生之关系遂告一段落。

孙中山命我往东北的佚事

当1923年（民十二）孙中山命我往东北，有一重大使命。那时孙中山正当开始与苏联接触。因所处之境颇感于孤立无援，有意在北方开拓天地，拟以北满为根据地，以便与苏联联系。又以为张作霖在东北多年来受日本压迫，而张氏并非甘心俯首听从日本驱使者，或有可能接受孙中山的计划，共同合作。但据我的考虑，张作霖固然受日本欺压而其实正坚决反对直派，但张氏非能深明大义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若向其提议，必无效果，反生裂痕，并将对反曹、吴之举亦会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我无法进行，只说了些希望资助的话。及直系失败，英法美等帝国主义似有联络张作霖倾向，而以反苏反共为条件，张氏似乎为其所惑。迨孙中山由南方北上到津与张相见时，张氏首先表示反共的态度，且对进步思想毫无了解，遂至孙张合作益属无望，而中山亦遂去世。查奉俄协定乃张氏欲维持日苏势力平衡之手腕，而英法美之对东北不能有何协助之处，张氏固亦知之，但误受诱惑，终至失败身死，中山的此一使命我迄未能提出，颇足扼腕！我以往未曾与人说过，今持记之。

一九〇〇年五月廿一日汪嘉棠致 刘坤一函稿书后

此一九〇〇年（即光绪庚子年）五月廿一日汪君嘉棠上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密信稿，前年有一汪君，由上海钞寄的。我不识此汪君，其和汪嘉棠是何关系，亦不之知，但可信其不是伪造的。汪嘉棠号叔芾，时为江苏候補道，会办洋务局。我于前清曾见过一面，亦不悉其为人如何，但就这信稿看来，有如下的感想和推测。

义和团事件与甲午、戊戌各事件，实皆是帝、后暗斗的延展，其后更有英俄国际竞争的存在，这是按照当时的形势和近年发见的历史资料，几乎是可以完全肯定的。而东南互保协定，则是以刘坤一为首，而张之洞及李鸿章同意而成立的。这三个人各有其历史和政策，刘坤一是湘军仅余的一个重心，是反对太后废立的。张之洞一向是站在太后一面，但位在长江上游的湖广总督，公私内外，均极难处的。李鸿章则方任两广总督，虽不欲入帝、后斗争的漩涡，而国际却颇重视他，且本心和张之洞、刘坤一一样，不愿奉行太后乱命，以致兵连祸结，不可收拾的。因此，东南互保协定遂以产生，但两江总督辖境，在长江下游。当义和团发动之初，南北消息隔绝，中外关系，不绝如缕（西太后召开大会议，表示决定开衅在五月二十日，即汪函稿所指之昨天）。其时刘之焦灼，可想而知。其接晤孙领事、韩税司，是否此两人请见，或应刘之召，无从悬揣，但刘之徬徨无措，急求得一决策，是显然的。观函稿云云，似英派兵舰入江保护一节，殆出自刘之请求，故汪君以为不妥，而促刘之慎重考虑。其后互保协定成为与各国共同之约，则英自不能单独行动，似乎这一段经过，遂化烟云。观惜阴君所述（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一

文，略可概见。但英视长江流域，为其囊中物，则未尝不因此变本加厉，这乃自然的结果。观汪君于光绪甲辰对此函稿之加注的第二节，似这事仍有一段尾巴。但实际情况，须别加调查，推测起来恐又缘此造成别的新因，亦在不可必免之列，此不赘述。至东南互保的协定，不啻表示清朝统治力量已完全衰退，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逐渐酝酿其在政治上、经济上之发展，形成一个新阶段，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事。就说旧民主主义革命，由此发源也不为过。

此文竟旋得见《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九册第二章，内载义和团事件、各税务司与总税务司的报告。其中金陵关税务司韩森致赫德的文件，详述与刘坤一及汪嘉棠等来往商议情况，正可与汪致刘信互相参证。揣刘坤一所以如此，虽韩森有挑拨之迹，亦实由刘对西太后印象恶劣，见感觉责任重大，又完全未明北京真象，故激而出此，然言外可以揣得：一、当时帝、后两方实分拥英、俄为援；二、社会上对西太后印象之坏，当时国内外实有不少人主张拥光绪而抑西太后；三、英国对华外交以赫德为杠杆，能于任何时控制一切；四、当时以夷制夷之策深入人心，朝野均有此倾向，故帝国主义得售其技；今天追溯，犹令人耸然。

附录

汪嘉棠与刘坤一的密信

敬密禀者：窃以时局瓦败，国家心伤，调护南洋，惟宪台是恃。昨午接晤孙领事、韩税司二君，倾心画策，为国为民，侍谈之余，莫名钦佩。至愿英派兵舰入江保护一节，如与他人议及，只可云英自欲派兵轮护商，未便阻止，转启其疑，似不必明露本旨。□□恐互相传述（且易滋各国之忌），心迹莫明，事定则食德而不知，事乱则归过于当轴，清流之诮，不可不防。近时李合肥、张南海皆坦白为怀，当世之杰，而卒不能逃清议如此。翁常

熟初主清流，既主译署，则时局之不可为，深悔前非，力持大局，乃竟身败名裂，为天下人笑，谬悠之口，谁谅苦衷。宪台封疆数十年，勋威昭于史册，亦所宜计。□□不揣冒昧，妄贡管窥，惟宪台鉴之，悚惶密禀。祇叩钧安 □□□叩禀。五月廿一日亲缮呈讫。

病假中捡旧笥，见庚子五月上刘忠诚公密禀稿，尚记次日谒公面谕云：“昨函已阅，你实爱我，可感可感！”抚今追昔，能勿潸然。 光绪三十年申辰四月八日嘉棠谨识

复记：彼时孙领事向岷帅磋商，以美将派兵至沪（其实美无此事）保商，英亦欲派兵三千，以便抵制（自英派后，各国效尤，无法禁止）。某日衙参与恩方伯同见，愚窃以为，宜先电上海余道酌复，比蒙帅允，甫下官厅片刻，即由巡捕传谕英派兵之事，可不电沪道，即如其请云。事机一失，遂致催令各国退兵迟之又久矣，向使先由沪道，必破阴谋。同时追记。

故宫所谓第一次盗宝案的回忆

一九二四年冬（民国十三年），国民军冯玉祥派鹿钟麟执行溥仪迁出故宫一案，若干年来，外间不少风闻与传说。到现在虽都已成为过去的历史遗迹，但是其经过内幕，似仍有一谈之必要。故宫博物院庄蘊宽做院长时期有一个久任秘书名叫吴瀛（已去世），做过一部《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以下简称《经过记》）一书，其中记载皆系亲身经历，但他只记载一般事实，至那些事实的因果和内幕，似尚言之未尽，因此我想注释和补充一下，凡已见《经过记》的，不再复述。

我们在谈故宫经过之前，首先应知道故宫里所有的文物何止百十万件，可说是汉、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历朝

文物的精华总汇，若加以清查处理，确为极复杂而又困难的问题。况且清室本无清帐，事权又不统一，人事互相袒蔽，数百年来，即是鼠窃狗盗的大巢穴，其黑暗弊端，外人所不易察觉。自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溥仪等迁出宫后，即组成“清室善后委员会”，十二月廿三日开始点查，这不能不算是迅速了。其时订有“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物件规则”十八条，规定点查手续甚为严格，以防流弊。在讨论规则时，最初称为“处置”，嗣改为“审查”，又改为“清理”，最后始定为“点查”，其中出入颇大。以后始终采用“点查”二字，在几次纠纷之时，势抱定“点查”二字的原则，令一般打算掠夺故宫文物的人，无从下手，这是对于保全这一批文物有极大的力量的。按“点查”二字之所以重要，实因各文物散在仓库和各殿廷座落，乃至膳房、下处、床榻、箱笼、壁角、沟渠、过道等处，无乎不有，集中已不容易。有原来储藏陈设者，有预备偷窃先匿暗处者，有取阅后未归还原处者，有风声不好时宫中预先密藏者，有以赏赐借阅为名暗中移出者，有串通银行古玩店公然抵售者，若不逐件点查列目，则无从着手处理。据我所知，后来故宫正式编目时，只瓷器一门请了若干专家，闹了上十年，尚未能十分确当。盖不但某代某窑不易识别，有时连其器的名称尚难确定，书画铜器更费斟酌。至今不知是否已经完全审定编出一清楚正确的帐目。设三、四十年前仓卒处分，其流弊可想而知。

段祺瑞在津尚未就执政之前，闻知国民军接收清宫，溥仪等迁移出宫之事，颇不以为然，但亦仅因鹿钟麟等执行一切，举动态度略为粗糙而已。清室内务府及一部分旗族亲贵和遗老闻知，遂想利用此点，就陈宝琛等通过梁鸿志向段祺瑞陈说，故甚其辞。段本不知真相，且一向罕阅公牍，故彼等得上下其手。我记得是年十一月某日，段在私寓召集许多人谈话，谈到故宫物品宜早日解决，段说：“你们看看凡不涉及有历史关系价值的，可交与溥

仪，其余皆归公”。当时与会的人皆默然，我感觉其不妥，因说：“执政所示原则甚当，但有一前提，故宫物品约百万件，向无清册，且未办交代，今如不先点查清楚，而遽行处理，势必随时抽提移动，将益增纠纷。如逐室执行，将由何人判断，如专派大员数人充任，则责任太重，何人能负。如各室同时执行，则困难滋甚，现在外间谣言已很多，如仓卒处理因而生出流弊，恐政府亦担不起。所以我看必须先行点查清楚，方可议及处理。缘此百十万件物品，不比我们现在一间房间寥寥二、三十件东西，且系无大价值的，顷刻可以解决，故非详查后不可遽然处理。”在座诸人多以为然，段亦同意我的意见。于是彼辈之谋受一顿挫，否则，即将根据段的话笼统处理，必将弄得一塌糊涂了。我当时告知故宫负责人如沈兼士、陈援庵（垣）及他人，因遂决计抱定“点查”两字作文章。彼辈于是又别生一计，弄出阻止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之举。以临时执政府秘书厅名义函内务部暨京畿警卫总司令部查止。且以点查二字系由我提出，故转而恨我。我当时与李石曾、冯玉祥、鹿钟麟、易培基、黄郛等毫无来往，但以保全此宗国宝不受损失为宗旨。至今回忆，若当时以事不关己默不过问，听其自然，则此大批物品早会拆无片段，是我之受彼等忌恨，亦甚值得。

他们因所谋未得逞，复因社会上传说故宫盗宝，其种种谣传甚炽，因而又向段进言，并串通内务部，谓故宫事应划归内务部主管，不需设一独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遂因以酿成内务部的种种把戏。《经过记》所记甚详，但不知背后有提线者在。某日举行执政府会议，内务部公开提出，故宫办理不善，但所据者只是外间传说。我当时亦出席会议，我说：“我亦有所闻，但另一方面的话，则说故宫办得甚好，且一切规章很细，牵制周密。传闻之言似不可尽信，最好是有人前往实地视察”。段说：“很好，就请你同龚总长往看，再定办法。”我问龚“你拟何日去？最好是赶快，以

示突击”。龚说：“明早如何？”我答曰：“可以”。次晨即同往故宫，由工作人员带同视察三数处。龚说：“甚整齐周密，他处可不必看了”。我说：“不然，我们奉命来视察，负有责任，不可苟且”。遂又视察数处，龚足已疲不欲行。我说：“未便中止”，又再行数处，龚说：“我已走不动了，且已明白梗概，不必再看了”。我说：“如此则明日如何报告”？龚说：“可报告满意。”我说：“此事属内务部主管，明日请你负责报告，我为你补充，如何”？龚即应允，次日向段报告，段亦无辞，于是一场风波又暂平息。然彼等更怀忌恨。

我参与段的执政内阁，其中尚有一段内容。始孙中山先生因在南方屡次失败，又与苏联有默契，故颇思与北方联络，而因联合讨曹吴，故欲以奉天张作霖为起点。我认为其可能性不甚大，于是主张先与段方联络，这是我参与执政内阁之主要因素。彼辈徒知争权夺利，对此层关系全不了解，且梁欲谋任交通，我亦不知道，于是乃生磨擦。旋梁引郑孝胥（后来郑亦表示不干）与我对话，并声言日本人亦反对叶某任交通部总长。我表示本人固无意于此，但阁员之进退若听从外国人意图，断乎不可。吾辈无法施展，欲我与日本方面的人一晤，以图转圜，我坚决不允。某一日由王揖唐约我茶会，不意日本总领事亦继至，作为是偶遇形式，彼即趋别室，此滑稽之一幕遂以告终。

梁鸿志系龚心湛之弟的科举门生，故促使内务部与故宫种种为难，屡生齟齬。当时因龚与冯玉祥有往来，所以尚不敢公开与李石曾、易培基、鹿钟麟为敌。迨民国十五年，段祺瑞遂通辑李石曾、易培基。是时故宫博物院已成立（十四年十月十日成立），屈映光任内务总长，对故宫欲置于部辖之下，乃成为传统之谋。但一时又不能达到目的，无可奈何之下，卒将紫禁城沿筒子河的群房数百间拆卖，又向清室内务府买得西郊水田数百亩，聊以解嘲。在清内务府管理水田时，尚能注意保护城内水源，并未开垦用水，及内务部经管后，将西郊水源任意截流灌溉水田，遂

致城内水道不畅，臭秽淤积，有碍卫生。然彼辈只图私利，不复思群众利益了。民国十三年底，清室善后委员会开始点查时，由清内务府提出，溥仪仓卒出宫时，冬衣多未带去，日用物品亦多缺欠，请求善后委员会准其酌量取出，以资应用。政府方面亦有人为之关说，且在执政会议上提出，段祺瑞谓其随身衣物应与之，与议诸人亦无异议。我言应以必需者为限，众亦同意。乃于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提取大宗皮衣及其它物品（详单见《经过记》），实已大大超过必需者的范围，后知溥仪本人和家属所实际得到的有限，大部分皆被中饱（在神武门外就分了）。我主张故宫应宣布取物清单，但并未实行，仅将不完全之单在故宫周刊上印出而已。

我对故宫博物院始终是从旁协助维护，并未参加任何负责工作，但是在几次人事改变时，亦曾将我的名字写上。如民国十五年十月所组织的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同人名单计三十七人（后陆续增加二十三人），其中有叶恭绰的名字，我根本不知道。及至十二月九日，由汪大燮等七人邀请各界名流茶会，讨论筹商故宫博物院事。有多人要求我加入维持会，我不肯应允，于是大家坚欲我与故宫发生些关系，故变为推我作基金委员，实际并无基金，亦没有一个基金会组织。迨维持会正式成立不久，王宠惠副会长要辞职，院中同人又欲我参加并担任副会长，并已议决，我仍坚持不就，只允为从旁策应斡旋。盖一经正式就职担任主管，则转多不便，反不能帮忙矣。

前清军机处档案，乃一代极重要之文献，民国以后从无人过问，不知如何放在集灵囿（中南海内）的空屋中。某日我在会议后，偶然于空屋内发现档案堆积如山，尘土盖满，问国务院中工作人答云，是军机处档案，久放置此处。我亟告知主管部门运去，并属善为保管整理。因为清代自雍正以后，军国大政皆在军机处，一定有极关重要的文件。（参看我所著的《说清代军机处》）

不知何时将此项军机处档案移存在大高殿，及至民国十六年六月张作霖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潘复为国务总理，沈瑞麟为内务部总长，忽然通知故宫博物院，要将大高殿所存军机处档案移归国务院保管。时江瀚担任故宫博物院维持会会长，为此大感棘手。江来我津寓相商，邀我一同入京，我未应允，后来几经磋商，始作罢论。我有鉴于此，遂向故宫同人说：不如将军机处档案全部移入故宫内，而将大高殿交出。众咸同意，如法泡制，此项珍贵文献遂得保存。后来一部分档案随古物南迁，复被蒋介石等劫往台湾，所余下者已非全璧。

民国十六年十月在潘复内阁时期，将故宫博物院维持会改组，聘王士珍为委员长，王式通、袁金铠为副委员长，并聘沈瑞麟等十二人为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推定江庸、王式通、袁金铠、沈瑞麟四人为接收委员，于十月廿一日接收故宫。至此即所谓奉方管理委员会时期。在这时期里，尚有一极大之内幕，外间不甚了解，并因一向无文字记录，故《经过记》亦无记载。内幕为何？即当局欲将故宫物品移往沈阳。此事之主谋是谁，我没有证据，不能肯定，但酝酿已经甚久，始得张作霖之同意，大约清室及段祺瑞方面和奉张方面人物不少预闻其事者。而国务院总理潘复更是跃跃欲试，要想从中攫取些什么，因为潘复平日亦好搜罗古物。一经有此迁移传说，院中同人甚为徬徨，无计可施。于是有人向我谈及并要求设法挽回。我不得已，乃独往见张作霖，告以此种办法非宜，劝他不必因此事被人批评。张闻之，思索有顷，乃向我言：“难道连由奉天行宫以前运来的东西也不好拿回吗？”我说：“故宫博物院的東西重复的很多，本来有分存全国各地的计划，奉天亦在其内。将来实行此办法，自然会尽先分配到奉天去，比起仅将原来由奉天运京的原物送还为数必大大增多，岂不更好，何必于此时急急呢。”张听后颇以为然，遂说：“然则连原在奉天的文溯阁四库全书亦不好取回吗？”我当即答云：“那

当然可以。”于是一天云雾就此消散，四库全书一部遂运回奉天了（北京尚存文渊和文源两部）。故宫博物院全部物品乃以一部四库全书换回。一直的保存下来，直到解放后交到人民的手里（劫往台湾的除外），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知当日之委曲经过者，恐无几人了，我特附记于此，以存真象。至蒋介石国民政府时，将古物南迁，并宣传李石曾、易培基盗宝云云，其内容更加复杂，此不具述。但有一事可附带叙及，即是那时南迁的古书画，全部存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大仓库里，曾由南京教育部约请鉴定家按清单逐件审查（记得有张葱玉、徐森玉、吴湖帆和我，尚有何人已记不清）。结果查出有五件被调换，但原来并非精品，名头也小，大约系陈白阳、周之冕之类。而所掉之伪品，并非仿造，乃以极劣之苏州片充数，连题款都不符的，这显然系不知何时由极外行的太监们所调换，如由稍有常识的人去搞，亦不至如此荒谬。此可证盗宝云云，实为一种攻击人的手段而已。后来蒋帮又有一盗宝案，拼命攻击李石曾、易培基，与此亦有些相仿，此不赘谈。

军阀与西方国家的军火贸易 (1920—1928)

〔加〕陈安东 著 沈自敏 译

编者按：中国军阀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军火贸易，一直是民国史研究者关注的问题。由于当时的军火贸易是秘密交易，故有关资料极难搜集，因此，加拿大华裔学者陈安东（An thong B.Chan）先生的《把中国人武装起来——1920—1928年中国军阀和西方国家的军火贸易》（Arming the Chinese—The Western Armanents trade in War-lord China 1920—1928）的出版，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该书作者从英法美各国的外交档案中细加检视，详加爬梳，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较系统的叙述。今节录译出，以供研究者参考。该书英文版由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于1982年出版。

第二章 西方国家的军火贸易及控制

上海和谈会议失败（指1919年南北议和上海会议一译者），中国历史上军阀势力的扩张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当时的情势下，要想经过南北谈判而取得和平统一全国的目的是达不到的，徐世昌本人虽也试图作此努力，但反对和平之声甚嚣尘上，那些具有实力的大军阀如张作霖、徐树铮一直想用武力统一全国。战争的乌云笼罩着二十年代的中国，到处都在进行军阀的战争，但是气氛却与1916—1919年之间有所不同。那时，日本支持段祺瑞，在加强段的武力和军事机构中起重要作用。但是到二十年

代，日本“有所收敛，成为一个颇受尊信的强国”^①。这时，它不再支持某个特定的军阀。倘若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那么中国军阀要想从西方国家得到军火武器是颇为困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结束，西方国家有很多剩余的军用物资，而且日本原敬内阁也倾向于与西方列强进行密切合作的政策。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以及军阀决心进行内战的意图，西方国家的军火贸易纷纷进入军阀时期的中国市场。

所谓“军火贸易”指的是施展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手段，以装备、建立、支持、利用一支正规或非正规的军队。此中关系是很复杂而多种多样的，包括利用合法或非法的政治机构、地方和市区的权力机关、盗匪或散兵游勇，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种种关系。从严格的意义来说，所谓“军火贸易”，是通过一定的渠道，在个人、集团、地区、国家之间协商，取得满足国家或个人需要的作战器械。这种贸易，并不单是指那些从一个单位给另一个单位出售军器和装备，此外还有多种多样的转运方式。例如张作霖卤获了吴佩孚的70大炮，这原来是洛阳直系军阀购自意大利，准备以此与南方政府交换2万支来福枪、5万发枪弹、72门野炮、5000发炮弹、120挺机关枪及其他附件^②。又有一笔交易是日中森林工矿会社的500万金圆借款给广州的南方政府。1922年5月5日签订，以开发海南岛及广州沿海岛屿及由厦门至海南的捕鱼权为交换条件，同时又取得江西的伐林开矿的权利^③。日方既获得此等特权，同意不再广州沿海岛屿及海南另建军事设施。此外，有唐继尧给予法国开采贵州锡矿的权利，换取2万支来福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时期之后》，页9。（Ichiye Akira: After Imperialism The Re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② 1927年8月16日驻北京法国使馆武官罗格斯上校（Capt Roques）致法国国防部（见ADSA 1919—1929 China, Vol 165, P27—29）

③ 贾米森（John Jamieson）致阿尔斯顿（Beiby Alston）（见FO228/3105。1922年7月11日于广州）

枪、200万发子弹、一吨半炸药。以上各项军火，由马赛启运，经海防运到云南。军火买卖过程中，还包括交换军事情报、工作人员。唐继尧把在云南空军中工作的原法属安南的一名上尉阿比特（Arbit）借给张作霖使用，派他到沈阳的化学工厂帮助三名化学师迈耶（Meyer）、富克斯（Fuehs）、利德曼（Liederman）工作，制作毒气。^①不过，当时输入中国的军械是手枪、来福枪、大炮、机关枪、野炮。有时也运入飞机、坦克、装甲车、机动车、军盔、鞋帽或军服等军需用品。所以，所谓“军火贸易”，包括的范围是很广泛的。从这个观点来看，吴佩孚任用的军事顾问，张宗昌雇用的白俄，1921年张作霖购置的装甲车，都可以归入为“军火贸易”。因此，所谓“军火贸易”不仅仅限于军需用品的买卖了。

从综合的观点来看，军阀统治时期的军火贸易，可以包括这些项目来加以叙述：军火贸易的结构、卖方市场；军火贸易的机构、购销关系；军火控制。

军火贸易的结构 卖方市场

1916—1928年间，中国出现了军阀时期，与之同时存在的军火买卖市场是垄断性的。它由早期的军火贸易发展而来，与当今把军火贸易作为一种外交手段有所不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军火制造大都属于私人企业，与其他企业有类似之处，官方很少过问。1919年，在华各国同意签定了对中国军阀“禁运军火协定”。这个协定，并未认真执行，而且还有很多保留的条款，竟使军火制造商可以为所欲为。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只要有现款或其他妥善的办法，就可以取得军火武器。以克鲁伯（Krupp）公司为例，它在1866年普奥战争发生之前，可以把枪炮卖给奥国，并无所谓爱国与否的观念。英国也如此，身为英国

^① 迈耶领事（M.S. Myers）致国务卿（见SD 895.575 1923年8月30日于昆明）。

公民的马克里 (Hiram Maxim) 也没有这种观念。他在南非布尔 (Boer) 战争时, 公开把机关枪卖给布尔人来打英国人。

西方国家的这种自由买卖的原则波及到世界各地, 在亚洲、非洲、南美洲的军火贸易中推行。军火制造, 在落后的地区显出它在经济军事上的优越性, 在那些遇到阻难的地区, 军火市场却对之自由开放毫无禁忌。例如, 在波利维亚、巴拉圭, 以及军阀统治的中国, 那里派系争夺、政局不稳, 武器就成为迫切的需要, 西方的军火就迅速运入。这对西方国家在那里建立市场, 发展企业都是大为有利的。事实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自由贸易在各大国一直保存着, 有些国家还一直延续到三十年代中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西方的军火贸易扩张到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 保持着繁盛的局面且获利甚巨。

二十年代中, 世界上主要的军械制造厂有英国的维克斯 (Vickers)、德国的克鲁伯、美国的贝休莱姆 (Bethlehem) 和杜邦 (Dupont)、法国的施奈德 (Schneider)。手枪、步枪、小炮、重炮、军车、迫击炮等等, 由上述工厂生产, 输运给中国军阀。其他, 挪威的劳发斯 (Raufoss)、孔斯堡 (Kongsberg) 工厂、捷克的斯科达 (Skoda)、丹麦的尼尔森 (Nielsen)、温斯尔 (Winther) 公司、意大利的特尼 (Terni)、安沙度 (Ansaldo), 亦从事对中国的军火贸易, 把军械贩卖给中国军阀。^①

西方各国并不掩饰转运军火的买卖, 这种办法, 使他们把军火交到中国军阀手中变得简单易行。自从1919年上海和谈失败后, 民国时期的那批军阀需要各式轻重武器, 只要双方认为合宜, 尽可以提供方便的条件。既有现存的卖方, 又有自由买卖的方便, 军火武器运入中国是轻而易举的事了。各地军阀得知

^① 林德利 (F.O. Lindley) 致张伯伦 (Chamberlain) (见FO0228/3764, 1928年7月11日于奥斯陆)。

自己的兵工厂供应不足，只要内战不停息，那末国外武器装备的供应一定会持续下去。二十年代中，国内和平的希望十分渺茫，西方军火的卖方和中国军阀的买方，他们的交往活动就非常频繁了。军火厂的行商走贩遍及全球，尤其是在那些陷入战火之灾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觅取更多利润。

近代西方历史中，最为声名狼藉的军火商是若哈劳夫勋爵（Basil Zaharoff）。^①他受雇于英国维克斯公司。军阀统治时期，在中国的国外军火商大都是独立经营，与国外列强当局的军火工厂并无特殊的交情。当时，他们把中国市场容纳军火的数量估计过高。实际上，采取经济保护政策的英国，从1923年到1929年，对中国军火贸易额为1.093亿磅，列为第十五位。当时印度居首位，爱尔兰居第五位，加拿大居第八位，阿根廷居第九位，荷兰居第十位。因此，中国的军火市场，对他们的吸引力并不太大，他们走遍各地觅寻获利最大的地域。当然与一位皇帝打交道和与一名僻地的土匪出身的云南小军阀打交道，其效果是不一样的。但无论如何，都一样的可以获利。在中国，从1912年到1928年的十六年中，有一千三百多名军阀在各省各地战乱不休。哪里在打仗，哪里就需要军械，可以这样说：“军火商人和军阀双双制造了中国的内战，并且支持内战的进行”。^②

中国虽然并不是一个巨大的军火市场，但是残酷的内战总能吸引一大批各式军火商人。他们有的是驻北京使馆的官方经纪人，也有身分不明的格兰特上校（Grant），他原是加拿大公民，却充

① 有关这些神秘人物的情况，可参阅：

卢温森（Richard Lewisohn）：《欧洲的一名神秘人物》（The Mystery man of Europe）。

麦考密克（Donald Meiermack）：《出卖死亡的贩子》（Pedlar of Death）。

② 齐锡生（Hsi-Sheng Chi）：《1916—1928年间中国的军阀政治》（War-lord Politics），页123。

当国外军火商和中国军阀之间的掮客。① 沈阳的布瓦苏(Boix)有限公司为张作霖购买了 3000 毫升十四型引擎的布雷盖(Brequet)飞机二十架,英国弗莱明(Fleming)公司从拉脱维亚购进德制步枪和军需用品在青岛出售。还有很多临时性的商贩,其中有南亚人、俄国人、俄籍犹太人、日本人和无数加拿大、美国的华侨人员,把军火从美国走私运到香港。哈尔滨有一家正式的公开军火市场,挂牌叫做“纳哈罗夫卡”(Nahalovka),出售各种小型武器。

当时从事军火贸易的人,各式各样的都有。有一些是外交官或使馆雇佣,他们进行私人的活动,或者受雇于某些军阀。这些人的活动,大都由英、法、美各国的使馆作了报导。

意大利的外交人员公开的干这些买卖,即使在1919年5月5日首席外交官员朱尔典首创的“禁运军火协定”正式签订,意大利对此亦置之不顾。这份协定,意大利政府在5月12日表示同意,但是又声明说:“业经意大利签订或由各国在此日期前签准的合同,不在此范围之内,应加以保留。”② 其可保留的,就有与陕西、湖南、东北军签订的合同。有一船军火,包装上标以“日本玩具”,曾在神户停泊,货主为意大利驻华使馆警卫队长瓦拉尔达(Varalda)上校。卸货登陆后,据北宁路局负责人报告。装载了148节车皮,总重4011吨,经由天津马兹里(Mazeli)公司验收。其中有克虏伯、德波特(Deporte)出厂的野炮、步枪,及其它军需品,还有马鞍、军靴、帐篷、帽子、床铺、饼干、风灯、小车等杂件。这一大批军需品,再由北京启运,其中2434吨运往山海关,10吨沈阳,1507吨天津,60吨留在北京,存放在意大利使馆区的一家意大利医院里,其中有2万支左轮枪。

① 英国使馆致安尔根(Francis Alger), (FO228/3102, 1919年11月10日于北京)。

② 伊斯特斯(A.E. Eastes):《有关禁运军火的备忘录》(FO371/5297, 1920年12月9日)。

和100万发子弹。1921年11月21日、22日两天之内，有八十辆军用小汽车，把藏在山海关意大利军营里的军火运交给曹锟。①

上述4011吨军用物资，是意大利在“禁运军火协定”前签订的军火贸易合同数量最多的一次。但是同意“禁运军火协定”之后，意大利并未改变其继续贩运军火的活动。意大利驻哈尔滨的领事索科（Gibello Socco）还把军火卖给土匪。他的同伙富特拉（George T. Futera）从前是一名捷克的上尉，他在哈尔滨开了一家军火机械车间。1921年英国使馆武官阿尔斯顿（Beily Alston）曾在北京意大利使馆展出军火清单和照片。1924年，存放在山海关意大利军营的武器由曹锟购买了。②

另一位有名的军火商人是印度支那的总督凡雷纳（Alexandre Varenne）。法国虽然是“禁运军火协定”的签字国，但是仍旧照样在1927年把捷克斯科达出厂的7000支步枪、700万发子弹供应给昆明的龙云。步枪每支价50美元，凡雷纳收回扣每支15美元。

个人的经营，其效果不下于官方的交涉。下列合同是上海九江路的赛里布赖科夫（S. A. Serebriannikoff）与浙江军阀卢永祥的两方代表签订的：

甲方向乙方出售：

6.5毫米自动火炮九门，每门价沪关银4100两，附炮弹一百发。又3英寸迅发火炮炮弹一百发，计沪关银6100两。火炮十门，计价沪关银22200两，货到时，先付11000两。军火将于首次付款5400两后八日至十日内运出。其余十门大炮亦将依上述条件于十日内运出。

电话号码 C 1697

1920年7月14日于上海

① 阿尔斯顿致外交部，（FO371/6585，1921年12月9日于北京）

② 同①

此外，还有大连的日本人西川。他在1921年2月18日因贩卖军火被日本警方逮捕。退职军人从事军火贸易的大有人在。就这些人的职业训练来说，以贩卖军火为业，亦不足怪。例如美国的退职上尉卡尼（L.D. Kearney），他的案例可以说明军火买卖已远远超出国界。1922年，卡尼和前沙俄的海军人员用俄国船只贩运轻重武器到中国。他犯有私运军火到朝鲜之罪，将罚款2500美元，现监禁在比利比（Bilibid）狱中。

卡尼案说明，军火买卖涉及诸多国家。他的伙伴既有沙俄一般的海军人员，又有高级的海军少将如斯塔克（Stark）、迈耶（George A. Mayer）、霍罗威茨（Harry Horowitz）以及中国的军官。美国审判官洛宾格（Charles Summer Lobinger）认为这案件触犯美国法律，“他们明知故犯，无法无天，罪迹昭彰，贩运违禁物品，诸如机关炮、刺刀、步枪、子弹、手枪、左轮枪、野炮，以及其他军用物品。上述各项，显然违反1844年望厦条约第三十三款、1858年天津条约第十四款，以及1903年10月8日中美条约第三条第一款。上述各条约，今日仍属有效”，因此，卡尼和中国军阀进行军火买卖，显然黷犯美国国法。^①

卡尼案了结后，另有一些人照样活动，他们不再独来独往，而是和军阀直接联系。其中有一名叫利（W.J. Leigh）的人，他是一名混血种，自幼父母双亡，四川有一名叫利德尔（Archibald Little）收养了他，给他改姓“李”。后来，他在张宗昌行伍中服役，专出主意，活动买军火，经常和山东的德国人打交道，受到德国领事西伯特（F. Siebert）的庇护。他每月的正常收入为900元，但可另得佣金每年有10万元之巨。^②

当时有很多人想做军火生意发财，所以还有一批第二流的军火商人和掮客。这行业经常转运，流动不定，与那些制造商和大

① 戴维司领事（James P. Davis）致国务卿。（SD 893.113/568，1923年9月21日于上海）

② 图尔斯（B.G. Tours）致兰普森。（FO228/3638，1927年4月25日于济南。）

头目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结成一伙是相当稳定的。而那批第二流的人物，一旦把军火交到官员、商人、掮客、经纪人手中，这种组合就解散了。中国并不是一个主要军火市场，对它的限制也比较少，因此这种交易相当松散，也不经常。

军火贸易的机构 购销关系

为了说明军火贸易中复杂的购销关系，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来进行研究：一，单一性的，即某一个人或某一公司，供应某一军阀的军火武器；二，承包某一军阀全部的武器需要；三，多渠道的军火供应。

二十年代中，就全世界的范围来看，中国并不是主要的军火市场，因此一些规模很大的兵工厂并不直接和中国军阀取得联系。当然也有例外，如1919年维克斯公司和北京军阀签订合同，供应飞机和零件，这是一种直接的购销关系。大多数的情况是采取间接购销关系，军火商从别国的私人工厂及推销人手中买到武器，然后转运到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日本单独向段祺瑞供应军火。1919年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国家的势力重新回到中国，日本不得不与别的国家采取合作的态度。二十年代中，给云南的唐继尧供应军火的是法国。安徽的王揖唐由一家克里潘多夫（Heivrich Krippendroff）的德国公司供应军火。情况最复杂的要算是张作霖了，他和大小国家都有交往，因为他要维持军事上的优势地位，所以需要的军火特别多。他与日本、丹麦、法国、英国、挪威、捷克、德国、意大利、白俄都打交道。

单一的购销关系最具代表性的是段祺瑞与日本的关系，这是曹汝霖的活动和西原借款的结果。二十年代中，再没有比这更稳定的关系的事例了。其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恢复了各国在中国竞争的局面了。

地理环境和交通渠道，也是决定军火购销关系的因素。例如，法国是最便于把军火卖给云南军阀的。这是因为云南地邻法属安南，水路可由沅江到红河海防，车辆可以从安南到云南。1923年3月，唐继尧经海防印支商业公司购得三十万元武器，这些军火，经由昆明到海防的鸦片走私路线运进云南。^①此外，云南军阀又从英国航运公司、怡和洋行、加拿大的温哥华莱斯特公司运进空军设备。法国除了向云南输运军火外，也向张作霖、卢永祥、曹錕出售飞机，给四川的刘湘供应武器，又向吴佩孚、张学良的空军派遣机械士和教官。

山东张宗昌的军械主要来自德国，还有少数捷克和日本的武器。据说，德国的领事曾建议张宗昌举行过两次晚会，来宾中90%是德国人，迈耶公司的老板还曾为张宗昌的军乐队捐赠过300元。有一次迈耶公司的代理人在託购的军火中私自夹带步枪，但并未遇到阻难，所以迈耶公司的代理人对之既表示感谢，又寄以期望。

德国给中国军阀销售军械，并不违反1919年5月5日签订的“禁运军火协定”，因为德国是到1928年3月30日才列名其中的。所以德国人对此毫无忌讳，德国商人公开在济南声称，从1925年到1927年间，与张宗昌签订过数额巨大的军火合同。

1928年1月30日，德国总理舒伯特（Herr Von Schubert）对英国公使林赛（Sir Ronald Lindsay）说过，德国给中国军阀输运军火，采用两种方式：

一、由非德籍的商人，用非德国的船只装运武器到德国海港卸货。这些军火来自捷克，再由德国港口运往中国。二、由德国在中国的公司向德国以外的国家购进武器，直接由上述国家运往中国，不必由德国船只从德国港口运出。

^① 迈尔斯致舒尔曼（Schurman），（KM 834 R0114，1923年3月13日于昆明）

舒伯特说：“德国并不特地制造运往中国的军火，但德国拥有股份。那些军火直接运往中国”。因此，德国方面辩说：德国亦不违反凡尔赛和约第170款，该条款禁止军火在德国进口和出口，亦不许制造军火运往别国。

德国向中国军阀运去军火，可又恪守凡尔赛和约321款的规定。该条文说：

“各同盟国的成员、货物、船只、货车、小车、邮车，可以由水陆两路通过德国领土。过境时，免收过境税，及免除其他限制，并可享受在德国境内的其他便利措施。过境货物免去税收及类似的税款。可适当收取一些运费。行经途中，免去一切干扰”。

363款规定在德国享有“转运自由”，其条文为：

“汉堡（Hamburg）、斯特汀（Stettin）港口，可租给捷克使用，为期九十九年。其地属自由港性质，货物可以直接出入”。

因此，从技术上说，德国是遵照条约的规定行事的。它实际上借捷克、挪威之手对中国军阀输送军火。^①

德国利用了条约中的漏洞，意大利则干脆对此置于不顾。有一次英国驻北京代表麦克利（Ronald Macleay）问意大利公使有关山海关输运轻重武器的问题。意大利公使赛路第（Cerruti）简单回答说，还没有同中国方面打交道。他又着重说，这笔军火还在意大利海军部手里。又说，还没有与段祺瑞谈妥。可是在货款尚未付清之前，段祺瑞倒台了，意大利方面准备和张作霖、曹锟商谈这笔军火。可见西方国家的军火，是和中国的各派军阀都可以成交的。

“禁运军火协定”的最初签署者英美等国似乎严格遵行，其实不然，他们的公民如维克斯、佩奇、柯蒂斯（Curtis）的各公司，公开出售飞机，以“供商业之用”为借口。英国怡和洋行、太古洋行、贩卖军械和毒气弹给广州政府和湖南军阀。

^① 佩罗纳（Perowne）：《德国捷克》，（F0371/12890）。

英国政府给中国军阀出售军火首先考虑的是：一名军阀是否能建立一个稳定而又倾向外国的政府。英国政府认为，所有的中国军阀，都具有这种可能性，它对于吴佩孚的态度，从麦克利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可以看得出来。这报告书说：“倘若吴佩孚能建立一个稳定而保守的政府，那末禁运军火协定应该取消，以便该政府行使其职权。”^①它又在给他的领事戈夫（Herbert Goffe）的指令中说：

“请你向吴佩孚在口头上对他的友好态度表示赞赏，并说明英国政府目前对各派的纷争仍保持严格的中立态度，暂时不能改变。但对英国供应军火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阻难，将予以取消，以利稳定和北京中央政府的友好关系。北京经常受到广州激进分子及其他地区势力的阻难，这不仅是全国统一和全国安定的阻碍，而且危及英国的在华利益，阻碍中英人民友好关系的建立。”^②

戈夫执行了他上司的指示，将其结果报告如下：

“吴佩孚的密使在1926年3月21日前来访问，建议英美政府取消禁运军火协定。他说：吴佩孚认为不必在讨论取消禁运条例上多费时日。倘若可出，那就商谈协定，他就可下令从英国取得军火。吴佩孚对英国政府对他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工作表示冷淡甚感遗憾。他认为这不仅对中国有利，对英国亦有利。我对他一再表示，英国政府可以供应武器和军费，但必须交给一个稳定而友好的政府。”^③

早在1925年，北京英国使馆就向伦敦报告：张作霖曾传言说，不必讨论取消禁运军火协定，只要视而不见地将武器供应给他，他就可以与在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势力作斗争。在我看来，只

① 麦克利致外交部（FO 3711/1655 1926年3月3日）。

② 麦克利致戈夫（FO 228/3113，1926年3月10日）。

③ 戈夫致麦克利（FO371/11672，1926年3月22日）。

有张作霖一人能恢复中国的秩序和安定。”^①

两年后，兰普森（Miles Lampson）写信给伦敦的威尔斯利（Victor Wellesley）说：“只有张作霖才对外国表示友好并遵守条约。一旦他死去，不少人会感到遗憾”。^②英国的子民过分放肆地输运武器，英国官方才对他们加以禁止。英国在1919年虽经朱尔典设想禁运军火，但实际上则利用中国军阀，甚至利用其势力已侵及到英国范围的吴佩孚，英国仍对他加以考虑。

美国像英国那样禁止它的公民给中国军阀运销武器。1922年3月4日，哈定总统表示支持“禁运军火协定”，而且还讲了许多道理。他公布的告示说，军火买卖是违法的，侵犯了美国的法律，具有唆使制造阴谋之罪，贩卖军火之罪，等同于叛国。话虽如此说，美国却仍旧通过“铁路技术联合会”把机关炮、步枪、军需品在海参崴登陆卸货，据说这些军火是贩运给吴佩孚的。美国人斯莱文（James Slevin）将飞机运到福建，最后交给洛阳吴佩孚的部队。美国国务卿还批准军用车辆以商用名义运给斯莱文和汉口意大利银行的买办。这一切都是由美国的“长泰二号”货轮装运来的。1923年，由美国运来的飞机在上海被扣留。

与中国军阀进行军火买卖的，不仅是几个大国，众多的小国家也纷纷活动。例如捷克、挪威、丹麦与张作霖签订军火买卖合同；白俄、比利时人、荷兰人也与张作霖和龙云来往买卖军火。甚至西班牙的商行，希腊的掮客也从事这种贸易。

有一些国家的公民专注意一些特殊的军阀，这样就使军火的销运更加复杂了。例如丹麦和挪威，专门与张作霖作交易，其它国家的一些军火商人，几乎与任何军阀都进行交往，只要他们能付出现款。既然在中国有现存的买主，所以西方大小诸国，虽然

^① 巴拉利特代办（Palariet）致外交部（FO228/3112，1925年7月14日于沈阳）。

^② 兰普森致书尔斯基（FO371/12505，1927年10月4日）。

有“禁运军火协定”的限制，军火交易依然在偷偷进行。

军火贸易的控制

在中国和日本都拥有利权的那些西方国家，要把作战物资输运给中国军阀，是直接违反“禁运军火协定”的。这个1919年5月5日签订的协定送给当时的外交总长陈篆^①时，附有照会，内称：“中国目前仍是南北分裂。需要对各国公民限制将轻重武器继续运进中国，不论其所运军火由何工厂制造”。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美国、沙俄、巴西、法国、日本是最先试图控制军火运入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的西方国家。他们认为，只有一旦出现一个“其权威为世界各国所承认的政府，禁运军火的命令才能废止”。英国是最先倡议这一协定的国家，其他各国如荷兰、丹麦、比利时、意大利，他们的代表口头上声称，与“禁运军火协定”取一致态度，但是不愿负全部责任，认为这并非政府的职责，而是属于外交官的职权。^②

英国的作用

英国是“禁运军火协定”的创始人，它还进一步想筹建一个国际军火联合组织，用集体的力量阻止军火运入中国。这一主张最先由美国公使芮恩施提出，进而由朱尔典安排，为此而召开驻华各国公使的会议。朱尔典资深识广，以他在华的丰富经验和灵活从容的态度和手腕，处于首要的地位。^③

当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召开南北和谈会议时，所有的外交人员都看得出和谈很少成功的希望。南北双方代表互相责备，造谣中伤。陕闽的内战未停，在战争中进行和谈实在毫无意义。上

① 时陈篆为外交次长，代理总长职务。——编者注

② 路易斯 (w. Roges Louis): 《1919—1939年间英国对远东的策略》, 页122。

③ 普加奇 (Noel H. Pugaeh), 《1919—1921年间英国的对华禁运军火与销售军火的竞争》(载于《外交史》杂志, 1978年第四卷)。

海和谈不过是一场欺人的骗局。芮恩施和朱尔典想把促使中国和平的办法掌握到自己手中。

国外列强以减少武器供应作为防止战争的初步手段。他们并不作其他选择，匆促采取“禁运军火”这种办法。因为一旦和谈失败，陕西的内战就会扩大到其它地区。可是“禁运军火协定”订立之后，反而使军火交易和获取军火交易的利润成为在华的外国人首先考虑的事了。

为实施“禁运军火协定”，在北京由部级官员决定，在国外由外交部进行讨论。这些讨论如同其它决策性的事件一样，具有国际的性质。与1913年组织银行团相似，最后决定由各国首都作出。以英国为例，首先有朱尔典筹议对华政策，后由伦敦批准。在他执行“协定”的过程中，英国政府不加干预。

“协定”送给外交总长陈篆时，有一些国家又加上了一些保留意见。例如日本，它不同意将“禁运军火协定”的范围包括东北地区。又例如法国，它宣称它的军警尚无武器在手则将无所作为。一个协定竟有如许保留，朱尔典对此亦仅仅表示其有保留的乐观态度而已。^①

前景虽然暗淡，但是英国仍认为这是保护它在华利益的一种方法。因为经久的战争会窒息交通运输、货物周转，这是中国商界所担心的事，也会缩减国外的投资。这种经济逆流是与国外输入军用物资有直接关系的。

国外军用物资的输入，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也有其具体原因，那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有一大批剩余的军用物资。据英国的军需部长凯拉威（F.G.Kellaway）说，1918年11月后，最大的同盟国英国有库存待售的军火，价值十亿英镑。空军副部长西利（J.E.B. Seeley）空军少将说，停战以后，每年还生产四万八千架飞机。一年以后，英国将剩余飞机一万架，发动机

① 朱尔典：“禁运军火协定”（FO371/5297，1920年12月9日）。

三万座，以及很多零件。它的盟国美国，在1918年11月间，有年产2.1万架飞机的能力。^①至于德国，投降后交出重炮2500门、野炮2500门、机关炮2.5万门、迫击炮3000门、飞机1700架。这都成了待销售出去的剩余军用物资了。^②

“禁运军火协定”的首创人考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在中国的作用，1918年12月，朱尔典呈文伦敦，叙述了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占得了不少商业上、政治上的利益，改变

易仍迅速增加，尤其是在长江流域一带，不久即可达到目前梦想不到的程度。”^①但是要想发掘中国的潜力，实属想入非非。首先，英国必须排除竞争的对手，即阻止日本日益增涨的势力。它企图以“禁运军火协定”对日本加以限制，这实在是很可笑的，只能说明英国徒有帝国的虚名，而无对抗日本的实力。

限制英国的公民在中国从事军火的非法输运，是根据英王第1907号中国指令第255款，1919年6月2日朱尔典在北京颁发，包括下列内容：

- 1、任何人，不得以他本人或别国人的名义，在中国租借地、租界等处运销武器。供体育玩乐之用的枪支除外。
- 2、倘有违反，当处以五十镑以内的罚金或监禁三个月。倘又涉及其他禁运物品，当处以货价三倍的罚金。
- 3、违禁各物品，即行没收，交付当地英国使馆。
- 4、其它未在此指令中规定的物品，需由英国公使审批。
- 5、上述指令称为1919年有关禁运军火指令。^②

其他国家的作用

“禁运军火协定”，是当时在华各国有关军事方面的一种新型合作。^③英国乃系首创者，其原意在保护它本身的利益，同时也表示它在中国的首要地位。法国、日本、美国及其它一些小的国家随之附和，不过都是相当勉强的，所以违禁的事例经常发生。例如法国在1923年经过布瓦苏公司运飞机给张作霖，它干脆不承认是违禁的行为；又在1927年给龙云供应军火，后被印支总管凡雷纳扣留，结果付出了30%的佣金，照样运行无阻。意大利有一笔军火合同是在1919年5月5日签订的，日本代为向英国疏

① 朱尔典致奎松（FO371/3691，1919年8月于北京）。

② 1919年英皇，第25号指令（见FO371/8900，1922年1月26日）。

③ 入江昭：（同前书）页1—22。

通，但是日本是一个主要的签约国，所以英国未予通融。^①

美国对英国，也采取应付的态度。但是英国多加指责，所以美国亦想严格执行。可是仍是无法禁止它的公民从事这门非法活动，尤其无法禁止从马尼拉运到广东的军火。美国的困难是在1921年3月5日国会通过的联合决议，取消了1917年6月15日的“间谍法令”。这一项法令原由军需处执行，是唯一的法律依据，据此可以禁运军火去中国。1922年3月4日，哈定总统又明确通告：“总统倘发现美洲国家中，或美国享有治外法权的国家中，有使用从美国取得的武器而制造骚乱者，总统将严正通知，此项武器之输运该地区为非法。”^②如果违令将武器运往中国而制造骚乱者，将罚款一万美元，或监禁二年。特殊情况，由国务院另外规定。如有违反，当以叛乱罪处理。这件通知，实际上成为废纸。给中国军阀输运军火，其金钱的引诱远比处罚有更大的吸引力。^③

在“禁运军火协定”上签字的一些大国，常常以本国的法律为依据作一些补充的条文；那些小国家，其利用的託词更是多种多样的了。意大利、荷兰、丹麦驻北京的公使，在原则上同意这种协定，但它们的具体行动，又推给了各国政府。二十年代中，意大利是向中国军阀输运军火最放肆的一个国家。他公开在中国登刊广告，在使馆内展出军火目录和样品照片。意大利的代办竟声称，意大利给张作霖、段祺瑞、张敬尧售运的军火，其合同系由政府于1919年5月5日“禁运军火协定”之前签订。1922年荷兰驻北京公使乌登代克（W.J.Oudendijk）声称，荷兰的法律并不禁止装运军火。丹麦政府与此不同，例如丹麦的尼尔森，温特尔公司卖军火给张作霖，英国政府对它加以指责，丹麦政府却答

① 艾略特（C.Elliott）致内田（FO371/6583，1921年2月3日于东京）。

② 哈定总统通告（见SD893.113/250，1922年3月4日）。

③ 戴维恩致国务卿（SD893.113/586，1923年9月21日于上海）。

复道：丹麦政府并无禁止军火出口的法律，此等物件的销运不必呈报政府，可以随意处置。除此之外，其它小国如西班牙、葡萄牙、巴西、比利时，他们虽然签订了“禁运军火协定”，而且表示要进行合作，其实，这对它们继续与中国军阀进行军火买卖毫无影响。还有一些国家，如瑞士、挪威、捷克，没有在“协定”上签名，所以正式通知英国，说不准备干涉其本国与中国军阀的军火交易。还有一些原来就没有在“协定”上签名的大国，如苏联、德国，它们就名正言顺的对“协定”置之不理。苏联更是自觉的置身于资本主义国家之外，要想利用外交压力限制它的军火交易，那完全是徒然的事了。德国因为受制于“凡尔赛和约”，不准在国境内外输运军火，但是它可以借手别的国家，公开把军械卖给张作霖。英国还认为“此举并不违反凡尔赛和约第170款。”^①

小 结

英国维克斯公司给段祺瑞输运飞机一事，是经过英国政府在1919年10月批准的。可是在五个月以前，它是“禁运军火协定”的首创人。因此，这次输送飞机给段祺瑞，无论它如何强词夺理的说供“商业之用”，一直很难使美国、日本等国家接受。既然如此，英国的声誉当然令人置疑了。它们想在攻击佩奇签订合同，为维克斯公司输送军火造成的丑闻中挽回一点面子，但是无济于事。

英国一方面创导“禁运军火协定”，另方面又在海外从事飞机销售，人们把英国看作是两面派就不足为奇了。英国正在肆意掠夺中国，它会真正禁运在中国的军火贸易吗？维克斯的合同

^① 佩罗纳：〈德国捷克〉（F0371/12890）。

很清楚说明了英国的真实意图，从中可以窥测到英国在中国所起的作用。一直到1933年，英国的公众和其他国家的人士还把英国在东亚的作用作“很高的估计”。英国本身就被这种假象所损害，而妄想用自己的地位促使“禁运军火”的实现。就英国在第一次大战后虚弱的实际情况来说，要想用强权来执行其政策，已经是不可能的了。1919年以后，英国把全部的精力用在处理欧洲的事务，其它的国际事务只能暂时放在一边了。它想凭道义的力量支持它创导的“禁运军火协定”，那是一种妄想。

美国在华盛顿会议时，又重新提起了“禁运军火”一事，并由美国的鲍尔福（Arthur Balfour）于1922年1月24日重新起草，但是大多数代表对此毫无兴趣，^①所以“禁运”一事暂时搁置。当时，却因为苏联给中国军阀输运军火，所以“禁运”之议，又保留了一段时期。直到1929年，首席公使荷兰的乌登代克，向南京政府正式提出，取消“禁运军火协定”。^②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被国外认为是比较稳定的政府，而且当时日本暂时放缓了对张作霖供应军火，由于这两个原因，所以“禁运军火协定”不再执行。但是自从“禁运军火协定”签订的十多年来，大量军火输入，加剧了中国军阀的内战，“禁运军火协定”，并未给中国带来任何一点好处。西方国家大量剩余的军用物资，急需向市场推销以获利，没有具体的实力来执行这个“协定”，违禁事件就层出不穷。外交当局或者不作声，或者以“供商业之用”为借口，西方的大小诸国，却向中国销售军火。“禁运军火协定”是一大失败。

① 《禁运军火备忘录》（FO371/10916，1925年9月7日）。

② 《中国年鉴》1931年，页438。

第三章

各派军阀及西方国家的军火贸易

张作霖与西方国家的军火贸易

世界性的军火贸易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找到张作霖这样一个新出路是颇为理想的，规模虽小，获利却大。这对中国的张作霖来说，也是他十分盼望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张作霖得依靠其他军阀，还要和日本人打交道。例如1918年在秦皇岛扣留的军械，是段祺瑞和张作霖所共有的。张作霖和日本的关系，不仅仅限于供应军火，而且派出顾问，在财政问题、东北开发各方面加以援助。^①既然如此，张作霖和皖系及日本来往，就迫使 he 与之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合作。例如，张作霖为了要从皖系段祺瑞手中获得军械，就不得不容许皖系的势力在吉林活动。这样就把张作霖在东北的势力卷入到全国，而投身于全国的军阀内战的漩涡之中，一旦失败，他的身价就大为降低。1917—1918年间，张作霖的盟友皖系军阀正热衷江浙一带的争斗，张作霖要与直系交往则又处于劣势，难以联盟；日本势力已极不可靠。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对西方军火的供应十分热心，那是势所必然的事了。他想从失势中重新振作，对购取军火的标准很简单，即价廉物美，他与各国交往，很少考虑政治上的反应。

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火交易情况，西方国家保存了相当完备的材料。其原因是东北相当富裕，有能力购进大量军械。张作霖之所以非得与西方的企业打交道，也是当时中国国内的政局所促成。张作霖不仅设立军工厂，制造轻重武器，而且聘用西方军械专家、顾问，试制化学武器。他与西方国家军火交易的规模，引起西方

^① 日本和张作霖的关系很复杂，可参考麦科马克（Mc Cormack）：《张作霖》，页50—145。

人士的注意。

从技术上说，军阀购买西方国家的军械是违反“禁运军火协定”的，所以这种买卖多少是在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为此，英国曾指责意大利，说它公开招股。法国当局对他们的外交人员买卖军械一事置之不顾。^①

英国在中国的军事力量居于优势，这是中国人士所共知的，但是军火买卖是秘密的。进口的军械，要经过海关人员、外交人员仔细查看，并加以登录。大批军械，坦克、飞机是难以隐匿的，可是手提的迫击炮、步枪，是用报纸氈子包裹起来或用大小不等的木桶装钉起来，然后用小火轮或从陆路运送到军阀的营垒里，一时或不易发现。中国海员常常从温哥华、马赛私运军械给广东的革命军及其他军阀。不过这些军械往往数量很小，不能反映出西方国家的军火输运给军阀的情况。大批买卖，则可以从巴黎、华盛顿的政府报告中了解一些情况，从中探究其规模。不过，这些记录又常常不很完备。

白 俄

袁世凯死后，中国的军阀内战连年，他们口称要统一全国。还有另一个国家也在从事统一全国的战事，那是1917年革命后的苏俄，它在共产党领导下，托洛茨基正率领红军向东征伐直到太平洋沿岸，从西伯利亚直逼海参崴，那里还有白俄的最后据点。

在俄国境内，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兵力有“捷克友军”兵团，它也曾把军械输运给张作霖。这个兵团的士兵原是俄国的公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从捷克斯洛伐克放出来的囚犯组成，原属俄军第三军。其兵员大多从事间谍情报活动，分布在俄国本土。1917年2月，俄国临时政府的一些首领与马沙里克、米里可夫，同意将他们组成了一个“捷克友军”兵团，由俄军统

^① 戈登(G. Gordon)致外交部(F0371/12425, 1927年8月1日于西贡)。

领。1917年7月3日曾经在前线挽救过俄军，后被击败而趋于瓦解的危机。

1917年11月俄国革命后，“捷克兵团”仍为盟国作战，但是马沙里克与苏联政府谈判后，这支军队就涣散了；东线崩溃，这支“捷克友军”分散了。马沙里克为了拯救这支军队，与苏联政府进行谈判，准备把它从海参崴、西伯利亚调到西战场。苏联之所以同意这种做法，因为深恐这4.5万名武装的捷克人在俄国土地上为非作歹。而且自1918年3月3日签订了布列斯特-立脱夫斯克条约后，与德国之间的战争结束，不再需要捷克兵团了。但是他们留在俄国土地上，必然会闹事。

这个计划最后并未实现，不过经马里沙克的努力，使“捷克兵团”至少能象征性的参加了击败德国及奥匈帝国的战争。这个兵团原来只有168支步枪、50400发子弹、一门大炮、1200发炮弹。可是它在沿西伯利亚铁路的五千英里的行程中，收集了大批军器，成了一支颇为强大的武装部队了。

1918年5月14日，在西伯利亚铁路的车里亚宾斯克车站，几名捷克士兵杀死了一个匈牙利人，因为他用碎砖打伤了一个捷克人。托洛茨基以此为借口，下令解除捷克士兵的武装。这时苏联已退出战争，不再需要捷克兵团，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苏联红军正想招募匈牙利人、德国人入伍。捷克兵团则认为是托洛茨基准备有计划地消灭他们。

这样引起了红军和捷克兵团的冲突，他们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战斗，使同盟国方面视捷克兵团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武力。同时，英法等国又极力促使日、美参予西伯利亚的战斗，首先消灭德国的势力，继之消灭布尔塞什克的势力。车里亚宾斯克车站的小小事故，成为同盟国家在西伯利亚干涉共产主义运动，意在扑灭其传布的借口。捷克兵团一时被视作是反共主义的先遣军了。

1918年6月29日，一名捷克裔俄籍军官第德里奇（Dietrichs），率领了14000名捷克士兵进占了海参崴，解除了那里共产党军队的武装。这样，同盟国方面就接管了这个城市，那里存有六十万吨军火。1918年7月以后，捷克兵团准备进攻伊尔库茨克的布尔什维克，它成了白俄反革命军队中的一支部队了。

白俄军队和布尔什维克在这一带的战斗从未中止过，一直到1922年10月，布尔什维克最后攻占了海参崴。至此，第德里奇也无能为力了，他在军车上装上了圣像，意在使他进行的内战具有宗教色彩。但是低落的士气并不因此而提高，一切都全无希望了。1922年初，双方进行谈判，以便使白俄军队撤出，其中有一次涉及到张作霖。

第德里奇和张作霖商定，“捷克兵团”以它们所拥有的武器为交换条件，取得在东三省避居和取得给养谋生。他们两人都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但这已不成为主要条件了。他们当时的考虑，一个是要生存下来以便有朝一日可以重回欧洲；一个是在从中获得军械武器，以便装备奉军。这批军械虽然为数极少，但是足以说明，张作霖是利用各种手段取得军械，以便增加自己的力量，保持其在东北的地位。

捷克兵团和张作霖交换武器一事，由英国驻哈尔滨领事波特（Harold Potter）与第德里奇的代理人罗奇维兹基将军（General Lochvitzky）谈话之后，作了报导。两次军火交换，都由罗马尼亚人拉奇斯基（Rachinsky）作经纪人。武器由边境小站波格来朱亚（Pogronichnaya）经中东路运到绥芬河，再转到哈尔滨，改经南满路运到长春，最后到沈阳。^①

第一次交货计有步枪3万支，每支13元。这些军器，混在茶叶货包里启运，在波城和绥芬河曾遇到税务官的阻难，最后放行

^① 波特（Harold Potter）致阿尔斯顿（Beiby Alston）（FO 371/8001，1922年9月11日于哈尔滨）。

运到哈尔滨，共有二十二车皮，到哈尔滨后，又向沈阳转运。

第二次交付的是另一些军械。据称1922年10月3日，有十五辆货车经南满路运到沈阳，内有炮弹626箱，炸弹209箱计5016枚，电线等物品200箱，还有一架飞机。随同来到的有三名白俄飞行员，张作霖录用了其中的一名以代替原法籍飞行员马尔斯(Mars)，此外还有二名将军，三名少校，一名制作炸弹的技师。

意大利人

张作霖和第德里奇的来往完全是公开的，主要的是因为捷克人想在东北安身存命。但是他和意大利人的交往则是躲躲闪闪的。中国在政治上和日常生活中，经常受到外国势力的巨大影响。在这一段军火交易期间，一些既不受中国法律管制，又得到国际法庭和用强力取得的司法权保护的西方国家，显然在交往上占了上风。军阀急于想获得军械，西方货主趁此强行霸道，在所难免。他们籍法律对他们的有利庇护，朦骗军阀，这是常见的事例。军阀只能自认倒霉，无处可以申诉，即使会审公廨可以受理，但因军火买卖是1919年的协定所禁止的；即使事前曾经工部局和海关批准，但是操纵之权仍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手中。

西方军火商人进行的这种不公正的买卖，中国军阀在国内虽然声势很大，但是对他们也毫无办法。例如德国商人卖给张作霖的步枪，子弹数量不足，张作霖对之也无计可施。问题不仅在此，而是在这种买卖中，西方商人总是处于有利的一方。市场的性质决定武器的型类，例如6.5毫米的大力士枪(Mannlicher)、来福枪、卡宾枪、7.9毫米的毛瑟枪、1888型德国鲁格尔(Luger)手枪，还有哈却开斯(Hotchkiss)重机枪，各色各样的军械都有，中国军阀所得的却是陈旧过时的次品，毫无自行选择的余地。中国内战频繁，军阀需要军械甚急，这正好成为西方剩余军火的倾销之地了。他们或者弄虚作假，或者取费昂贵。因为从西

方国家的水平来看，这些军械大都过时，可是在工业落后的地区，如玻利维亚、巴拉圭，以及中国这些地区看来，却还颇为新式，容易上当被欺，即是被视为“能人”的张作霖也不免受西方军火商之骗。

张作霖自1922年战败以后，即向外进行交易活动，其目的在增强他的军事实力。1919年，他与意大利的早期交往很有收获，存留在天津、山海关的军械，在1921年1月就沿着辽东湾运到葫芦岛了。

1922年，他又从意大利菲亚特（Fiat）公司买到价值四万元的飞机零件和八万元的其他军械。1923年1月，他与意大利军队的领班人巴奇（Bacci）订购五百万元的军械。巴奇是意大利皇家军的代理人。订购的军械包括各种步枪、机关枪、山炮、野炮等，事先预付五十万元，言定三个月内运到葫芦岛。可是到期各货未能运到，张作霖派人到上海去索还预付款，可是被租界的公廨驳回。

巴奇的事件说明，在军火交易中，西方国家掌握了决定性的大权。至于法庭，更是为西方国家的利益而设立。那些西方的骗子手、贪利者很容易把他们的势力伸入进去，中国军阀对他们只能言听计从。所以张作霖即使受骗，仍旧需要和意大利人打交道，以便继续购得军械。1923年9月，大小武器和两架柯蒂斯（Curtiss）飞机运到沈阳。

英 国 人

意大利进行的军火贸易规模比较小，英国则注意到关于空军的大批交易。为了避免其他国家的指责，他们把飞机的品种和零件小心翼翼的分为“商用”、“军用”，分别设法卖给中国军阀。

议论最多的一椿军火买卖是段祺瑞政府和维克斯公司的一件合同。日、美两国于1919年10月11日通知朱尔典，指责它违反

“禁运军火协定”。朱尔典则宣称，这些车辆“不适于军用”，^①因此不能指责英国违约。可是日本方面却发现涉及此合同的唯一一名中国人，乃系军方人士，因此“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指责”。由此可见，所谓“禁运军火协定”，乃意在防止日本独占对中国的军火交易。

上述维克斯公司合同的主要内容是英国贷给段祺瑞1803200英镑，利息8%，1919年10月起在伦敦支付。日本驻北京使馆的领事永井向英方询及这笔借款的性质，英使馆人士马勒（Max Maller）回答说：“此项借款由维克斯公司经营，用以购置飞机场各种设备。”

维克斯合同供应24架装置完整的维米（Vimy）商用飞机、24架阿弗罗（Avro）飞机及所附各种零件。以上各件，由中国驻英公使接收后即待装运。^②财政总长且指令从盐余中每月抽出10万元，以付所需各项。付款之日起于1922年1月11日，直至全部付清为止。

1920年直皖战争后，北京政府改组，维克斯公司的这次交易没有能做成。段祺瑞虽然下台了，但是军阀政府继续和西方国家签订合同，西方的军火商家希望继续上台的政府能承认以前的合同有效。这样，1919年皖系签订的合同，1920年后由直系来承担，承认维克斯的合同，于是维克斯运进的军需车辆，由曹锟和张作霖分享，并由他们负责付清全部借款。

维克斯公司的借款和销售飞机等事项，都是得到英国政府的同意的。英国的军械船舶制造公司，除阿姆斯特朗公司以外，维克斯公司是一家主要的制造厂。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该公司产品的销售量减少，工人闲置，造船业更甚。为此，维克

① 朱尔典（John Jordan）致寇松（Curzon）（1919年10月22日电报第551号）。

② 维克斯公司致外交部（FO371/6583，1921年3月3日于伦敦）。

斯公司转向了飞机生产，认为这是很有希望的一种行业。公司的生产情况和政府的关系很密切，不断的期望伦敦方面的援助以渡过财政危机。但是英国政府，已经把飞机的生产减少到只有战时的十分之一，所以得另行设法打开国外的市场。维克斯公司和段祺瑞的交易即是其中的一项，因为中国市场是颇有吸引力的。

段祺瑞在和维克斯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当时，又与英国的佩奇公司签订合同，订购飞机，计有大型O/400客机6架，每架10550英镑。1920年直皖战争时，这些飞机为曹锟、张作霖获运往保定、沈阳。1920年12月，佩奇向英国政府报告，内称已与直奉联军秘密签订了897000英镑的合同，购买F3型水上飞艇30艘，N-T-2B飞艇50艘，S型飞机25架，罗伊斯卷式发动机附件55套，200匹马力腹蛇式发动机附件50套。可是这次合同未能获得英国政府的批准。

英国代办克莱夫(R.H.Clire)指责佩奇，对他的代理人斯莫尔伍德(H.St.Clair Smallwood)说，伦敦之所以支持维克斯，因为看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力量。他说：“英国海外贸易部认为，要在中国航空业取得立足点，这种主意是不能轻易取消的，尤其因为法国已经首先在日本取得了这一类立足点。”^①

佩奇所订的合同总额1297200英镑，克莱夫称它违反“禁运军火协定”，而佩奇则认为政府之所以加以谴责，是因为伦敦方面意欲使维克斯公司独占对中国进行飞机买卖的市场。克莱夫试图消除这些纷争，曾经说过，要是北京一旦失信，而要使中国政府向私方商号付款，那就会使英国使馆陷于狼狈的境地。尽管各方纷纷责难，但英国政府一直偏袒维克斯公司。克莱夫曾说过：“尽管英国使馆和维克斯公司劝阻私商签订飞机贸易合同，但常常遇到困难。”不过，由此也可以了解到，佩奇所订的合同当然

^① 阿尔斯顿致寇松(F0371/6583, 1921年1月26日)。

是被视为无效的了。

张作霖在1920年与维克斯公司签合同时，曾经提出过需要英国的教官和飞机设备，因为他在北京之外，还想在保定、沈阳等地建飞机场，这个合同倘若签订实施，那末英国就可以垄断空军驾驶员的“顾问”市场了。张作霖当时还表示需要英国的军用车辆，英方则声称此乃违反“禁运军火协定”，所以未获结果，于是1922年6月与维克斯公司代表商定的购买10架巡逻机一事也无结果。

1923年张作霖继续努力，争取英国的支持，建设他的军事设备。他与英方代表波特（Harold Porter）谈判时，曾要求英国帮助他修建葫芦岛海港，并且以北票煤矿为交换，获取英方供应军械。张作霖还自我吹嘘，他是如何在骚乱的时期保护了开滦煤矿和英国在铁路上的利权。同时，张作霖又对英国深表不满，有过如下的一份报告：“英国阻止法国所供应的飞机，张作霖对此十分恼怒。他不懂，英方为什么把他这一位当代中国风云一时的首领人物，又是当时北京政府的有力后台，竟当作一名小兵痞，当作一名土匪头目，当作一名破坏和平的人来对待。”^①

这份报告表明，张作霖想方设法，从一切可能得到军械的地方购买军火，但是又不愿意受他们的约束。1925年，张作霖和各色军火商订了很多合同，一再向英国方面透露希望得到英方的支援，又希望英方不要干涉他与其他国家的交易。1927年，张作霖的安国军面对国民党的北伐军，他向各方面试探，以期获得更多军械。他经常出入英国使馆，因为他们具有共同反对共产主义的意愿。西方国家此时对张作霖的观感，可以英国公使兰普森（Sir Miles Lampson）的意见为代表，他说：“张作霖是当时

① 波特致麦克莱（MacLeay）（FO371/31111，1923年2月13日于沈阳）。

中国唯一的势力，可以维持安定，保护外国人生命。”^①因此，兰普森极力促成英国政府，允许像维克斯公司那样的军火商，将飞机及各种照相测量仪器卖给张作霖。

张作霖为奉军及以后的安国军筹建军工厂等事，经常和英国方面商讨，英国是在华首屈一指的帝国主义强国。张作霖自直奉战争失败以来，重整军备是他经久的目标。1922—1924年是张作霖对外政策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主要的是依靠日本的军械和顾问，在此之后，他转而面向各个方面。”为了取得英国的支持，张作霖为它提供了有利可图的军火市场。当时，英国的空军技术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是张作霖也不必为英国态度的变化而忧心忡忡，因为张作霖广向各国打交道，此国拒绝，他可以求之于他国。

法 国 人

欧洲的航空工业，只有法国可以与英国匹敌。英国要它的公民在中国恪守“禁运军火协定”，法国对此毫不理睬。法国供给张作霖的不仅有空军的设备和军械，而且还有顾问教官。维克斯公司的合同结束以后，英国不再向张作霖供应军械和教官了，法国正好趁机而入，一时成为供应奉军空军设备的主要支柱了。

张作霖和法国的交涉，其采取的方式与对意大利的方式不同，他直接派代表到巴黎，进行政府级的谈判。法国方面亦公开接待来自沈阳的代表，当作政府的使者对待。意大利则用报纸广告、货品展览、秘密谈判等方式进行。又例如，张作霖从前与维克斯公司签订合作是分别在两国首都进行。而奉军和法国交易则在巴黎和沈阳进行，不必有北京直系政府的批准。法国政府还向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授勋章，表示两个政府交易的成功。^②

^① 兰普森致外交部（FO 371/3112，1927年4月11日于北京）。

^② 麦克莱致外交部（FO371/10239，1924年10月2日）。

张作霖在巴黎的主要代表是魏宗晋（译音），1923年，他曾率领12名学生去法国安格斯（Angers）航空学校学习。魏住在巴黎梵努路一个舒适的别墅里，从事购买防空设备，装甲坦克、飞机，以及海军用具的谈判，以及其他军械车辆，只要是12年内的产品，都属于谈判之列。

魏此次法国之行，签订了一份数量巨大的合同，购买考德隆（Caudron）、布雷盖（Breguet）等各式各样的飞机105架，戴姆勒（Daimler）水上飞机35架，后者即行运往葫芦岛港，由一家叫布瓦苏的公司销售。此外，还有一名叫波利特（Etienne Poulet）的军官充当航空学校的主任，另有四名当教官的飞行员。布瓦苏公司和维克斯公司不同，它并不假冒伪称这些飞机乃系商用。这些装有雷诺发动机的考德隆飞机和装有西瑞发动机的布雷盖飞机都装有炮位，足见其决非“商用”。布瓦苏公司的军械，在奉军军火市场上获利最厚。它还运来西特伦履带坦克，这是根据惠普特（Whippet）式的坦克制造的，使用胶轮。

法国政府委托布瓦苏公司，因为它对业务熟悉，签订手续迅速，交易很有成效。沈阳和巴黎两地，又有张作霖的代理人 and 法国政府的人员可以直接交往，考德隆、布雷盖公司的业务人员又经常可以接触，所以布瓦苏是沈阳很得力的外商经纪人，及时处理当地事务，迅速进行谈判交易。1924年1月，第一批布雷盖的飞机运到，就如此遥远的路程来说，这是成交速度极快的。

法国在华使馆很注意布瓦苏公司所订的协议，而且从旁帮助促其实现。后来英国公使麦克莱（Ronald Maclay）发觉了这种活动，但是法国公使对此并未重视。法国的上海领事反而向巴黎报告说，在此从事这种活动的法国人为数不少，来自马赛船只停泊在通商口埠的码头，其中几乎都装载着违禁的军用物品，获利极厚。例如白朗宁手枪，在马赛的价格每支50—80法郎，可是一运到中国，即可卖到360—540法郎，即使被搜获，法

国法庭也不过判处100法郎的罚金，或是数日的监禁而已。因此这种买卖是并不冒多大风险的。^①

张作霖派出人员在沈阳和巴黎进行交易外，同时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也进行活动。他派一名姓曾的上校，在瑞士苏黎士设立据点。这个城市拥有国际闻名的银行，可以经此而巧妙地从法国、意大利、德国换购军火。据说，在1924年5月曾到巴黎时，携有信用款2000万元。当时他的交易对手是德国的军火商人。

德 国 人

根据凡尔赛条约170款的规定，德国是不准制造武器，也不准将武器运进输出。倘有发现，即系违法。但是德国人可以利用邻国的港口，避开这些限制。德国人又宣称，运往中国的军火，并非最近制作，而系一批上交的军火，并系由其他国家运输出口的。例如，军火在瑞典港口装货，然后由德国备用的货船哈姆（Hamm）号运往中国。

德国运往中国的军火，大都是卖给张作霖的。在北伐战争期间，德国记者萨尔茨曼（Von Saltzmann）报导说：德国在中国进行的军火交易，40%是输运给张作霖、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的。这说明，安国军买了很多德国的军火。

张作霖从德国人手中所得的军械，一部分送到沈阳兵工厂，一部分分发给奉军部队。他在1923年与德国的一家公司签订了一份数额为18万元的合同，用在沈阳设立的兵工厂增设一座热电厂。英国驻日本东京大使馆的报告说，1924年11月7日，有德国船只“苏菲·里克默斯”号（Sophie Riehmers）满装军火驶往大连港。1924—1925年间，张作霖经常从德国购进军械，通过哈尔滨的德国商人路德维格宾（Ludwig Bing）购得步枪8.1万

^① 维尔特（A. Wilder）致法国外交部长波恩加莱（Poincare）（ADSA，160卷，1923年11月17日于上海）。

支，其中4.6万支系日本制造，其余则为俄国制造。还有子弹4000万发。上述各项军火，在汉堡装船，经开普顿运到营口。宾又从中说合，将其中的德制子弹2800万发卖给奉军。

张作霖除了买德国的军械外，还聘用德国的军事顾问，在他的兵工厂和毒气制造厂里有不少德国的技师，专门制造炸弹。张作霖与德商的来往，既可以直接得到他们的帮助，又可以通过他们与捷克人及北欧诸国的军火商取得联系。

捷 克 人

捷克人是军火贸易中的新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才从奥匈帝国的统治下解脱出来，很快的成了一个生产军械的国家，斯科达是它最重要的兵工厂。捷克是一个内陆国家，无法与其他国家进行直接的运输交往，可是凡尔赛和约363款划定斯德汀、汉堡为自由区，捷克亦可以利用。这样，捷克货物的进口出口就没有很大困难了。1920年6月29日签订德捷经济协定，第一款规定：“德捷两国的货物和人员，两国之间不受任何限制。某些技术问题，可按照一般运输规章行事。”

捷克没有签署“禁运军火协定”，它在中国进行军火买卖并不受到限制，它投身于西方的军火买卖的门路很多，又与德国订了条约，可以在主要的港口自由进出。捷克并且与挪威合作，实际上暗中组成了军火联盟，彼此帮助，从中谋取最大利益。

1924年，布拉格的一家诺沃特尼（Nowotny）公司，给它在天津的代办运去大批军械，并催促它从速转给张作霖。可是在运输途中，被新加坡的英国当局查获。英捷双方官员为此进行多次商讨。捷克外交部的吉沙（Girsa）、贝尼斯（Benes）博士对在布拉格的英国人说，他们将劝说捷克政府参加1919年5月5日的“禁运军火协定”，但是业已启运的军火，应容许其继续前进运往天津。1925年10月14日，有步枪8.1万支、子弹4000万发运

到营口。这笔交易，是由捷克伯隆诺（Brno）兵工厂和捷克国防部负责商谈的，经国防部和贝尼斯批准。

捷克政府虽然原则上可以同意1919年“禁运军火协定”，但是对捷克公民从事这种贸易则并不准备加以阻止，除非其他各国真能做到军火的禁运。但是，倘若各国真做到这一点，那末苏联、挪威将垄断这些军火交易了。因此，就捷克来说，军火的自由买卖，将使自身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这就涉及到与德国及挪威的关系了。

奥斯陆是捷克军火联营的集合港口，在张作霖被刺前的六个月，捷克货船“普拉格”号（Praga）从汉堡驶到奥斯陆装载军火，准备经好望角，驶马尼拉，到秦皇岛。此船装有步枪4万支、子弹2000万发。此后，又给张宗昌、孙传芳运步枪15万支、子弹750万发。

布拉格、汉堡、奥斯陆的联运并不是捷克贩卖军火的唯一路线。为了防范德国、挪威政局的变化，需要另有准备，捷克转而向意大利和希腊寻找出路。1924年10月，英国驻捷克代表克拉克（George Clark）报告说：北京有一名叫罗森塔尔（Rosenthal）的，向斯科达订购大批军火，希腊的代理人准备将这批军火由萨洛尼卡（Salonika）运出。但是要经过匈牙利、南斯拉夫，这条道路困难殊多，牵涉到很多国家，而且需时很久，因此准备设法从意大利寻找出口。

1928年，在蒋介石的势力到达北京前的一个月，意大利政府曾要求斯科达公司进行意捷联营军火贸易，并准备从的里雅斯特（Trieste）出口。捷克是否同意，此处不详论，但是意大利之乐于军火联营，这是当时国际上的常例。捷克倘若同意，就涉及到捷克的很多军火工厂，包括国营的伯隆诺兵工厂，这个工厂在1925年就和张作霖有来往。

斯堪的纳维亚的商人

挪威、丹麦亦是沒有簽署1919年5月“禁运军火协定”的国家，因为，它们对中国军火市场的态度与捷克相似。但是它们同样了解到，与中国军阀进行军火买卖，可以获得巨利。它与捷克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卖军火之外，还卖各式军需用品。例如：车床、抽水机、化学器材、钢材、制服、靴子、头盔、披肩，当然，还有不少步枪、手枪、机关炮。挪威、丹麦、瑞典这三个国家，在军阀的部队里还有为数不少的顾问。

上述三个国家中，以挪威卖给中国军阀的军火为最多，张作霖是它的大主顾。挪威的兵工厂在劳福斯（Raufoss）、康斯波格（Kongsberg）两处的，乃系政府所经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挪威政府的官员，常常考虑这些工厂的出路。长期以来，亏损甚巨，政府考虑要与需求军火的国家签订合同，那末，当时由军阀掌权的中国是最有利的市场了。1925年，私营的斯普拉格托夫（Norsk Sprangstoff）公司，将炸弹卖给中国军阀，此后1927—1928年北伐时期，挪威有不少公司与中国进行军火交易。

1927年，挪威的格兰公司（A.L.Gran）在沈阳有一个分公司，和张作霖订了一份合同，为他装备了一座化学工厂。这个工厂由德国人维特（Whitte）设计，生产T.N.T炸药，机械装置由格兰本人主持，瑞士人布拉克赫姆（Carl Brakenhielm）充当助手，他原是张作霖兵工厂的外国总顾问。该兵工厂为筹集资本，驻沈阳的怡和洋行，曾经代为向汇丰银行交涉。格兰在两年前，曾由瓦夫（Var）号货轮装运西蒙森（Haldfan Ditlev Simonsen）公司的军火运给张作霖。各以货物重量计算，有步枪129000公斤、白朗宁手枪3.9万公斤、黑色火药2990公斤、T.N.T火药20.7万公斤。

挪威和张作霖进行的一批买卖最大的交易，是在德罗波赫(Dröbsh)附近的尤金(Eugene)，由沙柯达(Sakudale)号货轮装运的14189箱军货。这批货在1927年11月19日到营口，内有步枪12987箱、雷管8箱、T.N.T火药545箱、无烟火药309箱、黑色火药17箱、混合火药282箱、迫击炮弹17箱、推进机24箱，共计重量为1176吨，经张学良指令海关批准进口。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挪威货轮罗隆号(Rollon)到秦皇岛，运来火药400吨。

挪威货船从启程到张作霖接收，它的全航程都受到英国方面的监视，清楚了解到贝斯蒂克号货船上载有3608箱军火。这笔军火涉及到好几个国家。最初由德国、捷克集中到挪威奥斯陆；荷兰的军火则在汉堡由波恩(BONN)号货船运到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装上尼奥维号货轮。1928年，贝斯蒂克货轮装满劳福斯工厂出厂的军火经英国劳埃德(Lloyds Underwriters)公司保险，又经挪威奥斯陆驻营口的经纪人阿穆森(G.G. Amundsen)负责，把14箱飞机零件、60箱军械、8箱体育用枪，一起运给张作霖。另外3626箱，由阿穆森与汉堡弗兰克(George Frank)美中进出口公司运交给青岛的张宗昌。

还有一批运给安国军的零星军械，也在1928年3月18日运到青岛，从挪威船艾金(Aker)号卸货，运给孙传芳、张宗昌和张学良、杨宇霆的奉军第三、第四军。张、杨所收到的2482箱军火中，有步枪、手枪、子弹，价值一百万圆。1927年7月，艾金货轮停泊青岛，船上载运给张宗昌的军火2107箱。

挪威军火运送给中国军阀，不仅该国外交部插手，该国政府首脑也常常过问。当有军火运输给安国军时，挪威外交部经常与艾金号船主戈里森(Gorriessen)接触。因为这笔交易对挪威的出口商和海运有利，对此不加阻止。挪威首相莫温克尔(Mowinkel)曾对英国驻奥斯陆的大使承认，挪威的国家兵工厂给安国军输运军火，而且在1928年6月张作霖被刺身死后说过，应当在中

国另找出路，并说业已签订的合同需要执行，而与国营的劳福斯、康斯波格签订新约当设法避免。

丹麦的态度与挪威相似。他们认为中国的政局虽不稳定，但却是一个从中发财的机会。1921年，哥本哈根的尼尔森、温斯特公司与张作霖签订的合作很有代表性。张作霖需要利用它们的力量在沈阳建立兵工厂，由这两个公司供给车床、抽水机，以及制造野炮、炸弹等军械所需的设备，并且希望每日制造野炮20门、炮弹100万发。

尼尔森、温斯特运来的各种设备，在1922年11月由马拉亚号货船运到营口，计有机械300套，价值300万圆。这些机械大多是由尼尔森、温斯特公司从德国购到的。据丹麦外交部长说，英美的公司，曾与上述两公司竞争，但因要价太高，张作霖不愿委托。据说英美方面曾向丹麦政府抗议。据丹麦外交部长说：这种抗议实属不公，因为英美的公司曾经在1920年—1921年为沈阳、太原、广州等地的兵工厂供应过类似的设备，政府并不加以干预。丹麦对英国政府的正式复文称：“丹麦政府对此类物品的出口未加阻禁，此类物品自可任意载运，不必经政府批示。”^①

丹麦政府对美国的复文指出：“美国所指各机械，并非均系用以制造或修理武器之用，因此不便加以禁运。丹麦政府认为，如加干预，实无依据。”^②

尼尔森、温斯特公司除供应设置兵工厂的器械外，还派去顾问，如制造小型座炮的专家布拉克斯姆、制造步枪的专家施罗德（S. Schroeder）、制造大型武器的专家克里斯琴森、制造炮弹的专家拉森（Larsen）。他们都是丹麦人。

张作霖不仅从丹麦购进兵工厂所需设备，1923年6月，又订购了价值25万圆的制服和军需用品。1926年11月，上述两公司又

^① 帕尔（R. C. Parr）致寇松（FO 228/3105，1922年5月24日于哥本哈根）。

^② 科尔特（C. M. T. Cold）致丹麦外交部（1923年11月23日）。

为张作霖供应了弹壳30万吨，及炸弹等军火。

美国、瑞士、荷兰商人

张作霖与西方国家的军火交易规模很大，他从英、法两国购得建立空军所需的设备；白俄、意大利人、德国人、捷克人、挪威人、丹麦人与英法一起，为张作霖的沈阳兵工厂供应军械设备。其他的西方国家也与张作霖进行军火交易，不过数量较小，来往也不经常。

前述的美商安德森公司、迈耶公司，在二十年代中，曾供应张作霖三十座机器，可供生产雷管、皮带、黄铜等军需杂件。这笔交易，就是1922年丹麦政府外交部曾对美国抗议的复文中提到过的尼尔森、温斯特的合同。

1922年，张作霖又要他的商务经纪人从美商贝克（Baker）处购买军服衣料90万元。同年，又从驻天津的美商购得100辆装甲车，每辆2万元，预计100万元，定于1923年1月在沈阳交货。1923年，美商又卖给奉军皮制护胸。

瑞士、荷兰也在中国做军火生意，但是数量和规模都不大，1924年7月，有两架奥式朗纳（Lowhners）4座飞艇、2架奥式戴姆勒巡逻机从瑞士运到沈阳。张作霖还从比利时的鹿特丹、安特卫普购得步枪5万支以及足够数量的子弹。

张作霖购买西方国家的军械及其作用

自1922年的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一心一意想要加强他的奉军的力量，与一切可能进行交易的西方国家打交道，希望从它们那里获得军械。这样，同时也可以减少对日本的依赖。当然，他并不放弃与日本原有的联系，从日本方面获得军械和顾问。

日本在东三省的势力很大，直接影响着张作霖的军事政治活动，张作霖对此深有警惕，所以竭力从西方国家中获取军械，以

便与日本方面过分强大的势力取得平衡。西方国家的军火合同，不仅减轻了张作霖对日本的依赖程度，而且这类合同很少具有政治束缚的力量，军械的价格也比较低廉，手续也很灵活。1922年以后，张作霖深感受制于日本，他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减少了这些束缚，使他具有参予统一全国的军事政治活动的力量。

张作霖既要避免受日本的束缚，可是在与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进行军火买卖时，又要避免受制于另一些国家。所以张作霖除了从西方国家购进制成的军械外，又设法购进一些设备，以便自行建立起一个兵工厂，因此他又需机械设备和顾问专家。可以这样说：军阀时代中国军事的现代化，乃是采用了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技術。张作霖在东北的经济条件颇为优厚，在当时成为一名颇为重要的首领人物，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主要的是依靠西方国家的军火商人。

张宗昌获取的西方军械

张作霖是二十年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军阀，张宗昌却是一个怪人，他放荡不羁，毫无知识，残暴成性，可是又尊崇孔子。他一向信从张作霖，统治山东时，镇压了高惜冰。高为报1919年结下的仇恨，起兵反对吉林孟恩远，动摇张作霖。1925年张宗昌任山东督军，其力量超过吴佩孚在长城要隘冷口的第九师，两军冲突，冯玉祥趁机一举于1924年10月逐走吴佩孚在冷口的军队，吴本人从塘沽坐船逃往上海。

张宗昌忠于张作霖。1925年4月，张作霖把他捧上山东督军的地位，初上任时，就支援张宗昌四十万圆。后来，山东税收增加，张宗昌放肆削掠，从1925年到1928年间，山东省的经费预算89%用于军费。

当1926年7月1日张宗昌再次任山东督军时，正是北伐进军时期，国民党在北伐动员令中说道：“为保障人民福利，必须消

灭军阀及一切反革命势力，如此方能实现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

张作霖及其两名副手张宗昌、孙传芳，在1926年11月24日联合组成了安国军。张宗昌除了从张作霖那里取得军械之外，还自行和西方国家的军火商人交易以增加军力，尤其在受到北伐军进攻期间。

张宗昌与捷克的军火商，也与挪威人常有来往，但主要的对手还是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人在山东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中国国内军阀的内战愈是激烈，军阀需要的军火愈多，西方的军火商人获利也愈大。

张宗昌和捷克人之间，进行过几场军火交易。1927年秋，捷克布鲁恩（Brunn）兵工厂，有五万支步枪运到青岛、布鲁恩兵工厂是捷克政府支持于1923年1月1日成立的，拥有三千万捷克金币的资金。它一直认为中国的军火市场获利甚厚，不可忽视，它与斯科达工厂相似，一直得到英国公司的保证和蔽护。伦敦劳埃德公司早已了解到，中国军阀对西方的军火商人的信任尚不稳定。

张宗昌曾从捷克军火商那里获得不少军械，但迄未成为最主要的供应来源。安国军组成后，驻留在青岛、济南的许多德国商行，为张宗昌运来很多他所需要的军械。1926年11月28日，卡洛威茨公司和张宗昌签订了一份300万元的合同，购订180万元的子弹，每百发计价13元，以及各种弹壳。1927年1月24日，德国货船里希曼号装有大批军货运到青岛，乃系德商埃迪布特（W. Edelbittel）公司所采办，计有9.8毫米步枪4371支，附有刺刀3240具，8毫米步枪6600支，附有刺刀6671具，以及挂枪皮带10096副及子弹300万发，另加前未付清的1124发炮弹，还有2门机关炮、12门迫击炮、200支毛瑟枪、子弹220万发，还有一架运往上海的水上飞机。以上各种军械，皆为张宗昌所卤获。

1927年夏，德国船只阿姆兰（Amrum）号由里加（Riga）驶往青岛，载货5000箱，内有步枪6000支、皮带6000付、刺刀6000把、子弹600万发。另外尚有手枪13支、枪弹1005万发，以及无线电发报机一架。老式的李氏恩菲尔德步枪，原系拉脱维亚政府购自英国弗莱明（Fleming）公司。德籍美国人弗洛（Flaugh）负责在里加装上船运到青岛，中途由一家英国公司保险。船到青岛，由中德贸易公司的洛兹（J.H.Lotz）将货物交给张宗昌。

西方商人卖军械给中国军阀，虽然手续繁杂，例如输运时期、输运路线，以及层层中间商人。可是因为获利很大，风险颇小，所以对西方军火商人很有吸引力，而且与中国军阀交涉时，常常居于有利地位。例如，即使货物品种不合适，也不会被中国军阀指责、退货；而且中国军阀还常常对他们表示感激之情。例如，张宗昌曾为德国船只里希曼顺利运到军火，特为之举行晚会表示谢意。^①西方军火商和中国军阀军火买卖，很少发生纠纷，步枪配件可以在军阀的兵工厂配齐，生产少量子弹更是轻而易举的事了。在当时，军阀迫切需要的是步枪和迫击炮，军阀本身设立的兵工厂不能满足要求，需要西方军火商源源不断的供应，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就更频繁而直接了。

挪威和张宗昌进行的军火交易也是大有利可图的。1927年8月到1928年8月的年间，有大批军械由挪威船只艾金号、斯卡尔号、贝斯蒂克号装运到青岛。艾金船上装有两批军货，一批是由张宗昌的军械顾问利（W.J.Leigh）经办的，1927年7月6日从奥斯陆启程，装载军械2107箱，内有九架德国尤特德公司制造的飞机零件。此外还有皮带20800副、刺刀11370把、新式步枪8875支、老式步枪2500支、刺刀11370把、前膛枪9000支、零件250种、猎枪6支、子弹1200发、飞机座舱步枪12支、体育用枪及雷管10箱。

^① 济南特务情报（FO228/3763，1927年9月30日）。

在艾金船第二次到达之前，斯卡尔号船只已运到步枪7000支、机关炮10门，子弹及炮弹210万发。以上军械分别供应给张宗昌及安国军各部。此船于1928年1月抵达青岛，所载军械系青岛国际贸易公司、联合贸易公司、海因策尔(Heintzel)公司联合经办。

艾金号货船第二次到青岛时是1928年3月，载有军械2482箱，其中2140箱系运交给张宗昌的，计有88型“七九”步枪130箱、98型“七九”步枪1941箱。其他各物，则有刺刀、机关炮、炮弹、手枪、钢盔等杂件。

1928年8月，贝斯蒂克号货船到达青岛，内有军械3526箱在青岛卸货，82箱在营口卸货。张宗昌接收的这笔军火，系天津中美进出口公司经办，内有步枪500、支刺刀5000把、肩带5000付、子弹500合、白朗宁手枪40把、子弹43000发，共计39405金圆，由天津比国银行的施罗德签署。

张宗昌为了增加他的军械供应，也自办了兵工厂，先在德州，后在济南。济南的兵工厂由捷克的军器专家汉希特德经办，利用原在德州的设备，制造坦克及其它军械，1927年改由一名德国人弗拉克(Fracke)经办，又请了一名德国人杜兹(Doth)在青岛北的沧州营建了一个飞机场，由一名旅居青岛的德国人奥斯特(Franz Oster)为张宗昌试制300匹马力的飞机。

孙传芳获取的西方国家的军械

孙传芳像张宗昌一样，是安国军的一名副司令；吴佩孚、阎锡山名义上也是安国军的副司令。张宗昌对张作霖一直是忠心耿耿的，孙传芳则有时又支持吴佩孚。国民党北伐时期，孙传芳控制了浙、苏、闽、皖、赣诸省。当时赣苏、闽浙一带，在1926—1927年间为国民党势力所侵占，孙传芳乃与张作霖、张宗昌联盟。他之所以加入安国军这一集团，想从中获取更多的军械。张

宗昌曾答应孙传芳可以使用他的鲁军，只要孙能及时支付军饷，孙就从浙皖税收中支付给他五十万银元。张宗昌还把他从西方国家运来的军械卖给孙传芳。1928年3月，艾金号货船运260箱军械到青岛，张宗昌指定将此运输给孙传芳，计有步枪1000支、刺刀1000把、皮带1000付、子弹300万发、机关炮150架、手枪106支、子弹5万发。1928年8月，又有从贝斯蒂克船上运到青岛的军械，也是指定供应给孙传芳的。

据说孙传芳曾向英国方面洽购价值500万英镑的军械，这是传闻中供应孙传芳军械数量最大的一次，但是无从证实。就实际情况而论，当时孙传芳所统治的长江流域，历来是英国在华商业利益的重要地区，因此，两方要趋于一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孙传芳和中国的其他军阀一样，总是力求有某些西方国家对他支持。张宗昌独占山东，地位比较稳固，所以便于与西方国家进行军火交易；而孙传芳地处长江流域五省，其地位动摇不定，难以与西方的军火商建立比较稳定的关系。即使如此，孙传芳与西方的一些军火商还是常有直接的联系。例如1924年10月，一艘“诺德曼克”（Nordmark）号的意大利船从热那亚驶出，将一船德、捷制造的军货运到浙江，共计293箱，其中自动炮2箱、迫击炮12箱。孙传芳在货到后在上海检视，认为德商供应的军械颇为精良，分别由他和另一些军阀买下。

吴佩孚获取西方国家的军械

吴佩孚所占的地区也属于长江流域，他因此和孙传芳相似，想从英国方面取得军械。据说，吴佩孚在汉阳、巩县的兵工厂就是用英国供给的设备建立起来的。吴佩孚势力的成长和成为一名“强人”，大都得力于英国人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①但是，他们的关系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例如1921年，吴佩孚想

^① 麦克莱致戈夫（Herbert Goffe）（FO228/3113，1921年3月6日）。

从英国贷取1500万银两，用此购买军械和雇用士兵。当时英国的驻华使馆和香港当局曾多次讨论，认为此举违背英国的中立政策，并设法阻挠英商给吴佩孚贷款。^①

英国并不公开支持吴佩孚，吴佩孚转而向其他国家联系，争取价廉物美的军械，增加他的军事力量。1922年2月，吴用奈尔斯(Niles)、贝门特(Bement)、多德(Dord)等美国公司生产的军械装备他在巩县的兵工厂。所有各种设备，由美商卡堡格(Karberg)公司、卡洛威兹公司设法运到上海。一个月后，有两名法国工程师来视察吴佩孚在巩县的兵工厂，并决定增加设备以便制造飞机，扩建1920年从段祺瑞手中夺得的飞机场。

1922年8月，一名意大利掳客加兰达(Galanda)向吴佩孚推销价值560万元的军械，在1922年9月4日预付了25万元，交给一家外国银行存储。在这同一个时期里，一个美国人史蒂文(Stevens)，将一艘打扮成“渔船”的美国船只走私装运的步枪、机关炮等军火停泊在海参崴，以后从海参崴卸货，经中东路运到哈尔滨、长春，最后设法南运交给洛阳的吴佩孚。还有一个名叫斯莱文(James Slevin)，把飞机卖给吴佩孚。还有一艘船只满装着从西伯利亚逃来的白俄，这艘船只后来驶到吴淞口。这些白俄从吴淞口到上海的短短路程中，把他们私带的军械卖给了吴佩孚的经纪人，其中有4英寸、6英寸口径的炮和炮弹，以及炮身長75厘米、47厘米、40厘米、22厘米的各种座炮及相应的炮弹。此外还有20箱零碎及照相器材、步枪2000支。白俄卖出这些军械，得以在上海谋生度日。

1924年春，吴佩孚又与意大利人打交道，用300万元购得步枪4万支、子弹5000万发，7厘米口径大炮及5万发炮弹、机关炮。这些军械，暂时储藏在天津。

吴佩孚和其他的军阀一样，只要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利，他

^① 外交部秘密情报(F0371/8001, 1922年9月16日)。

可以与任何一个国家打交道。他的上司曹锟，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军阀。

曹锟获取西方国家的军械

曹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从西方国家购进了不少剩余军火。1916年他曾准备买进泊于安庆的一艘英国炮艇。当时英国的注意力集中于世界大战，此议未有成果。1920年，英商佩奇公司也想从事对中国军阀的军火贸易，12月9日曾与直奉联军进行商谈，但是未能获得官方的批准。后来，直奉军队战胜了皖军，缴获了段祺瑞的一些飞机之类的战利品，也算是一种补偿。

英国和曹锟的军火交易并未取得多少成果，意大利就趁机而入了。1921年11月曹锟与意大利政府谈判，取得了4011吨军械，那时意大利政府尚未参予1919年5月5日的“禁运军火协定”。这4011吨军械分别运送到沈阳10吨，山海关2434吨，北京60吨，天津1507吨。这些军火在1919年12月，由天津马兹里公司从神户运到北京。意大利政府经手这批军火的是意大利使馆的武官瓦尔达（Varada）上校。内有迫击炮2万门、炮弹100万发，存放在北京的一家意大利医院，1921年运往天津曹锟的司令部。山海关的军火储藏在滨海的一所意大利军营中，也在1921—1924年间先后交到曹锟手中的。

这一批军火装满了80节车箱，1921年11月21日、22日先后到达天津。英国使馆武官帕尔默（H.B.Orpen-Palmer）早就在监视这批军火了，在货到之前就向驻华英国公使阿尔斯顿作了报告。据说，其中有步枪3万支、子弹300万发，价值700万法郎；又有山炮6门，价值460法郎；炮弹2.4万发，价值290万法郎；菲亚特机关炮50门，价值70法郎；炮弹30万发，价值300万法郎。1924年，存放在山海关的军械，运给了天津的曹锟。计有步枪1.9万支、子弹1700万发、野炮21门、炮弹2500箱、手榴弹

1400枚、无线电机通讯2架，共计200万元。

意大利外交部曾与美国驻意大利的大使说明过，声称曹锟由意大利所购军械，是政府所准许的。1923年曹锟还向意大利商人安吉洛（D'Angelo）购买价值550万元的军械。此外，曹锟还另找关系，购买军械增加自己的军力。据1923年6月布思（W.R. Booth）报告麦克莱（Ronald Maclay）说，曹锟曾派出两名代表与天津的伍伦（Woclen）、沃西（Vosy）公司的经理、英国的化学专家接触，希望他能帮助制造毒气，供飞机上配备毒气弹之用，据称所需数量颇巨。

曹锟努力想加强他的空军力量，那末与英商的交往是一条有利的途径。后来，英国政府制止了佩奇的合同，1922年曹锟改为通过在上海的代表向法国购得飞机十架。1924年10月，曹锟在倒台之前，还继续向其他国家购买军械。德国船只里克默斯号，为驻汉口的布瓦苏公司装运飞机和240箱迫击炮到天津，价值1.8万英镑，又为北德劳埃德公司的费尔兹号货船于1924年运载飞机两架到天津。

布拉格的一家捷克军火公司诺沃特尼报导，1924年6月7日施莱斯丁号货船从安特卫普运出25箱手枪枪弹25万发；同一个月内，又有沃格勒号货船，从汉堡运出迫击炮六箱；1924年6月18日，奥利夫号货船从汉堡运出迫击炮300门。以上所列军械，均系运送给天津的曹锟部队。诺沃特尼在天津的经纪人名叫普赖荷达（J. Prihoda），他住在天津丰大业路87号的办公室中经办这些军火买卖的业务，又得到北京曹锟政府的批准。不巧，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北京兵变，各船所载的军械都转到了冯玉祥、张作霖手中了。

冯玉祥获取西方国家的军械

吴佩孚失败，1924年11月2日曹锟辞去总统职位。张作霖、

卢永祥、冯玉祥，会同段祺瑞在天津开会，筹划组织新政府。经过磋商，1924年11月24日推定段祺瑞为临时执政。段祺瑞和张作霖曾经在1920年翻过脸，因此这次的新联合颇有些捉摸不定的感觉。浙江军阀对冯玉祥的反叛倒戈颇多不满，但是直系军阀既已溃败，这一批军阀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得到暂时的安全感。他们又都不愿意支持张作霖和冯玉祥，一面力图避免与张作霖的正面交锋，一面又力图阻止张作霖的势力进到长江流域。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他们接受了张作霖的推荐，使段祺瑞成了临时执政。

段祺瑞内阁中，没有冯玉祥一派的人物。冯自己感觉到，自己既无声望又无实力地位，他了解张作霖的军事实力，决定就任由张作霖所任命的西北边防军司令一职。

冯玉祥在西北的势力限于绥远、察哈尔一带，他建司令部于张家口。1925年8月25日，甘肃军务督办刘郁芬也归他统率。

冯玉祥竭力想加强他的军事力量。1925年4月间，苏联曾答应给冯玉祥的国民军以军械援助，但是以冯玉祥容许在国民军中进行国民党的宣传为条件。这使冯玉祥感觉到矛盾：一方面他既需要苏联的军械援助，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服从国民党的控制。可是冯玉祥既没有足够的武器，又根本没有自己的兵工厂制造武器的能力，他只能依靠地理上的方便条件，从苏联取得军械。他曾经设法试从沿海口岸运进武器，可是一到沿海口岸就被其他军阀截取了，所以不得不经西北陆路运进苏联提供的武器了。

1925年2月，冯玉祥与鲍罗庭商定，给国民军以财政援助和供应军械。^①1925年4月到8月，这批军货分两次运出：从莫斯科启运，经西伯利亚铁道到乌兰乌德（Ulan-Ude）。当时乌兰巴托（Ulan Baatar）还没有和西伯利亚铁路接轨，只能靠陆路驼运，需时四个月，运到买卖城，以后到乌兰巴托，再经京绥路到平顶山，冯玉祥又派部队从平顶山运到张家口。这次贩运的军

① 费希尔（Louis Fisher），《苏联与国际事务》卷I，页648-650。

械，被一名丹麦的官员考夫曼（Kauffman）探询，作了报导，他当时恰好由蒙古到北京。

这次由乌兰巴托运到平顶山的军械，有摩托车300辆，驾驶这批车辆的汽油却是从北京运去的。所载300辆车中，计有军械100箱，其中步枪1500支、子弹1500万发、自动机关枪27架、枪弹63万发、挖掘机1000架、手榴弹3万把、炸药100普特（一普特等于540磅）。上述各军械，又由平顶山运到张家口。

另有一批从莫斯科运到乌兰巴托的军械，包括步枪6400支、卡宾枪1.5万支、子弹7200万发、机关炮189架、炮弹645万发、野炮66门、左轮手枪1800支、枪弹500万发、野餐用具50套，两轮车150架、军刀1.6万把。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搜查苏联驻北京使馆，搜出冯玉祥的两张军货收据。

一张是购买步枪27970支、子弹27350545发、马克星机关炮90门、圣爱丁机关炮50门、维克斯机关炮3门、刘易斯机关炮4门、3英寸口径炮42门、拖车42架、炮车84架、炮座126座、瞄准仪63具、手榴弹1.1万枚、化学弹640枚、战壕军车18架、掷弹机1000架、军刀1000把、长矛500支、飞机3架，以及其他零件，总计货价为436365.61卢布，直接由莫斯科运往张家口。

另一张收据，包括步枪3530支、子弹23649455发、马克星炮80门、三英寸野炮18门、榴弹炮18门、炮弹38箱计17654发、化学炮弹9360枚、战地摩托车18辆、火药柱1800支、防毒面具30000具、燃烧器10架、纳门特手枪500支、军刀4000把、手枪子弹5000发，总计货价为4501999卢布。

冯玉祥从苏联获得的军械，加强了国民军的力量，但是，他也同样设法从其他国家获取军械。例如当莫斯科的第二批军火运到张家口时，他同时又派代表和驻在北京的意大利人商购军火。英国驻北京的武官帕拉里特，曾向意大利驻北京的代表询及

此事，意大利代表答以此系一天津意国商人代为购买制造毒气的设备。1926年2月，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二军向英国安利洋行购买军械，计有步枪1万支，每支85元；子弹200万发，每百发12.5元；机关炮24门，每门7500元，炮弹500万发。

冯玉祥和其他的军阀一样，认识到军械供应倘若只靠一个来源，那是对自己不利的，因为这样一来，无异于把自己束缚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当然，有一些军阀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只能单独依靠某一个特定的国家。云南的情况就是如此。

云南军阀获取西方军械

二十年代中国军阀中，从法国获取的军械最多的是唐继尧，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他亦曾向英国洽购军械，英方因碍于1919年的“禁运军火协定”，没有同意。其实根本原因在于云南当局不承认北京直系政府的地位，而英国却以当时北京的直系政府为唯一合法的政府，所以向怡和洋行和温哥华的莱斯特（A. M. Lester）公司示意，嘱他们不要和唐继尧洽谈。唐继尧转而又购进了德国的机械，工具、车床等设备计25000元。但是他大量的军械仍来自法国。

唐继尧和法国的频繁交易，也是由于地理条件所造成。云南和印度支那毗邻，法国早已有意于云南，云南的鸦片大都运入印度支那。唐继尧则视法国为他所需军械的主要供应，唐继尧可以借此增强自己的势力，以阻止范石生、龙云等人的势力的渗入。云南和印度支那既可经沅江、红河到海防的水运，也可以径直经滇越铁路。

1920年，唐继尧从东京湾的法国商人处购进步枪7000支、机关炮20门、炮弹5000发。1922年10月，又从法国普安沙、韦勒商行购得布雷盖飞机6架运到昆明，又从云南派去学生10—12名到印度支那东京湾的某地学习飞行技术。1923年3月，唐继尧从河

内商业联合公司用滇币30万元购买军械。4月,即收到步枪2万支、子弹200万发、炸药1.5吨。这些军火是从马赛经海防运到云南,云南地方当局将个旧锡矿的开采权出让给了法国。^①1923年7月、8月、9月,先后从法国运来步枪2800支。当年春天,又购得飞机20架及部分零件,价值10万美元,并有法国飞行员阿皮德(Arbitre)上尉随行。阿皮德上尉本人还私带一些机械工具在云南出售。1924年2月,安南政府派出一名法国机械士马丁(Martin)帮助唐继尧筹办空军。2月,又有6架考德隆训练机从安南运到云南。这种双座训练机,每架价格在1850—2000美元之间。1926年,唐继尧又通过驻昆明法国领事,购得步枪7000支,子弹550万发。每一支枪附子弹1000发,价格为110美元。11月,又购到步枪5000支及子弹甚夥。上述各项军械,唐继尧把它们分发给手下的20个团的士兵手中。防守滇越路北段的军队,他们所得的兵械最多。唐继尧手下的三名镇守使,昆明的龙云前后独得步枪90万支,蒙自的胡若愚和昭通的张汝骥仅得步枪400支而已。从唐继尧分配枪械的情况来看,也可以说明唐对胡、张的不信任。后来,事实也终于证明。1927年2月,胡、张起而推翻了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

统治云南的军阀虽然换了人,但是他们和法国的关系并没有变化,因为代之而起的军阀,照样需要由法国供应军火以便于他们加强统治的力量。而法国当局并不考虑那一名军阀来统治,没有改变政策的需要。

唐继尧被逐下台的前一年,他曾派唐继虞、徐之琛去东京湾拜会印度支那的法国总督凡尔纳(Alexander Varenne),接着签订了一些购买军械的协定。唐下台后,凡尔纳继续与云南当局联系,1927年夏,为龙云运去步枪7000支、子弹700万发。这

^① 云南外侨致北京公使团,1923年4月25日自广州(载KM 1923年5月21日于北京)。

些军械，都是斯科达工厂的出品，先运到景洪，再运到昆明。凡尔纳经手的军械，价值11.5万美元。

法国对龙云的支持，远比对胡若愚、张汝骥的支持要大得多。1927年6月，胡若愚包围了龙云的住宅，并把龙云囚禁起来。龙云的家属躲到法国驻昆明的领事馆内。后经多方面努力，龙云7月获释。自此以后，龙云在云南的声势日高，一则因有云南地区的地主官僚的支持，二则因为龙云控制了滇越路北段的势力，更重要的是法国对龙云的优惠态度，帮助他把胡若愚的势力赶到四川，把张汝骥的势力赶到贵州。龙云从中得了实惠。

法国在这个过程中的活动细节难以探明，但是在这一期间，从法国运进了大批军械到昆明，这是很明显的事实。1927年12月11日，有毛瑟枪4箱400支、白朗宁手枪一箱100支、步枪37箱、子弹25万发，从海防运到昆明。同在这一天，又由德柯加蓬商行从海防运出连烟火药10箱、引线2箱、雷管3箱。从1928年1月11日起到2月10日之间，有两架布雷盖军用飞机和法国驾驶员马洛丁格（Malortique），150箱无烟炸药，以及469担日本铜铤从印度支那运到昆明。这一笔交易，使龙云的实力大为加强。要没有这些军器装备，龙云是否有能力把胡若愚、张汝骥赶出云南，最后于1928年统治云南，那就很难说了。

其他的军阀如何取得西方的军械

云南的军阀可以通过印度支那从法国购获军械，其他一些地区的军阀，如湖南、安徽、四川等地的军阀，就没有这种方便条件了。他们既没有像张作霖那样拥有海港，也没有像冯玉祥那样具有陆上通道。但是，这并不能说，他们就毫无获取西方军械的可能。

例如张敬尧，在他被赶出湖南之前，曾从意大利人手中购得价值100万元的军械。他先经天津比国外汇银行，给意大利的经纪人

马兹里预付31.2万元、购到步枪一万支、毛瑟枪150支、机关炮4门、步枪子弹120万发以及毛瑟子弹，为数甚多。1924年，王揖唐委托天津德华进出口公司的克里潘多夫订购毛瑟手枪120支、枪弹10万发。四川的杨森，与俄、法、德各国的军火商都有来往，刘湘曾由里克默思号货船给他运军械，在上海卸货，又转运到四川。1930年，刘湘从一家英国商行中购取机关炮500门、炮弹800万发。

浙江的卢永祥，他占有上海的港口之利，与上海的几名西方军火掮客，如赛林勃安可夫、柏格等人常有来往，通过他们与意大利军火商交易。他们在上海停泊一艘巡洋舰准备出卖，而卢永祥所需者只是军械而已。意大利驻华公使杜拉佐（Marguis Durazzo）曾公然告知英国代办克来夫说，意大利的这种巡洋舰在各国港口都有，在军阀统治的中国也有。其目的在设法做生意。1922年，卢永祥和上海护军使何丰林想从德国购买飞机。1923年11月21日，20架飞机、10座坦克车底盘由布瓦苏公司经办，经中国军舰朝云号运到上海。后来卢永祥在军阀争斗中失败，逃出上海，运到的飞机就被孙传芳卤获了。

陈炯明及广州政府获取西方军械

广州像上海、青岛、秦皇岛、营口一样，是西方船只可以进入的港口。它毗邻香港，更具备将军械运入南中国的方便条件。香港对外又可以与澳门、马尼拉等地区的广大华侨联系。

1920年10月26日，陈炯明、许崇智、邓铿从闽南进军，最后把陆荣廷赶出广州，结束了客军统治广东四年的历史。为了巩固统治广东的力量，防止桂系势力的重来，必须立刻加强广东本身的军事力量。

陈炯明在攻占广州后，立即派人和美商戴维司公司签订合同，购买军械价值1603844元。不久，美国船只旺特利兴（Won-

driehen) 号在广州卸货，有水上飞机及其他供兵工厂及造币厂所需的机件。1921年11月，他又与纽约西北贸易公司的加拿大经理商订合同，购买车床、钻床等制造军械所需的机件。这批货从香港运到广州，价值44000英镑。1921年，他又从怡和洋行购到同类机件，价值4万美元。

陈炯明统治广东的时期虽然很短，可是购进了不少飞机。1922年，由法国船只琴吉埃号从马尼拉运10架飞机到广州。当时菲律宾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从中也可以看到陈炯明购买军械时与美国的联系。在这同一时期，陈炯明因为要偿付所附军械的货款，特向香港的一家英国公司借贷300万英镑，英国公司在广东取得了一些开采矿产的优先权。这笔借款的一部分，是用以支付由德国船只哈姆（Hamn）号从汉堡运到广州交给贝伯林（Berling）公司的军械，计价209818香港关两，总重量为334吨，内有手枪5723支、子弹1604600发、猎枪2支、无烟火药21008磅、榴弹炮引线3500支。这批军械是从斯德哥尔摩转道汉堡，运来广州的。前后历时七个多月。

广州商团

1920年陈炯明攻占广州后，他与孙中山的关系就很难处理了。因为孙中山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广东的势力以作统一全国的基点，陈炯明则主张联省自治，反对武力统一全国。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的部属叶举逼走孙中山，但是在陈炯明心中，孙中山始终是他的一种威胁。1923年1月中旬，陈炯明终于被滇、桂军驱逐出广州，不得不退守到粤东，其残余势力一直延续到1925年。其间，他曾两次试图设法重回广州未果。

在陈炯明企图重回广州的时候，当时拥有七千人的广州商团的军火被国民党政府没收。广州商团的组织，原是为抵制国民党的苛捐杂税，以及抵制滇、桂军队的骚扰，并以其武力支持陈炯

明。当时，广州的共产党组织工会反对商人及各种行会。

商团的头目叫陈廉伯，他是汇丰银行广州支行的买办，陈炯明从中购得一批军火，用来作推翻广州国民政府之用。货款由香港汇丰银行资助，军火由英国税务司协助运进。^①这批军火得之于比利时，由安特普的艾尔弗雷德·布莱马勒（Alfred Bley Muller）经手运交广州的德国桑德尔·威利（Saunders and Weller）商行。比利时政府对其中情况十分了解，并函致海关当局，託请通融批准。^②

可是当载运这批军械的挪威船只哈夫（Hav）号到达广州时，即被国民党政府缉获，计有步枪4850支、子弹150万发、自动手枪4331支、子弹206万发、左轮枪660支、枪弹114200发。上述军械一经没收，广州商人即行罢市，要求发还收缴军械，并扬言如不发还，英国当局即将进行干涉。1924年10月10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发还一部分军械。当时，陈炯明颇有与商团合作的意向，国民党政府当即镇压了商团的游行示威活动，并没收了他们储备的武器。

从广州商团购订军械的过程来看，在军阀统治的时代，他们需要的军阀，势必依靠国外的供应，即使军阀自己设立兵工厂，也得依靠海外势力的支助。

回顾段祺瑞的情况

1920年7月，曹锟和张作霖联合打败了皖系段祺瑞之后，从此以后二十年代购买军械的活动中，段祺瑞所占的地位就很微弱了。众所周知，段祺瑞在其掌权时，他的军械主要依靠日本的供应。但是在他倒台之前，也曾与英国和意大利打过交道，购得

① 韦慕庭（Wilbur），《孙中山传》，页250。

② 翟尔斯（Bertram Giles）致克麦莱（FO 371/11672，1924年5月28日于广州）。

一些军械，但最后都落到直系、奉系手中。

段祺瑞从英国购进的军械，涉及到伦敦的北京银行团，由佩奇经手，买进客运飞机六架，每架10540英镑，于1919年2月签订合同。当时，“禁运军火协定”尚未签署。可是1919年9月26日，又批准北京银行团把“商用”车辆运入中国。

段祺瑞准备从意大利购买兵船和军械。1918年他派人去意大利，准备购买430吨的潜水艇两艘，每艘价500万法朗。意大利方面曾准备给段祺瑞贷款1800万元，段祺瑞准备用1200万元购进100艘炮艇、6艘扫雷艇、6艘潜水艇，由意大利商务参赞佩斯塔洛扎(Pestolozza)参加商谈具体事项。但是因为不久直皖开战，谈判毫无结果。但是段祺瑞在1919年12月，从天津的马兹利公司运进的4011吨军械中，获得了其中的60吨。

小 结

就以上的叙述，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在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一些比较重要的军阀都与西方国家的军火交易有关系。张作霖在东北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又有海港的运输条件，所以在与西方国家的军火买卖中，他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物。这些条件既决定了贸易范围的大小，也决定军械物品的内容；大而至于军车、飞机，小而及于军服肩章之类。因此可以说，军火买卖的意义超出于单纯的军事范围了。

第 四 章

西方军火买卖的后果

西方的军火买卖不只是简单的把武器卖给了军阀，它涉及到一些商业上的风险。就卖方来说，需要了解市场，标价议价，运输时地，保险系数；就买方来说，力求价廉，交货时地，付款手

续。军阀心目中，不仅要购得现成的军械，而且还要设法自己制造。^①就当时军阀具备的技术条件来说，要想创建一个自主的军事制作系统，那是相差甚远的，因此必需要有西方的专家、技师和设备前来帮助经营兵工厂、化学武器厂、军事飞行设备。这些人物为数不少，如格雷（A.L.Gran）、布雷根海姆（Carl Brakenhielm）、施罗德（S.Schroeder）以及声名狼藉的“独臂”人萨顿（F.A.Sutton），他们具有在中国制造武器的技艺。还有一些是野心勃勃的，如英国人霍尔德（F.V.Holt），他想在中国支援某些军阀创立空军；法国人普莱（Efienné poulet）从西贡来帮助张作霖建立空军；还有不少顾问前来帮助训练士兵。总之，他们企图用西方的技艺前来帮助作战或组织军力。张作霖、张宗昌雇佣了大批白俄作“突击”队。由此看来，无论是兵工厂、化学武器厂、设置空军，以及改进军队制度，当时的军阀都需要西方的技术专门家帮助使用新武器，以及自行制造武器。内战愈是激烈频繁，这种需要也就愈加迫切。西方的军事专家，如同西方的武器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剩余极多，他们就向玻利维亚、巴拉圭、中国等地区寻找出路。他们的出现，对中国二十年代的军事发展情势颇有影响。

兵 工 厂

近代西方型式的兵工厂，最先是在太平天国时由曾国藩、李鸿章在徐州、安庆、南京创设。大量军械从国外运进，因此国内的工厂形成修理装配车间了。1865年上海江南制造厂的设立，对此情势略有改变。一年后，左宗棠又由法国技师的帮助，在福州创立兵工厂、造船厂。此外，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创设的兵工厂要算是最主要的兵工厂了。

到1916年，计有29家兵工厂，其中只有8家能自行制造军

^① 罗斯基(Thomas G. Rawski)，《民国经济史》，页8。

械，其余大都是修配厂的性质了。内战频频发生，军阀纷纷创办兵工厂，但其规模不过是象一家较大的铁匠铺，以作修配军械之用。二十年代初，在四川就有这种铁匠铺型的“兵工厂”131家。即使规模较大的天津、保定、西安、张家口的兵工厂，也只能修理装配而已。

有人曾说过：“由于急需军械，可以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新的工业设施”，但是这些国内制成的产品是不能与西方的军货较量的。即使具有“城市里小的军工工业”，但没有能力制造出军阀所需的大量军械。当时中国境内，只有沈阳、汉阳、太原能制造出供一团一师军队所需的军械。沈阳兵工厂是二十年代军阀所拥有的最大厂家。1923年以前，只有这家兵工厂能制作军械。^①它是张作霖收买合并其他兵工厂而成的。例如，1921年江南兵工厂以2.7万两的价格把制造火药的机械卖给张作霖，张又从武昌兵工厂购进机械设备。它每日可生产500磅火药，15000—30000发子弹，还准备生产毛瑟手枪，生产适合日式步枪的弹腔，以及无烟火药、手榴弹、硫酸。全厂有电力200马力。但是要满足象张作霖那样野心勃勃的军阀，沈阳兵工厂的供应是远不足数的，它既不能生产步枪，也不能制造机关炮。因此，他在1921年经丹麦尼尔森、温斯特（Winther）公司买到300套机器，1922年11月运到营口。奉系力求以此在军械供应上能适当的求得满足。但是据报告，这批军械“并未全部运到，所运到极少数军械亦已损坏。”这是1923年初的情况。1924年装备大致齐全，每日能生产子弹30万—40万发，每年生产200件大炮部件和30万发炮弹。

沈阳兵工厂是依据湖北汉阳兵工厂的类型加以扩大的，生产

^① 麦科迈克（MC Cormack）：《张作霖传》，页106。

需要供吉、黑、奉三省奉军之用，开办经费的50%来自奉天，①厂址占地15平方里。工人17000人，女工大部在子弹制作车间，不少工人来自直隶、山东。②其中雇佣有1516名外籍人，大都是技工，白俄和德国人比英美人多。1928年间，沈阳兵工厂极为兴盛，日产步枪7500支、子弹900万发、机关炮70—80座、各种口径的炮弹45000发、弹壳120000枚，以及手榴弹、烧夷弹、炸弹（最大者为100磅）。锦州车间是沈阳兵工厂的重要分厂，日产左轮枪500支，原料大都为进口物资。除此之外，沈阳兵工厂修理装配各地的军械。张作霖力求能自给自足，可是他仍不断向西方购买军械。这说明他的兵工厂的自给能量颇为不足，而且他的兵工厂的装备大都来自西方国家，不能充份供应本身之所需。

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是第二个规模较大的兵工厂，武器设备来自德国，以电力为动力。1924年有工人1700人，生产维克型、马克星型的75毫米山炮、机关炮和其他小型军械。他聘用怡和洋行的雇员和退役德国炮兵军官赖特（H.T.Wright），厂长和主要工程师都曾在谢菲尔德（Sheffield）大学学习。1926年，全厂工人近8000人，有很多童工，有五名外国顾问和留学回国的中国工程师，每日可以制造1500支步枪，240—360万发子弹，500支毛瑟手枪，30座水冷马克星型法国肖尚型（Chauchaut）型机关炮，300支三吋迫击炮，同时还制作火药引线。这个工厂尚能满足阎锡山的需用。它和沈阳兵工厂那样，也设有修理各种军械的机器。

其次，就生产的数量来说，汉阳兵工厂也是一个重要的兵工厂。它用威斯丁豪斯（Westing house）的电机设备，有工人

① 帕姆（Orpen—Palmer）致外交部（FO371/6646，1921年1月11日自北京）。

② 沙利斯基（Siluski）：《张作霖治下的东三省》，页100—197。

4500人，机件大都来自德国和美国。1924年间，每日制造4000把刺刀、6000步枪、1500支卡宾枪、4400支施内德（Schneider）手枪、20支菲利浦（Phillips）自动步枪、20架马克星机关炮，以及每周制作平光型子弹50万发。1928年的月平均产量是390万发子弹、6,000支步枪和卡宾枪、300毛瑟枪、50座水冷白朗宁机关炮，以及迫击炮、手榴弹、大小炸弹。

沈阳、太原、汉阳兵工厂是军阀时期的主要兵工厂，与南方相比较，显然处于优势。1920年莫荣新撤出广州，广州兵工厂遭到破坏，1921年又用美国机械重新建立。在1925年，每月能制造750支步枪、70万发子弹、8架维克斯机关炮，以及数量不等的自动手枪。

与进口的西方军械相比，国内兵工厂的生产是微乎其微的，它们之间的比数极不相称，这种情况，可以张作霖为例。与其他军阀比较，张作霖拥有本地的财源可以发展他的军械生产，同时又大量购置西方军火。在这两方面，他都是首屈一指的。对此加以比较分析，可以说明两者之中以何者为重要。

1928年是张作霖的兵工厂生产数最高的一年，每月生产步枪7500支、子弹900万发。奉军的人数，在1927年10月时共计有23.2万人，安国军总数则达148.15万人，主要的都是步兵。每月需步枪7500支，一年需9万支，不足应付步兵232000之所需，而且又常有军器丢失、被缴、破损等情况发生。倘欲供应安国军之所需，则沈阳兵工厂和张宗昌的济南兵工厂，必需年增产16.46%。但是内战的继续进行，士兵数目不断增加，而兵工厂的生产率无法提高。

在没有战争的时期，张作霖集中力量于国内兵工厂的生产尚能勉强满足需要，本区的经费大部份应付这笔支出。但是战争来临，这种考虑既不现实也是很不利。他需要尽快地获得军械。

1922年，他从白俄手中购得36000支步枪及相应的子弹。^①1922年11月，从丹麦买到兵工厂的机器运到营口。1920年4月建立的沈阳军械厂已能制造军械和无烟火药。1921年10月，兵工厂也能制造上述武器。但是真正具有制造军械的能力，有待与尼尔森（Nielsen）、温斯特（Wintler）签订合同之后。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张作霖从国外购进军械。1925年，德国由哈尔滨的路德威格·宾（Ludwig Bing）经手，卖给他81000支步枪。1928年，张作霖又从捷克买得4万支步枪，又向挪威买到992支马枪和150万发子弹。由此可以说，张作霖是极为重视与西方军火商打交道的。从西方购进4万支步枪，就需要国内兵工厂生产五、六个月。由此可见，从国外购买军械，既迅速省事，又稳妥可靠。而国内制造，既要材料，又需技工，还得有设备。当时，有时可能买重复了，但是西方的军械生产有一定规格，不至于毫无用处。军阀所得的西方军械，大都是第二手的产品，但对当时军阀内战之所需已很合适了。

西方军货的二等品比国产的一等品还有用。即使西方军械并非甚佳，但因为战争的迫切，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国内的产品。对那些有道路可以直接获取西方军械的军阀来说，国内的兵工厂只是一种辅助。可是对那些不能从国外直接获得军械或机器设备的军阀来说，那就不得不依靠本地的工厂了。甘肃有一个军阀，他筹设了一个车间，用水力作动力制造武器，其成本例比上海江南兵工厂的生产成本为低，当然质量极差数量极少。四川省则可以从长江入口购运制造步枪的机械。赤水车间每日可制作240支步枪，万县日产200支，丰都日产60支。杨森在成都设了一个兵工厂，日产步枪300支，该厂情况良好，有工人2000人，由留学德国的中国工程师负责。其他四川各地的兵工厂规模不大。

^① 斯密斯（Arthur St. Clair—Smith）备忘录（SD893.113/419，1922年1月20日北京）。

云南昆明兵工厂规模相当完备，乃由德国克劳威兹（Carlowitz）公司设计建成，生产的手榴弹乃采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所用手榴弹型式。该厂由日本留学的唐继尧的助手负责，日产子弹30万发，但步枪仅日产30支。

要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的数量，则需要各种机械设备。在这个对军械十分需求的国家，其军械来源有二：得之于大型兵工厂，如沈阳兵工厂、汉阳兵工厂，以及从国外购进。军阀竞购军械，有时质量低劣的军械也可以卖得高价。例如，张作霖要在沈阳设兵工厂，他就从上海和武昌收购机械。但是，并非一切军阀都具有如此的购买能力。

军阀的军器需要，既不能得之于其他军阀，又不得购自国外成品，他们就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了。像唐继尧、张作霖这样的军阀，他们要扩大昆明兵工厂、沈阳兵工厂，就需要国外的机械设备。各地军阀，大大小小的都有自己的武器装配所，小的类似一家铁匠铺或小车间，大的则如有17000工人的沈阳兵工厂。大工厂的重要性取决于是否能从国外得到各种机械设备、外国技师和顾问。没有这一切，军阀的军火工业就很难发展。西方的军火交易，促进了军阀工厂的更新；西方的技术，使军阀的军火工业现代化。生产和使用新式军械，在军事的攻防技术上都有影响，士兵的训练也得样取西方的方式。接着化学工业、航空工业亦随之而起。

化 学 工 厂

与兵工厂相比较，化学工厂似乎是多余的。只有那些既拥有财力又有人才的军阀才有能力从事这一行业，因为要制成化学武器的成品是很费钱的。

1923年6月2日清晨，曹锟走访了天津租界内的一家化学公司伍伦沃斯（Worlen Vosy）的经理梅钦（Machie）。他需要购

买大型毒气弹，并准备用现金交易。^①湖南的赵恒惕对此亦极为关心。1921年夏，他从上海宁波路九号的华昌（Wah Chang）贸易公司购得两箱毒气弹，计重5,000磅。这笔货是从汉口运到长沙后转运过来了，计价10,843.32元。冯玉祥也想聘用德国、苏联专家制造化学武器。很多军阀对此均跃跃欲试，而能成其事者，只有张作霖而已。

张作霖的经济条件经王永江的经营，颇有力量试行制造这种武器。沈阳设置化学兵工厂，也是他武力统一全国的手段之一。他聘用了3名德国化学技师：迈耶斯（Meyers）、富克斯（Fuchs）、利德曼（Liedermann）。一名白俄格里波甫（Gleboff）1925年总管这个工厂，制作氯气、毒气、芥子气。这些毒气武器，德国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使用过，而且颇有成效。这些情况张作霖早就从他的外国技师中获悉。为了增聘国外技师，张作霖在上海退役军人服务处招揽。有一名爱尔兰人皮戈特（R. C. Piggot）应聘，1925年他曾在麦克安德鲁（McAndrew）、福布斯（Ferber）公司任职，但因无确切证明，所以他未能去沈阳就任。其他在奉军中任职的外国人，待遇一律，并无差异。

沈阳的化学工厂是与德国人威特（Witle）签订合同而建立起来的。1925年3月22日，高七十呎的烟囱树起，这是一项最主要的建设。1926年锦州亦准备与德国人签订合同筹建化学工厂。1927年挪威格雷公司从奥斯陆运来化工厂设备，11月到达，机械由格雷公司人员装配。该厂准备制造烈性火药和化学炸弹。这类产品，早在1924年曾试制过。^②

对张作霖兵工厂来说，化学武器仅是极小的一部分。1925年

① 布恩（W. R. Booth）致麦克来恩（MacLeay）（FO 228/3107，1923年6月4日，天津）。

② 图尔斯（B. G. Tours）致兰普逊（Lampson）（FO 371/13186，1928年5月9日，沈阳）。

奉军曾向吴佩孚的部队施放毒气弹，吴称此种武器为不人道。1924年10月6日，驻山海关的吴军中发放了防毒面具，以备万一。但是这一行业在军阀中并未引起广泛注意，这不过表明有一些军阀千方百计试用新式武器，这也许受到第一次大战中施用毒气的影响。要没有西方的军火交易，化学武器的制造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化学武器的制作，使得中国军阀更多的需要西方国家的支持。空军的建立，与此情况相类似。

空 军

军阀筹设空军，也像他们设立兵工厂、化学工厂一样，是受到西方的影响。从中国军事技术和装备的发展来看，西方国家各式各样高度技术的空军发展先例，对中国具有吸引力，那是不足怪的。国内兵工厂的建立，是受了十九世纪中叶江南兵工厂的影响，那么空军的筹建，乃是受到在战争中空军所起的作用的影响，个别人士也起了作用。例如1910年载涛从德国买回飞机，军机处又派学生去德国学习飞行。同一年，清政府准备在南苑筹建一处飞机工厂。1909年法国人瓦朗（Vallon）驾双翼机飞越上海空中，1910年俄国飞行员驾单翼机飞越北京使馆区上空，这些例子引起利用飞机作战的考虑。

龙济光是军阀中最先利用空军作战的一人。1912年，他在广州参观了一次华侨谭根的飞行表演，龙就用25,000元购买了一架冈思式飞机。他又委托华侨办一所航空学校。另一名对空军有兴趣的军阀是曹锟。1913年他任南苑警备时，遇到一名曾在英国学习的飞行员李集，他从澳洲买回两架艾曲奇（Etrich）单翼飞机。曹锟对此很感兴趣。黎元洪用30万元购买了12架双翼考德隆（Caudron）飞机，并在南苑筹建了一家修理车间和一所航空学校，有两名法国机械士、两名法国和两名中国教官。以后大约有10名毕业生，1913年在段祺瑞消灭白狼起义和蒙古革命军时起了

作用。1916年1月，袁世凯派出两架飞机与南军作战。同年，在福州船坞试制水上飞机。但发动机不灵，这个计划于1921年宣告结束。

空军第一次用在战斗中，乃是消灭白狼起义，用在军阀内战中，始于1917年7月7日段祺瑞反击张勋复辟。段派飞机去丰台轰炸，张勋军被迫退往廊坊，同日上午十一时，飞机飞越故宫上空，并向张勋的司令部投掷炸弹两枚，双方损伤极微。但是空袭引起了地面部队和市民的巨大惊恐。后来，二十年代中运用空袭日渐增多，人们也习以为常了。

军阀利用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军械，更新自己的军力。当时由于战争尚在进行，因此不可能把飞机卖给中国。但从1918年11月后，军阀筹建空军之举猛烈进展。其原因有三：西方国家有很多的剩余军械；1919年上海和谈的失败；有一些军阀看到空军将会在战斗中起重要作用。西方国家的各式新器械运入中国，这种形势发展得更迅速了。中国空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的情况，不超过1913年的模式，但以后很快地发展了。

战 后 形 势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军阀购进飞机的数量成百倍增加。有能力购进飞机的军阀，想从而设立起另一种有效的武器装备。1919年5月5日“禁运军火协定”无济于事，英法等国不断向军阀输运飞机。二十年代最大的一笔交易是两家英国商行佩奇（Handley page）、维克斯（Vickers）经手的。英国上尉霍尔特（F.V.Holt）在中国任顾问，以发展中国的商用航空。英国派出这样一位顾问，说明英国急于想在中国的航空交易中取得立足点。^①具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的英、美、法各国教官被军阀聘用，有一批机械士在中国等待机会。据此，南苑的航空学校又

^① 朱尔典致奎松，1919年10月15日，引自《英国外交文件》，页100。

恢复了。原计划加强商业航线，以便与沿海港口和内地商路连贯起来，^①因此需要发展航空技术，这又非依靠西方的国家不可。这样一来，首获其利的是帝国主义国家。便利的交通，使国外的势力更便于接近它们的势力范围，加强了它们对中国的控制。而过去，不能使中国完全屈服的主要原因是地理条件。交通往来加强了，广大的中国疆土就受制于外国势力了。霍尔特派到中国，对中国的航空市场日益重视。西方国家又获得了控制中国的新手段。

利用新式的交通手段巩固在华的商业利益，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搁置了五年，接着又因1920年的直皖战争而未见成效。中国的航空局在1919年时属于交通部，在段祺瑞执政时划到军事部门去了。在皖系军阀统治期间，所有的飞机都划归作军事之用。段祺瑞虽作了种种调动，但最后还是失败了，获胜的直奉双方分享了航空机械。二十年代起，根据他们各自的势力发展他们本地区的航空事业。1922年，霍尔特又计划用航空交通联系沿海港口和内地商路的活动，以利他们的经济利益。^②军阀们对此并不在意，而希望从中获得发展空军的技术。

段祺瑞对购买“商用”飞机也并不阻止，因为他知道，在飞机上装上机关枪就可作战斗、轰炸之用。“禁运军火协定”既已禁止军械交易，那么用“商用”飞机改装成军用飞机则是最为妥便的办法了。建立航空交道网这种想法来自英国，它的目的是想开发中国这个航空市场。发展这一工业，英国不仅开辟了一个获利极厚的市场，而且可以巩固它已得的经济利益。可惜1920年的内战把这计划搁浅了，1922年的直奉战争，这计划就无从实现。英国主要的航空官员霍尔特自1922年起，也放弃了这个计划。可是军阀却一直从军事的需要来考虑航空技术。1922年后，有一

① 《中国年鉴》1928年，页1283。

② 利里（Leary）：《巨龙的双翅》，页4—5。

些军阀试图发展自己的空军。

张作霖等建起当时最大的空军。首先，他在1920年直皖战争中缴获了四架佩奇公司的飞机，又从日本、法国的公司购进飞机。1924年，他有沈阳、葫芦岛两处飞机场。沈阳飞机场有11平方公里面积，有好几个飞机库可容80架布雷盖、考德隆飞机。从法国购进的40架施里克水上飞机分别停在沈阳、葫芦岛飞机场，还有60架正在组装。法国购进的飞机有随行的法国教官。此外有白俄飞行员11名、日本人2名，7名是中国人。但机长主要由法国人充任。

此外，直系军阀有89架飞机，分别停在北京（39架）、保定（41架）、洛阳（3架）、南京（6架）。有一名美国人诺思里奇（Northridge），在清河南苑的航空学校训练40名学员，他原在英国皇家飞行队服役。有两个维克斯公司的雇员威廉（William）、托拉特（Tollard）充任机械士，同时当教官。这些人都曾在南方齐燮元的一支小小的空军中工作。当时齐是支持直系的。

各地军阀也有不少飞机。张宗昌的济南机场有波兹—安沙尼型飞机；卢永祥的龙华机场有35架阿维隆、布雷盖、摩兰—姆泰伊、阿门司龙、魏德沃期杂牌飞机，大都从法国购进；唐继尧的昆明机场有1000×50码大小，在滇越铁路南三哩。他的飞机大都由法国从印支运来，有10架布雷盖、考德隆飞机。其中六架曾在1923年4月参战。此后4个月中，已购进飞机20架，随同前来的有三名法国技工，少校阿皮特、上尉法朗士在昆明航空学校充任教官，还有一名来自印支的机械士。总管其事的是来自广州的留美学生刘培昌（译音），他手下有15名飞行员，分为总武官、中士、机械士三个等级，其他二十几名初级飞行员和学员大都来自广州。又有20名云南飞行员在越南东京湾受训。最著名的飞行员是来自广州的华侨，名叫洪天闻，他在美国出生，曾

在美国空军服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机械士有来自河内的安南人，在北京培养的中国人。其他拥有少量空军的军阀是孙传芳，他在1925从江苏的奉军手中缴获了几架飞机。冯玉祥拥有英国、苏联的飞机。阎锡山聘用了两名德国人，经营自己的飞机厂。陈炯明从美国经马尼拉购到飞机。^①

军阀们群起筹建空军，但对飞行员的作战训练全不在意。外国人士从1924、1925、1926年的几次内战中看到，中国飞行员乐于作巡视飞行而不作实际的攻击战，他们的轰炸总不能击中目标，因为他们飞得太高。由于这种倾向，巡视飞行就毫无意义了。

中国飞行员不作进攻性的飞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法飞行员也受到这种指责。空军只作防御之用。实际上，英国空军有效的支援了西线的陆军。在战争的第一个阶段，空军主要的用来作巡逻，后来才用来摄影，指示目标，但主要的并不用作进攻。空战和轰炸的进展也是缓慢的。法国是西方的重要空军力量，但只把它当作辅助力量。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中国军阀时期空军的地位。

1920年直皖战争时，未见到有关空战的记载，皖军用法国飞机对吴佩孚在西陵的地面部队掷下了几枚氯气弹。1920年10月25日，陈炯明派飞机轰炸广州莫荣新的总部。轰炸造成很大灾难，以致政府机关停止办公，不敢外出领取月薪。1924年直奉战争时，奉军飞机在北京上空散发传单，9月27日轰炸山海关，杀伤了一些人。翌日，又进行轰炸，死伤较多，但不知是市民还是士兵。1924年9月1日的江浙战争，卢永祥和孙传芳都出动了空军巡逻。1926年4月3日，奉军飞机轰炸北京国民军的兵营。同年，吴佩孚派飞机在南口上空散发了十万份传单，促国民军投降。这种战术，后来也被国民党采用，在1927年11月到12月中旬

^① 《北华捷报》，1920年9月25日。

继续运用。在国民党和安国军战斗激烈之际，军阀利用空军轰炸也增加了。12月11、12、14数日间，国民党军队屡遭安国军的空袭，国民党也派出飞机以作报复。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空战在1927年12月16日在徐州上空进行，历时十数分钟。安国军有白俄驶驾的装甲车，又有白俄、日本、法国、中国飞行员驾驶的空军。但是国民党十分强大，由张宗昌，孙传芳率领的安国军在江苏被消灭，军阀退到山东。^①

北伐战争期间，安国军和国民党都利用空军巡逻、宣传、轰炸，空军成了一个战斗单位了。军事行动时而发生，空军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国民党和安国军之间的争斗，空军成了一支突击的力量。无论是在军阀的阵营中或北伐战争期间，都说明华侨在中国空军发展中的作用是很大的。西方人士在军校、兵工厂、司令部、参谋部、修配厂以及战场上，都成为二十年代中国军事史上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技术师和雇佣军

不少具有军事技艺的西方人为中国军阀服务。自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有不少具有战争经验的人，高价出售他们的军事技艺。西方的工厂制造军需成品，西方的顾问、技师、雇佣兵也同样被需要。在军阀的部队里被聘，用以训练士兵，教他们作战和使用新式武器。

萨 顿

萨顿是一名知识丰富的武器技艺师和顾问。这是一名野心勃勃的冒险家，在第一次大战中，在加里波的丧失了一只手臂，后来在赫斯特（Hearst）出版公司当记者，又曾在温哥华的波特兰（Portland）岛上做地产生意。他在改进雷管设备中有所贡献，

^① 乔丹（Jordan）：《北伐》，页146。

因此受到张作霖的重用。

萨顿原在伦敦的军需库，他改进了斯托克的迫击炮雷管，并将此出让，这种发明配装迫击炮在美国及亚洲市场发售。他因与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思公司谈判不成，不能在美国市场发展，乃转向亚洲。

他起先与吴佩孚打交道，因要价太高未有结果。但是一名重庆的军阀对他的技艺很欣赏，就聘用了他。可是四川每日都有内战，萨顿就另找出路。张作霖对他很有兴趣，1923年要他筹设一座制造迫击炮的兵工厂。他制造了600门迫击炮，6万发炮弹。萨顿立即收进了12.5万的酬金和2.5万元赔偿费。他共收进1.5万英磅及其他零星杂费，并任军需库主任。他的迫击炮图纸曾在重庆被窃，但因图纸不全，窃得人一无所用。萨顿不仅为张作霖改进军械，而且经手购买西方军械。他原与西方商人有来往，所以走私军火颇为方便。他二十年代在中国的活动，对张作霖很有好处。例如他经手雇佣的白俄，成为奉军、安国军中一支好斗凶狠的部队。

白俄雇佣军

1917年俄国革命后，俄国遗民力求在政治上平等存身。中国的边界易于进入，于是俄国的国内战争实际上在1918年1月已渗到了中国。当时霍瓦斯（Dimitrii Horvath）将军招募了3000白俄和蒙古人，名为保护中东路，实际上是用以与布尔什维克作战。^①他们常遭到张作霖部队的分割，开始时互有争斗，后来成为各取其利。1922年10月，张作霖和白俄联军的捷克军团将军第米特里（Dietrich）进行了一批军械交易。1924年8月，张作霖雇佣了白俄部队。这个建议最初由捷克空军飞行员库达连科（Kou

^① 唐盛镐（Pefer S.H.Tang）：《1911—1931年俄和苏俄对东北和外蒙的政策》，页118。

-dalianko) 上校提出来的, 计有尼钦伊甫 (Netchaieff) 将军率领的七百名士兵。1924年直奉战争期间, 由前述白俄士兵, 又加300名日本士兵和二营中国士兵, 编成奉军洋兵团。虽合编为一个混合旅, 但内部从未统一过。主要分为两部, 一部分是日本军官率领的日本团, 一部分是白俄和中国士兵。日军使用日本武器, 白俄使用哥尔察克 (Alexander Kolchak) 海军少将遗部留下的武器。1924年10月直军失败后, 白俄士兵“荣获”守卫上海, 防止孙传芳的任务。其中有三名军官获得“满洲十字奖章”, 但日本部队则于1924年11月解散。

1925年3月, 白俄部队扩大到1200人, 内有机枪营。又从1924年9月到吴淞口的600名白俄难民中招募了一些士兵。他们原在江浙战争中打过仗, 月俸30元, 伙食每日2角2分, 武器由本人准备。在上海的白俄头目叫谢米诺夫, 他还准备为张宗昌招收散兵游勇组编一个骑兵营。在上海招募白俄, 每名给奖金30元。

1926年11月安国军组成后, 白俄是反击国民党的有力部队。这支驻扎在江苏、浙江的约5,270人的部队, 是以打击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同伴为自己的使命。1926年12月, 大部份白俄军队都并入张宗昌队伍中。有一支但尼伊甫 (Tonaieff) 上校率领的130名骑兵, 每人带160发子弹的哥萨克分遣队充任张宗昌的个人警卫队。^①还有一个手榴弹队, 系由185名鞑靼人和哥萨克人组成, 每人有四支手榴弹、炸弹。谢莫尼兹 (Semomidze) 上校率领一支500人的步兵团, 每人有步枪和150发子弹, 其中还有8名机关枪手。塔克霍甫 (Tckehov) 将军的4辆装甲车和700名士兵, 支援上述的步兵、骑兵。该装甲车各备俄式3吋炮二门、炮弹200—300发, 以及8—12架机关枪。在济南, 有一支沙拉伊甫 (Saraeff) 率领的700名骑兵的白俄部队。骑兵学校有200名学

① 贾尔斯 (Bertram Giles) 致兰普逊 (FO228/3451, 1926年12月30日, 南京)。

员，还设立了一所装甲车部队，它们都备有济南造的榴弹炮。最高指挥官是尼钦伊甫将军，他本人率领有 1200 名士兵的 65 步兵师。张宗昌的总顾问是梅库洛甫 (Merkulov) 将军。

这批白俄雇佣军，1924 年在上海防击孙传芳，1926 年又在孙传芳手下防阻国民党，1927 年在龙潭之战中驻守徐州。除此之外，他们还参预其他政治性的活动。由于他们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性质，所以又为公共租界英国捕房招募，用来镇压上海的工人罢工，1926 年 4 月 6 日，在北京参予对苏使馆的搜查。当然，他们并非全部都是反布尔什维克的，例如沙俄将领唐克希沙拉文 (Tonkikh Shalavin) 在开封，伊凡诺甫里诺甫 (Ivanov-Rinov) 在冯玉祥部队中充任国民党的志愿兵。当然，这种情况为数甚少。张作霖以反共出名，给的待迁又比较优厚，这使很多白俄先后投入张作霖、张宗昌的部队，为他们效力。

白俄雇佣军像萨顿一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剩余产物。他们的作战技艺为张作霖、张宗昌等军阀所赏识。当然，这些雇佣军首先考虑的是待遇，当然思想意识也占一定的地位。他们其实是在 1920 年 9 月 23 日新总统上任便与沙俄断绝关系的一个国家里的流民，他们象其他逃到欧洲国家以寻安全的白俄一样，怀着一点小小的希望，希望有朝一日反对革命成功而重回家乡。就当时情况而论，所在的国家继续反对布尔什维克于愿足矣。但是重要的是，军阀供给他们谋生之路，他们的军事技艺得以施展。这些白俄雇佣军与十五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或近代安哥拉的 (Angolan) 雇佣军性质不同，他们单纯的是为了发财。而白俄雇佣军则是为了反对布尔什维克投身奉军和安国军。由于这种政治思想的原因，他们不能任性之所至投身于任何主子。这就是白俄之与其他发财致富的雇佣军有所不同。

支 付 问 题

军阀为支付购进西方军械、国内兵工厂家的经费、空军、顾问、机械师、雇佣军等等费用，广开财源。田赋、关金、盐税是主要的财政收入，内外公债、厘金、鸦片买卖、邮政、铁路、敲诈是辅助收入。就外债一项而论，从1916到1927年，计有31笔，总计742,115,000元，国内政府公债自1912至1916年计612,002,708元。

奉天省是张作霖主要的财源。北宁路山海关到沈阳的铁路收入，自1922年后每年达500万元。1922年5月后，关金、盐税不再缴付北京，每年有盐税900万元、关金70万两进入张作霖的金库。1922年的财政年度，田赋地租的经常收入是供政务及军事的费用。张作霖自1922年战败后，经王永江的经营，每年可以从收入265,787,958元中节余8,548,737元。支付的18,239,221元中，76%即13,941,158为军费。仅1923年，支付给沈阳兵工厂的就达2000万元。山东张宗昌的军费占1925—1928年省公债的85%，1923年据北京及十四省的统计（包括东北），大部分省份的军费占各省收入的60—90%。^①

至于购买军械所需款目，难以有可信的统计，因为这些交易大都是秘密进行的。但就奉军的购置而论，可以作大致的一个测算。白俄雇佣军每月30元，军官略高，总有雇佣军约为1,570名，1926年划归为安国军。1925年奉天省收入增加到3500万。兵工厂每年约费2200万到2300万，900万供化学工厂、空军、国外军械、国内部队的费用。

小 结

西方的军火贸易，是二十年代中国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外国

^① 吴英广：《近代中国的军阀》，页161。

的专家和雇佣人员引进了很多新发明。国内的军械生产、化学工厂、空军设备，要没有外国机械设备、成品和人员，那一切都将停顿。1918年11月后，西方有大量的剩余军用物资，又是军阀进行内战的需要，故西方的军火买卖甚为顺利。只要存在这两种因素，那末任何禁运条例都不能阻止军火输入中国。

英国对华政策

——1930年1月8日英国外交备忘录

张晓东 蔡洪波 译

编者按：20年代后半期，英国在华地位和其对华政策与上世纪及本世纪初相比，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英国外交部1930年初向议会提交了这份外交备忘录，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总结了过去的对华政策，较系统地阐述了英国对华原则、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该备忘录被认为是了解英国对华政策最关键的文件之一，被列为1960年出版的《英国外交政策文件集》（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有关英中关系的第2编第8卷首篇。今翻译刊出，希望能从另一个角度为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历史的考察

最初，英国在华的地位是依靠武力确立的，我们一开始就记住这一点至为重要。此后，它靠着威望把这种地位维持到了大战时期。但是，现在中国人已逐渐明白，没有实力作后盾的威望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

迄止1900年的四十年间，中国一直对外国人怀有强烈的倍受压抑的仇恨和深深的不信任，甚至发生暴力冲突。在1895年的中日战争中，中国遭到日本致命的打击。人们都认为中国将因此而分崩离析。列强按当时的惯例，着手瓜分中国，并首先在华划分势力范围。1895至1900年是势力范围和租界纷争时期，1900年的拳匪之乱结束了这一时期，当时中国人做了孤注一掷的努力，企

图把可恶的外国人赶出沿海地区，他们为此受到了严厉的惩罚。1900年以后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国认识到外国人的进入无法避免，因此不再致力于驱赶他们，而是着手向他们学习，弄清其力量的秘密。中国古老的科举考试被废除了，建立起新的西方式的国家教育制度。这是与传统的决裂，其重要性无法估量。

这个新时期的主要特点是，过去对外国人的那种盲目仇恨已完全消逝，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主义的精神。这种新精神表现在，一方面与外国人保持友好的私人关系，渴望通过与他们的交往获得利益，一方面对外国人享受特权和限制中国主权，抱有日益增长的怨恨。

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历经多次危及统一的政治动荡，特别是在改朝换代时期。但是，它的向心力最终压倒离心力，而重归统一。然而，1911年的革命同以往比起来，更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同传统的彻底决裂。中国瞬息之间从世界上最古老的专制王朝变成了新式的近代共和国，至少从理论上可以这么说。对一个就其传统、气质和政治训练都难以顺利适应新制度的民族来说，这个转变太突兀、太剧烈了。至于近代共和国的整个立法建制，中国还距之甚远，因为它是以公众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为前提的。

民国前五年的命运掌握在左右政局的袁世凯个人手中。只要这个狡猾的政客控制着政权，旧的统治精神就将在新的形式下维持下去。似乎中国可以平安地度过风暴了。最重要的变化是各省的权力不知不觉地从都督（满清总督的后继者）转到了称为督军的军事领袖手中。只要袁世凯还活着，他就能将这些督军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确，这些督军都是袁世凯的私人仆从。但是，1916年袁世凯死后，政治拱门的顶石塌落了，督军们随即兵戎相见，展开了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至今未息。中国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战之中。督军们拥有庞大的军队——据估计目前至少有

150万武装人员——维持如此庞大的军队，势必花去几乎每一笔可资利用的收入，留给各省的必要开支或维持中央政府的经费所剩无几。中国被相互的残杀搞得支离破碎，土匪横行。据说中国大约有100万土匪，而且常常是兵匪不分。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频繁交替，但皆令不出京。每一届政府都虚弱无力，威信毫无，摇摇欲坠。无非是在台上的一个派系，有名无实，根本代表不了全中国。然而，有个奇怪的事实：尽管有这些犹如大海中层波浪的政治动乱，中国正常的生活却在继续进行，未受干扰。在许多方面，中国都取得了稳步的实质性的进展。最近的海关报表，说明了中国收入和贸易的持续稳定增长。

民族主义运动取得成功是时局的主导因素，这得归功于1900年以后新式教育的刺激和中国欧美留学生的影响。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孙逸仙博士。他于1925年逝世，现在被南京的执政党奉为神明。这个党自1911年^①以来一直被称为国民党，它是袁世凯于1914年解散的第一届国会中最大，呼声最高的党派。袁世凯死后，国民党与袁氏后继者——督军们继续对立，并从1918年1月1日起建立了独立的广东共和政府，自称是全中国的政府。两个政府（北京政府和广东政府）的状态从1918年持续到1928年。北京的外交使团只承认北方政府，列强特别是英国，几次强迫广东政府向北京政府交纳海关收入。于是，国民党便将列强，特别是英国，视为敌人。1923年，孙逸仙博士在上海同越飞博士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之后，达成苏联向国民党和广东政府提供苏联顾问和援助的协议。这次结盟，特别是在1925年上海事件和“沙基事件”之后，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党的仇视。1926年，广东军队开始北伐。这次北伐出乎意料地取得了成功，9月就抵达汉口，翌年3月便抵达上海。后来党内的冲突（关于苏俄和共产党员问题）延迟了直接推进。1928年6月8日北京被占领。然而占领北京的不

^① 原文如此。

是最初的北伐军，而是山西阎锡山的军队，阎宣布支持国民党。10月3日公布了政府组织法，10月10日新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是年底，满洲宣布归顺南京，中国名义上统一了。

说它是名义上的统一是因为南京的新政府实际上只控制了新都周围的两三个省份。在其他地方，地方军阀虽不再称督军，但实际上仍各行其事；中华民国政府主席蒋介石本人便是一个督军，他用怀疑和虎视眈眈的目光监视着他的同伙。

新政府执政一年后仍没找到削减军队和对付土匪威胁的方法，这使得为恢复国家金融所作的努力化为泡影。国家金融状况仍是混乱不堪，一团乱麻。新的关税开辟了新的财源，但只是为重新大量举借外债提供了抵押。国民党人在两年间通过国内借贷筹集的资金比北京政府在以前十四年间筹集的还要多，而且也有同样的倾向：只照顾国内的债权人，对外国债务置之不顾。这种情况加上内战的再度爆发——虽然至今与其说是明争，不如说是暗斗——是当时最令人忧虑的事情。若要说国民党人的出现没给中国带来新的东西也是不公平的，会产生误解。它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外交事务方面，它使中国说话算数，并且从强大的很不情愿的列强那里争取了具体的成果。内政方面，按西方标准，它播下了政府科学的第一颗小小的种子。

英国同列强政策的比较

至于英国的对华政策原则，一言以蔽之：我们没有领土的或帝国主义的目的。我们首先关心的是维持我们在华贸易的地位，它密切关系到香港的繁荣和海关的命运，务求英国侨民、财产和商务实业不受侵犯。其次是维持“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以防中国落入某大国手中。为此，我们希望有一个统一有序，繁荣和平的中国。我们的政策便是，为此目的而与列强通力合作。这些是我们在华一切努力的基本原则。

自划分势力范围和拳乱之前的租界纷争起，我们的努力已取得了某些进展，列强现在至少在理论上承认，合作而非竞争应成为对华的指导原则。1913年银行团的成立（为中国向国外借贷提供资金）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第一步；1920年银行团的重新恢复和1922年的华盛顿九国公约，是在华国际合作原则的进一步扩展。尽管列强在对华关系上貌似和谐，但潜在的利益分歧却无法掩盖。这使得合作困难重重。主要障碍来自日本。虽然日本并不希望中国发生动乱，但无可否认，由于很显然的原因，它并不希望中国统一强大；同时不幸的是，英美虽然根本目标一致，但由于政治见解的基本分歧而不能步调一致。法国远不如其他列强对远东感兴趣。法国的合作并非可靠，它惯于用自己的地位来寻找自己的目标，而不是实行开明的政策。一个明显且招致不幸后果的例子，便是它迟迟三年不批准华盛顿关税条约，以强制解决金法郎案——这一拖延导致了这一时期的普遍衰退。

中国和列强：巴黎和会

协约国政府在诱使中国向同盟国宣战时，答应尽其努力，以保证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享受大国的地位和尊严。于是，参加凡尔赛会议的中国代表极力要求和会废除治外法权，实行完全关税自主。但列强看来，1919年的中国提出这样的要求不合时宜，因而未予接受。这样一来，再加上中国在山东问题上受到的对待，大大地加剧了中国人的排外情绪。中国人痛苦地离开了巴黎，他们觉得自己被出卖了。

这样，我们便失去了一次机会，本来我们可以在较为平和的气氛中，欣然放弃形势一直逼迫我们放弃的东西。我们的威信也大大降低了。从此，我们的政策不再是自动放弃特权地位，而是被迫退却，这需要进行大量的防卫工作，努力防止退却成为溃败。

目前治外法权问题的状况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华盛顿会议

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的目标是改善列强一直认为是公正的不利环境。中国再次强烈要求放弃治外法权，实行关税自主。虽然这些要求未得满足，但是会议对中国的期望作了很大的让步。无疑，许多让步是应该的而且是早就应该的。尽管如此，华盛顿会议还是使中国人明白，在国际会议上使列强满足自己的要求是多么容易。会议制定了四项国际文件，从总体上明确地规划和决定了列强在远东的政策。

它们是：1. 四国公约（英、美、日、法）

订约各国同意，相互尊重各自在太平洋区域内属地和岛屿的权利。规定：任何个别问题引起的争端，经由外交途径不能满意解决者，交由联席会议商议解决。如上述权利受到任何国家侵略行为的威胁时，订约国应互相通报；该条约有效期十年，除任何一国于期满前12个月提出通知外，条约继续有效；自条约批准之日起（1923年8月17日），英日同盟条约即行中止。后来的补充条约（1923年2月6日）在把“属岛和领岛”一词使用于日本时作了说明，以免包括日本的主要岛屿。

2. 九国公约（英国、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和中国）。

除中国外，各缔约国同意：①尊重中国的主权和独立、领土与行政的完整；②给予中国充分无碍的机会，以发展和维持一个有效稳固的政府；③施用各国的影响，在中国全境切实确立和维持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的原则；④不得利用中国的现状，乘机谋取特殊权益和特惠，从而减少友邦人民的权利，不得支持有害友邦安全的活动。

各国协定，不缔结有悖于这些原则的条约和协议，遵从“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各缔约国协定，不得谋取或支持

其国民谋取：a,旨在为私自利益在中国获取商务和经济发展优越权利的任何办法；b,致使剥夺他国人民在华从事正当商务实业的权利，或他国人民与中国人民、政府或任何地方官员共同从事任何公共企业的权利的专利或特惠权，以及因其范围之扩张，期限之久长，地域之广阔，致有破坏机会均等原则实行者。

条约其他条款规定：①订约各国不得企图建立势力范围；②对中国铁路不得有不公正的歧视；③应尊重中国在未来战争中的中立立场；④遇有牵涉条约的任何情况，缔约国应坦诚明白地交换情况；⑤其他与中国有条约关系的国家将被邀请加入本条约；⑥该条约批准后即行生效（1925年8月5日）。条约没规定一定的期限。

3. 中国关税条约（九国公约签字国订立）

该条约有条件地同意中国增加2.5%的附加税，但应举行专门会议来决定增加这项税收的条件。

4. 关于治外法权的决议

提出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治外法权的整个问题，以期最后废除之。

根据上述决议召集的委员会，本应于1925年12月18日开会，由于中国内战的爆发，会期推迟到1926年1月12日。会议报告书于同年9月16日签字。会议报告书提出了一些建议，一俟建议被合理地遵守，各国保证取消治外法权，而获得在中国全境居住、经商自由和民事权利。

建议各点如下：

1. 保护法院不受政府或军方的非法干涉；
2. 完成法院法，并付诸实施；
3. 统一颁行法律；
4. 扩展新式司法和监狱制度；
5. 法院、监狱应有充足的经费；

6. 在上述建议未经采纳之前，但在主要项目实行以后，得考虑废除治外法权的进一步计划；

7. 应通过在领事法院施行中国法律；通过中国新式法院审理外国原告案件，而不派员会审；通过制止对中国个人和公司提供外国保护的弊端；通过在中国当局和享有治外法权的各国当局之间进行司法协助，迅速执行判决和传唤；通过坚持各国侨民应向中国主管当局交纳正当税金等等措施，来对现体制下的治外法权作某些修改。

中方委员王宠惠博士在报告书上签字，但同时声明对报告中的某些内容不予承认。

关 税 会 议

关税会议于1925年10月26日在北京举行，主要目的是给予中国一项已经同意的，名为华盛顿附加税的增加关税。如若可能，还将达成某项使用这笔增加收入的协议。然而，会议一开始，中国代表团（团长是王正廷博士，现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便把关税自主作为中心议题。经过三周的讨论，取得外国代表团的同意，达成了一项决议：中国从1929年1月1日关税自主。这未曾预料到的进展是会议取得的唯一成果。会议在1926年7月以前断断续续举行，这期间各国讨论征收华盛顿附加税的条件，表明他们对时局没有深刻的洞察。此时，北京政府行将崩溃，发端广州的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广州方面发生了抵制大不列颠的激烈活动。鉴于北京会议的同僚们都倾向于把会议失败的责任归咎于我们，英王陛下政府乃决定向美国政府送交一份备忘录（美国率直地询问过我们对会议的态度），以澄清事实。我们在备忘录中认为，应当无条件地缴纳华盛顿协定规定的附加税，不应企图抽取、控制和强行担保。简而言之，关税会议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因为①某些国家，主要是美国、日本，它们迫切希望偿付给

它们无担保的债务。关于附加税收，它们决心将本备忘录17页描绘的可恶制度永久维持下去。这样海关总税务司就可以扣压税款，用以偿还国外债务；②中国的内战使它无法派出有代表意义的代表团。

广东政府征收华盛顿附加税

从（1926年）10月10日起，广东国民政府开始对进出口货物征收一定的消费税，进口货物按华盛顿附加税相应的比例征税。英王政府同各有关列强发表了一篇形式上的抗议。但是，鉴于当时我们已确信这些附加税应无条件承认，于是我们没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英国商人提出了抗议之后，也交纳了附加税。

掌握了日益增多的对外贸易收入之后，广东政府发现对香港的抵制有害无益，于是抵制活动取消了。几个月后，抵制委员会的活动完全停止了。同时，国民革命军在俄国军火和顾问的帮助下，胜利挺进到长江流域。1926年12月国民政府所在地也由广东迁到了武昌（汉口对面）。

十二月备忘录

面对恢复关税会议的尝试性建议，英王政府在1926年12月18日，将著名的备忘录通知了在京的华盛顿条约国家的代表。这项备忘录重新提出了无条件承认华盛顿附加税的建议，而且不对这笔收入施加任何形式的外国控制。但是鉴于国民革命事业的成功，以及治外法权委员会提出的事实，我们朝前迈了一步，建议应当把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付诸实施，建议各国在他们积极的政策中，清楚地表明他们希望尽力满足中国的合法要求。

一九二七年的一月提议

现在这项备忘录已成为英中关系史上的一块里程碑。继这项

各总领事而来的是条约修改办法的提议。如果中国的北方或南方当局希望英王政府这样做的话，英王政府准备采取这一步骤。这项提议分别于一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交给了顾维钧博士和陈友仁博士。这项提议涉及到承认中国的法院；承认中国合理的国籍法；承认中国法律在英国法院的运用；承认英国国民向中国纳税；还涉及到考虑修订的中国刑法的应用；涉及到英租界市政管理的修正和英国传教士及教徒的权利。这项提议的公布，虽然在当时引起中国的抨击，却对促使中国对英国持友善态度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这项提议拔出了一根非难大不列颠的利刺，它被认为是维护旧条约的主角。这项提议置中国人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他们着手具体修改时，才发现实际的困难非常大，并且提议中对旧条约的赞赏也是他们难以接受的。

俄国在中国的影响

广东革命政府早期所持的强烈反英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广东政府取得的胜利依赖于苏俄慷慨提供的武器和顾问。莫斯科同广东国民党的联盟，从1923年1月越飞和孙逸仙的会晤开始。共产党在1924年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加入国民党，更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联盟。但是俄国人直到1925年夏的上海、沙基和其它一些事件之后，才有机会大出风头。国民革命军占领汉口标志着俄国的影响达到最高峰。他们充分施展这种影响，1927年1月，唆使暴徒攻进汉口英租界，再次挑起事端。由于英国当局和守卫部队的自我克制，这次事件才得以避免。自此之后，国民革命军军事领袖蒋介石与俄国人的裂痕越来越明显，直至酿成1927年3月24日在南京侵扰外国人的事件。极端派企图利用这次事件来离间蒋介石与列强的关系。以此为开端，蒋介石在他控制的地区对共产党人采取了最为严厉的措施。最后，蒋介石与冯玉祥就这一问题，取得一致意见。1927年7月，鲍罗廷和在汉口的俄国顾问

只得逃离中国。是年12月，俄国的代理人在广东搞了一次共产党暴动，遭到严厉的镇压，苏联副领事和其他一些俄国人被处以死刑。国民政府在华中和华南全境，驱逐了俄国官员。至此，俄国在中国的影响已实际上消除了。由于俄国对中国事务的巨大干预，在政治上可以看成是对英帝国在亚洲地位的严重威胁；因此俄国人惨重的失败，亦可视为英国外交的巨大胜利。

上海防护军

汉口事件之后，我们面临的形势显然很危险、很严重，于是向上海派遣了一支人数一度达2万人的英国军队。但是，从该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较为缓和的局面，俄国的影响也每况愈下，故尔可以减少防护军。目前在上海只有2至3千英国军队。

陈—欧玛利协定

增加在华陆海军并非英王政府为清除麻烦而采取的唯一步骤。我们的政策实际上是双轨的：a. 保护英国国民和财产；b. 继续努力，以求在十二月备忘录和一月提议的基础上，同任何通情达理的中国政府达成谅解。为了明确地证实我们后一政策的真诚，我们没有用武力去恢复我们在汉口的旧有地位，而是继续与国民政府谈判前英租界行政权的转让问题。体现这种转让的协议（连同另一项有关较小的九江租界的协议）于1927年2月19日由欧玛利先生和陈友仁博士签署。根据该协议，前租界改为中英管理局下设的特别行政区，中方任局长。协议当时遭到英国远东侨民的反对和批评，最初颇费周折，但最后两年执行得令人颇为满意。英王政府对汉口租界的态度，是使中国国民政府相信我们的诚意的最重要因素。

南京事件的解决

1927年底，俄国人在中国的影响最终消除之后，大不列颠与

南京政府的关系迅速改善。但是，在南京政府未对1927年3月24日的南京侵害事件承担责任并进行赔偿之前，两国的关系还不能确实地置于满意的基础之上。由于这一举动关系到新政府的“面子”，因此解决起来很困难，很缓慢。但是，最终通过1928年8月9日换文，获得解决。照会中，国民政府表示了深切的歉意，并报告了罪犯的惩处情况，同时建议成立中英委员会来评估应赔偿的损失。英国政府在发出的照会中，亦对皇家军舰“绿宝石号”在这一事件中，不得不采取措施保护英国侨民，做了解释；并在后来的照会中表示：不会因南京事件而改变我们在修约问题上对中国的同情态度。

关 税 自 主

南京事件的解决，为关税问题扫清了道路。自1919年的巴黎和会以来，关税自主一直是中国提出的首要要求。这个要求显然合乎情理，但满足这一要求所遇到的唯一危险，则来自中国当局的不可靠、财政经济的脆弱以及多年来政权的纷争和掌握海关收入的内在困难。南京政府的建立，消除了一些障碍，而且美国政府率先于1928年7月25日签署了一项条约，同意中国完全关税自主。该条约自1929年1月1日起生效，但前提是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由此而使得其他各国别无选择，于是在该年底，中德、中挪、中比、中意、中丹、中葡、中英、中瑞（典）、中法、中西间均签订了内容相似的条约。中英签约的时间是1928年12月20日。中日间没有签约，但达成了一项解决方案，日本决不妨碍中国政府。1929年2月1日起，高关税表开始实行。在条约中，英国货物和船舶吨税获得了最惠国待遇，而且英国民间进出口货物，也取得了国家待遇。随着这些条约的签订和新关税表的实施，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及1925—1926年北京会议所争论最激烈的关税问题得以解决。但是，只要日本政府不妥协，中国

政府尚不能完全获得关税自主权。当然，日本并非视其为实际措施，不过是正在进行的总条约谈判中的筹码而已。

条约修订

虽然中国内乱还会继续，但现在是将中国与列强关系置于比1842—1876年间所订条约更为现代的基础之上的时候了。此点已被普遍承认，已明确载入12月备忘录中。关税问题已获解决，余下的便是“地役权”问题，泛称为治外法权。在讨论这个问题的现状之前，我们先概述一下实现英国1927年1月提议的进展情况，是有帮助的。

过程如下：

1. 承认中国近代法院有资格审理英国原告案件，英方不派员会审。——至今有效。

2. 承认中国合理的国籍法。——一项经审慎研究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对香港和马来亚的英籍华人关系重大）业经拟定，而且是与中国政府谈判的主题。在中国南方，一项工作计划实际上已在实行之中。

3. 在中国的英国法院中，应用近代中国民法和商法，迄今未获进展。因为在考察这些法律的时候，发现除商标法外，这些法律不完备，不适合在英国法院应用。

4. 英国居民向中国政府照章纳税。——事实上，英国商行交纳了，即使并非全部也是绝大部分的消费税、印花税。这些税收种类繁多，对中外货物任意课取。然而，我们并未通过国王条例使这些税在英国法院合理生效，因为它们实在是杂乱无章，无法予以承认。但是，我们向英国商行的建议是：明智之举是提出抗议，然后纳税。至于九江的英国前租界，市政税已通过英国于最近生效。

5. 中国刑法在英国法院的应用。——1912年的临时刑法最近

方由新的法律取代，该项新法律于1928年9月1日生效。新法律在英国法院的应用问题，在即将召开的商讨治外法权总问题的会议上，可能予以考虑。

6. 英租界市政的修改：

a. 汉口——根据1927年的《陈—欧玛利协定》交还中国。该协议目前执行情况良好。

b. 九江——根据1927年的《陈—欧玛利协定》交还中国。

c. 镇江——按照与九江类似的办法交还中国，中国永久出租给前英王政府治下居民。

d. 厦门——保持不变。

e. 广东即沙面——保护不变。

f. 天津——英租界的法律业经修改，让中国人与外国人在同等条件下选举，并增加市议会中国代表名额。均在满意地执行中。

在此应注意，上海没有英租界，但上海有公共租界，至少其规定是国际性的。

7. 英国传教士在条约中享有的特权。——已经或正在放弃。

中国人以特有的机敏方式提出了修约问题。1842—1876年间签订的旧约，除商务和关税条款之外，并未规定有取消或修订的条款。商务和关税条款在某些，但并非所有情况下，可以每隔十年修订一次。1926年11月26日是1865年签订的中比条约修约期。中国（北京）政府擅自宣布有权废止该项条约，不仅是商务条款，而是整个条约。比利时是个弱小国家，最初呼吁列强给予援助，后又诉诸海牙国际常设法庭，要求纠正，但最后还是作出让步：在达成新的条约之前，于1924年4月1日接受了中国规定其在中国法律地位的条例。类似的方法也施之于西班牙、意大利，（1928年7月19日起）施诸日本，最近又施之于丹麦、葡萄牙及瑞典。1928年7月13日，国民政府颁布了一项临时条例。该条

例适用于条约已被“终止”的国家的国民，将这些国家视为已完全丧失了治外法权。然而，从致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西班牙交换关税条约照会中可以推知：这些国家的国民仍保有治外法权。因为每个政府同意在华盛顿条约国放弃这些权利之后，放弃这些权利。日本一直不能容忍中国的竞争，拒不承认中国有“废除”与其所订条约的权利。英中主要条约（1858，有关商务和关税条约）1930年10月30日到期。

治 外 法 权

中国政府正集全力于废除治外法权，名为废除或许实为修改。意大利、丹麦、葡萄牙和西班牙政府保证，一旦中国同所有华盛顿条约签字国达成类似的协议，他们便放弃治外法权。比利时已作出承诺，只要现在拥有这一特权的大多数国家同意废除这一特权，它即放弃。1929年4月底，中国政府向英国、美国、荷兰、法国、挪威和巴西政府送交一份照会，就消除中外旧约对中国司法主权的限制，表示了他们强烈的愿望，请求列强放弃治外法权。英王政府在复照中指出，中国尚不能象西方国家那样开放，因此目前仍需维持某种条约口岸制度，这当然是指对治外法权进行了某些修改的条约口岸制度。

英国邀请中国政府提出临时的过渡办法。中国政府回复了一个照会，英国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答复，重申了谈判的意愿，并再次邀请中国提出建议。但中国却公开表态，于1930年1月1日完全废除治外法权，他们几乎不会以建议修约的方式妥协。然而，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实际上准备妥协。英国为了防止中国不顾列强的拒绝而发布废约令，引起危险形势，于9月2日向蓝普森爵士发出基本电示，指示他以如下基本次序集中考虑司法移交方法：（1）民事案件，（2）刑事案件，（3）个人身份问题。我们认为，只有第一种情况于不久的将来可能取得进展。在中国法庭民事管

管辖权的执行情况表明了，刑事管辖权可以托付给他们而对英国人的利益不产生过分的损害以前，我们应该坚决抵制任何谋取刑事管辖权移交的企图。至于民事管辖权，首先须与中国代表合作，仔细检查中国法典。为了提供保护，希望中国聘请外籍法官，外国人是被告时，中外法官应于新式法庭会审。英国人之间的诉讼仍应在英国法庭审理，但不同籍之外国人间的诉讼可在中国法庭审理。至于刑事管辖权，仍应从诸如违反市政规则和违警等小的方面起步。就民事管辖权而言，英国船只的地位和中国征税要经过特殊的考虑。这些指示是我们仔细考虑了一些驻北京公使提出的选择方案的结果。这些方案的基本内容是按地理观念来处理问题，即治外法权应先在内陆放弃，至于主要的条约口岸则保留现存的制度，在几乎无外国人居住的边远地区放弃治外法权。与现在的制度相比，并无明显的差别，这一建议对中国人并无吸引力。对英国人来说，要对生活在内陆的英人某甲和生活在条约口岸的某乙作出区分绝非易事，为了在就近的新式法庭受审，某甲可能不得被带往条约口岸，那将更是困难重重。我们还考虑到，在内陆完全放弃治外法权会损害我们如下的论点，即中国司法状况是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庭管辖的根本原因。我们把这些提议转达给有关国家，结果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前景似乎乐观，在即将来临的谈判中，所有国家会取共同的路线。

总之，我们期望在中国人至为关心的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这一进展应是缓慢的，在过渡时期须对外国人提供充分的保护措施，同时我们应和其它列强尽量保持一致。

另一方面，中国人则迫切希望加快步伐。毫无疑问，为此，他们已表明准备于1930年1月1日废除治外法权。中国外长于9月28日正式宣布事议已决。同时，中国人显然希望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就事情的性质而言，年底是无法了结的。本来可把上述

决定视为一种专横和非法的行为，拒绝进行谈判。然而这只会造成僵局，最终被迫在难堪的境地里谈判。因此，最明智的政策似乎应设法确保废除治外法权宣言以尽可能无害的形式发表。换言之，与其是一个废约宣告，不如说是一个原则声明。开始谈判本会产生这种结果，但12月份内战再度爆发，我们未采取这一步骤，而是于12月20日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表明陛下政府同意1930年1月1日应原则上被视为治外法权开始逐渐废除的日子，对中国政府想发出的与上述态度相适合的宣言不加反对。陛下政府已作好准备，只要中国政治形势许可即开始进行具体谈判，以达成两国政府皆能满意的方案，逐渐废除治外法权。中国政府的答复令人欣赏，12月28日发布了一项措辞巧妙的命令，其大意是从1月1日起，所有在华的外国人应遵守中国法律，为了检查和审议，主管当局将作出计划以执行这一命令。由于这一命令没有规定外国人应在中国法庭受审，便为谈判敞开了大门。不许中国把我们拉出正常的轨道，而仅允许其走我们既定的路线，即希望它发表一个我们已认可的宣言是可行的，并被认为是最明智的。在1月1日送交给中国外长的另一个备忘录里，相应地采取了上述路线，它进一步指出了即将进行的谈判免遭不幸事件危害的重要性，并表明陛下政府由此迫切希望中国政府向各省和地方官员发出严格的指示，在达成修约协议前，与英国人有关的各种条约应被视为完全有效。

蓝普森爵士于1月2日离开北京赴宁，以上述指示为基础开始谈判。

我们已表明了对治外法权司法方面（包括民事和刑事）的态度，剩下的仅是治外法权的行政管理方面，它包括外国租界管理办法，对在华外国人和公司的征税及外国船舶的豁免权。这些是很重要的问题。陛下的政府仍感兴趣的租界是英国的天津租界、厦门租界、广东租界（沙面）和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支配

权。上海公共租界问题将在单列的题目里探讨。厦门和广东租界无关紧要。英国的天津租界当局，目前正在华人占有相当名额的市政府领导下顺利行使职能。至于税收，除了上交现存条约规定的税款（如海关税），英国人及其商行享有免交此外的任何税收之待遇。实际上，他们不得不交纳大量的非法税，尤其是在货物运输方面。陛下政府的政策是，如对中外货物不加区别，即提抗议，同时劝诫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交纳税款。

外国船舶于目前不受中国政府干涉并免纳税款，吨位税除外。至于吨位税，我们有最惠国待遇。外国船只有权进入它们能进入的任何中国内河港口，它们可在中国沿海港口进行航运（虽然引出上述权利的条约，是由中国与意大利和其它一些小国签订的，已不再有效）。这些权力对英国运输业至关重要。中国显然想把沿海和内河贸易留给中国船只，对英国船行使管辖权。但同样清楚的是中国的海上贸易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承担如此巨大贸易量的水平。因此，至少在过渡时期，中国会与外国运输公司（主要是英日）达成某种妥协。这种妥协已含糊地谈论过，但问题迄今为止还没引起大家的关心。

商 约

为给英中讨论提供一个基础，蓝普森爵士于1929年6月向中国当局提交了一份以通常模式制订，且又避免引出任何治外法权问题的商约草案。中国回复了一个反建议案，提出了一些争议问题，交由专家审议。由于中国明确提出先解决治外法权问题，上述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商约草案内容是处理诸如税收和运输问题的。

上 海

就外人而言，所有中国问题中恐怕以上海的前途最为重要。这

一拥有约200万人口的大城市可能发展为世界人口最为稠密的城市。目前，这个城市划分为五个行政区域：（1）为居住约100万华人的公共租界，（2）为法租界，（3）、（4）和（5）区为纯中国行政管辖区，合称大上海。目前，注意力正集中于城市的商业中心公共租界。1928年前，它受9名外国人（其中英占5人）组成的工部局管理，去年增加了3名华董。城市管理按英国模式，职员主要是英国人。中国人自然会提出争辩：中国的大城市应由中国控制。但是，迄今为止（许多中国人虽然已经意识到，但又不愿意承认），仍无一个中国政府胜任于控制上海这样一个其复杂和重要性可比之于纽约和伦敦的城市。未来的上海市政不存有切实可行的既定答案，在困难形势中出现的问题须随时解决。千万要记住，上海的最终归宿是受中国的完全控制。不幸的是工部局似乎已失去了自信心，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即在他们的坚韧和对形势的了解中寻找不到补救之法，而指望政府采取行动或指望其它途径。一种潜的恐慌情绪日趋明显，它可能会引起危机，这应是上海最急于避免的。

工部局的华董问题的解决，突出的问题在临时法院（即上海会审公廨，各书的名称不同——译者注）。

这是一个中国法院，为对公共租界里上百万华人行使司法而建立。从它于1864年建立起，为了维持工部局和确保司法管辖接近西方标准，在征得中国当局的同意后，实行了某种程度的外国控制。1911年革命和影响深远的骚乱，使其几乎完全受制于外国领事和工部局显得尤为必要。1927年1月，与当地政府达成了一个临时协定，恢复了中国对法院的控制，但保留了某些保护条款，诸如在审理某些等级的案子时，领事代表参加会审。这一协定执行得很糟，引起了严重的磨擦。现在必须进行修改，而且中国人可能希望大大减少法院中的外国因素。各方皆认为，当前组成的法院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目前，法院已不为英国总领事的决

定所支配。根据《让渡协议》，外国代理人来源于各领事馆，实践表明，与其说是保护，还不如说是磨擦的根源。我们希望在即将开始的谈判中能采取主动姿态，以满足中国的愿望，从而建立起一个各方面都满意的新法院。由于法院的权力渊源仅在中国政府，而执行法院决定的警察权却在工部局。只要在公共租界里存在一个外国当局，行政和司法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冲突，这些冲突不可能因提交上级而得到平息。因而，行政和司法之间的协调（没有这种协调公共租界当局就无法运转其机器），只能在老练和谨慎的处置中，在双方的良好意愿中寻求解决冲突的办法。这是正在进行的谈判所注意到的问题之一。

关于上海，还应记住另外一点，每当真正的危险危及上海时（象1927年那样），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必须派出军队保护公共租界，仿佛公共租界是英国租界。上海防护军已被减至2000至3000人。就在沪外国人的切身安全而言，前不久似乎应撤出这些军队，但近来内战重新爆发，一度威胁到国民政府的生存，他们军队出现了被迫撤向沿海的迹象，这就表明，认为内战对上海的威胁已过是危险的。目前，治外法权谈判正值危机之际，再要撤退军队，难免被中国视为软弱之举，从而提高价码。因此，目前军队当留在上海，一旦我们的谈判圆满达成协议，形势又许可时，便撤退军队，以示姿态，庆贺问题获得解决。实际上，中国人并没对军队的存在表示出不满，从1927年年初起，他们甚至没对驻军问题提出过一个正式抗议。

近两年来，我们一直向上海的英国社会提供特别军事保护，为此向他们征税。但现在已遇到了某些实际困难，似乎有必要对其作进一步的考虑。工部局对上海防卫军占有的土地和建筑免收租金，个人住户也表现出同样的慷慨。然而，从一个诸如工部局的国际机构直接征税当然是不可能的。同时，考虑到它涉及困难的规章问题，向国外英国人征收所得税的建议迄今仍未被采纳。

威海卫和庚子赔款

这两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或许能相提并论，因为它们皆起因于1922年陛下政府欲对中国显示出慷慨的愿望，而且在这两件事上我们皆陷于令人痛惜的境地，七年来两手各持礼物东奔西走，却无法送出。

a) 威海卫 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为了有助于解决山东问题，我们宣布将威海卫租借地归还中国，其条件如下：作出安排，允许陛下政府的船只为疗养和夏季避暑停泊刘公岛；对威海卫增长起来的英国利益给予适当的考虑。由于中国人对此并不真正感兴趣，此后的谈判出现相当长时间的耽搁。但双方于1924年夏达成了协议，英国公使接到了签署这一条约的指示。但偏偏在此关头，发生了一场革命政变，其结果是公认政府消失，一个临时政府建立，直到一年后，英国政府才正式承认它。那时，一个竞争性的南方政府的壮大表明中国已完全处于分裂之中了。北京政府摇摇欲坠，向它交还威海卫并非明智之举。1929年，与南京国民政府重提此事，起初似乎会或多或少以1924年条约草案为基础达成协议，谈判过程中中国方面变卦，提出将把威海卫变成中国的军港，向陛下政府船只提供的便利，在三年期满后不再延续，这一地区不再作为商业口岸开放，对外国居民和外国贸易将不再提供便利。这一态度的根本转变，本来会为英国撤回1922年提议，回复到22年前的状况提供理由，但为了威海卫走这一极端是否值得却是个问题。蓝普森爵士曾接到如下指示：一旦合适的机会出现，他应向中国提议：(a)他们应在其它合适的地区提供1924年协议同意的便利；(b)提供这些便利之费用由中国政府负担，作为无偿转让岛上英国海军资产的酬报；(c)当可供选择之便利落实时，将放弃岛上英国海军财产；(d)中国政府应从外国财产所有者手里买下全部产权。

这一问题目前仍然存在，蓝普森爵士尚未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些建议。如果他们接受了，当然好；如果他们拒绝，陛下政府要么退让，要么再拖下去，两者取其一。

(e) 庚子赔款 1922年底，英国政府通知中国，我们已原则上决定，把英国享有的庚子赔款收益专用于有益于英中两国的工程项目。这些款项将于1922年至1945年间支付，金额总计1100万英镑。转拨这些资金须经议会程序，一开始就遭耽搁。然而，当1925年6月30日的中国赔款（适用）法最终载入《法令全书》时，上海事件恰好过了一个月。此时，反英运动遍及中国。实际上，从1922年起，整个形势已经变了，一个以威灵顿勋爵为首的代表团被派往中国寻求出路，代表团提交了一份报告书，提出了许多建议。报告于1926年底发表（Command Paper 2766, China No. 21926）。发表后的一个月后，反英势力煽动暴民进攻汉口和九江租界，英国政府已决定向上海派出防护军。我们虽想赠送这一礼物，但时过境迁，送交此种礼物已不合时宜。1929年春，英国对统一、友好的中国政府重提此事，要将这部分资金的管理权移交给中国政府。其条件是他们执行由1926年报告提出的教育纲要的总路线，而且，相当部分的资金要用于第一项建议，即在英国购买铁路建材，以供中国铁路复兴急需的物资，同时有助于解决英国至关紧要的失业问题。根据上述路线即将达成协议，中国交通部长却出面干涉，提出修改。如果这样，在英国进行铁路建材定货的规定就会化为泡影。同时我们了解到，中国政府想用这一资金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来完成广东——汉口铁路的建造，而这一工程从属于一个既存的条约，即1911年《湖广铁路借款合同》^①。这一合同及有关方面（中国除外）签订的附约有如下基本内容：如果此路的建材来源于国外，订货须经公开投标。就目前的价格而论，这等于说这些订货合同到不了英国手中。僵局出现了，为了

^① 即《粤汉、川汉路借款合同》——译者注。

取得进展，以下的对立原则须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调和：

(a)英国政府的愿望如下：便利对英国而言，应在英国订购铁路器材。

(b)中国政府的愿望是，这一资金须先用于建成广东——汉口铁路。

外交部已逐渐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可能途径，其它有关部门、蓝普森爵士和根据1925年法案建立起来的咨询委员会对此表示同意。为了修改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已相应草拟了具体指示并送交给蓝普森爵士。

海 关 总 署

海关总署始于1842年，那时五口岸对外通商，必然要收取这一贸易的进出口税。从无外国条约为基础来说，它纯粹是中国行政机关，海关聘用外国人始于1855年，当时，地方官吏在向外商收税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恰又遇到太平天国作乱，再添麻烦。上海首先聘用外国稽查员，这一制度是如此成功，以至各地效尤。赫德先生（后称罗伯特爵士）于1865年成为总税务司。1911年赫德死后，佛朗西斯·安格联继任。海关收取进出口税，沿海贸易税、中转税和外国船舶吨位税，还负责中国沿海、港口与可航河流的灯塔照明和浮标指航。它是一个国际性的服务机构，但英国职员占了半数。它一直是一个卓越的英国机构，英语是官方语，行政按英国模式建立。

在过去，维持海关不受干扰一直被视为至关重要的英国利益。这一行政机构是由伟大的英国天才建立的——四十多年里已故的赫德掌握着它的命运，经历了从微小的开端到拥有1400名外国人和6000名华人的整个壮大过程。对中国及中国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它给予了巨大的利益，中外各国人士对此有口皆碑。这一英国正直和效率的纪念碑有益于我们的威望，是我们在华的重要

财富。

对英国商人来说，海关行政按迄今指引它的方针运转至为重要，从而不仅在征税上，而且运用指导在华贸易的复杂规则上，确保公平的待遇。

有效地收取海关税，迄今为止一直是中国信誉的主要依靠，是外国债券持有者的主要保障，以海关税为抵押的外债已达22,400万镑。起初，英国在这些借款中占有3100万镑，其中2000万镑仍未偿付。第一笔以海关税为抵押的借款是中日战争的结果，于1894——1898年间订立。1900年加于中国的庚子赔款大大增加了外债。1894年，只有十分之四的海关税送交北京，其余的为各省留存。但到了1911年满清政府结束时，所有的海关税皆为外债吸干。由于贸易的增长，1917年庚子赔款的免除和引入了华盛顿附加税及新税表，关税有了相当的剩余。但国民政府立刻以国内短期贷款的方式把这些剩余税收抵押了2000万英镑。

1911年是中国海关行政史上的关键时期。迄止1911年，海关的外国总税务司仅仅掌握收钱的机构，不直接掌管钱。关税直接交往各口岸的中国主管人，中国当局自己作出安排，或送交中央政府，或自己保管，或偿还以关税为抵押的借款。应该指出，中国从不违约。理所当然，他们的信誉始终很高。

1911年革命爆发，自然有一个时期相当混乱。一些官吏仍效忠于满清，一些转向革命党，另一些人弃职而去。政府系统崩溃，实际上首次出现了不履约的状况。

为防止海关税落入革命党手中，挪用偿还外债的海关税，约翰·朱尔典爵士作出一项安排。据此，各口岸的海关税交往外籍海关专员，由他们汇总税务司在上海的某些外国银行的帐户上。1912年1月30日《托管银行协议》使这一安排具体化了。

为了确保所有以海关税为抵押的外国债务按期得到合理的偿还，这一协议规定，外交使团为整个海关税的托管人。此后每当

海关税有了剩余，这一协议又被理解为外国对这些增加的税收有控制权，不经外交使团的同意，总税务司不能把它们送交北京政府。这一协议更使海关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从此它具备了双重职能：（1）它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机构；（2）它是外交使团实施托管使命和继续对整个海关税收进行控制的工具。

因而，在外交使团的支持下，由佛朗西斯·安格联领导的海关一度成为（在北京的）中国政府的出纳员，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老板。由于海关仅和北京政府保持一致，它成为广东国民政府的攻击目标。广东国民政府公开表示对它的仇恨，指责它为外国人的压迫工具，宣布他们决心彻底取消它。1926—1927年间，佛朗西斯·安格联爵士的职务日益遭到妒恨，他领导的海关不得不向两个相互处于战争状况中的政府效力，不得不作出安排以收取华盛顿附加税，由于日本的反对，收取这一附加税仍不为条件许可。最后，由于拒不收取这一附加税和胆敢与南方政府建立个人联系，他于1927年1月31日被北方政府解职。北方政府任命了易执士先生为署理总税务司，而南京的国民政府则信任他们的海关事务顾问、上海海关（江海关——译者注）专员梅兹先生。这一分歧既丧失威信又充满危险，持续了2年，最终以易执士先生于1929年1月自动辞职和任命梅兹为总税务司而告结束。从发出1926年12月备忘录起，英国政府有意于改变外国控制中国海关的政策，把海关恢复到革命前赫德时的状况，即海关是中国政府忠诚和有效率的仆人而不是它的主人。大家皆认为这是挽救海关免于崩溃的唯一出路。由于我们从1926年起一直坚定地施加着压力，更大程度上是由于任命梅兹，这一目标已基本达到。

梅兹先生在担负这一艰难使命中表现出了智慧和理解力，他已把这一行政机构统一起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重新确立了地位。但是，已很清楚，它将越来越成为一个中国化的机构，由中国人任总税务司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就其职员构成而言，海关作为英

国利益的重要性已不能和1925年以前相比，但就其作为中国政府
和外国商人调节器的职能而言，它一如既往。虽然中国在海关中
的影响会与日俱增，但应该作出一切努力，尽可能地维持赫德所
创建的传统精神。

与日本和其它列强的关系

英国在华政策的原则之一，是与在华享有利益的列强尽可能
地维持合作关系。合作的通常媒介表现为北京外交使团的例会，
各公使在会上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相互磋商制定政策以供各自
政府参考。欧洲大战前，外交使团的威望和权力是对付中国推诿
和阻拦的有力因素。战争毁掉了这一威望，无论是从个别看还是
从联合起来看，列强的地位皆受到了削弱，同盟条约的存在本应
使大不列颠和日本之间有着紧密的合作，但日本滥用这一同盟以
谋私利，几乎不顾或完全不顾它的伙伴。日本于1915年向中国提
出最后通牒，通常称之为“二十一条要求事件”，更是臭名远
扬。这直接导致了同盟的终结，或确切地说，华盛顿条约取代了
同盟。华盛顿条约曾为与会八国（中国除外）合作、恢复外交使
团的活动辅平了道路。这一新的合作形式没能很好起作用，关税
会议的失败及1925年的情形证实了这一点。当时英国被中国孤立
出来作为攻击目标，其它列强非但不予援助，却表现出幸灾乐祸
的态度。但是1927年事件使他们再度团结起来。当时，日本日益
卷入济南府附近的战斗，他们向英国提出了一些紧密合作的含蓄
建议。前外相内田康哉于事件后的9月份前往英国，以解释日本
在华政策之目标，探讨合作之途径。这一临时活动并没有导致任
何实际结果。但是两国驻北京公使奉命保持密切联系，尤其是在
探讨共同感兴趣所有问题上，以便形势需要时，有关政府要么认
可对方保留意见，要么同意采取和同意协调此种联合步骤。从那时
起，它一直是英日在华政策的基础，并发挥着作用，令双方满意

亦有益于双方。

事实上，日英两国在华利益的区别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日本政策必然会出现某种不同于我们的变化。如在维持治外法权方面，他就不象我们那么关心。他准备以放弃治外法权为筹码，与中国作交易，从而保护其特殊利益，尤其是在满洲的利益。日本正准备根据这一宗旨与中国谈判，从而就条约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不能指望日本的支持，尽管在某些时候我们一起共事不无便利。

银 行 团

列强之间的合作除有政治基础以外，还有以1920年的《银行团协议》为形式的财政经济基础。这一协议源于1895年中日战争后在华瓜分殖民地的历史。有关政府和商界已经意识到合作比不加限制的竞争更令人满意。战后的形势促成了四国银行团，这一计划最初由美国发起，得到了英国政府的热烈支持。《银行团协议》规定：今后，英、美、日、法四国的代表性大财团在平等的基础上，平等地参加所有对中国政府或政府部门或各省的公开借款，既包括用于行政的借款又包括用于工业事业（铁路等）的借款。这一协议得到了有关政府的支持，各国政府保证对本国的银行财团成员给予充分的支持。这一银行团自建立之日起就产生着完全消极的作用。其欲防止那些不负责任、只顾私利的政治家为一时同中国缔结借款合同。事实上，过去九年来中国的信誉是如此之低，以至令人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在国外市场上无力举债是否应归罪于银行团。无论如何，对中国人来说，关于银行团的整个构想令人诅咒。他们认为它是一种列强从财政上束缚中国的企图。随着信誉的提高（在目前形势下它理应如此），他们当然会向银行团以外的银行家和非银行团国家寻求援助，而不求助于银行团。因此就出了问题，银行团的存在是否会既有益于中国，又有

益于列强。尤其是在工业借款方面，如假使中国提出一项合理的铁路建造建议，由于银行团的伙伴不参加，属于银行团的英国企业当然也无法插手，这自然会触怒中国人，致使他们转求它方。另一方面，陛下政府对能参与此项投标的非银行团英国公司无法提供援助。在处理庚子赔款政策与建造广东——汉口铁路的关系时，我们开始深深感到，在做实际生意时，银行团义务多有妨碍。这些困难已告知蓝普森爵士以作观察评论，现在我们正期待着结果。我们已向他作出如下提议：在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常进程方面（即铁路和其它工业借款），似乎设计不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国际合作结构，从而可以防止国际竞争束缚英国工业家之手，而不是防止束缚他们的竞争对手。因此，最好还是恢复自由体制和公开竞争。

孔祥熙致唐绍仪密函

学通 译 沈自敏 校

编者按：关于唐绍仪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历史之迷。这封孔祥熙于1938年7月5日致唐绍仪的密函，或许对于我们解破这个迷团不无裨益。该函用中央银行（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16开信笺，英文打字，末尾有孔祥熙亲笔英文签名。原件现藏于香港唐绍仪夫人处，由唐绍仪女儿唐宝塔提供。

少川先生勋鉴：

六月廿七日大札，业经诸夫人^①转交，承蒙先生相示以诚，深致谢忱。得悉先生近状，殊感欣慰。专此奉复，恭祈康健。

诸夫人告知，先生以国难为虑，渴望于国事有所襄助。祥熙深知，先生以战争致民众于水火揣悬于怀，且深有同感。值此国难当头，先生身为党国元老，远虑深谋，当于国事多有献替。故藉诸夫人回沪之际，代聆廑教，尚祈竭诚相告。先生之博知卓识，当于汉口诸公之筹谋不无裨益。

先生之意，欲得公正和平，须中日公开谈判。祥熙不揣粗陋，略陈管见。

中日交战，衅非我启。战争初期，我方别无选择，时至今日，或有公正和平之望。交战虽不可免，然战局终有了结之时。姑无论如何了结，战争于中日民众均非幸事。我可容许之公正和平何日可得，此乃问题所在。若前途明朗，自当不致久陷民众于水火之中。

^① 唐绍仪的大女儿。

目前似有两途，甚值一试：一，藉先生之有利地位，探试日方于和平意向。诚然，欲谋和平，日方须先排除种种障碍。二，恃中日名望声重之民间人士，共同倡议和平，呼吁双方当局进行和平谈判。据悉，此议日方已在进行。

当此之时，中日政府似均期和谈，唯尚羞于启齿耳。且日方一再声称，不接受第三者之调解、仲裁。上述两途，或于摆脱僵局，停息敌对，不无益处。

上述建议，谨供参考。无论先生何为，用心之良，致力之勤，祥熙均至表钦佩。仍恳随时赐教，诚挚之见，自当倍加重视。倘有嘱托，乐于奉达。敬祈

福祉

孔祥熙顿首

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五日于汉口

· 史料研讯 ·

迫清帝退位通电列名者考

张 黎 辉

1911年，袁世凯为迫使清廷退位，曾指使段祺瑞、姜桂题等北洋将领通电，要求共和。据陶菊隐著《北洋军阀史话》和《六君子传》二书所说，当时列名通电者为四十七人。黄毅《袁氏盗国记》说，列名通电北洋将领为四十余人。白蕉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谈及段祺瑞等联名通电迫宣统退位，未列通电将领数字。钱基博《辛亥南北议和别纪》中提到北方诸军统兵大员四十二人（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八册）。同一电文，众说纷纭，究竟有多少北洋将领列名呢，笔者现看到武昌都督府收文电牒抄本，民国元年二月栏内电文一通，列名者为五十人。

此电原为唐绍仪致段祺瑞，请其开列赞成共和通电将领名单。段复电谓，通电赞成共和将领五十人。唐接电后，将电文转致南方革命政府和谈总代表伍廷芳。伍转电孙中山、黄兴、黎元洪等人。兹将电文按原文抄录于后，个别人名疑有误。

南京孙大总统、黄陆军总长、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北伐联军总司令鉴：唐君绍仪电询段军统联名赞成共和诸将姓名，兹得复电，开列于左：

署理湖广总督第一军总统段祺瑞，古北口提督毅军总统姜桂题，护理两江总督长江提督张勋，察哈尔台都统陆军统制官何宗莲、副都统段芝贵，河南布政使帮办军务倪嗣冲，陆军统制官王占元、陈光远、李纯、曹锟、吴鼎元、潘榘楹、孟恩远，总兵马金叙、谢宝胜，王怀庆，参议官靳云鹏、吴光新、曾毓隽、陶云鹏，

参谋官徐树铮,炮队协领官蒋廷梓,陆军统领官朱泮藻、王鼎镜、鲍贵卿、卢永祥、陈文运、李厚基、何丰林、张模元、马继增、周符麟、萧广亭、聂求淬(?)、张锡元、施从滨、萧安国,营务处张士钰、袁乃宽,巡防统领王汝贤、洪自成、高文贵、刘金标、赵倜、仇俊圉(?)、嵇启、刘兴顺、柴得贵,帮办天津防务张怀芝。正定镇徐邦杰亦同意,复电迟,故未列云云。特为转致。廷芳。冬。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74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代史資料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李学通
封面设计：冯式一
版式设计：刘建光

近代史资料
JIN DAI SHI ZI LIAO

总 74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主编 章伯锋 副主编 庄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20 千字

1989 年 7 月第 1 版 198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700 册

ISBN 7·5004·0560·X/K·64 定价：3.80 元